江西宗派研究

伍曉蔓 著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四川出版集

巴蜀書

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7-80659-728-X

9 787806 597286 >

ISBN 7-80659-728-X/B·126
定價：27.00圓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江西宗派研究

伍曉蔓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江西宗派研究/伍曉蔓著.—成都:巴蜀書社,
2005.6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叢書)
ISBN 7-80659-728-X

Ⅰ.江... Ⅱ.伍... Ⅲ.江西詩派-文學研究
Ⅳ.I207.2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45250 號

江西宗派研究 伍曉蔓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4122206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開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張	15.25
字　　數	300千
書　　號	ISBN 7-80659-728-X/B·126
定　　價	27.00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换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編委會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祝尚書　俞理明
　　　　沈伯俊　蔣宗福　張　勇
　　　　楊文全　段志洪　汪啓明
　　　　楊宗義

秘　書：劉長東

序

祝尚書

三年多前，伍曉蔓同志跟隨我學習唐宋文獻；三年後，她提交了題爲《江西宗派研究》的博士論文，得到同行專家們的很高評價，一致認爲是一篇優秀博士論文，順利獲得了博士學位，并因此留校任教，成爲我的一位年輕同事。最近，她因這篇論文入選四川大學“211 工程”建設項目“俗文化與中外文學”學術著作系列，即將由巴蜀書社出版，故向我索序。

“江西詩派”是宋代文學中影響最大的詩派，也歷來是宋詩研究的熱點，雖相關成果不少，但并非盡如人意。曉蔓入校之初，我閱讀了她研究玄言詩的碩士論文，覺得她思辨能力强，文筆好，若再濟之以文獻功夫，必將有所成就。故到博士論文選題時，提議她摸摸“江西詩派”。我的想法是，這一“塊”不僅是宋詩研究的“高地”和前沿，而且難度大，理論性强，涉及文獻廣，也許能發揮她的長處，彌補其不足，從而得到較大的鍛煉和提高。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她將視綫集中到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圖》。她認爲，已有的莫礪鋒先生的《江西詩派研究》和臺灣學者龔鵬程先生的《江西詩社宗派研究》兩部專著，主要目的在

搭建“江西詩派”研究的理論根基和基本框架，尚未深入到《宗派圖》所列的具體詩人，特别是中小詩人，單篇論文涉及的也不多，故“江西詩派”研究雖然熱鬧，但對《宗派圖》詩人的研究却很不夠，留有較大的開掘空間。於是，她決定把研究重點放在《宗派圖》中的二十五位詩人，加上吕本中，共二十六人，將戰綫由“江西詩派”退到“江西宗派”——“詩派”與“宗派”雖衹一字之差，定位却不相同：前者是源流兼及，後者主要是溯源。

戰綫上的“退”，并非退避，從某種意義上説，其實是捨易就難。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圖》作於何時？“江西宗派”是怎樣形成的？首先就遇到這樣一些學術界争議大、迄今解決得并不理想的棘手問題。就是研究《宗派圖》二十五詩人（加吕本中爲二十六人），也非易事，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曰：“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江瑶柱似荔子’，又‘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捨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要從“味”而不是從“形”認識“江西宗派”，既要弄清“宗派”共有的“味”，又要分辨黄庭堅、陳師道、二謝、三洪等二十多人不同的“味”，談何容易，所以連楊萬里《序》也感嘆道：“嗟乎，離神與聖，李蘇李蘇乎爾，杜黄杜黄乎爾；合神與聖，李、蘇不杜、黄，杜、黄不李、蘇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

曉蔓經過極大的努力，遍考文獻，認爲吕氏《宗派圖》應該是大觀末、政和初的作品，其他説法都未必可信。這雖然仍是“推論”，但較他説似乎更有文獻依據，可信度也更高。至於“江西宗派”的形成，作者經過仔細梳理，認爲先有地域性如南昌、臨川、黄岡等多個詩人小群體，這些小群體間又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氣味”相近，通過結社等方式“同作并和”，表現出强烈的群體意識，經過多次整合，最終形成爲一個帶有宗派性的大群體——“江西宗派”，從而釐清了宗派建構的基本脉絡。

《江西宗派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對“江西宗派”領袖人物、“宗派”之“宗”黄庭堅的研究。作者認爲，在元祐作家中，黄庭堅既對儒家道德有着堅定的信仰，同時又疏遠政治，親近佛教，具有獨特的文化人格。他的詩歌理論和實踐，開創了屬於自己的、具有典範意義的詩歌範式：要求有道德皈依和智能關照，標舉性情本體性，而又與韓愈的“不平則鳴”不同，他的創作是爲了抒發“不怨之怨”，化解内心矛盾，因“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書王知載朐山雜咏後》)。黄庭堅處於不平則鳴與夷然喪我之間，在壓迫中行自由，因此，瘦硬、幽僻、冷雋、倔强是其主要的美學特徵。這對於封建社會後期詩人走向個體化、邊緣化、内省化，具有普遍意義，容易引起深層的共鳴。黄庭堅又注重師承與傳授，上繼歐、蘇詩統，同時又諄諄教導後學，形成并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徑——“山谷家法”：治心養氣，得之心地；熟參前作，自爲己出；經由法度，到達自由，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點鐵成金”説，一般認爲還有“奪胎换骨”説等等。而山谷詩學的着眼點在個體體悟，學習詩法是爲了超越法

度，前作與法度，都是獲取自家面目的“筏”而非“岸”。

除黃庭堅外，《江西宗派研究》對《宗派圖》所列詩人及呂本中一一作了考察，詳辨各家之“味”，而在整個考察過程中，作者特別注意“知人論世”，把所論詩人置於“元祐黨禁”這個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下。作者認爲，如果説元祐文學已面臨轉型傾向的話，那麼元祐黨禁時代，江西諸派面臨的則是强制性的轉型。這個觀點是很深刻的，可説是認識“江西宗派”的一把鑰匙。這篇論文寫作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回歸文本，認真研讀每位詩人的作品，從作品和相關文獻中抽繹結論，絶不架空設論。論文還特别注重宏觀研究與微觀考察相結合，在一個要求具有廣闊視野的題目中，作者不放過似乎是微小的文獻辨證。如據洪朋《跋山谷帖用其韻》，他必定卒於黄庭堅後，而非《四庫提要》所説的黄庭堅猶得見其遺稿。又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記晁冲之在政和間作《漢宫春·梅》詞獻蔡攸，即除大晟府丞；作者據陸游《家世舊聞》（卷下）等，考證做過大晟府丞的衹有晁氏濟州“疏族”晁端禮，而非冲之，胡氏之言斷不可信。由於有了這些考證功夫，論述就顯得更有根基。

論文最後指出，“江西宗派”詩人從通經明用退歸淡泊自守，主題、題材向深、狹發展，失去闊大之境，偏僻、偏瘦、偏生、偏硬，而後學又漸漸失落山谷詩學的創新精神，如陳巖肖所説：“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庚溪詩話》卷下）這些弊端，雖呂本中以“活法”補救，仍在南宋顯露無餘，以至元好問有“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語。乾道、淳熙間，陸游、楊萬里等入室操戈，

濟之以晚唐巽味，後來晚唐詩派相繼興起，江西派於是從主流地位撤離。清晰的思路，既深刻揭示了“江西派”由盛到衰的深層原因，也勾畫出了南宋詩歌的發展路徑。

伍曉蔓同志聰慧執着。三年的攻博生活十分勤奮、緊張和清苦，論文撰寫期間，更是焚膏繼晷，真所謂“爲伊消得人憔悴”；她最終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巨大的付出終於得到了豐厚的回報：經修訂後的論文就要成“書”了。固然，現在出版的這本書，雖饒精彩勝義，還不能説就十全十美。曉蔓還年輕，這纔僅僅是起點，今後的路還很長。願她不斷努力，勇攀學術高峰。是爲序。

2004年10月16日寫於川大竹林村寓所

目　錄

序 ………………………………………………………… 祝尚書 1

緒　論　《江西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宗派 ………………… 1
第一節　《江西宗派圖》寫作年代辨正 ……………………… 4
　一、"少時戲作"和紹興三年説…………………………… 6
　二、少時戲作説優於紹興三年説 ………………………… 8
　三、《江西宗派圖》作年………………………………… 12
第二節　"江西宗派"釋名 ……………………………… 16

第一章　文學盛世下的陰影 ………………………………… 26
第一節　從新舊黨争到元祐黨禁 ………………………… 27
　一、新舊黨争 ………………………………………… 28
　二、元祐黨禁 ………………………………………… 36
　三、宋型文化的痼疾 ………………………………… 39
第二節　文學轉型的呼聲 ………………………………… 41
　一、文字獄的警示 …………………………………… 41
　二、元祐體詩歌的轉向 ……………………………… 49
　三、新文學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 ………………… 54

第二章　江西詩宗——黄庭堅 …………………………… 58
第一節　典範的建立 …………………………………… 58

一、文化人格 …… 59
二、詩學範式 …… 74
第二節　師承與傳授 …… 88
一、獨自參悟，東坡印證 …… 89
二、詩學傳承的勾勒 …… 96
三、師友淵源的指示 …… 99
第三節　山谷家法 …… 103
一、治心養氣，得之心地 …… 103
二、熟參前作，自爲主出 …… 106
三、經由法度，到達自由 …… 110

第三章　江西宗派羣體特徵 …… 113
第一節　蟄伏：出處的選擇 …… 113
第二節　堅持：斯文的承傳 …… 122
一、理學淵源——“詩人而入學派” …… 123
二、佛學修養——“精於一而萬事畢” …… 132
三、詩學傳承——“知味者當能别之” …… 145
第三節　團結：羣體的力量 …… 153
一、同聲相應——地域型小羣體的出現 …… 154
二、同氣相求——宗派型大羣體的確立 …… 158
三、標志性唱和事件 …… 163

第四章　陳師道 …… 179
第一節　生平：窘困生涯的承擔 …… 180
第二節　詩歌淵源及特色 …… 186
一、師黄與學杜 …… 186
二、苦吟詩人的文字境界 …… 196
第三節　後山句法 …… 201
一、章法——縮地法 …… 202

二、句式——造句法………………………………………… 205

第五章 山谷四甥……………………………………… 218
第一節 洪朋………………………………………………… 219
一、生平簡述……………………………………………… 219
二、擺脱、超脱和解脱的主題………………………… 224
三、尚未脱盡的摹擬…………………………………… 227
第二節 洪芻………………………………………………… 230
一、生平簡述……………………………………………… 231
二、初啓江西惡調……………………………………… 235
第三節 洪炎………………………………………………… 240
一、生平簡述……………………………………………… 240
二、人生境遇的悟證…………………………………… 244
第四節 徐俯………………………………………………… 248
一、生平簡述……………………………………………… 248
二、悟入與中的………………………………………… 252
三、法度與情韻………………………………………… 255

第六章 臨川四友……………………………………… 259
第一節 謝逸………………………………………………… 260
一、生平簡述……………………………………………… 260
二、贈答詩的風采……………………………………… 264
第二節 汪革………………………………………………… 271
第三節 饒節………………………………………………… 278
一、生平簡述……………………………………………… 278
二、木上座與管城公——詩禪相通的合理性認同……… 283
三、“舉似雲門第二關”——爲僧後詩更高 …………… 286
第四節 謝薖………………………………………………… 291
一、生平簡述……………………………………………… 291

二、重意詩歌的情致偏枯………………………………293

第七章　南康詩人………………………………………296
第一節　李彭……………………………………………296
一、生平簡述………………………………………297
二、高格與妙理的底蘊……………………………302
三、詩畫相通的審美認同…………………………304
四、平夷、奇崛相濟的詩風………………………308
第二節　祖可……………………………………………311
第三節　善權……………………………………………315

第八章　淮南詩人………………………………………319
第一節　潘大臨、潘大觀………………………………319
一、二潘生平………………………………………319
二、潘大臨詩歌：意與力的失衡…………………326
第二節　何顒……………………………………………330
第三節　林敏功、林敏修………………………………335

第九章　開封詩人及其他………………………………341
第一節　王直方…………………………………………341
一、生平簡述………………………………………342
二、詩話：述而不作的正確定位…………………347
三、詩歌："雖不熟，亦有格"……………………349
第二節　李錞……………………………………………351
第三節　夏倪……………………………………………353
第四節　晁冲之…………………………………………359
一、生平簡述………………………………………360
二、詩歌："意度沉闊，氣力寬餘"………………368
第五節　江端本…………………………………………371

第六節　楊符……………………………………………… 375
第七節　高荷……………………………………………… 378

第十章　韓　駒……………………………………………… 382
第一節　生平：“三黜本因元祐學”……………………… 382
第二節　詩論：江西宗派詩論的重要建樹……………… 390
第三節　詩歌：行針布綫的高手………………………… 397
第四節　餘論：“官樣文章”的考察…………………… 402

第十一章　吕本中……………………………………………… 408
第一節　生平：中原文獻的淵藪………………………… 408
第二節　理學家修養與詩人活法………………………… 418
　一、理學修養的滲透…………………………………… 418
　二、文學本體的立場…………………………………… 422
　三、詩統説的提出……………………………………… 426
第三節　詩歌的分期評述………………………………… 432
　一、崇寧末、大觀初詩歌……………………………… 432
　二、大觀後期至宣和末詩歌…………………………… 434
　三、圍城及亂離中詩歌………………………………… 437
　四、晚年詩歌…………………………………………… 441

結　語……………………………………………………… 446

參考文獻…………………………………………………… 451

後　記……………………………………………………… 471

緒　論
《江西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宗派

江西宗派是宋代影響最大的詩歌流派，它得名自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圖》（以下簡稱《宗派圖》）。該圖并序數百言，標舉宗主黄庭堅的詩學觀，勾勒出當時一個以黄庭堅爲“宗”，其餘二十五名詩人爲“派”的詩人羣體。歷史上這二十六位詩人并未開宗立派，故“江西宗派”是吕本中爲總結某種文學現象而創造的詩學術語。吕氏的文學眼光是敏鋭而獨特的，在北宋哲宗、徽宗朝，確實存在這樣一羣詩人，他們生存在元祐黨禁的時代，却學禀元祐，師友承傳，在民間形成一股隱伏的力量。他們中以江西人爲主，詩歌多受黄庭堅影響，因共同的政治態度、詩學興趣同氣相求，形成一個全國性的詩人羣體，出現“同作并和，盡發千古之秘，無餘藴也”[①] 的盛况。江西宗派這個名詞，正是吕本中對當時這樣一個具有文學流派性質之文學團體的稱謂。

---

① ［宋］吕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序》，載［宋］趙彦衛撰、傅根校點《雲麓漫鈔》卷十四，中華書局，1996 年，第 244 頁。按：《江西詩社宗派圖》實《江西宗派圖》之傳訛，參謝思煒先生《吕本中與〈江西宗派圖〉》相關論述，載《文學遺産》1985 年第 3 期。

吕氏的《宗派圖》并序寥寥數百言，却對後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首先，它勾勒出一個以黄庭堅爲宗主的詩人羣體。這就給後世留下了“江西宗派”、“江西詩派”這樣的題目①，從南宋以來直到今天，這都是詩歌研究的興奮點。其次，《宗派圖序》標舉的宗主黄庭堅的詩學觀在南宋得到熱烈響應，成爲後代詩歌學黄的理論基礎。從江西宗派的徐俯、韓駒、吕本中，到江西宗派後學曾幾、陸游、楊萬里，中興詩人幾乎都受黄庭堅詩風的影響。人們把詩歌學黄的現象歸結在江西宗派的名號之下。南宋人紛紛成立江西宗派的“後社”、“續派”、“别派”，如黄汝嘉刻《江西續派》曾紘、曾思父子集，趙蕃、韓淲、羅琦自立“江西别派”，劉克莊刻《江西詩派》選集，以曾幾、楊萬里“繼宗派”②；南宋大詩人大多進出於江西詩派，一度流行的其他詩派，如江湖詩派、晚唐詩派，都是在與江西派詩風或改造、或對抗的關係中出現；南宋詩論，幾乎都圍繞着贊同或反對江西詩風的問題展開。元代之後江西詩風式微，却并未熄滅，直到晚清同光體詩派，江西派詩風還一度燃起死灰餘燼。這些附着在江西宗派、江西詩派名目下的流變，無不當溯源到《江西宗派圖》。故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圖》，是江西宗派研究的起點，也是宋詩學乃至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中值得重視的寶貴文獻。

《宗派圖》并序數百言，原文不傳，如今我們衹能看到《苕

---

① “江西詩派”是由“江西宗派”衍生出的名詞，兩個稱謂既有區别又有聯繫，將在下文論述。

② 據［宋］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四部叢刊初編》本。

溪漁隱叢話》《雲麓漫鈔》中百餘字的引述。兩處皆節引，在詳略、文字上稍有出入，從中可以知道，《江西宗派圖》列黄庭堅以下詩人共二十六人。序言大意爲，詩道自元和末衰落，直至國朝黄庭堅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同作并和，盡發千古之秘，其源流出自黄庭堅，録下他們的名字，就叫"江西宗派"。其宗黄的詩學觀可以明確。但自南宋以來，對《宗派圖》的寫作時間就有北宋末（少時戲作）和南宋初（紹興三年）兩種説法。對江西宗派的命名根據、《宗派圖》排列次序和選擇標準，人們已不甚了了，往往提出這樣的疑問：

1. 圖中人物非盡出江西，何以言"江西"？

2. "宗派"二字怎講？

3. 關於《宗派圖》詩人，《苕溪漁隱叢話》與《雲麓漫鈔》所引略有出入，孰是孰非？

4. 選擇這些人物的標準是什麽？就南宋人看來，這些人大多無甚名氣；就我們今天來看，王蕃、楊皓、歐陽元老這些親炙山谷教導的學者未入列，汪革、謝逸等從未見過山谷，反而入圍，豈不奇怪？奇怪的還有：江端友詩歌學黄，名氣大於江端本，爲何捨兄取弟？四洪名聲齊等，何以遺落下洪羽？曾幾詩學居仁，大有江西詩風，爲何不入選？等等。

以上問題都關涉到吕本中《宗派圖》的創作意圖和選取標準，也關涉到江西宗派的性質與定義。畢竟《江西宗派圖》是

“吕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①]。該圖的著作權屬於吕本中，我們不必像南宋人那樣急着批評他“選擇弗精，議論不公”[②]，而是應該首先瞭解吕本中本人確定概念、選取人物、界定範圍的標準。於是，吕本中何時作《宗派圖》，其標準是什麽，意義何在，就成爲問題的焦點。在此基礎上，筆者樂意探討：何爲江西宗派？它與“江西諸人”、“江西諸派”、“江西詩派”這些概念的區别和聯繫何在？如何對本文的研究對象進行界定？概言之，從吕本中《江西宗派圖》的視野進入江西宗派詩人羣體的研究，是本文即將展開的知人論世、尚友古人歷程的引子與前奏。

第一節　《江西宗派圖》寫作年代辨正

關於《江西宗派圖》的寫作年代，歷來衆説紛紜。南宋的資料衹留下數則相互抵牾的記載：紹興年間，吕本中本人不止一次地告訴别人，此圖爲自己的“少時戲作”，亦即北宋末期作品；他的一些同時代人却認爲該圖作於南宋初，吴曾《能改齋漫録》更明確提出此圖爲紹興三年（1133）所作。這種争論一直延續到當代，形成了三種觀點：

---

① ［宋］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引程叔達語，載《誠齋集》卷七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第 328 頁。

第一，崇寧一、二年（1102、1103）說。由莫礪鋒在《江西詩派研究》[①] 中，在“少時戲作”說的基礎上，通過對《宗派圖》詩人饒節出家時間的考證提出。

第二，紹興三年（1133）說。孫鯤《〈江西宗派圖〉寫作年代獻疑》[②]、黄寶華《〈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詩派〉總集的刊行》[③] 重申紹興三年說，成爲崇寧一、二年說外的另一種聲音。

第三，政和元年（1111）說。謝思煒在《吕本中與〈江西宗派圖〉》一文中根據《宗派圖》詩人的活動情況提出，但一直未得到回應。最近，又有姚大勇《〈江西宗派圖〉作年考》[④] 提出相似觀點。

以上三種觀點，崇寧一、二年（1102、1103）説寫入程千帆、吴新雷主編的《兩宋文學史》，被大多數學者引用，爲目前影響最大的一種説法；紹興三年説有史料爲證，曾在歷史上佔統治地位，到了今天，其論證也較爲有力，是反對崇寧一、二年説的最强大聲音；與如上二説以考證爲據相比，政和元年説乃出於推測，故其影響不大。但在筆者看來，在如上三種觀點中，恰恰是最後一種推測方是《江西宗派圖》寫作年代的最合理答案。《宗派圖》的寫作年代問題，關涉到江西宗派産生的歷史環境、江西宗派的命名標準，對江西宗派研究來説，絶不是可以輕易忽

① 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齊魯書社，1986 年。
② 載《九江師專學報》1991 年第 4 期。
③ 載《文學遺産》1999 年第 6 期。
④ 載《江海學刊》2001 年第 3 期。

略的問題，亟需明斷。

一、“少時戲作”和紹興三年説

崇寧一、二年説、政和元年説、紹興三年説，首先源於南宋以來糾葛不清的“少時戲作”和南渡以後説的分歧。“少時戲作”，出自曾季貍《艇齋詩話》、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艇齋詩話》云：

>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後人妄以為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1]。

《陵陽先生室中語》的記録更爲詳細：

> 家父嘗具飯，招公（韓駒）與吕十一郎中昆仲。吕郎中先至，過僕書室，取案間書讀，乃《江西宗派圖》也。吕云：“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語。公曰：“居仁却如此説！”《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官開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為數等。初不爾也[2]。

---

① ［宋］曾季貍《艇齋詩話》，載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册，中華書局，1983年，第296頁。

② ［宋］范季隨《陵陽先生室中語》，載［元］陶宗儀《説郛》卷四十三，張宗祥重校《説郛三種》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04頁。

這兩段記録産生在南宋初期，曾季貍與范季隨都曾親見居仁。據此，南宋初，吕本中曾不止一次向人表達《宗派圖》是他的“少時戲作”。然而，與吕本中同時或稍後的南宋人似乎并不認可作者的聲明。吴曾指出，《宗派圖》乃作於紹興三年（癸丑）：

> 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①]。

紹興三年吕本中五十歲，若《宗派圖》果作於是年，自然不會是作者的“少時戲作”。與吴曾的觀點相近似，南宋人多認爲《宗派圖》爲南渡後所作。如李光《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詩自注：“近日吕居仁舍人作《江西宗派序》，以魯直爲宗主也。”[②] 王十朋詩：“近來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韓子蒼。”[③] 周必大也説：“陵陽先生早以詩鳴，蘇黄門一見，比之儲光羲；暨與徐東湖遊，遂受知於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詩社。”[④]“近日”、“近來”、“晚年”，都指向紹興年間，不支持“少時戲作”説。

---

① ［宋］《能改齋漫録》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上册，第 280 頁。

② ［宋］李光《莊簡集》卷七，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全書》）第 1128 册，第 495 頁。

③ ［宋］王十朋《陳郎中公説贈韓子蒼集》，載《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宋］周必大《題山谷與韓子蒼帖》，載《文忠集》卷十九，《四庫全書》第 1147 册，第 194 頁。

“少時戲作”和“紹興三年”，必有一說爲誤。從南宋初期開始，就有人猜測“少時戲作”説不出於吕本中之口。如周煇《清波雜志》卷八引前輩話：“東萊自言宗派本無詮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黨東萊者創此説以蓋時論，非本語也。”① 懷疑“少時戲作”説不是作者的原話，而是出於吕本中親舊的編造。據説南宋初期人們對《江西宗派圖》的評價不高，除當事人徐俯、韓駒不滿外，局外人物也多論其選擇弗當，“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己鑒裁之明”②，於是，有人猜測“黨東萊者”編造“少時戲作”説，來應付不利於吕氏的輿論。總的説來，紹興三年或南渡以後説支持者衆。後人直至清代朱彝尊、紀昀等人都遵用此説，數百年的時間内，“紹興三年”説幾成定論。

二、少時戲作説優於紹興三年説

雖然紹興三年説長期佔據上風，筆者以爲，“少時戲作”説實優於紹興三年説。如果“少時戲作”確爲吕本中本人的聲明，便具有權威性，可成爲確定《宗派圖》寫作年代的最直接依據。

關於“少時戲作”説的提出者這個問題，《清波雜志》所載此説爲“黨東萊者創此説以蓋時論，非本語也”的議論，其實是没有根據的猜測。如前所述，提出吕本中有“本無詮次”和“少時戲作”言論的，有曾季貍、范季隨二人。其中曾季貍是吕本中門生，范季隨却是韓駒弟子，從他對吕本中“吕十一郎中”的稱

① ［宋］周煇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卷八，中華書局，1994 年，第 354 頁。
② 同上。

呼來看，與吕氏關係平平，并非“黨東萊者”；而范季隨在《陵陽先生室中語》中記載了吕本中的説法後，也記載了韓駒的不滿反應，可見是表現時論，并没有“以蓋時論”的意思，他的記載當是實録。“少時戲作”説就是吕本中本人提出，而非“黨東萊者”的編造。

進一步來看，既然“少時戲作”説出自吕本中之口，那它會不會是吕氏本人爲對付輿論編造的謊言呢？黄寶華先生就曾將懷疑的目光投向吕本中：“問題不在於吕本中是否作過這樣的自白，而在於其自白的真實性，即其自白是否真實地表述了此圖的寫作時間。筆者認爲這一點是很可懷疑的。”① 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吕本中此言的真實性上。事實如何，前引范季隨的記載就成爲我們判斷的關鍵。

據范氏記載，范家邀請吕本中和韓駒同赴宴，揆之二人行踪，這件事當發生在紹興三年秋至四年秋這一年之内：吕本中於紹興三年秋到達臨川（今江西撫州），紹興四年秋離開臨川至福建，寓居臨川的時間有一年左右②；在此期間韓駒也寓居臨川，二人時有交往。從范氏記載來看，此時《宗派圖》已然刻版流傳。如果《宗派圖》果真作於紹興三年，則至遲到紹興四年秋之間，短短一年的時間，該圖已完成了作者作圖、作品流傳、作者矢口否認的過程，這是不可思議的——且不説此時吕本中是一個文學思想已進入成熟期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不至於也没有必要不

① 黄寶華《〈江西詩社宗派圖〉的寫定與〈江西詩派〉總集的刊行》，載《文學遺産》1999 年第 6 期。

② 據王兆鵬《兩宋詞人年譜·吕本中年譜》，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 年。

承認自己近期的作品；就從撒謊的技術層面來看，在短短一年內，區區一城中，此圖的寫作、出版、流行都瞞不過他人，哪裏有矢口否認的空間！紹興三年説，實在難愜人意。

“少時戲作”説還有一個關鍵的佐證。南宋初曾慥曾編輯《百家詩選》，并爲各家作序。在《夏均父小序》中，言及《宗派圖》出現後入圖諸家的反應，有“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① 的提法。夏均父，即夏倪，爲《宗派圖》成員之一。夏倪卒於建炎元年（1127）。如果他曾見過《宗派圖》并提出意見，則該圖爲北宋末期所作②。

“少時戲作”和紹興三年，一爲北宋末，一爲南宋初，相隔時間在二十年以上。這兩種意見雖相互抵牾，我們却不必把它們看得如此對立。假定《宗派圖》是吕本中的少作，作於北宋末，但其流傳并發生影響却在南宋初期，一切疑問將涣然冰釋。北宋末黨禁甚嚴，蘇、黄作品是禁毁的對象，連詩歌創作都被作爲元祐學術受到壓制，《宗派圖》却在這樣的時代勾勒出一個以黄庭堅爲宗主的詩學傳承系統，其寫作和流傳當然會處在一種地下的狀態。南宋初期則不同：元祐黨禁已解，詩歌創作興盛，高宗本

---

① 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上册，第 280 頁。

② 吴曾在《能改齋漫録》卷十中曾據紹興三年説認爲夏倪不及見此圖，不可能以在下爲耻。在紹興三年和“少時戲作”説的分歧中，吴曾之《宗派圖》作於紹興三年與夏倪不可能以在下爲耻的説法形成循環論證，故他的反對意見，我們暫時還不能聽取。又：另有一則材料對“少時戲作”説有利。［元］劉壎《隱居通議》卷六《評本之詩》云：“予嘗於故篋斷簡中見有評詩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檃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四庫全書》第 866 册，第 67 頁）此處李文叔當指北宋詩人李格非。李格非卒於宣和二年（1120），如果上述“出乎江西”、“入乎江西”言論果然是他提出的話，則“江西”之學成爲文學流派，就應該在北宋末。

人推崇元祐學術，喜愛黄庭堅的詩歌。在這種情況下，豐城（今屬江西）邑官將《宗派圖》刻石，坊間又出現刻本，都是情理中事。紹興三年或許就是《宗派圖》某個版本刊行或者《宗派圖》流行并産生影響的時間。紹興三四年左右，吕本中本人在江西乍見《宗派圖》刻本時非常驚訝，不知其已流傳人間，對於其他人來説，這當然更是新奇事物。況且這個時候黄庭堅詩歌受到推崇，黄氏外甥徐俯、洪炎得到重用，加上韓駒、吕本中等人寓居江西，江南西路詩歌大盛，因此人們會誤認爲《宗派圖》乃吕本中近期作品，還能爲它的創作找到應時、應景的理由。如孫覿論《宗派圖》寫作意圖云：

> 元祐中，豫章黄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之學詩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掛一名其中，有榮耀焉①。

據這種説法，靖康、建炎後，人們羨慕黄庭堅外甥以詩名進侍從大臣之列，打出江西宗派的名號，勾牽入社，以相互標榜，這就是《宗派圖》的寫作動機。其實南渡之後，與吕本中、韓駒在江西"同作并和"的詩人爲錢伯言、曾紆、曾幾等人，非如

① ［宋］孫覿《西山老文集序》，載《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常州先哲遺書》本。

《宗派圖》所列。至於《宗派圖》詩人，則已凋零無幾，談什麽“掛一名其中，有榮耀焉”！由於靖康前詩歌作爲元祐文學受到禁錮，大多數人的詩學批評視野都在南渡後打開，對創作於北宋末的《江西宗派圖》，他們感到了隔閡。在這種情況下，以紹興初“黨元祐”的政治環境作爲江西宗派的産生條件，出現紹興三年或南渡以後説，不足爲奇。“紹興三年”説長期佔統治地位，至今堅固難破，但它不過源於南宋初人對《宗派圖》寫作動機、寫作環境想當然的猜測。歷來對江西宗派有不少誤解，而最初的誤解，自吕本中作《宗派圖》後不久就出現。這意味着：在我們追尋歷史的途中，將時時遭遇歷史的迷霧。

三、《江西宗派圖》作年

《宗派圖》是吕本中的“少時戲作”，作於北宋末，已如上所言。關於它具體的創作時間，却史無明言。莫礪鋒先生根據詩人饒節的出家時間，指出《宗派圖》當作於崇寧一、二年。他的證據在於：饒節於崇寧二年正月半出家，法名如璧，而《宗派圖》著録“饒節”這個俗名——“根據當時的習俗，對於已經出家爲僧的人，是不再稱其俗名的”[①]，故《宗派圖》作於饒節出家以前，亦即崇寧二年正月半以前。是爲崇寧一、二年説。它産生了很大影響，却值得商榷。事實上，對僧人稱法名的習俗主要嚴格在當面稱呼上。作爲私交很好的朋友，吕本中曾在詩文中多次親

① 莫礪鋒《吕本中〈江西詩社宗派圖〉考辨》，載《江西詩派研究》，第 308－309 頁。

切地稱呼如璧的俗家名字，如吕氏《呈愚上人》“遂有聲名伴老饒”[①]、《外姊趙夫人智量以良人没祝髪感嘆成詩》“饒三笑汝參禪誤”（《全宋詩》第18088頁）的句子，都作於饒節出家之後，晚年作《師友雜志》，亦是直呼饒節俗名。同時代的一些詩論，如《紫微詩話》提到的：“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顔平仲歧、關止叔沼、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餘諸人共十人也。”[②] 此《十友詩》作於饒節出家之後，亦呼饒節俗名。稱呼俗名，不能作爲《宗派圖》作於饒節出家前的證明。從作者的經歷來看，崇寧一年或二年初，吕本中十九歲，與《宗派圖》詩人的交往剛起步，《宗派圖》很多成員，如江端本、晁冲之等尚未進入他的視野，不大可能寫作《宗派圖》。《宗派圖》名單的形成有一個機緣成熟的問題。判斷其創作時間，當從其人員的著録入手。

《江西宗派圖》自黄庭堅以下，列舉了如下詩人：

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傀）［倪］、林敏功、潘大觀、何

①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8册，第18053頁。本文所引江西宗派詩歌，除黄庭堅和陳師道外，洪朋、洪芻、洪炎、徐俯、謝逸、汪革、饒節、謝薖、李彭、祖可、潘大臨、林敏功、林敏修、王直方、晁冲之、江端本、李錞、夏倪、高荷、韓駒、吕本中詩歌，除特别注明外，皆據《全宋詩》。爲節省篇幅，以下凡引此書，僅列篇名和頁碼，於文中作注。

② ［宋］吕本中《紫微詩話》，載［清］何文焕輯《歷代詩話》上册，中華書局，1981年，第365頁。

（覬）［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①。

以上名單，反映的是大觀末、政和初一個山谷後學詩人羣體的情況。關於此詩人羣體的形成原因、過程及其性質、特徵，第三章中將有詳細論述，在這裏衹作簡要的介紹。上列二十五人，除陳師道去世時間稍早，高荷和其他人關係不可知外，其餘人是很好的朋友。其中，洪芻、洪朋、洪炎、徐俯是洪州（治今江西南昌）人，謝逸、謝薖、饒節、汪革是臨川（今江西撫州）人，潘大臨、潘大觀、何（覬）［顒］是黄岡（今屬湖北）人，李彭、祖可、善權活動在南康（治今江西星子），王直方、李錞、晁冲之、江端本、夏倪生活在開封（今屬河南），林敏修、林敏功隱居在蘄春（今屬湖北），他們年齡差别不大，從青少年時期起就聚集在一起切磋詩文，在其生活的地域形成幾個小的詩人羣體。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曾親聆山谷教誨，其他詩人也是黄庭堅的崇拜者，共有同情元祐黨人、傾慕蘇黄文學的傾向。共同的政治態度和詩學興趣，使這些詩人超越地域限制同氣相求。詩人羣體的交往從元祐年間開始，經紹聖、元符、崇寧時期的廣泛交流，到大觀年間，以徐俯、洪芻、李彭等在南昌結社和吕本中挑動諸友“東”字韻唱和爲標志②，《宗派圖》詩人之間直接或間接的交往關係全面確立，詩人們超越地域局限同氣相求的交融達到頂點，出現“同作并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藴矣”的盛况。吕本中本

① 《宗派圖序》，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引，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27 頁。

② 關於南昌結社與“東”字韻詩唱和，第三章有詳細論述。

人早與饒節、汪革、謝逸、謝薖、徐俯、楊符等相識；大觀末、政和初，他形成自己“活法”的詩學理論，被謝逸兄弟等推舉爲海内詩壇領袖，更進一步結識洪炎、江端本、晁冲之，與王直方通信，通過這些朋友與《宗派圖》其他詩人聲氣相通，完成了與《宗派圖》詩人的交往。至此，作者總結“江西宗派”這一文學現象、寫作《宗派圖》的條件完全成熟。據此，我們可以斷定：《宗派圖》應該作於大觀末、政和初這一時間段，尤其可能是政和初年的産物①，謝思煒先生所論不誤。早於此，《宗派圖》名單還不可能建立；晚於此，《宗派圖》詩人交往減弱，不再有同作并和的盛況。且大觀末、政和初，吕本中不到三十歲，與“少時戲作”説吻合。其時張商英秉政，政治空氣相對緩和，爲《宗派圖》詩人的活動與《宗派圖》的寫作提供了有利條件。但當時畢竟黨禁未解，蘇、黄詩歌尚爲禁學，吕本中在這樣的時代勾勒出一個山谷後學羣體，“録其名字，以遺來者”②，無乃大有深意。《宗派圖》的著録未必精當，《宗派圖序》推尊黄庭堅到紹續詩統的高度，又給予《宗派圖》詩人以“盡發千古之秘”的過高評價，無乃過激。二十年後，作者一度悔其少作。在我們今天看來，《宗派圖》提出“江西宗派”的概念，敏鋭地勾勒出北宋末期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説是“戲作”，却具有强烈的詩史意識，

---

① 吕本中於政和元年與晁冲之在汴京的相會，完成了他與《宗派圖》詩人的交往，故《宗派圖》很有可能作於政和元年。不過，大觀末期，《宗派圖》寫作的其他條件已成熟，吕本中與晁冲之摯友江端本的交往，可以把晁冲之帶入其詩學視野，所以也不排除《宗派圖》爲大觀末期所作。

② 《宗派圖序》，載《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中華書局，1962 年，第 327～328 頁。

雖有瑕疵，却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宗派圖》并序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雖然作者説他“甚悔其作”，我們却不可輕視這部作品。

明乎《宗派圖》反映的是大觀、政和年間一全國性詩人羣體的情况，是否爲此羣體成員乃著録標準，有助於解釋對《宗派圖》詩人名單的疑問。洪氏四兄弟中，洪羽早卒，未留下大的影響，所以略去；江端本與兄端友同學山谷，但是江端本而非端友爲此羣體成員，故捨兄而取弟；黄庭堅在兩川收的弟子，如王蕃、楊晧等，由於未加入大觀末、政和初的山谷後學羣體，不予著録；至於曾幾，他學江西詩風是在南渡之後，當然更不會録入該圖。

綜上所述，關於《江西宗派圖》的寫作年代，無論是歷史上支持率頗高的紹興三年説或當代佔主流地位的崇寧一、二年説，都未必可信。《宗派圖》應該是大觀末、政和初的作品，是吕本中對當時一個有着文學流派性質（詩宗黄庭堅）的詩人羣體的圖録。此時《宗派圖》詩人形成了直接或間接的交往網絡，遂以“同作并和”的整體形象，進入吕本中的詩學視野。

第二節　“江西宗派”釋名

《江西宗派圖》的流行，使“江西宗派”，或云“江西詩派”成爲宋詩學中的常用詞彙，但人們在使用這兩個名詞時，又往往

不能確定其具體的指謂對象，而提出如下疑問："江西"指黄庭堅還是江西地域？"宗派"與"詩派"是不是一個概念？"江西宗派"、"江西詩派"究竟具備什麽樣的内涵？這些問題經近千年的探討，還存在一些争議，是江西宗派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問題。就文學批評的領域，江西宗派第一次提出詩歌"宗派"的概念，它的本義及其衍生出的術語意義重大，亦值得我們細緻辨析。

先釋"宗派"。"宗"爲宗統，"派"爲流派。"宗派"乃是指《宗派圖》中黄庭堅和其他二十五個詩人的關係："宗派之祖曰山谷，其次陳師道（無己）、潘大臨（邠老）……凡二十五人。"① 吕本中《童蒙詩訓》中有"江西諸派"的概念："學退之不至，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方處。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② 將江西諸派與韓愈弟子李翱、皇甫湜相提并論，是把黄庭堅比作韓愈，將師與弟子、宗與派對舉。故江西宗派，指江西詩宗（黄庭堅）和江西諸派（陳師道以下共二十五人）。這個提法標舉一家詩法，其目的是爲詩歌的發展流變確定一個正統的傳承③，但在客觀效果上，却具有詩歌流派的意味。這在詩歌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周紫芝云："吕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④ 雲門、臨濟是禪宗中兩大派係，吕本中標舉山谷一派，則與别派，如東坡一派風格始判，這促進了文學流派風格的辨析，也推動了本流

① 《宗派圖序》，載《雲麓漫鈔》卷十四引，中華書局，1996 年，第 244 頁。
② 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下册，中華書局，1980 年，第 597 頁。
③ 關於這一點，將在十一章具體論述。
④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載《歷代詩話》上册，中華書局，1996 年，第 355 頁。

派的壯大發展。《宗派圖》流行之後，山谷後學進一步在江西宗派這一旗號下聚集，如楊萬里詩中所説："要知詩客參江西，政似禪客參曹溪。不到南華與修水，於何傳法更傳衣?"① 從此，江西宗派便成爲詩之一派，與其他派别，如晚唐、江湖派對舉。

後人稱江西宗派爲"江西詩派"，是在"江西宗派"概念基礎上擴展和衍生的術語。淳熙年間程叔達刊《宗派圖》諸家詩爲《江西詩派》總集，後來劉克莊又編《江西詩派》小集。隨着這兩部集子的刊行和它們在後世發生影響，江西詩派便成爲江西宗派約定俗成的稱謂，與"江西宗派"名稱并行。所謂"詩派"，是指"詩"之一"派"，與江西宗派的"宗"之一"派"（黄庭堅爲"宗"，其餘二十五人爲"派"）不同。但"江西宗派"與"江西詩派"，這兩種提法又存在着遞進關係：相對於黄庭堅，江西諸派是"宗"之一派，相對於整個詩歌界，江西宗派又不過是詩之一派；而江西宗派既立，則相應形成了衆詩派的一種。"宗派"的提法本身包含着詩歌門派的意味，後人遂用"江西詩派"這個名詞來指稱吕本中所説的"江西宗派"，後來又發展成爲對涵蓋北宋末及整個南宋時期，包括"江西後社"、"江西後派"、"江西别派"等大大小小團體在内的詩宗黄庭堅的廣義的詩歌流派的稱謂。《江西宗派圖》之作，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評："宋詩之分門别户，實自是始。"② 自吕本中標舉"江西宗派"後，詩歌流派的觀念深入人心，"詩派"的標舉，"詩派"的競爭都由此興

① ［宋］楊萬里《送分寧主簿羅寵材秩滿入京》，載《誠齋集》卷三十八。
②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中華書局，1965 年，下册，第 1783 頁。

起。從“宗派”到“詩派”，《宗派圖》的繪製居功甚偉。

對於“江西”二字，一般有兩種解釋。從“宗”的角度入手，“江西”二字可釋爲江西詩宗黄庭堅的籍貫；從“派”的角度入手，“江西”二字指此詩人羣體的主體爲江西人。江西諸派以江西人爲主體，却非全是江西人，如劉克莊所述：

> 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①。

江西宗派人既非盡江西人，故人們理解的“江西”一般從“宗”的角度入手，指黄庭堅的籍貫。如胡仔所謂“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②，就是用“江西”這個籍貫來指代詩人黄山谷，當代學者大多贊同這個思路。然而以籍貫來指代詩人，對黄庭堅最通用的稱呼是“雙井”、“豫章”而非“江西”，相對於前二者，“江西”的所指更爲寬泛，不云雙井、豫章而云“江西”宗派，必有深意。

其實“江西”二字，非單純從詩宗或詩派入手，而是統領了兩個概念，具有指代黄庭堅、强調江西地域兩層含義，還隱隱包含着“江西諸人”這個名詞的歷史作用。江西諸人這個概念，散

---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②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第 333 頁。

見如下一些文獻：

徐俯師川少豪逸出衆，江西諸人皆從服焉。崇寧初見予所作詩，大相贊賞，以為盡出江西諸人右也。其樂善過實如此①。

夏均父稱張彦實詩出江西諸人②。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精苦也③。

看來，“江西諸人”這個概念，最早見於崇寧初徐俯的評論，中經夏倪提及，到了南宋初，吕本中還在使用。它與“江西宗派”、“江西諸派”不同，是一個實在的詩人羣體概念，指北宋末客觀存在的一個以南昌四洪、徐俯、臨川二謝、饒節、汪革等爲主體的江西詩人羣體。與江西相鄰的南康，在宋代或屬江南西路，或屬江南東路，但在歷史上它一般與洪州同屬豫章地域，到了今天也是江西省的轄地。南康詩人李彭、祖可、善權等，或亦可劃入江西諸人的範疇。撫州、洪州、南康緊鄰。三地詩人間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共同的詩學趣味與頻繁的唱酬，使他們織成一個交結的網絡，形成“江西諸人”這一羣體。吕本中與江西諸人淵源非淺。得到徐俯的欣賞，與汪革、饒節、謝逸等的交往，是

① 吕本中《東萊吕紫微師友雜志》（以下簡稱《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② 吕本中《紫微詩話》，載《歷代詩話》上册，第369頁。
③ 同上，第363頁。

他與江西宗派結緣的關鍵。更深一步來看，呂氏與江西士人素有淵源，如呂本中侄孫呂祖謙指出：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呂夷簡）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呂公著）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荆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荆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絶江款郡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還政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黄魯直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講（呂希哲）於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繹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遊，晚節居黨籍。右丞（呂好問）以筦庫之禄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侄。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呂本中）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為忘年交。談賞篇什，聞於天下。……蓋江西人物之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考；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疏密，亦門户興替之一驗也。"①

江西自晏殊、歐陽修、王安石、曾鞏、黄庭堅以來名流輩出，而呂氏家族與江西賢士大夫的疏密，不僅當引起"觀人文

---

① ［宋］呂祖謙《題伯祖紫微翁與曾通道手簡後》，載《東萊集》卷七，《四庫全書》第1150册，第64～65頁。

者”，也當引起詩學研究者的關注。謝逸、汪革、饒節等從吕希哲遊，使吕本中與臨川詩人乃至江西諸人有了密切交往。這在他自己的詩歌中有明確體現：

> 更約洪謝林汪潘，徐李欲去不作難，倚松聞之亦解顔，我且往矣君先還。（《送李惇秀才》，《全宋詩》第 18242 頁）
>
> 秖今江西六七輩，可到元和二三公。（《用前韻寄商老》，同前，第 18040 頁）

這兩首詩都作於大觀年間。第一首詩送人回江西，提及江西諸人；第二首詩寄給當時活躍於豫章詩社的南康詩人李彭。可見，吕本中本人以及他提出的江西宗派這一概念，與江西詩人、江西地域間的關係實千絲萬縷。筆者以爲，在爲江西宗派命名時，吕本中或許有意折中了以江西人爲宗和以江西人爲主體、“江西諸派”和“江西諸人”等概念，以籠統的“江西”二字，糅合了江西籍貫、江西地域、江西詩人等含義，指謂北宋末出現的一個以黄庭堅爲宗、以江西詩人爲主體的詩人羣體。如此多概念的混合，使人們對江西宗派的理解容易發生混淆，但這些概念的糅合亦有一定道理：黄庭堅是江西人，受黄庭堅影響最大的江西詩人是黄庭堅詩學的嫡派；山谷去世後，他在江西的外甥徐俯、洪芻等更成爲其詩學的當然繼承人，繼續聚集和團結着仰慕山谷的年輕詩人，形成了“江西諸人”這一初具詩歌流派特徵的詩人羣體；江西宗派正是在江西諸人的基礎上，突破地域限制，拓展而爲全國性的規模。黄庭堅（江西）是江西宗派的宗主，江

西諸人是江西宗派的主體，綜合“宗”、“派”二義，總冠以“江西”之名，無論是觀念上還是實體上，其源皆出於山谷。明乎此，我們認爲楊萬里“江西宗派者，詩江西者，人非皆江西也”[①]中“詩江西者”這個籠統的説法其實是一種最清晰的表述：在某種程度上，“江西”二字乃吕本中的創造，它超越了地域的實指，成爲一種詩學風格的概括。江西宗派，乃集合了詩學風格、詩人羣體、詩歌流派三層含義，這三層含義又統一於北宋末出現的學習黄庭堅詩歌并形成流派的詩人羣體。

最後，需要確定一下江西宗派詩人羣體的成員，因爲，吕本中的《江西宗派圖》有兩種以上的流傳版本。《苕溪漁隱叢話》引《宗派圖》，自黄庭堅以下，列舉二十五位詩人“以爲法嗣”，已如第一節所引。《雲麓漫鈔》卷十四所引稍異，去掉何覬，加入吕本中本人，在人物的排名情況上也稍有變動。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録何覬爲何顒（人表）。在數家論中，《苕溪漁隱叢話》成書最早，但其他諸家，如《雲麓漫鈔》對《江西宗派圖》也是直接引述而非轉引，孰是孰非，似乎不好分優劣。各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吕本中本人入江西宗派與否，何覬是否著録，以及《宗派圖》中著録的何姓詩人究竟是誰、叫什麼名字這三個問題。

關於《宗派圖》著録吕本中還是何覬的問題，謝思煒先生以爲：“揆之事理，吕本中既是作圖者，似不應將自己列入。”[②]筆者贊同這一觀點。不過，《苕溪漁隱叢話》説吕本中“自言傳衣

①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載《誠齋集》卷七十九。
② 謝思煒《吕本中與〈江西宗派圖〉》，載《文學遺産》1985年第3期。

江西"[①]，無論吕本中將自己列入《宗派圖》中與否，他都是他本人命名的"江西宗派"的當然成員。因此，我們論江西諸派，在《宗派圖》詩人外加上吕本中，以二十六人計。至於何姓詩人的名字、身份，黄庭堅《謝何十三送蟹》原注："十三名頡"（《黄庭堅全集》第236頁）；而成書於南宋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首"姓氏"分别著録"何氏覬（人表）"、"何氏覬，字人表"[②]；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則作"何顒人表"。從這些文獻可知：所謂"何覬"，或云"何頡"、"何顒"，都是指同一個人，他就是與《宗派圖》其他成員關係密切的黄岡詩人"二何"中的"小何"，何頡的弟弟，字人表者。黄庭堅集中《寄何人表》、《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李彭集中《戲何人表》，就是與他的唱酬。何頡本名"頎"，後更名"頡"[③]，皆從"頁"。作爲他的弟弟，小何之名亦當從"頁"，故所謂"何覬"，雖然有《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的佐證，還是應當首先排除。至於剩下的"顗"、"顒"二字，"顗"字與訛字"覬"形近，且有山谷詩作證，歷代援引也較多，似乎當從；不過，"顒"字有"大"、"嚴肅端正"、"景仰"義，與"人表"義正合，雖祇見於《江西詩派·總序》，但因符合

①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327頁。

② 皆見《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見［宋］舊題王暐《道山清話》，載《四庫全書》第1037册，第648頁。

古人名、字相符的習慣，於義爲優。兹録“顒”字，更待詳考[①]。

①　在二何兄弟中，何頡似乎是比弟弟更著名的詩人，與宗派諸友交遊也更多。現存吕本中文集、雜著從未提起何顒，却在《紫微詩話》中有專條論及何頡：“何斯舉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對山公。’斯舉即無己詩所謂“黄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余初不相識。”（《紫微詩話》，載《歷代詩話》上册，第 367 頁）上引何頡詩是對大觀時期吕本中“東”字韻詩的和作。從這條記録來看，吕本中對何頡的詩學地位相當關注；何頡又主動和“東”字韻詩，在吕氏作《宗派圖》前夕進入其詩學視野，在這種情況下，《宗派圖》捨兄取弟，實在不好理解。據説吕本中作《宗派圖》時“連書諸人姓字”，筆者臆測，或許是他在連書姓字時因一時疏忽將何頡遺漏。無論如何，《宗派圖》中所録爲小何而非大何，若是吕氏不小心將何頡遺漏，我們也衹好一仍其舊。

第一章
文學盛世下的陰影

宋詩是唐詩之後詩歌的第二個盛世。它發源於五代凋敝之後，從清淺小溪到漸興波瀾，直至揚波滄海，在儒學復古運動和詩文革新運動的鋪陳中，以歐、梅、蘇、黄四大家的出現爲標志，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面貌。宋詩發展有兩個高峰，其一爲慶曆文學，領袖人物歐陽修；其二爲元祐文學，領袖人物蘇軾。歐陽修與蘇軾爲師弟子關係，元祐文學沿慶曆詩風的路綫發展，却産生了一些轉向。江西詩派又沿着元祐文學，繼續新的轉向。

元祐體詩歌以蘇軾、黄庭堅、張耒、秦觀、陳師道爲代表，以元祐時期爲主要創作年代，上限爲蘇、黄訂交的元豐元年(1078)，下限爲紹聖元年（1094)；江西宗派體則繼元祐體之後，爲北宋末、南宋初的主導詩體。江西諸派以黄庭堅爲師，又廣泛尊崇元祐諸公，無論從師承關係還是文學史階段來看，都是元祐文學的下一代。蘇軾、黄庭堅爲代表的元祐詩歌，擺脱對唐詩的摹仿，形成宋詩獨特的面貌，亦以其理性的意藴和豐厚的精神空間，釀就了中國封建社會人文之極致。江西詩派稟承元祐詩學，却變元祐詩歌的風流藴藉爲峭拔瘦硬。後人對此頗有微詞。但我

們應看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詩風的改變與世情之改變是相表裏的。江西詩派處在兩宋之交，中國文化從張揚到内斂、中國詩歌從興盛到衰落的轉折點。江西詩派直承元祐之學，但它得到的，不僅是元祐文學的光輝典範，還有新舊黨爭投射下的陰影。黨争造成政治上的風風雨雨、詩人境遇的一波三折。從熙寧、元豐時期的新黨當政、元祐時期的舊黨掌權，再到紹聖以後的新黨重新得勢，北宋後期都處於新舊黨争的政治旋渦中。從新黨和舊黨相互排擠的關係來看，元祐文學和江西詩派文學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元祐文學的盛世光輝中，已埋下了憂患的種子。

第一節　從新舊黨爭到元祐黨禁

北宋是一個豐豫的時代，亦是一個充滿着複雜矛盾的時代。積累了千年之久的中國封建文化，到了北宋進入其發展的成熟期，出現文質彬彬的渾厚氣象：文官制度的完善、儒學的復興、理性精神的高揚、審美情趣的積澱，這一切賦予這個朝代以一種既慷慨激昂亦興致悠遠的人文精神。然而這個文化的盛世，同時又是封建帝國開始暴露其危機的時代：冗兵冗官、積貧積弱、外侮頻仍、黨争不斷。而國力微弱的最强烈表徵，是位於宋北部、西北部兩個少數民族國家——遼、西夏的屢次入侵。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與遼承天太后簽定澶淵之盟，靠城下之盟來維持

與外族的平衡。這不僅在觀念上破壞了尊王攘夷的儒家信念，亦以對家國存亡的現實威脅，强烈地刺激着上至帝王、下至普通士子的神經。對國家面臨的問題，許多人作出積極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應不應該改革，如何改革的問題成爲争論的中心，朋黨亦因此出現。宋仁宗時期，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①] 爲目的的慶曆新政便是這麽一種思潮的産物。北宋中後期，又出現一位深切希望變革現狀的政治家，遭遇一位深切希望變革現狀的皇帝，爲國家積貧積弱的症狀開出治方，提出一系列舉措，是爲熙寧變法。它拉開了新舊黨争的序幕。

一、新舊黨争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卒，太子趙頊即位，是爲神宗。神宗是一位有抱負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起用有變法思想的王安石，圖革積弊。熙寧元年（1068）二月，王安石爲參知政事，設制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吕惠卿、章惇、曾布等爲骨幹，議行新法。從本年起，先後頒布實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是爲“熙寧變法”。在新法的推行中，遇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反對，形成觀念和利益上的衝突，這就是“新舊黨争”。

新舊黨争首先是一種政見上的分歧。王安石新法的核心，是

①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三慶曆三年九月丁卯條，引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語（本文中有節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 册，第 1311 頁。

通過“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①] 的“理財”之道，來達到富國强兵的目的。這首先引來儒家意識形態上義與利的衝突。“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一經典的判斷成爲反對變法的武器。於是，劉摯所謂“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②] ——由君子、小人的道德判斷，進而轉變爲對王安石的人身攻擊，稱其爲“奸邪”，就成爲一種代表性的論調[③]。舊黨還認爲，講求功利，必將破壞風俗，如蘇軾上言：“國家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④] 除此之外，他們還對王安石“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論點持懷疑態度。司馬光説：“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因此他斷言“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⑤]，是與民争利。而與民争利，無疑違背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雖然有如上意見，從北宋中期開始，士人的憂患意識已普遍反映爲改變現實的需要，所謂的舊黨，大多并不泛泛地反對變法。正如朱熹所言：“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

---

① ［宋］王安石《萬言書》，見［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中華書局，1978年，第30册，第10542頁。

② 《宋史》卷三四〇《劉摯傳》，第31册，第10850頁。

③ 關於北宋黨争中“君子小人之辨”的内容與表現，參沈松勤《北宋文人與黨争》第二章，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④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蘇軾傳》，第31册，第10806～10807頁。

⑤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傳》，第31册，第10763～10764頁。

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① 很多後來被劃爲舊黨的人，如吕公著、蘇轍、程顥、李常、孫覺，還參與了新法的籌劃工作。於是，新舊兩黨的政見分歧，更多的表現爲對新法具體實施措施的不同意見和對新法推行過程中出現問題的不同態度上。如王安石與吕惠卿議定青苗法，詢問蘇轍意見時，他說："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棰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② 這是一種很中肯的意見，可惜王安石終未聽取。鋭意改革并不一定能盡除積弊。新法在君相的意志下從上往下推行，勢必成爲下級官吏進身的憑藉，在實施過程中出現擾民的弊病，這與新法推行的初衷南轅北轍。在這種情況下，蘇軾進言神宗："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③ 范純仁進言："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④ 這些意見看似保守，却切中了時病。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雖存在種種問題，但還不至於防礙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若驟然投以未經試驗的猛藥，其危害恰如蘇軾所

①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〇，中華書局，1986年，第8册，第3097頁。

②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蘇轍傳》，第31册，第10822頁。

③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蘇軾傳》，第31册，第10804頁。

④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純仁傳》，第29册，第10804頁。

説“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1]，造成政治的急劇動蕩。

平心而論，王安石變法基於深刻的危機感和變革現狀的需要，他“理財”的思路重在對生財之路的發掘，也是一種較爲先進的治國思想。從義利之辨來反對變法，無乃是對現實問題的麻木不仁，王安石斥之爲“因循苟且”，不無道理。另一方面，大多數舊黨人士從儒家仁政思想出發，指出新法推行過程中擾民問題等弊端，却是對變法提出的中肯意見，值得聽取。可是，倍感變法壓力，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思想的王安石，一旦得到神宗的支持，就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强力推行新法。他早有變法的主張，但在仁宗、英宗朝皆未受重用，和神宗間的君臣遇合方給了他實現理想的歷史機緣[3]。而他以皇權爲依靠推行新法，則不免走向獨斷。凡反對新法者一律排斥出政府，奉行新法不力的也要被查處。熙寧三年（1070），吕公著、司馬光、李常、程顥等因反對新法相繼被罷免，史稱“數月之間，臺諫一空”[4]。王安石還指斥反對新法者結黨，并於熙寧五年（1072）置京城邏卒，收罪謗時政者，拒絶接納哪怕是正確的反對意見。與此同時，他大量進用新人，其中不乏趨附、倖進之輩。一時之間，“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

①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蘇軾傳》，第31册，第10804頁。
②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第30册，第10550頁。
③ 參趙翼《王安石之得君》，［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十六，中華書局，1984年，第561頁。
④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57年，第4册，第1679頁。

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①。在朝和在野，親王或親馬，新黨與舊黨，遂由觀念上的兩個陣營轉化爲有特定成員的兩大利益集團，開始你死我活的權力爭奪。

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一書將新舊黨爭定義爲“政黨政治的萌芽”②，我認爲是不確切的。政黨政治乃托根於民主政體，而北宋中後期的黨爭則建立在君主專制的基礎上，孰勝孰負，完全繫之於君主的個人好尚。帝后的生卒沿革成爲新舊二黨此起彼伏的關鍵，缺乏理性的制約。這令新舊黨爭充斥着專横、殘酷與冷漠，也令身陷局中的朝士遭逢數不清的驚濤駭浪。元祐更化，便是這驚濤中的一抹漩渦。

元豐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其子趙煦即位，是爲哲宗。神宗的母親宣仁太后高氏權同處分軍國事。從本年至元祐八年（1094）九月，宣仁后是朝政的實際掌握者。她任命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吕公著爲尚書右丞，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廢除新法，驅逐新黨，史稱“元祐更化”。綜觀北宋歷史，這是一個政治較爲清明的時期。宣仁后“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③，朝中大臣“道學則有二程、張、邵，政事則有温公、潞公，文章則有蘇、黄、晁、張，氣節則有器之、瑩中”④，乃人物彬彬之盛時。史書上對這段時期津津樂道，稱之爲“元祐之治”。

① 劉摯語，見《宋史》卷三百四十《劉摯傳》，第31册，第10852頁。
② 蕭慶偉《北宋新舊黨爭與文學》，第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③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宣仁后傳》，第25册，第8627頁。
④ ［清］陸心源《重刊師友雜志紫微雜説序》，《師友雜志》卷首。

然而這個文化的盛世，實則是新舊黨争惡性循環中的一鏈。“元祐更化”，是建立在舊黨對新黨人物的無情打擊、對新法的全面廢除、對神宗朝政治的全盤否定的基礎上的。魏了翁説：“士之擯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爲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爲世用。”① 這段話一語道出元祐文化興盛的原因。如果説，王安石推行新法有獨斷之弊的話，舊黨人士當權後對新法的態度，亦失之爲粗暴的否定。如下三事，爲其犖犖大者：

其一，隨着神宗去世、高太后當政，推行十多年的新法一朝更改。面對“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指責，司馬光不以是非公道爲行事依據，而是依仗最高統治者的權勢，説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②，悍然不顧。這和王安石依仗神宗强行推行新法一樣，是一種獨斷專行的態度。在這種態度指引下，司馬光不分青紅皂白，將新法一律廢除。其實新法有利有弊，關鍵在於如何推行。無奈新黨行之太速，舊黨疾之過度，元祐初年，凡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就連行之有效、於民有利的免役法，也不顧蘇軾等人的勸阻，强行廢除。畢仲游曾致書司馬光云：

① ［宋］魏了翁《答羅制幹愚》，《鶴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卷三十六，《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馬光傳》，第 31 册，第 10768 頁。對司馬光這句話，［宋］羅從彦《尊堯集》卷七《司馬光》評價道：“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限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豫章文集》卷八，《四庫全書》第 1135 册，第 716 頁）可參。

> 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①！

畢仲游此論肯定王安石變法“欲興作、患不足”之情，正道出北宋朝臣應有的問題意識。“元祐更化”否定這種問題意識，終究不能杜絕“不足之事”與“不足之意”，不符合天下的公議。此盛世危言，後來果然得到應驗。

其二，與新黨當政時一樣，舊黨上臺，首先貶斥新黨人士。元祐初年，蔡確、章惇、吕惠卿、蔡京等相繼被貶。吕惠卿之貶，蘇軾草謫詞云：“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鷄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故試伯鯀；終

①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畢仲游傳》，第27册，第9526頁。

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① 這不僅是對吕惠卿，也是對所有新法人士毫不留情的斥責。此制一出，天下傳誦稱快，却引起新黨的切齒痛恨。後來新黨當政，蘇軾再責授昌化軍，林希代表新黨人物草制，亦痛詆蘇軾作爲報復。兩黨的評價缺乏寬容，可見黨爭早離開政見之争的軌道，走向意氣用事的尖刻與權力鬥争的冷漠。

其三，先朝實録的修撰，是對一朝歷史的記録和評價，而舊黨在編撰《神宗實録》時顯然摻入了政治上的偏見。《神宗實録》先後經司馬光、吕公著、吕大防提舉，鄧温伯、陸佃、黄庭堅、范祖禹等人參與，歷時六年修成。神宗一朝大臣多有日記，記載當時大事，王安石有《日録》，司馬光有《涑水記聞》。元祐《神宗實録》乃依司馬光《涑水記聞》修成。紹聖之後，新黨復根據王安石《日録》重修《神宗實録》。舊黨人士陳瓘抨擊這是“尊私史而壓宗廟”。其實“尊私史而壓宗廟”的先例，已由元祐《實録》開啓。至於《實録》的修撰，范祖禹之子范冲後來聲明：“先臣修《神宗實録》，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② 持此態度，難言公允。就連黄庭堅，他遵循秉筆直書的原則，如寫“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的新法之弊，乃其作北京學官時親眼所見③；但他與陸佃所争王安石與吕惠卿書有“無使上知”語事，亦未免失之耳食，缺乏堅實的

---

① ［宋］蘇軾《吕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蘇軾文集》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册，第1100頁。

②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十九，中華書局，1988年，第1289頁。

③ 見［宋］黄䇓《山谷年譜》卷二十六，《四庫全書》第1113册，第918頁。

依據[1]。《實録》是對一朝歷史的蓋棺定論，是日後修撰正史的基礎，《神宗實録》對熙寧變法的評價如何，牽動着新黨、舊黨人物的神經。《實録》之争，就成爲新舊黨争的導火綫。後來新黨得勢，元祐史官首先得罪，原因正在於此。

元祐時期看似太平，亦是蘇、黄諸人仕途最爲通達的一個時期。但我們也看到，在表面的風平浪静中，孕育着暴風欲起的掀天巨浪。這不僅表現在元祐時期舊黨内部的洛黨、蜀黨、朔黨之争，更大的危機，還在於畢仲游所説的新黨人士，“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元祐之治脆弱地建立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上，而高氏此時已日薄西山，將走向她年壽的盡頭。元祐八年（1093），隨着高氏去世，“元祐更化”也隨着化爲了泡影。新黨們仗着哲宗的支持將進行激烈的反撲。而這場反撲，不過是新舊黨争的惡性循環中，新的，也是更加猛烈的一場報復罷了。

二、元祐黨禁

新舊黨争是新舊兩黨交互鬥争的結果。兩黨一度勢均力敵，各赢一局，但到了鬥争後期，舊黨的力量與新黨就不能同日而語。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彌留前的社日，她召吕大防、范純仁、蘇轍等老臣，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當思老

① 此事陸佃曾請查對吕惠卿上繳的王安石原信，結果是：“後降出安石書，果無此語，止是屬惠卿言練亨甫可用，故惠卿奏之。庭堅乃止。”（《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十八熙寧九年十月丙午條附注引陸佃《實録院乞降出吕惠卿繳進王安石私書劄子》自注，第3册，第2623頁）

身也。”這句話蘊含着舊黨日薄西山的真正傷感。哲宗迎來了他盼望已久的親政。他憎惡在太皇太后面前畢恭畢敬却不把他放在眼裏的元祐大臣。無論是洛黨、朔黨還是蜀黨，對他而言，都是垂簾時“朕衹見臀背”[①] 的人物。衹有流放在外的新黨中人，纔能理解他壓抑已久的心事。紹聖元年（1094）四月，張商英入朝，上疏言：

> 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②]。

危言聳聽，却道出了人心的實情。在殺氣騰騰的積怨中，元祐大臣面臨着貫穿他們後半生的嚴厲貶謫。次年三月，李清臣發進士策題，有“元祐邪黨”之問。禮部侍郎楊畏爲覆考，悉下主元祐者，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四月，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以明紹述先聖之志。時以章惇爲相，蔡京爲户部尚書，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林希爲中書舍人，張商英爲右正言，蔡卞爲國史修撰，黄履爲御史中丞。這些新黨中堅人物，元祐年間曾經貶謫、外放，現在把持要路，開始對舊黨瘋狂的報復。本年七月，追奪司馬光、吕公著等贈謚，貶吕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詔下，劉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謫吾曹，死無所

①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第5頁。
② 《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張商英傳》，第32册，第11096頁。

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1] 新黨對舊黨的打擊，轉爲失去約束、無復理智的惡性報復，這標志着黨争的局面全面惡化。紹聖四年（1097），蹇序辰等人編類元祐章疏，收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凡一百四十三帙，爲對元祐大臣的集體迫害提供依據。元符二年（1099）九月，又以究查元祐訴理局爲名，設立看詳訴理局，凡對熙、豐政事有言語不順者，動輒加以釘足、剥皮、斬頸、拔舌之刑，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新黨打着紹述的旗號對舊黨殘酷報復，國家的政局也失去平衡，陷入專制和恐怖。

貫穿北宋末期的元祐黨禍，中間曾有過一次短暫的局勢回轉。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其弟趙佶即位，是爲徽宗。向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任用韓琦之子韓忠彦爲相，罷章惇、蔡卞，叙復黨人。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明年爲建中靖國，政局一度回暖。但這短暫的“小元祐”氣象旋因向太后的還政及她的去世化爲烏有，隨之而來的，是崇寧年間對元祐黨人更殘酷的迫害。

崇寧元年（1102），蔡京籍元祐黨人一百餘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徽宗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以後的兩年，黨人碑範圍不斷擴大，元祐黨人再遭嚴遣，元祐學術、政治、文字禁止傳授，黨人子弟也被禁錮。崇寧五年（1106），因星變，方毁元祐黨人碑。此後政治的高壓氣氛稍有鬆動，但元祐學術、文字之禁未解，直到欽宗靖康元年（1126），詔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

① 《宋史》卷三百四十《劉摯傳》，第31册，第10857頁。

指揮更不施行，黨禁纔正式解除。而此時北宋已在數十年的黨爭、黨禁中消磨盡氣數，金兵鐵騎南下——“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於是乎亡國。

三、宋型文化的痼疾

陳寅恪先生云：“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① 的確，北宋是中國封建社會人文最盛的時代。值得深思的是，在這個文化的盛世，國家的窘困却顯露無遺。北宋士風挺立，講究經世致用，對國家面臨的問題，許多人積極思考并提出解決辦法，却言人人殊。從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應不應該改革、如何改革的問題成爲争論的中心。詩文革新運動、儒學復古運動就是在這種變革現狀的時代要求中産生，朋黨亦因此出現。北宋黨争的局面很混亂：新黨與舊黨争，臺諫與宰執争，皇帝與太后争，舊黨、新黨内部相争。觀念的衝突與政治的衝突相互交織，合理的争論走向强力的黨争，走向權力之争的刀光血影。而黨争變爲權力之争後，北宋的政治局面全面惡化。元祐黨禍便是這麽一種宋型文化的産物，詩歌的江西宗派亦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出現。從我們今天看來，宋型文化的痼疾，暴露的是整個儒家文化、封建體制所存在的問題，非黨争所能解决，亦非簡單的是非、曲直、善惡的二分法史論所能評判。倒是劉子健先生在《試論宋代行政難題》提出的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思索：

---

① 陳寅恪《宋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頁。

一、就現代中國文化的整體或許多方面來看，宋代是一個承上啓下的定型期。繼承經典先儒，兼取漢唐，而加以調適，加以新説新制，加以推廣，建立了一個新傳統。這新傳統的類型是怎樣穩定的？為什麼不能另起更超越的進展？同時，為什麼也不致於衰落？而能使這全人類農業社會之中最高度的文化深入民間，普遍全國維持了千年之久？

二、在這定型的文化中，文治的儒國是很大的特色。非貴族門第出身的士大夫地位之高，興學出版文風之盛，都是前所未有。但是儒家的理想究竟實現了多少？為什麼有許多的限度，失敗和流弊？為什麼在宋代後期經世儒術不能發展？倒反是退求性理的道學，另闢了新的境界？雖在政治上不能開展，却用了《三字經》、成語種種家傳户曉的方式滲透，鞏固了整個儒家的社會①。

上論爲宋代的行政難題，也給我們的詩學研究帶來啓發。從宋代開始，儒家的文治理想遭逢現實的衝擊，外族的入侵、從新舊黨争到元祐黨禁的惡性衝突就是一系列强烈的表徵。當儒家“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失去它天然的合理性時，新的行政難題擺在統治者與政治思想家面前，而士大夫在非理性、無目的的政治命運、黨争漩渦中，亦將面臨個人生存目標、人生信仰的重建。於是，北宋時期出現基於新的思考、脱離朝廷褒貶系統

① 載《兩宋史研究彙編》，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第 94 頁。

與政治結黨的師友淵源體系[①]，重組着時代思想的秩序。理學派之於思想重建、江西詩派之於文學精神重塑，皆對應着相同的時代困窘。江西詩派（廣義）出現在宋型文化之痼疾開始顯露之時，其興起略晚於理學；而二者在兩宋之際的地下承傳、南宋時期的發揚光大，以及在以後數朝直至晚清之香火不絕，步驟幾乎相同。與理學一樣，江西詩派的影響不僅在兩宋，還貫穿了以後的封建王朝。在整個傳統詩學體系中，這也是一個新傳統的建構。宋型文化，起於經世致用，終於性理之學，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兩宋之交的江西詩派，反映出的，不僅是詩歌轉型，更是宋人思想轉型的脉絡。

第二節　文學轉型的呼聲

一、文字獄的警示

宋代是文字大盛的時期，這不僅由於印刷術的普及。文官制度的完善和儒學的復興一度增加了文人的自我期許，亦令文字受到無上的尊崇。肇端於中唐，由韓愈、柳宗元發起的復古、通經、明用的古文運動，一路興波作瀾，曲折迴復，衹有到了文人

① 這種師友淵源體系，與唐古文運動以來“道統”、“文統”及歐陽修所謂“君子之黨”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自覺意識高漲的宋代，纔找到其迅速發展的土壤，經柳開、王禹偁、孫復、石介等的提倡、實踐，在歐陽修手中得以完成。它對應着慶曆新政的時代精神與儒學復古運動的勃興，標志着文字功用的尊崇與文學使命感的提高。歐陽修反對"弃百事不關於心"①，提倡"議論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②。蘇軾受乃父"言必中當世之過"③的教誨，早期以章表和詩歌積極干政，體現了相同的文字使命感。可惜，在君主專制的社會，張揚的人文精神必將觸摸到政治的天花板，著名的"烏臺詩案"，遂作爲詩案的第一起，載入史册。

(一)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舒亶，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及詩文中語言，以爲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國子博士李宜亦上狀，摘取蘇軾《靈壁張氏園亭記》，以爲顯涉譏諷；諫議大夫李定奏蘇軾詩文訕上駡下，有可廢之罪四。七月二日，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至湖州（今屬浙江）逮捕蘇軾。八月十八日，赴御史臺獄，對蘇軾詩文諷刺何事、與誰人有文字往來之事進行審問。蘇軾先稱除山村詩外，其餘文字并無干涉時事，并未與人文字往還；三十日，供出自來與人有詩賦往還數人姓名；後經北京留守司根勘，又招供有與黄庭堅譏諷文字。十二月二十四日，蘇

① [宋] 歐陽修《答吴充秀才書》，《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歐陽修《薦布衣蘇洵狀》，《歐陽文忠公文集·奏議集》卷十四。

③ 蘇軾《鳧繹先生詩集叙》引蘇洵語，《蘇軾文集》卷十，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册，第313頁。

軾責授黄州（治今湖北黄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其與詩文往返者數十人，也先後受到罰銅等處罰。是爲“烏臺詩案”[①]。

“烏臺詩案”是朝廷對蘇軾詩文的一次强行清理。何大正進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册》三卷，及蘇軾熙、元年間與親友往來詩文，受到逐句清盤。御史臺官員不愧是深受比興詩教熏習的文人，在他們精確到每一句詩、每一個典故與修辭的盤問下，蘇軾對自已作詩的意圖作出全面交代。據周紫芝《詩讞》，烏臺詩案中，蘇軾招供的罪名有：

1. 譏諷新法。這樣的詩歌有《山村絶句》《八月十五觀潮》等。以《山村絶句》爲例：

> 烟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黄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
>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
>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這組詩，蘇軾招認，前二詩譏鹽法太峻，後詩譏青苗、助役法不便。在這類詩歌中，蘇軾明確表達其政治主張，對新法的譏諷顯而易見，故成爲舒亶最先摘取告發的對象，也爲蘇軾最早承認。

① 據［宋］朋九萬《東坡烏臺詩案》，《叢書集成初編》本。

2. 諷刺執政及朝中大臣。有《秋日牡丹》《留題風水洞》《和劉道源寄張師氏等》等。以《秋日牡丹》爲例：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祗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

蘇軾招認："杭州一僧寺内秋日開牡丹花數朵。陳襄作絶句，某和之。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這類詩歌招致灾禍也不難理解，它傳播在人口目，易引起當朝人士的痛恨。

3. 表達對時事的不滿。有《贈孫莘老》《寄子由》《題風水洞》等。以《贈孫莘老》爲例：

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會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對"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這句，蘇軾招供："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説也。"[①] 在這首詩中，詩人對時事不滿的態度呼之欲出，所以被摘出審問。

以上詩歌，總的説來，表達了蘇軾對時局的看法。對熙、元年間新法的推行，蘇軾是一個積極的反對派。熙寧二三年，蘇軾在朝，就"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

① 以上詩歌及蘇軾供語，皆據［宋］周紫芝《詩讞》，《叢書集成初編》本。

誚"[1]；後因策題事得罪當道，自請在外，歷仕杭州（今屬浙江）通判、知密州（今山東諸城）、徐州（今屬江蘇）、湖州，"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補於國"[2]。據他後來回憶："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臣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3] 從王安石當政時開始，新法一直以拒諫的態度强制推行，蘇軾在上書、與賓客言等渠道都被堵塞的情況下，選擇了"下以風化上"的詩歌諷諫。這是蘇軾積極用世姿態的表現，亦反映了他嫉惡如仇的率真性格。這些詩歌反映了新法的流弊，道出了人們的心聲，故往往立即鏤版流傳，傳播在人口目，亦在觀點相似的舊黨人士心中引起共鳴。由此産生的影響，一方面是輿論上的煽動羣衆，一方面是私下裏的文人結黨，都是與朝政對立的不安分力量。何大正即是取蘇軾詩文之"鏤版而鬻於市者進呈"，以提醒朝廷"軾所爲諷刺文字，傳於人者甚衆"[4]。蘇軾是一代文豪，"虛名浮論，足以惑動衆人"[5]。在他這裏，文學的力量足以侵犯政府的權威，於是，朝廷就拿他開刀，殺一儆百。蘇轍事後分析乃兄得罪的原因，説"且東坡何在？獨以名太高，與朝廷争勝耳"[6]，可謂一針見血。

---

①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歷代詩話》上册，第416頁。
②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第31册，第10809頁。
③ 蘇軾《乞郡劄子》，《蘇軾文集》卷二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册，第829頁。
④ 《東坡烏臺詩案》。
⑤ 《東坡烏臺詩案》載《李定劄子》。
⑥ 見周紫芝《詩讞》。

烏臺詩案是文字獄的開端，竟也有律可循："準律：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徙二年。"[①] 詩歌的諷刺與匿名文字的誹謗同罪，此罪名的確立意義深遠。中國詩歌向來有諷喻的傳統。所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②]，在君主集權社會，詩歌的諷喻作用一開始便定義在"譎諫"，亦即有限度、有技巧、"溫柔敦厚"地諫議的範圍。"烏臺詩案"中按勘的部分詩歌，如《山村絶句》，確實超過了"譎諫"的限度，近似於政論文章的犯顏直諫，但更多的詩歌是在傳統的"興觀羣怨"的領域、"香草美人"的表達方式中進行。蘇詩反映出文字功用的尊崇和文字使命感的擴大，是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對此，"烏臺詩案"的"以諷諫爲誹謗"明確表達了朝廷的態度：對日益加深的封建集權制度而言，文字功用的膨脹是一種僭越。據説"烏臺詩案"中，蘇軾受到屈辱的拷打與死亡的威脅。對文學的發展來説，這種拷打與威脅，更多地進入了詩人的内心，對詩文運動以來不斷膨脹的詩文野心進行了壓制。這促使文學功用從致君堯舜、主文譎諫、經世致用等領域撤離，退回到個人情感和心性修養的範圍。

（二）車蓋亭詩案

"烏臺詩案"是詩案的第一起，没過多久，就發生了另一起"車蓋亭詩案"，表明了文字獄既已出現，便不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這次詩案發生在舊黨當政時期。元祐元年（1086），新黨人

① 《東坡烏臺詩案》。

② 《詩大序》，［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頁。

物蔡確貶知安州（今湖北安陸）。在安州任上，他遊當地名勝車蓋亭，寫下《夏日登車蓋亭》十絶句。元祐四年（1089），知漢陽軍吳處厚摘取其中五首箋釋奏上，以爲譏訕。這五首絶句中，最爲敏感的是如下一首：

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古人不見清風在，嘆息思公俯碧灣。

此詩提到的郝甑山爲唐朝名臣郝處俊，他是安州安陸人。據蔡確自辯，此詩乃“臣以涢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嘆其忠直見於詩句”[①]。臨其地而咏懷古迹，是詩歌的常見主題。然經吳處厚箋釋，此詩之稱郝處俊“忠言直節”，乃是以武則天比宣仁后，以郝處俊諫止高宗遜位武后事，影射高太后有宫廷陰謀。此事牽涉到元豐末年一場公案。時神宗病篤，新黨人物不安其位。邢恕、蔡確私自密語太后侄高公繪等，欲議立太后之子——神宗的弟弟岐王或嘉王，公繪驚不敢從。二人見計不行，反宣言高太后欲立岐王。後哲宗立，二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這種傳言極大地損害了高太后與哲宗祖孫間的感情，成爲新舊黨争的一個敏感話題，史稱此事爲“宣仁之誣”。吳處厚指出此詩有比高后於武后意，戳痛了高太后的神經。據説她始覽此詩并不生氣，看過吳處厚箋釋後却變得怒不可遏，加之對造謗一事早憤憤於心，遂不顧大臣勸阻，貶蔡確爲英州别駕、新州（今廣東新會）安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六元祐四年五月戊寅條，第4册，第4017頁。

置，是爲“車蓋亭詩案”[1]。這個詩案自乾興以來六十餘年後首次將大臣貶向嶺外，增加了新黨的仇恨，爲他們以後更强烈的報復埋下了種子。

與“烏臺詩案”相比，“車蓋亭詩案”更彰顯了文字場中風波險惡。如果説“烏臺詩案”對蘇軾的指控多能坐實的話，“車蓋亭詩案”中吴處厚對蔡確詩的箋釋，衹可理解爲“詩無達詁”這樣一種詩歌的闡釋學處境的表現，幾近捕風捉影。直到今天，我們也無法判斷蔡確詩中有無吴處厚看出的那層影射。用范純仁的話來説，這場詩案，是“以語言文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2]，既不能坐實，也不能洗清。就詩案的製造者而言，吴處厚於蔡確有私憾，繳奏其詩是爲了報復[3]。宣仁后也未必相信此詩爲影射。據她自己説，是“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煽事端，規爲異時炫惑地。吾不忍明言，故托訕上爲名逐之耳”[4]。從這番話來看，文字獄的起因還不在文字本身，則文字在君權的俯視下，陷入了一種更可悲的地位。號稱清明的元祐時期已如此，文字之禍，便在紹聖新黨重新執政之後，愈演愈烈。

“烏臺詩案”和“車蓋亭詩案”相隔僅十年，作爲詩案的開端，它們已具備後世文字獄所擁有的基本特徵：或捕風捉影，或

---

① 見［宋］楊仲良《皇宋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〇七《蔡確詩謗》，臺灣文海出版社，1968年。

② 范純仁語，見《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純仁傳》，第29册，第10288頁。

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二十七元祐四年五月辛巳條：“吴處厚者，嘗從蔡確爲山陵司掌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己，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繳奏確詩。”第4册，第4024頁。

④ 《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宣仁后傳》，第25册，第8626頁。

深文羅織；限制文字的功用；窺視文字以達到對文人心靈的控制；附會文字以打擊政敵。其結果就如蔡確所説："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① 作爲與君主專制相配的一種統治手段，文字獄一經出現就流行不衰，它不僅對官僚階層的主體——文人形成有效威懾，也深刻規範着文學的表現空間。傳統詩學"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觀點，被强權所挑戰。詩歌的衝動在一個地方壓抑，必會在另一個地方突破，新的詩學範式，開始悄悄生成。

二、元祐體詩歌的轉向

"烏臺詩案"、"車蓋亭詩案"是新舊黨争中出現的兩個典型事件。事實上，在激烈黨争的政治局面下，對文字的控制和借文字打擊政敵已成爲一種必然。以科舉選拔爲主要遴選手段的文官體系，官員以文學、經義起家入仕，即使不出任直接與文字相關的館職，亦日與章表奏議相伴，離不開文字的表達與交流。記録歷史、評價官吏、表達政見，以及國家政令的頒布施行，都表現爲文字。文字的作用之大、範圍之廣，使黨争中人對它非常重視，又其作爲書面表達有據可察，更容易成爲攻擊的對象。蘇軾一生的仕途坎坷都與文字有關，無獨有偶，與蘇軾齊名的黄庭堅，其人生的挫折，亦繫之文字：

①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二十六元祐四年五月戊寅條，第4册，第4017頁。

第一次挫折：元豐二年（1079），因曾與蘇軾通信，受“烏臺詩案”影響，由著作佐郎改知吉州太和縣（今江西泰和），罰銅二十斤。

第二次挫折：元祐年間任《神宗實録》編修官。紹聖元年（1094），以修《實録》失實貶涪州别駕，黔州（今重慶彭水）安置。

第三次挫折：元符三年（1100）東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因陳舉摘《承天寺塔記》文字以爲“幸灾謗國”，貶宜州，死於貶所。

事實上，不僅蘇、黄，當時無論新黨、舊黨人物，仕宦浮沉亦多與文字相關聯。王安石的詩就曾被人摘爲誹謗；後吕惠卿又發其私書，使他失去神宗的信任。而紹聖四年著名的“同文館獄”，亦是發私書而附會出的誣陷。北宋乃封建集權漸趨嚴密的時代，人主倚之爲耳目的臺諫制度，許以風聞告訐，助長了派系鬥争之風。然風聞仍需一定證據方能取得好的效果，文字作爲書面材料，正好作爲告發的證據。於是，從公開的章表奏疏到隱秘的私人信件，從政論文章到文學作品，都受到窺視、審查與規範。而其中，詩文又以其模糊、可詮釋、可想象的特性，成爲摘取箋釋以攻擊政敵的最有力武器。在這種情況下，從政治功能中疏離，重新尋找方位，就成爲時代文學的選擇。

元祐詩歌已開始出現這種轉向。在蘇、黄那裏，詩人與官員的身份有所疏離，詩和文的職能進一步區分。元祐初期，蘇軾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黄庭堅任《神宗實録》檢校官，社會責任主要依托在應用型文字。在行制詞或修史時，他們能立場鮮明地

表達自己的觀點，爲此身陷黨争而不悔；但對文學性文字，尤其是詩歌，則傾向於將它從政治功利性中撤回，作用於個人情感的領域，體現出幽微的文人意趣。

元祐詩學以蘇門酬唱爲標志，分汴京酬唱與潁川酬唱兩個階段。以蘇軾兄弟爲主盟，在他們門下，會集着所謂“蘇門四學士”：黄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另有陳師道、李廌，與四學士合稱“六君子”；此外，還有詩人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畫家李公麟、米芾等。他們往往會集一堂，詼諧調笑，留下不少詩酒唱和之作。到了南宋，邵浩將這些唱和詩編爲《坡門酬唱集》，張叔椿序曰：“詩人酬唱盛於元祐間。自魯直、後山宗主二蘇，旁與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李方叔馳騖相先後，萃一時名流，悉出蘇公門下，嘻其盛歟！”① 元祐時期是蘇軾及門下士人人生較爲順利的一個時期，他們會聚在一起，氣盛言宜，大家輩出，如汪藻所言：“元祐初，巽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②

另一方面，元祐時期并非風平浪静，而衹是暴風眼中相對的安静罷了。這一時期，舊黨的順境建立在排斥新黨的基礎上，舊黨内部也充滿派系鬥争，在這種局面下，經歷過“烏臺詩案”的蘇、黄等人，處廟堂而有山林之思，對文學有着更加成熟的認識。元祐體詩歌就是他們相互影響、共同合力的結果。在元祐詩人手中，經史子的修養更多地進入詩文，但詩歌更加與政論、史

① ［宋］邵浩《坡門酬唱集》卷首，《四庫全書》第1346册，第465頁上。
② ［宋］汪藻《呻吟集序》，《浮溪集》卷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筆區分開來，成爲精神空間的一種寄托。江湖之思的抒寫，個人憂患意識的表達，茶、畫、筆、墨的吟咏，師友間的相知相悦，是這精神空間生成的不可缺少的成分。兹舉坡門酬唱之一例。元祐三年（1088），蘇軾知貢舉，辟黄庭堅、晁補之、李公麟等爲屬，鎖院閲卷。待此事結束後，蘇軾等往見李公麟，公麟畫欲驟馬，諸人皆賦詩，蘇軾作《書試院中詩》記其事：

>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為考校官。三月初，考試既畢，待諸廳參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愊愊不欲食，作欲驟馬以排悶。黄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饕虱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泪縱横。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william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勤遠行，夜聞嚙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横。千重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羡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啓、晁無咎、舒堯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録。予又戲作絶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驟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書①。

① 《蘇軾文集》卷六十八，中華書局，1986年，第5册，第2139～2140頁。

因畫賦詩，復因詩作畫，畫以排苦悶，詩以發高興。“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這樣個人化的意緒與審美型的意象，就成爲衆人唱酬的興奮點。這是一次典型的蘇門唱酬。它從政治功利的境界退藏到人文意象之中，向審美生存的領域拓展，於雍容大度中散發疏野之氣，不同於慶曆詩歌之主於功用，亦没有淪入館閣唱和的空虚單調，而是以幽微精緻意趣的建構，揭示出一種新的人文境界。究其根本，元祐詩人雖然奉行儒家道德，但在終極取向上，却以自身獨立人格爲尚。秦觀曾這樣評價蘇軾：

> 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①。

以“深於性命自得之際”爲蘇軾之精，以與世周旋的議論文章爲其粗，可謂知言。而晁補之這樣評價黄庭堅：

>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為人所不為，故用於讀書、為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為人②。

此亦深知魯直者。無論是“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還是“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都是一種新文化人格的建構。而

① ［宋］秦觀《答傅彬老簡》，《淮海集》卷三十，《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宋］晁補之《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鷄肋集》卷三十三，《四部叢刊初編》本。

元祐文學中與政治相疏離的文人意趣，正是這種文化人格的體現。在這片個人修養、精神意趣的自得空間中，現實中被極端規範的詩人在文字中找到精神獨立的天地。這是一片新開啓的、極富發掘潛力的詩學空間。元祐體詩歌已透露出向江西宗派體過渡的可能性，而引導并開拓了這種可能性的，無乃是黄庭堅。對這個問題，下一章將有詳細論述。

三、新文學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

如果説，新舊黨争從一開始就和文字功用絞結在一起，新黨和舊黨利用文字互相攻擊，以之作爲黨争的一種手段的話，到了黨争的後期，由於兩黨勢力的懸殊，對文字的打擊就成爲一邊倒的文字迫害。紹聖之後，政治與文學的緊張關係全面爆發，演化爲一場歷時長久的詩文之厄。

紹聖元年，蘇、黄得罪，蘇門學士紛紛被遣。但元祐詩歌依舊傳誦在人耳目，蘇、黄諸公，依舊是青年士子崇拜的對象。以蘇軾的影響爲例，建中靖國元年（1099），蘇軾在常州（今屬浙江）去世，“吴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①。文學偉人的影響力可見一斑，而這是朝廷所不願意看到的。理學的情况亦略如是，程頤雖遠放涪州（今四川涪陵），門人亦追隨不輟。於是，崇寧年間，對元祐黨人的迫害，擴大到對元祐學

① ［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蘇軾詩集》附録一，中華書局，1982年，第8册，第2803頁。

術、政事、文學的全面清理。崇寧二年（1103）四月，詔："三蘇、黄、張、晁、秦及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鑒》，范鎮《東齋記事》，劉攽《詩話》，釋文瑩《湘山野録》等印版，悉行焚毁。""程頤追毁出身以來名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察覺。"① 崇寧三年（1104）正月，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黄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集并毁板。"② 政和二年（1112），以詩爲元祐學術，"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③。宣和五年（1123）七月，詔："毁蘇軾、司馬光文集版，已後舉人習元祐學術者，以違詔論。"④ 宣和六年（1124）十月，詔："有收藏習用蘇、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論。"⑤ 從禁令之重複，可見蘇、黄詩歌之深入人心、屢禁而不止。而政和二年之禁詩賦，則更是一幕荒誕至極的鬧劇，後以徽宗自己按捺不住，作詩破戒而收場。"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文學的種子已播種，就禁不住它的出土，燒不盡它的蔓延。但北宋末期確實是一個"茫然李杜壇，未免陳蔡厄"（吕本中《奉送子之還京師》，《全宋詩》第14491頁）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對詩文的禁錮完全成爲黨争的工具，文字不僅容易得罪，更有着天然的原罪，整個社會的文學水平普遍降低。

---

① 《皇宋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一《禁元祐黨人上》，第7册，第3663～3364頁。

② 《皇宋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二《禁元祐黨人下》，第7册，第3675頁。

③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中華書局，1984年，第141頁。

④ ［清］黄以周等《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四七宣和五年七月己未條注引《續宋編年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86年，第482頁。

⑤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第2册，第414頁。

不僅是文學，北宋末期，整個社會的思想、學術水平也急劇下降。紹聖元年，哲宗廢元祐諸法，罷詩賦取士，唐宋以來因科舉刺激而持續高漲的詩歌創作熱情在社會上驟然冷却，取而代之的，是科舉程文對青年士子的引導。紹聖元年策題，乃“元祐邪黨”之問，從此紹述之論大興。元祐黨人子弟及持異論者備受排擠，舉子們爲博取功名，不惜曲意迎合。如紹聖四年舉人方天若，程文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子弟當禁錮，資産當籍没，取爲第二名。這一時期的科舉狀元，如畢漸、莫儔，皆薄行小人。榜樣如是，後進者更堪憂。蔡京又主持推行三舍制，將教育和科舉結合起來，士人由縣到州，由州到京城，按外舍、内舍、上舍的標準升貢，在普及教育的同時，進一步限制了士人的學術視野。洪邁説：“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①]“箝制多士”的結果，是士子學問的日益荒疏。舉子們以《三經新義》、《字説》爲準，跟着程文的指揮棒走，而“士子程文，至於歷代世次先後、古人名氏顯著者亦或差舛”[②]；舉子或不識歐陽修爲何人[③]，而朝臣有未能詩者。黄茅白葦，滿目皆是。奔走於仕進之途的官吏與準官吏，在朝廷的規範下，失落了詩文革新運動和儒學復古運動爲宋人帶來的通經明道、經世致用、文采煌煌、宏通博大；重建思想秩序、維繫斯文命脉之不墜，惟有依靠

①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下册，第576頁。

② ［宋］蔡嶷奏，見［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選舉》4之8。

③ 見［宋］惠洪《冷齋夜話》卷十，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頁。

民間頑强的師友傳承。

這就是江西諸派面對的時代。如果説，在元祐文學那裏衹是出現文字轉型傾向的話，那麽，元祐黨禁時代，江西諸派面臨的，是强制性的文字轉型。支撑以前文學繁榮的動力，如科舉的吸引、社交的需要、文采的滿足、遊戲的愉悦，皆已抽空。他們頂着强大的政治高壓，堅持文字之使命，這就意味着文字已經逸出功名科舉之外，逸出政治允許的範圍，和同時轉入地下傳授的理學風潮一起，成爲頑强的師友傳承，進入一個更爲獨立的領域。他們需要回答：在逼仄的空間，脱落科舉的支持，脱落爲文造情，脱落華藻辭彩，脱落政治功利，甚至脱落元祐文學的藴藉風流後，詩歌憑什麽存在？詩人又如何站立？慷慨的用世態度、强烈的現實關懷、對儒家理想境界的向往還凝聚在詩人的深心，但對現實無力的感覺於此時已發展到極致，不得已而借助糅合佛家思想的心性之學，創造新的詩學範式，便成爲元祐後學的選擇。黄庭堅其人，就從元祐體詩歌的整體風格中凸顯出來，以他獨特的詩學品位、人格範式，開闢了新的文學空間，更在紹聖後以個人本位、文學本體詩學觀的進一步成熟，爲後學提供了思想資源和文學典範，帶領跟隨他的一大批年輕人，引導文學進入江西宗派時代。

第二章
江西詩宗——黄庭堅

在江西宗派中，黄庭堅是一個提綱挈領的人物。説他是詩派之“宗”，是因爲：在元祐文學的整體性中，他以自身獨特的詩學範式，開啓了適應時代需求的新的詩風；他親自獎掖和提拔的後學成爲江西宗派的主幹；他對青年詩人的諄諄教導，形成了一套可以遵循的家法。正因爲如此，黄庭堅爲後學詩人提供了可資學習的典範，在他開創的詩學範式的引導下，江西宗派得以形成。

第一節　典範的建立

《滄浪詩話》論詩體，“以時而論”，有“元祐體（蘇黄陳諸公），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①。黄庭堅同時在“元祐體”

①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歷代詩話》下册，第689頁。

和“江西宗派體”之内，他是元祐體詩歌的代表，又是江西宗派體的開山祖師，這個提法正確表述出元祐文學和江西宗派文學的先後承續關係和黄庭堅在這兩種詩體中的關鍵地位。元祐詩歌有諸多整體特徵，然黄庭堅詩歌在元祐詩歌的整體特徵中，無疑又具備自己的特色。他的詩歌從向外之搜括轉向向内的持守，嚴於格律，精於用典，富含豐富的歷史文化内涵，却又匠心獨運，自闢境界。它對應着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文化心理，應和着理學思潮，開創了新的詩學範式，成爲經久不衰的文學典範。

一、文化人格

元祐文學已出現了與政治疏離的傾向，而黄庭堅則走得更遠。他對人生的承擔在内不在外：有社會責任感，却缺少政治熱情；不企圖致君堯舜、大濟蒼生，而是專心於學問和著述。在他身上體現的，是一種新的人格類型。如果說，從宋初開始持續高漲的政治熱情到黄庭堅這裏驀然一冷，這也是一葉知秋的勢之使然。

（一）疏遠政治

與蘇軾自小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同，黄庭堅對經世治國的宏圖，從來有一種疏遠和懷疑的傾向。世傳他七歲作《牧童詩》：

> 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①]。

---

① 黄㽦《山谷年譜》卷一，《四庫全書》第1113册，第820頁。

小小年紀，就以詩歌抒寫對政治伎倆的厭惡與對自由生活的嚮往。這首詩反映出的少年老成態度和獨立思考習慣，奠定了黄庭堅一生思想的基調。他對官場的污濁早有所警惕，然父親早逝，母老家貧，仕宦是他生存的需要。黄庭堅兩舉進士并於治平四年（1067）登第，調葉縣尉，開始了官宦生涯。是年也是神宗即位、起用王安石變法的開始。黄庭堅歷仕葉縣（今屬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知吉州太和縣、監德州德平鎮（今山東商河德平鎮），飽見新法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吏的趨走奔競。下面一首詩，就冷峻地描畫出他們的醜態：

官符晝夜下，朝播責莫獲。射利者誰其，登龍彎繁弱。昨聞數邦貢，曲禮賦三錯。恭惟廟廊上，獻納及新瘼[①]。

一邊是追求速成，一邊是拔苗助長；朝廷要求收穫，就有地方官員獻納上貢。上下相欺，“興利者受實賞，力田者受實弊，郡縣行空文，朝廷收虚名；名爲利民，其實害之”（《按田》序，《黄庭堅全集》第1205頁），受害的衹能是百姓。這種醜陋的政治伎倆其實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與這些官吏不同，黄庭堅生性耿介，對官場的趨附逢迎早有拒斥之心，况他親見新法推行中變麥壟爲稻田的不識土性、以鐵龍爪治黄河的如同兒戲、開邊釁

① ［宋］黄庭堅《次韻答宗汝爲初夏見寄》，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黄庭堅全集》，第2册，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98頁。本書所引黄庭堅詩歌，除特別注明外，皆據《黄庭堅全集》。以下凡引該書，僅列篇名和頁碼，在文中作注。

而師老西鄙，時政與己意有違，奉行上級命令，不得不有所違心。在太和任上，黄庭堅深入窮僻山區，親身體察貧民的苦處，雖然不得不頒行鹽法，但并未像别的郡縣那樣争授多數，“大吏不悦，而民安之”[①]；在德州德平鎮，又曾因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反對時任德州通判的趙挺之推行市易法。他懷抱儒家的仁政理念，反對新法的悍然推行，但也并非積極的舊黨中人。如莫礪鋒先生所説，黄庭堅“不是一個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强烈的政治主張的人”[②]。做官對他來説，是“食貧自以宦爲業”，養家糊口之所須，没有别人常有的熱情。山谷詩集中，無論是得第還鄉的“京塵無處可軒眉，照面淮濱喜自知”（《新息渡淮》，同前，第1271頁）、葉縣尉任上的“素餐每愧斯民病，改作常爲法吏繩。官小責輕須自慰，得逢佳處幾人曾”（《次韻邵之才將流民過懸帛嶺均田》，同前，第1314頁）、任學官時的“功名可致猶回首，何况功名不可求”（《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同前，第1079頁），還是太和任期間的“我愧疲民欲歸去，麥田春雨把鋤頭”（《再次韻答吉老二首》其一，同前，第1164頁），對官場的厭惡和對自由生活的嚮往，始終是他反復吟唱的主題。

即使是進入元祐時期，山谷自身的仕途比較順利，厭惡官場的情感基調也没有改變。與同一時期蘇軾的感激涕零、思欲報效不同，山谷對政治的態度仍舊是疏離和冷淡。他參與編修《神宗實録》，敢於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對他而言，這不過是理所當然

① ［宋］佚名《豫章先生傳》，《黄庭堅全集》附録一，第4册，第2360頁。
② 莫礪鋒《論黄庭堅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載《文學遺産》1995年第3期。

的責任承擔。作爲蘇軾門人，他從不參與當時“洛黨”、“蜀黨”、“朔黨”間的争鬥，却往往爲政治鬥争餘波所及，數議除美官，而爲言事者所梗。對此，山谷付之以淡然。“有身猶縛律，無夢到行雲。俗裏光塵合，胸中涇渭分”（《次韻答王耶中》，同前，第11頁）是他對這一時期生存狀態的描述。館中的事務在他看來和縣衙的事務一樣瑣碎，在公務之餘，評詩賞畫，師友酬酢，方是他人生的快樂。他屢次發起歸隱主題的吟唱，如其《雙井茶送子瞻》：

>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磑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黄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同前，第87頁）

這首詩蘇軾有和作，黄庭堅又有同韻《和答子瞻》《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韻》《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緑珠之句復次韻戲答》《戲呈孔毅父》《謝黄從善司業寄惠山泉》等詩，挑起廣泛的唱和。經這次酬唱，江湖之思與雙井茶的風味，成爲元祐詩歌的經典意味。元祐唱酬詩歌，以山谷的成就最高；而元祐詩之疏離政治、充滿機鋒與雅趣，不能説没有留下山谷詩風深深的痕迹。

正如黄庭堅的擔憂，政治反復無常。因複雜的派系鬥争，蘇軾於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館閣唱和的盛況，一時風流雲散。兩年後，山谷因母親的去世歸鄉守喪。元祐八年（1093），山谷服除，同年高太后崩，哲宗親政，朝政大變。明年改元紹

聖，元祐史官首先得罪。面對《神宗實録》多誣失實的指控，山谷“三問皆以實對”，被貶涪州别駕、黔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即日上道，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喪休戚芥蒂其中也。”① 從本年開始，他歷貶黔州、戎州（今四川宜賓），元符末曾蒙恩東歸，崇寧元年就任九天的太平州（治今安徽當塗）知州，又因《承天塔記》的誹謗，被貶至更爲偏遠的宜州（今廣西宜山），最終死於貶所。因爲早對政治伎倆熟悉和厭倦，他對貶謫生涯應之坦然。對政敵的爲所欲爲、肆無忌憚，他持一種冷眼旁觀的態度，并無冤屈不平和壯志未酬之感。

自始至終，山谷對政治保持着疏遠和冷淡。仕宦對他，意味着人生責任，却非人生目的。在飽經憂患後，他説：“人生與憂患俱生，仕宦則與勞苦同處。事固多藏於隱伏，實無可避，願深思之。食其禄而避事，則灾怪生矣。”（《與明叔少府書》，同前，第 1819 頁）在地方官任上，他體察民情，在史官任上，他秉筆直書，這些都遵從了儒家的政治理想。集道德與倫理爲一身、將修身與治國糅合在一起的儒家政治思想，其道德之自足、圓滿性和實際政治操作的功利、目的性從來就脱節，到了北宋，更不能解决積貧積弱的現實政治問題，反倒是作爲新舊黨争中衆多思想矛盾中的一種，進入混亂的政治争鬥。黄庭堅懷抱儒家理想，却不再試圖致君堯舜、大濟蒼生，而祇求盡己之責，無愧於心。他清楚認識到，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并不像儒家先哲所預期的可用統一的道德協調起來；相反，對堅持儒家道德、自身修養

① 《豫章先生傳》，《黄庭堅全集》第 4 册，第 2361 頁。

的人而言，現實政治其實是一個非常陌生的領域。他在元祐四年(1089)作了一首《記夢》詩，很能傳達對政治的態度：

> 衆真絶妙擁靈君，曉然夢之非紛紜。窗中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借問琵琶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摇手。两客争棋爛斧柯，一兒壞局君不呵。杏梁歸燕語空多，奈此雲窗霧閣何。(同前，第97頁)

對這首恍兮惚兮的記夢詩，當時及後世有多種解釋。我們不必將本事坐實，而是直接從解夢的角度，體會本詩潛意識的流露："衆真絶妙擁靈君"的排場，惟宣仁后足以當之；"两客争棋爛斧柯，一兒壞局君不呵"的局面，則是朝廷紛争的重現。那位在多數舊黨眼中如女中堯舜的太皇太后，在山谷夢中，竟如此不通人情、把握不定。詩人在她的殿堂中，祇能注目於歌妓的琵琶，人與人的目目相接、人性與藝術的心心相通，即使如此，還得有所顧忌。至於其他，"杏梁歸燕語空多，奈此雲窗霧閣何"！那些權力與威嚴、紛争與混亂，如此疏遠、陌生、荒誕，實在是詩人的眼光與心力所不能及也不願探究的領域。黄庭堅注定不是一個政治家，而祇能是循吏、良史、詩人。在仕宦與貶謫的生涯中，在萬丈紅塵的空間，始終有一種境界成爲山谷的嚮往，在他的詩歌中，就幻化爲萬頃碧波中自在的白鷗。當這種意象出現，將現實生活的煩惱掃空，隨白鷗的翱翔，他似乎進入了一個更廣闊、更清凉、更浩淼的天地。這是詩歌的世界，是藝術的空間，是想象中的自由之境。

(二) 人生根基的重建

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自我在山谷那裏并非和諧。在他的詩歌語言裏，常出現兩組相對的意象。一組象徵着有限、脆弱、荒謬：

小黠大痴螳捕蟬，有餘不足夔憐弦。（《寺齋睡起二首》其一，《黄庭堅全集》第 213 頁）

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羅漢南公升堂頌二首》其二，同前，第 608 頁）

白蟻戰酣千里血，黄粱炊熟百年休。（《題槐安閣》，同前，第 1108 頁）

蠅説冰霜如夢寐，鷃聞鐘鼓亦驚猜。（《題神移仁壽塔》，同前，第 1111 頁）

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宫。（《觀化十五首》其十三，同前，第 1321 頁）

心游魏闕魚千里，夢覺邯鄲黍一炊。（《十月十五早飯清都觀逍遥堂》，同前，第 1339 頁）

而另一組意象，則象徵着穩固、堅定、不動：

頹波閲砥柱，濁水得摩尼。（《陳榮緒惠示之字韻詩推獎過實非所敢當輒次高韻三首》其一，同前，第 137 頁）

萬物逐波流，金石終自止。（《賦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八韻寄李師載》其七，同前，第 919 頁）

蓬蒿貪雨露，松竹見冰霜。（《和外舅夙興三首》其一，同前，第1058頁）

老松閱世卧雲壑，挽著滄江無萬牛。（《秋思寄子由》，同前，第240頁）

風雨極知鷄自曉，雪霜寧與菌爭年？（《再次韻寄子由》，同前，第1097頁）

松柏生澗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骯臟自骯臟，伊優自伊優。但觀百歲後，傳者非公侯。（《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其九，同前，第57頁）

一方面是夏蟲、斥鷃的狹隘，魚游、蟻鬥的荒誕，黄粱美夢的短暫；另一方面，是金石、砥柱的穩固，松柏、曉鷄的堅貞，摩尼寶珠的澄澈。兩相對比，山谷的取捨不難看出：他看到人生的有限、脆弱，却没有陷入迷惘，有所恃也有所守。我們不禁有興趣探討：失去對外界世界的憑依後，是什麼掌管着黄庭堅的人生之舵，支撑着他内心的穩定、堅固？

首先，對儒家道德的堅定信仰，是山谷思想的根基。他的儒學源流極正。因父親早故，他十五歲起就往依舅父李常於淮南，在舅父的教導下，"六經觀聖人，明如夜占斗。索居廢舊聞，獨學無新友"（《用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爲韻寄李秉彝德叟》其五，同前，第915頁），參學精進，李常以爲一日千里。十七歲，又得李常的同年兼知交孫覺許其女，進而受學，"得聞言行之要。啓迪勸獎，使知嚮道之方者，孫公爲多"。（《黄氏二室墓志銘》，同前，第1386～1387頁）李常在《宋元學案》中入《范吕諸儒學

案》，爲司馬光同調；孫覺入《安定學案》，出胡瑗門下。他們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政治家，也是名儒。在二公的啓迪下，黄庭堅深入經史，涵泳於學問的海洋，嘗作詩言志曰：

> 争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斑。末俗風波尤浩渺，古人廉陛要躋攀。螳螂怒臂當車轍，鸜鵒能言著鏁關。顧我安知賢者事，松風永日下簾間。（《去賢齋》，同前，第1293頁）

與俗吏以學問爲仕進階梯，得第後過河拆橋不同，聖賢之學對山谷來説，意味着道德的常態、終身的事業。“人間寵辱無來路，萬頃風烟一草堂”（《和吕秘臣》，同前，第1300頁）。與其政治態度相對應，黄庭堅對儒學的興趣顯然在道德修養而非經世致用環節。所謂“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奥室，其塗雖長大，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論語斷篇》，同前，第506頁）。他曾標舉“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書嵇叔夜詩與侄榎》，同前，第1562頁）的不俗境界，又贊揚“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濂溪詩序》，同前，第308頁）的有道者氣象。篤實剛健，而又通透灑脱，這也正是黄庭堅本人的風貌，是他“事事反求諸己”的儒學修養的體現。

其次，親近佛教、參禪而得的心法啓迪是黄庭堅人生根基重建的關鍵。山谷一生與佛教有勝緣。其故鄉分寧（今江西修水）

是佛教勝地，即臨濟宗黄龍派的道場。黄庭堅的祖母、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自幼年時代起，他就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佛教潜移默化的影響。而從中年時期開始，伴隨着喪妻、喪母、老病、貶謫的人生體驗，釋氏之學更成爲他憂患人生中尋求解脱的方向。他對佛教的深切皈向始於元豐三年（1080）。是年，山谷的第二位夫人謝氏去世，他本人又受“烏臺詩案”牽連，由著作佐郎改知吉州太和縣，赴官途中，路過舒州懷寧縣（今安徽潜山）三祖山，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盛，因自號山谷道人①。元豐七年（1084），他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與肉食，正式皈依佛教。

如果説，元豐、元祐時期，山谷對佛教的皈依主要在虔誠信仰的話，到元祐末期，一次著名的禪悟經歷，則帶給他智慧的啓迪。元祐六年（1091），山谷母親去世，同時他自己也大病一場，帶着生老病死的痛苦體驗歸鄉守喪。丁憂期間，他時往黄龍山，從黄龍派僧人晦堂祖心及其弟子靈源惟清、死心悟新遊，得到晦堂的見機接引：

> 太史黄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黄龍山，從晦堂和尚遊，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

① 次年蘇軾躬耕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這標志着蘇、黄經歷人生憂患後，思想、創作進入成熟期，故“天下人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之，以配‘東坡’云”（《豫章先生傳》，《黄庭堅全集》第4册，第2362頁），“東坡”與“山谷”，遂成爲蘇、黄二人的標志性稱謂。

> 三子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釋，而至於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沉默久之。時當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①。

問山谷以《論語》斷章，這本儒生所長。但晦堂所問，不是章句訓詁，亦非微言大義；離開知識的分別詮釋，直觀自我的當下體悟，方是他要指出的禪宗門徑。這是一種奇妙的體驗：對學者山谷來説，聞香見道突破了分别思維的慣常習慣，有打破桶底的新鮮通泰；對詩人山谷來説，聞香見道打通了思維、情感及感官領域，拓展了詩情洋溢的空間。這種體驗能够把人從疑慮、憂畏中解脱出來，代之以禪悦的無往不適、自在坦然。

元祐後期的歸鄉居喪是黃庭堅人生命運和詩歌風格即將發生轉變的準備期，這一時期他詩歌創作不多，却在思想上有了新的收獲。由於對佛教有了更深體會，他晚年屢謫僻鄉，猶能“殊坦夷”②，以逆境爲進德之階，在貶謫的經歷中不斷體會心靈的進境，書法與詩歌藝術升華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他告訴别人：“三界無安，愛爲根本，惟洗心於道者，不受纏縛。不審頗觀佛書否？若於此有味，即能化煩惱境界，超然安樂。”（《答知郡大夫》，同前，第 494 頁）晚年的山谷，對佛教的理解更爲通達。

① ［宋］釋文瑩《羅湖野録》卷上，《卍續藏經》第 142 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年，第 0963 頁。

② ［宋］惠洪《冷齋夜話》卷三《少遊魯直被謫作詩》，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日本五山版冷齋夜話》，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4 頁。

他不再死守戒律，曾因爲朋友的雅興而飲酒，亦因爲身體的需要開始食肉。如果説，早期他曾抱着信仰的心態來皈依佛教的話，到了晚年，則認識到自己的支點乃在這個塵世。佛教對他不再是彼岸的許諾，而是隨時現前的通透與了悟——或許，這就是禪宗的真諦。“皮毛剥落盡，惟有真實在”，藥山的這句名言，被山谷引用來説明自己的悟境。與此同時，他的詩歌也擺脱以前刻意寫作的狀態，落落穆穆，風韻灑落，不煩繩削而自合，進入了無人之境。

我們看到，山谷在佛學修養的每一次進境，都伴隨着他憂患人生的體驗，故佛學對他，不是緣飾與增益，而是提携他人生的方向，是冷暖自知的心靈感受。在禪悟基礎之上，他對儒家經典有了新的理解：

> 若解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跋雙林心王帖》，同前，第 649 頁）
>
> 大概佛法與《論語》《周易》意旨不遠。《論語》大旨不過遷善改過，不自覆藏，故“君子坦蕩蕩”，“入太廟，每事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天地同根，萬物同一氣，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但諦審諦觀當如何是其人，莫認衹令弄影戲漢；若識得人，萬事成辦，元不欠少。（《與王雍提舉》，同前，第 2081 頁）

黄庭堅以佛家心法重讀儒家經典，對治經之法作出如下總結：

> 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説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書贈韓瓊秀才》，同前，第655頁)

可見，在傳統儒學“修、齊、治、平”的理想中，黄庭堅的思想重心從“治、平”中退回來，放在了“修、齊”之上。而修身、齊家，正當以“養心治性”爲根本，這是對儒學的一種心性化改造。

對道家經典，黄庭堅也采取了心性論的解讀方式。他好讀《莊子》，尤嗜《逍遥遊》篇，嘗作《幾復讀莊子戲贈》云：

> 有待於無待，定非各逍遥。……惜哉向郭誤，斯文晚未昭。胡不弃影事，直以神理超。(同前，第1191頁)

這裏牽涉到一樁學術公案。向秀、郭象注《莊子》，對“逍遥遊”作出“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遥一也”[①] 的解釋。此論混淆大小、高低、崇高與庸俗之辨，爲人的縱情行欲提供了合理性，在西晋與東晋前期極

①［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卷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0頁。

爲流行。直到東晋中期，名僧支遁指出："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遥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絶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①] 向、郭舊義方歇。支遁對"逍遥遊"的解釋重申"有待"、"無待"之辨，點明人生解脱道的終極目的，是用佛教般若思想對玄學進行格義的産物。黄庭堅對"逍遥遊"的理解與支遁略同，這是因爲，他和支遁一樣，有以佛學解老、莊的傾向。他在《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内篇論後》中，對這一思路作了明確説明：

>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涣然頓解者，僧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異，不求之耳。……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同前，第1405頁）

此云諸法雖異，却是"雖異而不異"，在治心的根本上有不異之同。在"養心治性"的基礎上，黄庭堅把佛、儒、道溝通起來，將學問化爲實際的心性修養，對人生的進退出處皆泰然處之，進入瘦硬通神的人格境界。以下這段話，是黄庭堅對自己學

①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説新語箋疏》卷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0頁。

問與思想體系的總括：

> 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難。……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與秦少章覯書》，同前，第483頁）

“自見其性”是學問的目的，亦是黄庭堅爲自己的人生尋找到的支撑。這就是在他詩中出現的逝波中不動的金石、濁水中澄源的實珠，是脱離政治本位後，依此法則“無適而不當”的人生新秩序的建立。正如“逍遥遊”之有大、小辨，它是立足於現實人生、面對個體生命的一種終極承擔態度，與對“隨人有工拙者”的“世俗之事”的究心正須區别開來。這就是蘇軾總結出的“輕外物而自重”①：輕視外在功名，重視自身品格，將道德的重心從政治熱情中抽離，内化爲一種向真、向善的心性修養。晁補之論“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②，也是一種中肯的評價。“治心養氣”的人格修養是理解黄庭堅讀書、爲文的關鍵，這與時代理學精神相通，是一種有典範意味的文化品格的建立。相對他來説，蘇軾感激論天下事的文化人格，更多的是具有承前的意義。

---

①　蘇軾《答黄魯直書五首》其一，《蘇軾文集》卷五十二，中華書局，1986年，第4册，第1532頁。

②　晁補之《書魯直題高求父揚清亭詩後》，《鷄肋集》卷三十三，《四部叢刊初編》本。

二、詩學範式

黄庭堅“輕外物而自重”的文化人格與時代理學思潮一脉相承，但并非其思想的全部。如果在他身上治心養氣工夫自身具足的話，我們或許也會像理學家尹焞那樣，問詩人黄庭堅一聲：“黄魯直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① 詩歌是人類特殊的活動，是人與自我晤對方式的一種。當哲人以哲學反思的方式超越日常生活的混沌，在“真”與“善”的領域作不懈探索，對自身思想作深入開發，滿足智性、理性的需求時，詩人則汲汲於以語言來尋找“美”，尋找人與世界和諧、圓滿的交點，以求情感的安頓。在有限、有待的人世，“真”、“善”、“美”的指向是人類永恒的追求。詩歌不止是一藝，而是如劉勰所説“實天地之心”②、人類精神向上的一種努力。惟有稟天地之心的詩人，方能以詩性的精神把握詩情的脉動，以不懈之努力，開拓新的審美領域。黄庭堅正是這樣一位詩人。他以獨特的理論與實踐，開創出屬於他自己的、又具典範意義的全新詩學境界。

（一）“呻吟調笑之聲”與“詩人之態”

黄庭堅對詩歌極有自覺意識，一生致力於詩歌的創作和理論建構。就詩學思想而言，他對詩歌本質有超出同時代人的深刻認識，值得我們細參深究。

反對玩弄辭藻，要求詩歌有道德的皈依與智慧的觀照，是黄

---

① 見《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② ［梁］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上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1頁。

庭堅對詩歌本質的第一層認識。這在山谷詩歌和書信中隨處可見。玆略舉二詩：

炒沙作糜終不飽，鏤冰文章費工巧。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日杲杲。(《送王郎》,《黄庭堅全集》第 85 頁)

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後生玩華藻，照影終没世。安得八紘罝，以道獵衆智。(《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同前，第 13 頁)

詩歌追求美，非祇在美的形式，更是對包含人類求真、求善努力之美的境界的追求。黄庭堅對華麗辭藻、空虚内容的批判，與唐古文運動以來對文學的認識一脉相承；而他“要須心地收汗馬”、“安得八紘罝，以道獵衆智”—— 建立在道德根基與心性修養上的詩學追求，則以“輕於外物而自重”的傾向偏離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經世致用的精神，與理學家詩論略似。總的説來，如上認識與時代詩學精神一脉相承，所立極高，但并非新論。

在時代共識的基礎上，黄庭堅對詩歌本質還有更深一步的認識，這纔是他詩學思想的特色。在《書王知載朐山雜咏後》這篇著名的詩論中，黄庭堅集中闡釋了自己的詩學觀點：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争於廷，怨鄰罵座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

> 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同前，第 666 頁）

“詩者，人之情性也”，黄庭堅此論出自《毛詩序》的“吟咏情性”，却抽掉了其“以風其上”的政治目的。對他的“情性”説，我們不妨借助哲學上“情”和“性”的範疇予以説明：詩人的情乃受了性的規範，“忠信篤敬，抱道而居”，符合儒家的道德準則；但畢竟是情而非性是詩歌的本體，當“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個體化的思想、感覺、情緒有所不堪時，發爲呻吟調笑之聲，是爲詩歌。此論在性和情的糾葛中點明情感的本體性，在北宋詩論中獨標一格，於中國詩學思想的發展而言也是一個進步。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來説明。

首先，和同時代性理説或政治功用説詩論相比，此論建立在詩人情感本體的基礎上，是對詩歌本質的正確認識。北宋道學家詩論，如邵雍《伊川擊壤集·序》：“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聲譽，如鑒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静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①] 以心性規範取消情感的獨立地位。而政治功用説詩論，如梅聖俞《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

① ［宋］邵雍《伊川擊壤集·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六玉汝見贈述詩》："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爲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① 對詩歌予以實際功用化的解釋。與如上詩論相比，黄庭堅此論回到詩歌本體——情感的基礎上，心性化的修養落實到對情的影響，詩歌因此不再是政治、哲學的附庸，而有了自己獨立的領域。

其次，和傳統主情説詩論相比，山谷標舉的詩人情性——經理性制約之情，是經否定之否定後所回到的情感本體，綜合了時代詩學思想的成果。在山谷這裏，對"人之情性"的吟咏，與《詩大序》的"吟咏情性，以風其上"的政治功利性不同，衹是爲了自己的"胸次釋然"；而"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與韓愈"不平則鳴"也有異，乃是爲了化解内心的矛盾。鍾嶸在《詩品序》中列舉出種種自然的詩歌情感："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泪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② 與這些情感相比，山谷的"呻吟調笑之聲"顯然受到外在政治條件的制約和詩人心性修養的規範，綜合了知性、理性、感性的主體

① ［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卷第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梁］鍾嶸撰、曹旭集注《詩品集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7頁。

意識，表達也更加曲折、婉約。在“發爲訕謗侵陵”便會“引頸以爲詩之禍”的時代，詩歌不再干預政治，而是向個人本位的方向發展，這無疑體現了時代特色①。

黄庭堅另有一篇《胡宗元詩集·序》，可與上文參讀：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沈林皋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托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吊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宫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

①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將黄庭堅“呻吟調笑之聲”和歐陽修“窮而後工”説作一番比較。歐氏《梅聖俞詩集·序》云：“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十二，《四部叢刊初編》本）在表達窮愁之慨、寫人情之難言方面，“呻吟調笑之聲”對“窮而後工”説有所繼承；但它又取消了後者“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的用世態度、“興於怨刺”的政治抱負，益之以極度内省的心性修養。二者之異同，正體現出自北宋中期以來時代詩學精神的發展和變異。

> 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托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同前，第410～411頁）

詩人有忠厚、平和的修養，故其詩歌不發爲怨怒；而他的際遇又孤獨凄凉，反映在詩歌中，又不得不有怨傷。“不怨之怨”，即前所謂“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是在心性修養規範下的個人情緒表達。這種表達，山谷比之爲候蟲之聲。如許多研究者指出，此序列舉的候蟲之聲、澗水之聲、金石絲竹之聲，分别對應着末世詩人之言、楚人之言和詩人之言，它們的詩學地位由低到高排列。不過，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這篇序文中，雖然黄庭堅將“候蟲之聲”放在三種詩歌之最低等，却又以“末世詩人之言”的定義將它歸之於時勢使然，更進一步肯定它的表現，這無疑是對時代與詩歌關係清醒的認識。在山谷看來，所謂“候蟲之聲”有三層規定性：首先，“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舞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它是詩人個人情感的表達，不關乎政治教化；其次，“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要有心性修養的底藴；最後，“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即使是末世詩人之言，亦能體現詩歌藝術的獨特魅力。個人本位和文學本體，以及心性修養的規範，是“候蟲之聲”的基調。而所謂“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的“詩人之態”，則是黄庭堅進一步對文學本體的强調。“候蟲之聲”，雖不如“澗水之

聲”激越、“金石絲竹之聲”雅正，却是詩人面對當前生存困境的真誠文學建構，體現了真正的詩歌精神，是黄庭堅詩論的獨創。

從時代精神的角度，我們可以這樣來看黄庭堅的詩學觀：時代對文字的限制越來越明確；而性理之學、儒家道德的内化，個人修養的强調，亦是對人生樸素哀樂之情的自持。在雙重規範下，“呻吟調笑之聲”反映着時代對人的擠壓、人在逆境下的道德努力，以及在逼仄的空間中，“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所能生成的情感空間和詩性天地。它處在不平則鳴與夷然喪我中間，於規範中見認同，於壓迫中行自由，乃戴着鐐銬的舞蹈、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傾訴、化解不盡的激蕩。瘦硬、幽僻、冷雋、倔强，是其主要的美學特徵。從中唐開始的儒學復古、詩文革新運動，以養浩然之氣入手，結之以治心養性，從不平則鳴開始，以呻吟調笑結束。正如理學乃儒學復古運動的必然結果一樣，“詩者，人之情性也”也是詩文革新運動的必然歸宿。它建立在詩本體，即個人情感的基礎上，而這種情感又經心性修養的塑造，以治心養氣而非政治熱情爲主要特徵，符合時代心理需求。“呻吟調笑之聲”、“不怨之怨”，作爲一種曲折、含蓄甚至悖反的表達，具有高度的韌性與張力，能引起混合着理性認同和情感共鳴的複雜審美愉悦，故山谷詩歌、詩論在後世屢獲認同，成爲封建社會後半期正直士大夫詩學選擇的一種。

(二) 黄詩"以意勝"的審美闡釋

劉熙載説:"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黄皆以意勝。"① 以"情韻氣格"或以"意"取勝,是唐、宋詩歌分野之所在。作爲宋詩的代表作家,蘇軾詩歌尚有天才高妙、以氣遣辭的特點,"以意勝"的特徵在黄庭堅詩中表現得尤爲突出,是"山谷體"詩歌最顯著鮮明的特色。

黄庭堅詩歌之"以意勝",首先體現在詩歌以意引領,具有寫意化的傾向。如前所述,山谷論詩以情爲本,所謂"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這種情感并非單純的悲喜,而是包含認知、判斷、潛意識在内的複雜個體感受。這種種感受,在山谷詩中,總是由一種精神向上牽引、尋找詩性語言的努力提挈統領,體現爲某種意向、趣味和格調,這就是筆者所謂的"以意領引"。試以下一首《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爲例,説明山谷詩"以意領引"的特徵:

> 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政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一軒黄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黄庭堅全集》第1007頁)

此詩意筆草草,先畫出無弦的古琴、詩人之衣袖,以及不能畫出、没有彈奏、却有豐富想象空間的旋律,在缺失的描繪中,

① [清] 劉熙載《藝概·詩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8頁。

召喚出詩意的在場。然後，在“豈落”——“後”與“不數”——“前”的對比中，指向詩中人呼之欲出的兀傲意態，却不明言。詩歌最後定格於淵明對菊的經典場景，回筆點出“無酒”之“缺然”——這一“缺然”，呼應前面的“無”、“誰”、“豈落”、“不數”；在這“缺然”中，詩人之“意”、詩中人之“意”，皆栩栩飛動。這首詩以意遣詞，抒寫詩人胸中意趣，與文人寫意畫的表現有些相似。而與繪畫相比，詩歌語言直接溝通着人的思想感情，顯然更具寫意的優勢。黄庭堅就是一個以詩歌語言寫意的大師。無論是《登快閣》的快意抒情、《秘書省冬夜宿直寄懷李德素》的淘寫冷笑，還是《演雅》的鋪陳蟲鳥、《乞猫》的滑稽梯突，都是抒寫詩人胸中的意緒、意味、意趣。再舉一首典型的山谷體詩歌説明這個特點：

>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妙絶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户牖，處處煮茶藤一枝。（《題落星寺》其三，同前，第 1093 頁）

此詩寫僧寺，在“落星開士”與“龍閣老翁”、當前僧人與我的漸進關係中，以賦詩、客坐、宴寢、觀畫、煮茶等活動的深入，揭示“深”、“藏”、“隔”的感受和“來”、“到”、“知”的體驗，詩人的情感傾向、意緒流程，歷歷可見。詩歌交織着内與外、静與動、過去與現在、留與來的對比，處處充滿緊張中的和諧、通融中的對立，在詩律上也采用奇中寓正的拗體，這就是山谷詩歌

之寫意。

既然以寫意爲主要特徵，黃庭堅詩歌之行文，就講究“命意曲折”[①]。他論作詩文法云：

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答洪駒父書》，同前，第 474 頁）

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輒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耳。（《論作詩文》，同前，第 1684 頁）

以意領起詩歌的運行，“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長篇須曲折三致焉”，章法謹嚴、意脉貫穿，這正是山谷詩歌的特徵。在此基礎上，其詩又往往大吞大吐、明斷實連，具有大寫意的氣勢。方東樹所謂“山谷之妙，起無端，接無端。大筆如椽，轉折如龍虎，掃弃一切，獨提精要之語。每每承接處，中亘萬里，不相聯屬，非尋常意計所及”[②]，說的就是這種氣勢。如《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床下拜老龐。

① ［宋］范温《潛溪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 年，第 323～324 頁。
②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年，第 314 頁。

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誠堪婿阿巽，買紅纏酒缸。”（同前，第16頁）詩歌的命意、用典、比喻皆新警，而章法之起接、連轉、收束，生新拗折，飈來倏至，亦非尋常意度。值得指出的是，山谷詩歌之寫意，并非如東坡的“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①、意氣之向外漫溢，而更多的是如周裕鍇先生指出的“繞路説禪”②，具有“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贈陳師道》，同前，第1039頁）的曲折、晦澀。他往往使用隱約、戲噱，甚至悖反的表達，在冷與熱、表達與消解、通達與倔强交戰的張力中，“起無端、接無端”、“轉折如龍蛇”，將“情之所不能堪，因發爲呻吟調笑之聲”的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黄詩大開闔處，正見其鍛煉之功，和内斂而非外放的意力——用王若虚的話來説，是“有斬絶而無横放”③。兹以其章法上的“斷句輒旁入他意”④爲例：

>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奇花寄愁絶。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咏》，同前，第114頁）

①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文集》卷四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4册，第1418頁。
② 周裕鍇《繞路説禪：從禪的詮釋到詩的表達》，載《文藝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金］王若虚《滹南遺老集》卷三十九《詩話》，《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宋］陳長方《步里客談》卷下：“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四庫全書》第1039册，第404頁。

山谷另有一小帖："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净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與李端叔書》，同前，第1751頁）水仙花之美，對應着少年情味。少年情味是六朝以來詩歌情懷之一種，好爲晚唐詩人所用，但對飽經世事的山谷來説，這種情味雖可喜亦可惱，徒亂人心，不如像禪宗公案斬猫話般作個了結。於是，詩歌最後一聯，一改前面對水仙花旖旎風華的精工描寫，突然放開，出門一笑，引入大江横的境界。詩歌的意脉至此出現了斬絶、斷裂，而這種斬絶、斷裂，又是作者獨特意緒的體現。思想的深度决定了詩歌的深度，更在意匠經營之中化爲命意曲折，進入騰挪跳擲的結構形式。"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鈎深入深。聽他下虎口著，我不爲牛後人"（《贈高子勉四首》其三，同前，第201頁），山谷詩歌的章法已與其人格境界同構，起也好，接也好，轉折也好，收束也好，非尋常意計所能擬議。與此同時，他"覆却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荆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韻奉酬四首》其三，同前，第203頁)，在意的熔爐中，無論是造句、下字、用典，還是借代、擬人等修辭手法的使用，皆能爲我驅使，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其結果就如錢志熙先生指出的"審美經驗的個體化"——"山谷晚年的詩，不僅整體的風格是獨創的，而且每一個作品都是獨創的。即使對自己的作品，也没有重複雷同的地方"[①]。每一首詩都在意的鍛煉中焕發神采，這就是山谷作詩"以意勝"的成果。

宋僧普聞對山谷詩的寫意特徵有一個比較精要的總結，這就

① 錢志熙《黄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14頁。

是“善琢意句”：

> 詩家云，煉字莫如煉句，煉句莫若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於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易琢，意句難制。境句人皆得之，獨意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所以魯直、荆公之詩出乎流輩者，以其得意句之妙也。何則？蓋意從境中宣出。……魯直寄黄從善詩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云云。初二句為小破題，第三第四為領聯。大凡領聯皆宜意對。春風桃李，但一杯而已，而想象無聊窶空為甚，飄蓬寒雨十年燈之下，未見青雲得路之便，其羈旅未遇之嘆具見矣。其意句亦就境中宣出，桃李春風、江湖夜雨，皆境也。昧者不知，直謂境句，謬矣[①]。

在這裏，首先要區别境句與意句。境句指寫境之句，一般是借景物的描寫寄寓詩人的情緒、體悟、感受；意句就是上文所述以意領起的詩句。以意領起并非衹是思想情感的直陳，如普聞所舉，衹要“意從境中宣出”，境句也就是意句。境句、意句之别，對應着唐宋詩的分野。從審美經驗的角度，境句的創作對應着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具有景對情、人對物的程序化傾向；而意句却生於詩人與世界的緊張感，凸顯詩人的主體意識，

① ［宋］釋普聞《詩論》，［元］陶宗儀《説郛》卷七十九，張宗祥重校《説郛三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72～3673頁。

具有强烈的個性化特徵。初、盛唐詩歌，對應着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情韻豐滿，氣味悠長，是境句創作的黄金期。自安史之亂以來，中國封建社會邁入中年期，衰態顯露，詩人與世界間的天然和諧漸漸消失。晚唐以來詩境趨於狹窄。詩歌情感、題材的程序化，使詩歌尤其是律詩定型爲一聯景、一聯情的套路，詩情、詩意退縮回風花雪月，不能直契真正的人生感觸。宋興以來的仿晚唐詩歌更等而下之，缺乏真正的想象，流於蒼白、貧弱。普聞所説的“境句人皆得之”就是指這種情況。“意句”的創作，確切地説，始於杜甫。這位集大成的詩人，以秉之於盛唐的氣勢、修養，在進入中唐的憂患感受中繼續尋求詩性力量，以筋骨矯健、思理深厚的詩歌創作爲後世開法。此法繼之以韓愈、白居易、孟郊，錢鍾書先生所謂“唐人之開宋調”[①] 者，在晚唐和宋初未得其傳，從宋中葉開始，經梅聖俞、歐陽修、王安石等的實踐，到了蘇軾、黄庭堅，終於發揚光大，尤以黄庭堅爲集大成者。黄庭堅詩歌以煉意爲第一要義，屏弃凡俗，追求崇高，以智慧的觀照、道德的堅守、情趣的涵養，對日常生活的繁瑣、政治生活的荒誕進行消解、净化、提高，倔强中見姿態，枯淡中發膏腴。其詩格高、律嚴，瘦硬而有神味，在語言與境界上戛戛獨造，開闢了新的審美境界。所謂“格韻高絶，盤飧盡廢”[②]、“雖若不入用，亦不無補於世也”[③]，山谷詩歌，對應着封建社會後

① 錢鍾書《談藝録》，中華書局，1984年，第2頁。

② 蘇軾《書黄魯直詩後二首》其二，《蘇軾文集》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第5册，第2122頁。

③ 蘇軾《書黄魯直詩後二首》其一，同上，第2122頁。

期走向個體化、邊緣化、内省化的一部分士人的生存處境，作爲“末世詩人之言”的一種，具有普適性，容易引起深層次的共鳴。

第二節　師承與傳授

宋人以復古爲口號，進行詩文革新運動，講究文統。吕本中《宗派圖序》先言漢唐以來詩文之衰，又云：“國朝文物大備，穆伯長、尹師魯始爲古文，成於歐陽氏，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同作并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藴矣。”[①] 以黄庭堅在詩歌革新中的作用比擬歐陽修在古文運動中的作用，儼然是一種詩統的建構。對黄庭堅的文學地位，這個提法有誇大的嫌疑；但是，如果不認爲黄庭堅是越過其他宋人，直承唐元和以來失落的詩統的話，他倒是有宋以來詩統的一環。北宋詩文運動有一個“付囑斯文”的傳統，就詩壇宗主來説，是沿着歐陽修——蘇軾——黄庭堅的次序傳遞的。當蘇軾接受歐陽修的囑托，或黄庭堅得到蘇軾的印證後，都勇於承擔宗主之責，以獎掖後學、傳遞斯文爲己任。元祐文學後，是學宗山谷的江西詩派而非學東坡的詩派成爲下一輪詩歌的主角，和這樣的一個詩學傳承體系有關。歷來對黄庭堅和江西宗派有太多的誤會，我們需要站在宋詩文運動主綫的高度，理解黄庭堅爲江西宗派指引的方向，理解黄

① 《雲麓漫鈔》卷十四引，中華書局，1996 年，第 244 頁。

庭堅與江西宗派在宋詩學發展中的地位，理解一代詩人的選擇。

一、獨自參悟，東坡印證

洪炎编山谷詩，以元豐元年（1078）黄庭堅呈蘇軾的《古風二首上子瞻》置之卷首，“以見魯直受知於蘇公有所自也”[①]。這兩首詩確實有非同尋常的地位：自黄庭堅作此二詩拜入蘇門，蘇、黄開始交往，蘇軾文人集團得以成型；而蘇、黄之交與蘇軾文人集團的唱和，更帶來後來元祐文學的盛況。故此二詩不僅可以置之山谷集卷首，亦可置之於《坡門酬唱集》乃至元祐文學史的卷首，對江西宗派研究而言，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本節即以此二詩的呈遞爲切入點，略述黄庭堅的詩學淵源與學詩歷程。

吕本中《童蒙詩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幸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②] 黄庭堅自己也説：“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處。”（《論作詩文》，《黄庭堅全集》第1686頁）的確，黄庭堅一生致力於對詩藝的學習、體悟。據説他七歲就有《牧童詩》，八歲有《送人赴舉》，十六歲有《溪上吟》，十七歲有《清江引》。這些詩歌抒寫獨往之情、隱逸之樂，藝術表達尚稚弱，却已能以絶高的氣質，初現重意詩歌的特色。他早期詩歌受父親黄庶、岳父孫覺[③] 影響。黄庶詩學杜甫，有《伐檀集》傳世。他奇崛精苦的詩風，給

① ［宋］洪炎《豫章黄先生退聽堂録序》，《黄庭堅全集》附録三，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册，第2380頁。

② 吕本中《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94頁。

③ 山谷於嘉祐六年（1061）得孫覺許其女，治平四年（1067）完婚，在山谷詩歌創作的第一階段，確切地説，孫覺還衹是山谷的“準岳父”。

黄庭堅留下家學淵源的烙印①。孫覺作爲一位醇儒，推崇杜詩的風雅比興②。在他的熏陶下，山谷捨去對如“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等晚唐體詩歌的喜愛，而“曉老杜詩高雅大體”③，有了“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的見識④，氣局漸趨宏大。治平三年（1065），二十二歲的黄庭堅以“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鎖烟”句得考官李詢激賞，舉鄉試第一，這也是山谷詩歌創作第一階段的結束。黄庭堅此時尚未自首肯，但已受到時人賞識，開始嶄露頭角。

治平四年（1067），黄庭堅得第，同時也有了詩歌“悟入”的第一次體驗，所謂“詩非苦思不可爲，余得第後始知此”⑤。及第之後，可以擺脱應試詩歌的束縛，以詩爲專門，又由於初入仕途，開始接觸社會生活，承受冷暖自知的人生體驗，從治平四年起，山谷的詩歌創作增多。數年之内，其詩便脱離稚弱之氣，呈現出豁朗的面目。熙寧元年（1068）的《徐孺子祠堂》，次年的《次韻裴仲謀同年》，後代視爲名作。熙寧四年（1071）是山

① 參詹八言《黄庶詩風及黄庭堅“淵源有自”》，載《九江師專學報》1988年第2期。

② ［宋］晁説之《晁氏客語》中録孫覺對杜詩的一段評論，所謂“杜甫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黄騏驥病，沙晚鶺鴒寒’，謂禄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云云，可參。見《四庫全書》第863册，第150頁。

③ 見［宋］范温《潛溪詩眼》，《宋詩話輯佚》上册，第327頁。

④ 《潛溪詩眼》，《宋詩話輯佚》上册，第327頁。

⑤ 洪炎《豫章黄先生退聽堂録序》引黄庭堅《退聽序》，《黄庭堅全集》第4册，第2379頁。

谷創作極豐的一年，據白政民統計，此年存詩有 137 首[①]。而其中，《過百里大夫冢》詩，山谷後來自稱“已自見成就處”[②]。熙寧五年（1072），蘇軾在湖州，見黄庭堅詩文於孫覺座上，聳然異之，以爲超軼絶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大震。可見到了熙寧中期，黄庭堅詩歌已初具體制并得到蘇軾首肯，他本人也成爲一名著名詩人。

山谷詩歌“悟入”的第二次體驗發生在熙寧七年（1074）。是時他任北京國子監教授，以詩歌受知於詩人謝景初，遂娶其女爲繼室[③]。謝景初爲梅聖俞妻兄之子，嘗編次宛陵詩，受其詩風影響，又在宋人中較早地學習杜詩，是詩歌“宋調”形成過程中一個承前啓後的人物。《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謙與今黄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黄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④] 又《王直方詩話》記載：“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絶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户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⑤] 當黄庭堅在藝術長路上獨自探索，雖初具體貌但詩風尚未成型時，詩人謝景初的影響成爲他提高一步的關鍵。我們可以從他和謝景初的唱和詩中感受到這種提高。如《次韻外舅謝師厚病間十首》（選三）：

① 白政民《黄庭堅詩歌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67 頁。
② 見《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 590 頁。
③ 據鄭永曉《黄庭堅年譜新編》，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第 58 頁。
④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07 頁。
⑤ ［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16 頁。

貝錦不足歌，請陳《江漢》詩。美人出江漢，窈窕世未窺。折蘭不肯佩，告我以蠶饑。獨歸豈憚遠，三危露如飴。（其一，同前，第 901 頁）

德人更疢疾，術智益灑落。反身見萬古，道不在卜度。胸中有鏌鋣，老境要志弱。謝公賦達生，達生真可托。（其二，同前，第 901 頁）

身病心輕安，道肥體臞瘦。好懷當告誰，四墻粟紅皺。負暄不可獻，捫虱坐清晝。端有真富貴，千秋萬年後。（其十，同前，第 903 頁）

這組詩歌以比興寄托之語、拗折瘦硬之句抒兀傲清冷之意，富筋骨思理神味，盡脱少年之色，昭示着黄詩成熟期的來臨。山谷後來作詩懷念謝景初："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奉答謝公定與榮子邕論狄元規孫少述詩長韻》，同前，第 12 頁）熔鑄文學思想入藝術表達、獨成一家的"句法"之學，正是山谷於謝景初處得到的不傳之秘——這就是"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從"知苦思"到"得濠梁"，山谷詩學的歷程，是文學精神與文學形式不斷糾葛，氣度與涵養化爲格、韻進入詩歌内部，達到曉之心而喻之手的藝術表達的過程。經過這一次脱胎换骨，黄庭堅詩歌呈現出"以意勝"的特色，氣質脱俗，格律謹嚴，開創出屬於自己的獨特詩風。元豐初，山谷編撰《焦尾集》《敝帚集》。其兄大臨云："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

自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爲可傳，故復名《敝帚集》。"[①]此二集的編輯是黄庭堅對自己詩歌進入成熟期的體認，亦得到秦觀"每覽《焦尾》《敝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②]的激賞，這標志着黄庭堅一代文學大家地位的正式確立。

與山谷詩歌的成熟幾乎同步，以蘇軾爲領袖的文人集團也在悄悄積聚。熙寧六年（1073），晁補之以文謁蘇軾於新城；明年，孫覺在揚州以秦觀詩詞數百篇向蘇軾推薦；熙寧十年（1077），蘇軾過李常於濟南，見山谷詩文愈多，大相激賞。元豐元年（1078），秦觀謁蘇軾於徐州，山谷亦寄《古風二首上蘇子瞻》與蘇軾正式訂交。對這次訂交，崔銘《從熙寧到元豐：對黄庭堅拜師過程的解析》一文有精彩闡釋。她説，黄庭堅與蘇軾交往的外部條件早已成熟，熙寧五年還有一次可能與蘇軾見面的機會，但直到元豐元年，他纔投書相問，執弟子之禮，這是因爲，蘇軾的詩詞文創作和人生思想，到了元豐元年方深化與成熟。"作爲一名初露鋒芒的詩人，黄庭堅已具備很好的文學素養和較爲明晰的創作傾向、文學趣尚，他對蘇軾的選擇，是建立在對自我的清醒認識與對蘇軾的準確把握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説，他既清楚地看到了彼此相通相融之處，也清楚地看到了蘇軾'導夫先路'，超出自己之上，既瞭解自己之'所能'，也瞭解自己之'所不能'，其'所能'自可發揚，而'所不能'則非入蘇門難以增益。因此

① 見［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四庫全書》第863册，第664頁。
② 秦觀《與黄魯直簡》，《淮海集》卷三十。

心悦誠服，決意拜在門下。"[1] 這一推論讓人信服。筆者要補充説明的是，山谷選擇在元豐元年拜師東坡，還不僅僅因爲此時蘇軾詩歌進入成熟期，令他心悦誠服。如他後來告訴陳師道："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争先則後矣。"[2] 元豐元年，"山谷體"詩歌自身的成型，也是黄庭堅以自信、謙虚的態度與東坡訂交的原因。他拜師東坡，不是爲了學習詩歌技法，而是爲了表達同氣相求的文學認同。如禪宗心法相傳，需自參自悟，而求明師印證，黄庭堅與蘇軾的師弟關係亦當如是觀[3]。《古風二首上子瞻》，是山谷經審慎考慮後的鄭重抉擇。詩云：

江梅有佳實，托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食，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盤，以遠終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傷。

青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同前，第2～3頁）

---

① 王水照等編《首届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63～464頁。

② 見陳師道《答秦觀書》，《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大字本，1984年。

③ 故黄庭堅雖爲蘇軾門人，而詩風自成一家，這對理解江西宗派的詩學淵源意義重大。

此二詩古風飄拂，高韻難追，奠定了蘇、黄之交，乃至元祐文學的高雅格調。所謂“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蘇、黄在“基本人生取向與人格理想”[①] 上有氣味之同，但在文化品格之具體植立與詩學風格上又各異其趣。正是這種同與異，帶來他們之間既契合互補又相互激發的關係，帶來了蘇門唱酬的繁榮，最終帶來讓人艷羡的元祐文學之全盛。

元豐年間，黄庭堅創作極豐，詩學思想與詩藝進一步精進成熟，創作了《汴岸置酒贈黄十七》《題落星寺四首》《贛上食蓮有感》《登快閣》《演雅》《送王郎》《寄黄幾復》等名作，并與蘇軾保持書信往來。蘇、黄相見於元祐初。黄庭堅有《與分寧蕭宰書》，説他在蘇軾那裏“所得過於所聞”（同前，第 1759 頁）；蘇軾則有《送楊孟容》，“自謂效黄魯直體”[②]，表達了對山谷詩風的敬意。元祐年間，黄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同任館職，號稱“蘇門四學士”，然四人的文學成就實不同：晁、張長於散文，而詩歌的領域無疑爲黄庭堅獨擅。作爲蘇軾後學，黄庭堅與三學士并稱；作爲卓有成就的詩人，他又與蘇軾齊名。元祐詩風的形成，主要是蘇、黄合力的結果。據李廌《師友談記》記載，元祐時期，蘇軾有付囑斯文的意願，語門下士云：

---

① 參崔銘《基本人生取向與人格理想：論蘇軾與黄庭堅的内在契合》，載《南京師大學報》2002 年第 1 期。

② 《蘇軾詩集》卷二十八，王注引趙次公言，中華書局，1982 年，第 5 册，第 1479 頁。

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①。

東坡付文章與誰人且不論，至於詩歌，則明確地屬意山谷。據黄庭堅自述：

往在元祐初，始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不謂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為一代之詩，當推魯直，而二公遂捨其舊而圖新。（《與王彥周書》，同前，第 1839 頁）

至於作詩，蓋童子雕篆之流，少而好之，晚不能休。而先達蘇子瞻猥見題品，以為絶倫。（《與元勛不伐書》，同前，第 1896 頁）

可見，在元祐時期，黄庭堅“一代之詩，當推魯直”的詩壇地位得到蘇軾認可，他也以此自任。從歐陽修——蘇軾——黄庭堅——江西諸派這條詩學傳承綫索來看，江西宗派乃北宋詩學嫡派、詩文革新運動的餘波。

二、詩學傳承的勾勒

既獲得蘇軾認可，成爲下任詩壇領袖，黄庭堅詩學就足以開

① ［宋］李廌《師友談記》，中華書局，2002 年，第 44 頁。

宗立派。黃庭堅一生獎掖後學不遺餘力。下面，對其詩學傳承作一簡要勾勒。

（一）“論士三人”——陳師道

元豐七年（1084），黃庭堅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德平鎮，過汴京（即開封，今屬河南），有書與晁説之論士三人，他們是：邢居實、陳師道、江端禮[①]。邢居實爲少年奇才，江端禮學兼詩、禮，可惜皆早卒；陳師道於元豐七年（1084）拜入山谷門下，無論人品修養還是詩學成就，都是黃庭堅最看重的詩人。黃庭堅對陳師道從不吝贊詞。建中靖國元年（1101）冬，山谷告訴蜀中弟子王雲，“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作詩淵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至於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答王子飛書》，《黃庭堅全集》第467頁）這樣高度的評價，儼然是以他紹續詩統。可惜是年底陳師道卒於汴京，不及擔當此任。

（二）“倦殼軒詩卷中人”——徐俯

元祐年間，黃庭堅在史館任職，與蘇軾、秦觀等唱酬，文采風流，天下景仰。他的人格魅力和詩學成就吸引着各地士子。他們或造門拜訪，或通過洪芻等寄書請求指點，黃庭堅也樂於汲引。元祐四五年左右，黃庭堅有《書倦殼軒詩後》：

① 據晁説之《邢惇夫墓表》，《嵩山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續編》本。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己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予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萬里矣。(《黄庭堅全集》第742頁)

被黄庭堅寄予厚望的這九位詩人——潘大臨、何頡、何顒、洪朋、洪芻、洪炎、洪羽、徐俯、潘淳（山谷稱他們爲“倦殼軒詩卷中人”[①]），是因洪芻仕黄而相互結識的南昌、黄岡詩人（其中有六個是後來的江西宗派中人）。在這九人中間，黄庭堅對徐俯期許最高。崇寧元年（1102），山谷有《與徐師川書》：“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真頹波之砥柱也。”（同前，第480頁）當前輩詩人已退出或即將退出詩歌舞臺的時候，維繫斯文之不墜，承擔宗統之重任，這是黄庭堅對後輩的殷切期望。

（三）兩川、江陵詩人——高荷

紹聖、元符年間，黄庭堅被貶黔州、戎州。“兩川人士争從之遊，經公指授，下筆皆有可觀”[②]。黄庭堅在兩川收了不少弟子，最受他重視的有楊皓、王蕃、歐陽元老等人。元符三年，山

---

① 見黄庭堅《與徐師川書》，《黄庭堅全集》第3册，第1869頁。
② 《豫章先生傳》，《黄庭堅全集》第4册，第2361頁。

谷遇赦東歸，明年待命於江陵（今湖北沙市），青年詩人高荷以三十韻排律《上黄太史》來謁，得到山谷激賞。山谷有《跋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簡》，并稱其蜀中及江陵弟子："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三君子者，雖事業不同，要皆知爲己之學，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他日聲名烜赫，而所爲不録録，然後余言可信矣。"（《黄庭堅全集》第1640頁）其中，又獨對高荷有"顧我今六十老，付君以二百年"（《贈高子勉四首》其四，同前，第201頁）的囑托，對他寄予最大期望。

除此之外，經山谷指點的後學，還有元祐年間在汴京向他請益的王直方、秦觀、秦覯，崇寧元年以《上黄太史魯直詩》詩拜入門下的李彭等人。韓駒、謝逸雖未見山谷，亦曾受他關注。我們看到，山谷後學，除因與《宗派圖》詩人交往少而未入圖録的秦氏兄弟及山谷兩川弟子外，其餘人正好是《江西宗派圖》的主體；以陳師道領頭、高荷殿尾的安排，也與山谷付囑斯文的次第相合。江西諸派的界定——"其原流皆出豫章也"①，所言不虛。

三、師友淵源的指示

黄庭堅平生好指點後學，在他門下聚集着一羣青年詩人。如果説，以前文學羣體的形成，在文學相知外，尚以共同利益爲結合點的話，黄庭堅詩人羣體聚集的核心，純在乎道德、學術與詩藝。山谷汲引後學，不出於功利的目的，也拒絶使用功利的手段。這一點在他的書信中有明確説明：

---

① 《雲麓漫鈔》卷十四引《宗派圖序》，中華書局，1996年，第244頁。

若夫發揮樂善之心，吹噓詩句之美，推之諸公之前，挽之青雲之上，雖無不肖之助，當世君子皆當為足下羽翼也。若足下亟知小道不足以致遠，發憤忘食，追配古人，則九萬里風斯在下矣。(《與潘子真書》,《黄庭堅全集》第482頁)

對青年後學，不挽之於青雲之上，而指點其道德學術，這與以前文學集團的師弟關係頗有些不同——即使是蘇門學士，也在仕途上得到蘇軾汲引。黄庭堅本人官職非顯，更重要的是，他以治心養氣、究心詩藝爲人生的重心，對友人與後學，亦以“草木臭味”相知相期：

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他求，特以草木臭味同爾。相求於一世之所弃，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於胸次也。(《與胡少汲書》，同前，第477頁)

“草木臭味”，見前引《古風二首上子瞻》。其中第二首詩刻畫了青松和小草兩個形象，結語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這是指人格修養與藝術情操上的情趣相投。它是蘇、黄之交的基礎，亦是山谷對後學的期望。黄庭堅反對結黨營私，提倡草木臭味，而他的人格、詩歌魅力，也正是後學聞風仰慕、傾心投誠的原因所在。於是，黄庭堅及其後學，以道德而非利益合，以文學而非政治交，“相求於一世之所弃”，以滋味淡薄的“草木臭味”集聚，與當時的理學承傳相似，走的是一條純粹的師友淵源路綫。

黄庭堅對當時科場風氣及爲文章而文章的教育對青年人的影響深感憂慮。他説：

> 聖人不作，道不明於天下。晚出之儒，玩禮義之名，而陋於知人心；失學問之意，而士必以讀書為選。(《宛丘懷居士墓表》，同前，第 1380 頁）
>
>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與洪氏四甥書》，同前，第 1872 頁）
>
> 今之君子好以文章輕重人，似是千慮之一失，最能溺後生，願足下鉤其深而勿遊其瀕也。(《與元勛不伐書》，同前，第 1896 頁）

基於此，山谷對後學的教誨，是按道德——學問——詩文的次序傳授。他屢書魏徵《砥柱銘》贈後學，并題跋云："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閲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跋砥柱銘後》，同前，第 699 頁）又指示他們超越功名科舉的視野，説："觀古人書，每以忠信孝悌作服而讀之，則得益多矣。亦不必專作舉子事業，一大經，二小經，如吾甥明利之質，加意半年可了。當以少年心志，治君子之事業耳。學問當以不及古人爲戒，勿以一日之長繫主司得失爲意，則世間疾苦不能入矣。"(《與周甥惟深》，同前，第 1924 頁）以古人而非流俗標準自期，以師友淵源而非功名之途爲尚，自探心性，立身有節，這就是黄庭堅傳給後學的衣鉢。

除自己的教導外，黄庭堅還提倡青年士子轉益多師、廣求善友：

亦以今世民之師師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因以卜足下誠有意於兹事否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答何静翁書》，同前，第464～465頁）

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舍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瑉而非玉也。（《全璧字説》，同前，第633～634頁）

學者之心似鑒，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鑒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下之友，則彌明矣。（《侍其鑒字説》，同前，第636頁）

黄庭堅對師友路綫的擇徑較廣。他勉勵後學廣參理學、禪學、詩學名家，如陳瓘、靈源惟清、蘇軾等，并鼓勵青年士子間彼此交往。如他告訴外甥洪芻："邠老才性極明敏，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與洪駒父》，同前，第1365頁）又對徐俯説："見所作二詩，皆有老成之氣，他日學問文章當不憂，但念當得知識深遠、老於世故者相與琢磨，乃爲有益。"（《與徐師川書》，同前，第1868～1869頁）在黄庭堅的關注和倡導下，"倦殼軒詩卷中人"走到了一起，成爲江西宗派最早的雛形。而此派的最終形成，乃是對他指示的師友淵源路綫的繼續貫徹。

第三節　山谷家法

黃庭堅說："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求其卓然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答秦少章帖》，《黃庭堅全集》第 1867 頁）在詩文創作上，他勉勵後學力穩根本、超出流俗、以古人自期。其詩學思想反映在對後學的諄諄教誨中，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爲青年詩人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徑，我們稱之爲"山谷家法"。是爲江西宗派形成的內在凝聚力。

一、治心養氣，得之心地

"詩者，人之情性也。"在黃庭堅看來，詩人情性爲詩歌的創作動力，但此情性非無施不可，而是應該有所涵養。儒家的修養，便成爲他對詩人之心的基本規範。他告訴外甥洪芻：

> 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然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極當加意養以敦厚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爾。（《與洪駒父》，《黃庭堅全集》第 1365 頁）

"孝友忠信"關乎詩人之心的涵養，故爲學問文章的根本。他不

止一次地說，詩文乃儒者末事，希望後學不要沉迷於辭藻之學，走入“玩影終弄世”的歧途。以下文句散見於山谷信函，是山谷家法的根本：

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與徐甥師川》，同前，第 486 頁)

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静，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與濟川侄》，同前，第 498 頁)

文章雖末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為度，以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閎深矣。(《答秦少章帖》，同前，第 1867 頁)

通知古今在勤讀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與洪氏四甥書》，同前，第 1871 頁)

頗得暇治經否？此乃文章之根，治心養性之鑒，又當及少壯耐辛苦時，加鑽仰之勤耳。(《與洪甥駒父》，同前，第 1934 頁)

更願加求己之功，沉潛於經術，自印所得。根源深遠，則波瀾枝葉無遺恨矣。(《答王觀復》，同前，第 2005 頁)

文章之學要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修養心性、深入經史就成爲必經的途徑。

到了後期，山谷進一步探究心性的本源。他的治心養氣工夫超越儒家孝友忠信的修養，有了更要眇的内涵。元符三年

(1100)，黃庭堅作《道臻師畫墨竹序》：

> 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何也？夫吳生之超其師，得之於心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不治它技，用智不分也，故能入於神。夫心能不牽於外物，則其天守全，萬物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盤礴而後為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問心之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祖，臻可持此往問之。(同前，第 416 頁)

此論書畫，而與詩文相通。黃庭堅認識到：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而此心之妙無以言喻，惟禪悟的境界能近之。這一時期，他教導後學要“識取自己”、“得之心地”：

> 要須且下十年工夫，識取自己，則有根本。凡有言句，皆從自根本中來，殊不與認奴作郎、認賊作子時文章同味也。(《答郭英發》，同前，第 2016 頁)
>
> 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作詩之器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無妙手故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老夫學道三十餘年，三四年來方解古人語，平直無疑，讀《周易》《論語》《老子》，皆親見其人也。(《答徐甥師川》，同前，第 2028～2029 頁)

山谷此時進道一階，詩文之作臻於佳境，也將詩文根本落實

在心靈的要眇上。這説明他對詩人之心的理解已超越道德範疇，進入審美境界。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一種心地法門，是得妙於心的詩人之筆的創造。從前期的孝友忠信到後期的隨緣解紛，黄庭堅都要求詩人以心地修養爲根本，衹是修養的内容略有差别[①]。建立在此基礎上的詩文創作，就呈現出“格高”的獨特風貌。

二、熟參前作，自爲主出

黄庭堅認爲，治心養氣是文章之本，在此基礎上需“濟之以學古之功”[②]，廣泛參以前人詩作，所謂“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論作詩文》，《黄庭堅全集》第1684頁)。他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解釋熟參前作的必要性：

> 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綉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與王立之》，同前，第1371頁)

織女必得錦機乃能成錦，作詩也先得領會古人繩墨，得其用意曲折，方能成文，所謂“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論作詩文》，同前，第1684頁)。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前人成功作品的體會，還可得“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之功[③]，

① 山谷詩歌一度被批判爲“形式主義”，這無疑是對其詩學思想的最大誤解。

② 黄庭堅《答秦少章帖》：“此事要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黄庭堅全集》，第3册，第1866頁。

③ 黄庭堅《與王觀復書》：“此病亦衹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虚語也。”《黄庭堅全集》第2册，第470頁。

去掉初學之造語生硬、不協律吕、好作奇語、有雕琢痕迹等毛病。黄庭堅一生不廢對前人作品的學習體會，在學習什麽和如何學習上深有心得。在讀書方法上，他主張精讀，務求貫穿。每勸後學讀杜甫、李白、韓愈詩，司馬遷、韓愈文，而尤以杜詩爲尚：

> 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凉，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講之。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字，要須以鍾、王為師耳。（《與趙伯充》，同前，第1371頁）

此所謂取法乎上。關於如何學習前作，據《潜溪詩眼》記載：

> 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吴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别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潜心焉。故學者要先以識為主，如禪家所謂正法眼者。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①。

在黄庭堅看來，以"識"爲主，"見古人用意處"而非"但得其

① 《宋詩話輯佚》上册，第317頁。

皮毛”，是參學前作的主要途徑。具體説來，學者應當通過對優秀作品的學習體會，領會如下内容：

> 學功夫已多，讀書貫穿，自當造平淡，且置之，可勤董、賈、劉向諸文字。學作議論文字，更取蘇明允文字讀之。古文要氣質渾厚，勿太雕琢。(《與洪駒父》，同前，第1365～1366頁)
>
>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與王觀復書》，同前，第470頁)

熟參前作，就是要體會其章法、句法、文理、氣質、境界及佳句善字爲我所用。他提出著名的“點鐵成金”説①，見《答洪駒父書》：

> 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

① 一般認爲，除“點鐵成金”外，黄庭堅還提出過“奪胎换骨”。周裕鍇先生撰《惠洪與换骨奪胎法——一樁文學批評史公案的重判》文，通過對《冷齋夜話》中關於“奪胎换骨”這則記録的重新標點，把此法的著作權判給了惠洪。此文載於《文學遺産》2003年第6期，同期載莫礪鋒先生《再論“奪胎换骨”説的首創者——與周裕鍇兄商榷》文，表達了反對意見。筆者以爲：南宋以來對黄庭堅“奪胎换骨”法的認識，皆出自對《冷齋夜話》一段話，確切地説，對這段話標點的理解，而周先生對這段話的重新標點，無論從文氣上還是語意上都較通行的標點或通常的理解爲優；又周文羅列惠洪著作屢提“奪胎法”、“换骨法”的内證，明此二法是他所總結的衆多詩法之兩種，言之有據，值得信從。筆者贊同“奪胎换骨”非山谷詩論，故在此不作探討。

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同前，第 475 頁）

“點鐵成金”，即點化古人陳言爲我所用。詩歌是一門藝術，亦是文化積累的成果。與一般詩人對陳言舊典的簡單沿襲、引用不同，黄庭堅此論的高妙處，在以己意熔鑄陳言，令其成爲詩歌的有機成分，讓它在新的情景中重新焕發神彩。這反映了黄庭堅以意爲主的詩學特徵，也是對梅聖俞、蘇軾“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理論的貫徹。紹聖四年，黄庭堅有《庭堅老懶衰墮多年不作詩已忘其體律因明叔有意於斯文試舉一綱以張萬目蓋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吴之兵棘端可以破簇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明叔當自得之公眉人鄉先生之妙語震耀一世我昔從公得之爲多故今以此事相付》詩付蜀中弟子楊皓，稱“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爲“舉一綱以張萬目”之法。又作《與明叔少府書》云：

試更追韻作二頌，此亦囊時得之於聖俞、東坡之斧斤耳。欲知文章奪其關鍵而自為主出，其無窮如此也。（同前，第 1817 頁）

就如何借鑒前人作品而言，從“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到“點鐵成金”，具體内涵或有不同，但“奪其關鍵而自爲主出”的法要，却爲它們所一脉相承。觀摩前人是爲了超越前人。取陳言

而點鐵成金，用故典而以故爲新，熟參前作，自爲主出，就成爲山谷詩學的不二法門。

三、經由法度，到達自由

後人爲山谷總結出許多具體的詩法，但山谷本人并不主張規模成法，他對詩法的指點，旨在啓人悟入。如《冷齋夜話》記載："造語之工，至於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荆公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黄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緑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衹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① 黄庭堅指點後學揣摩杜詩的句法，王、蘇詩的句眼，是要他們從佳作中領會意匠經營中活的詩文法度。因此，雖然黄庭堅要求後學"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但其詩學的極詣并非中規中矩，而是經由法度，到達自由。他多次在詩歌、書信和題跋中闡明這一觀點：

> 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與王觀復書》，同前，第 471 頁)
>
> 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

① 《冷齋夜話》卷五，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9 頁。

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答洪駒父書》，同前，第475頁)

寧律不協，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説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題意可詩後》，同前，第665頁)

比起庾信的“有意於爲詩”，山谷顯然更推崇陶淵明的“不煩繩削而自合”。同樣，杜甫夔州以後古律詩“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亦爲他深心嚮往。所謂“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贈高子勉四首》其四，同前，第201頁)，這是一種超越規範達到心靈與表達自由的境界，亦是山谷詩學的歸墟。“文章本心術，萬古無轍迹。”(《寄晁元忠十首》之五，同前，第934頁) 在法度規範之上，詩人的氣度、領悟引領着詩歌的創造——“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這種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乃詩歌之極詣，亦是經由法度、超越法度後方能達到的自由。

以上論述了山谷家法的三方面内容。我們看見，山谷論詩，重在心地法門的點撥：治心養氣是爲了識取自家本體，學習前人是要自爲主出，掌握詩法是爲了達到表達的自由。山谷詩學的着

眼點在個體體悟，前作與法度，都是獲取自家面目的“筏”而非“岸”。故山谷云：“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同前，第1249頁）“文章最忌隨人後，道德無多衹本心。”（《贈謝敞王博喻》，同前，第1304頁）以自成一家爲最終成就。他晚年在戎州有一首小詞，專答“門生請問先生家風”①：

> 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鈎絲。金鱗政在深處，千尺也須垂。　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訴衷情》，同前，第407頁）

此演叢林盛傳的華亭船子和尚偈：“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静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② 漁者自垂餌，魚兒自上鈎。漁者和魚兒的機緣來自雙方的契合，是建立在獨立主體意識上的自由選擇。在水寒江静、滿目青山的江邊，垂下千尺絲綫，等待着“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的魚兒，接引着江西諸派及歷代不絶之後學，載月明歸，這就是山谷家風。

---

① 黄庭堅《訴衷情·序》，《黄庭堅全集》第1册，第407頁。

② 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頁。

第三章
江西宗派羣體特徵

江西宗派是吕本中創造的詩學術語。它并非虚浮無根，而是吕氏對北宋末客觀存在的一個詩人羣體的命名。除詩歌流派性質外，此詩人羣體還呈現出强烈的羣體特徵：宗派詩人具有共同的思想傾向、詩學傳承、處世態度，又在禁詩賦的高壓氛圍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形成一個特定的圈子。這一特徵自哲宗元祐時期就開始出現，大觀、政和年間達到頂點。政和中期以後，江西宗派的群體特徵减弱。吕本中在大觀末、政和初作《江西宗派圖》，對當時出現的山谷後學羣體進行總結和圖録，爲我們今天認識北宋末期的文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

第一節　蟄伏：出處的選擇

元好問有一首著名的論詩詩，這樣評價江西宗派：

>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祇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流却是誰[1]？

該詩將蘇、黄後的詩歌貶爲“滄海横流”，以喻泛濫成災，這其實是不確切的。如果説，北宋初期的詩歌是清淺小溪，到中期漸翻爲長江巨浪的話，以江西詩派爲主體的北宋後期詩歌非但没有横流滄海，反而潛入地下，成爲無聲的暗流。貫穿北宋前中期大大小小的黨爭曾經刺激了士人參政議政意識的高漲，帶來詩歌的繁榮，然激烈的黨爭終釀爲黨禍，詩歌的發展勢頭也被遏制。哲宗的親政與舊黨的貶謫使紹聖元年（1094）成爲標志性的一年，崇寧元年（1102）元祐黨籍碑的樹立，意味着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元祐詩人貶謫的貶謫，禁廢的禁廢，雖然在逆境的激勵下，他們還有一段短暫的創作輝煌，但其生命已走向暮年。元符三年（1100）秦觀去世，次年蘇軾、陳師道去世，尚存的晁補之、張耒，文學創造力漸次減退。黄庭堅生命進入倒計時，他撫念舊人，心緒黯然，寄希望於新的一代。元祐文學的時代結束了，新的詩人開始嶄露頭角。中國文學，進入江西宗派時代。

與前輩詩人不同，江西諸派生活在一個艱難的時代。他們成長於盛宋之世，深受元祐文化熏陶，在應該登上歷史舞臺、承擔社會責任的年齡，却遭逢歷時三十年的元祐黨禍。他們中間，有六人直接受到黨禍牽連。吕本中曾祖吕公著、祖父吕希哲、父親

① ［金］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二十二，《遺山先生遺集》卷十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吕好問皆爲元祐黨人。吕本中十一歲即坐黨事貶官，隨父祖踏上貶謫之途，廢居達六年之久。晁氏一門被黨禍者衆，冲之族兄補之爲黨人，從兄説之、咏之皆受牽連，冲之獨隱於具茨山獲免。洪芻、徐俯元符三年應詔上書，左袒元祐諸公，於崇寧元年入臣僚章疏姓名之邪下，洪芻并因此以“元符奸黨”名入崇寧三年擴大後的元祐黨籍碑，貶官流放。洪炎也受二兄洪芻、四弟洪羽入黨籍之牽連而貶官。李錞祖父李茂直入崇寧三年元祐黨籍碑，按當時律令，李錞的仕途和活動範圍都會受相當影響。元祐黨籍碑的擴大化和對黨人子弟的禁錮，使這六位并非元祐黨人的士子直接捲入黨禍，成爲政治鬥争的犧牲品。他們默默蟄伏起來：冲之獨見事機，飄然隱逸；本中隨侍父祖，廣交益友，在世道風波中修養自己冲夷的心態；徐俯閉門讀書，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成爲青年士子的表率。精神和道義，是他們賴以自恃的力量。

除以上六人外，更多的宗派詩人不直接受黨禍影響。他們并不超然事外，在仕與隱、進與退兩條道路中，多數詩人選擇了後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元祐黨人、贊同元祐之政的政治表態。除徐俯、洪芻元符上書外，饒節也於元符三年上書曾布，請用蘇黄諸公，夏倪亦有萬言書言事。謝邁聽見“建中靖國”的年號，歡欣鼓舞，作《喜雨》詩呼籲政治春天的來臨。這些都是江西諸派政治態度的説明。但在更本質的原因上，江西諸派的蟄伏，還不是因爲政治立場而在於堅持自己的人格操守。紹聖之後士風大壞，朝廷以科舉、教育鉗制多士，士子們爲希求時好也往往不顧廉耻，帶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急速滑坡。從紹聖元年開始，舉子策論即以詆毁元祐政事、請誅元祐大臣爲尚。蘇軾得罪，他

的門人李公麟見其面而却走。朝廷詔毀蘇、黄文集，即有人上書請并天下蘇、黄碑榜而銷毀。連元祐時期流行的蘇軾高桶帽、黄庭堅幅巾也爲時人所忌諱，人心之敗壞一至於此。當時的世風，如謝逸所言，乃“廉耻道喪，忠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俗者滔滔皆是，乞食墦間、舐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讒邪如山貪墨成市，而莫之救藥；正人端士無辜籲天，而無以明白”[1]。世故悠悠，江西諸派却不易所守。他們激憤於高壓政治下人心的澆薄，有詩云：

南鄰經年不相見，北里雖見復粗疏。窄衣小帽走塵土，也復生貌施襟裾。（吕本中《符離行》，《全宋詩》第 18045 頁）

禿襟短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韓駒《贈蔡伯世》，同前，第 16588 頁）

樓上當當徹夜聲，預人何事有枯榮。已傳紙貴咸陽市，更恐書留後世名[2]。

筆底颶風吹海波，牓懸鬱鬱照岩阿。十年呵禁煩神物，奈爾焚琴煮鶴何。（李彭《老坡自海外歸為書簡寂觀雲卿閣榜今為煞風景者毁之》，同前，第 15957 頁）

---

① ［宋］謝逸《祭汪伯更教授文》，《溪堂集》卷十，《四庫全書》第 1122 册，第 554 頁。

② 陳師道《黄樓絶句》，［宋］陳師道撰、［宋］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後山詩注補箋》，下册，中華書局，1995 年，第 394 頁。本文所引陳師道詩歌，除特别注明外，皆據《後山詩注補箋》。以下凡引該書，衹列篇名和頁碼，於文中作注。

以上詩歌揭露的是紹聖之後的世態：高桶帽、幅巾既爲蘇、黄服飾，俗士們就反其道，以“窄衣小帽”、“秃襟短帽”爲尚；黄樓上有蘇軾所書蘇轍《黄樓賦》碑，黨禁嚴時，當地官吏毁之惟恐不及，黨禁稍弛，又搨之當當作響；崇寧三年，霍漢英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一例除毁，廬山簡寂觀牓亦被毁去。與如是世俗之態相反，江西諸派堅持師友情誼與個人操守。紹聖年間，蘇軾、黄庭堅獲罪遠謫，王直方爲二公作“頓有亭”，謝逸有《王立之園亭七咏·頓有亭》咏其事：

富貴幻天機，饑寒撼關鍵。參前横利害，俗眼青白眩。蘇黄兩玉人，落筆傳九縣。向來竄遐荒，弃捐若秋扇。王侯介如石，乃心不可轉。投之古錦囊，不遺俗子玩。近來詩奢子，嗜好亦稍變。有客來借觀，君無唾其面。酌酒對銀鈎，吞聲勿復辯。（同前，第 14819 頁）

在“饑寒撼關鍵”的情况下保持“介如石”的忠誠，這就是江西諸派共勉的氣節。他們的詩歌共有一個閨人的主題：

丈夫志四海，摶風類鵬舉。方其未遇時，潔身閨中女。（李彭《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為韻賦十詩》其四，同前，第 15879 頁）

行止既有義，離合亦有時。衆人豈無心，不如我所止。（謝逸《閨恨》，同前，第 14856 頁）

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

渾似曹娥江上聲。（汪革《賢女浦》其二，同前，第 14759 頁）

黄鶴一去已千里，雉子高飛亦能幾。人生長短要自裁，嗟爾此身今已矣，刺刺促促徒為爾。（饒節《士大夫湛於不義雖窮極富貴君子過之弗顧而況女子失身於委巷容笑之賤亦豈能自拔哉吾友人賦嘆息行有謂而作諸人既屬和僕亦擬古樂府為辭傷之於其末開之以正是亦詩人之志也》，同前，第 14545 頁）

以失身委巷之女子影射當時士子，以貞静閨人自比，正可見江西諸派在艱難時局中的道義自持。

江西諸派多逸民。當個人前途與道義準則發生衝突時，他們寧願選擇遵循後者。王直方是新黨子弟，却傾心於元祐文化。紹聖元年，當政治風向大變，元祐諸公紛紛貶謫的時候，他保持對蘇、黄的忠誠，放弃朝廷予以的官職，閉門著書，作"賦歸堂"以明志。江端本與兄端友不應科舉，林敏功、敏修兄弟隱於鄉里，徵詔不出，表明了同樣的立場。更多的詩人從維持生計的需要出發，并不一般地反對出仕，却拒絶通過不正當的途經獲取官職。汪革以紹聖四年省元入仕，長期爲州郡學官，官小禄薄，生活清苦，後入京改官，蔡京欲籠絡以宗子學博士的官職，他斷然拒絶，還爲楚州（今江蘇淮安）教授；謝逸家境貧寒，屢試不第，郡守欲以蔡京推行的"八行"法舉薦他，他委婉辭謝，依舊以教書爲業；饒節元符末爲宰相曾布門客，他不利用這種關係進身仕途，而是上書請用蘇、黄諸公，意見未納，輒毅然辭去，後

落髮爲僧。在取消異論的時代，這是一種沉默而堅韌的反抗姿態[①]。

除祖可、善權這兩位僧人與世事大體無涉外，江西詩派的逸民，之所以沉淪下僚或隱逸山林，多出於同情元祐黨人的政治態度、嫉惡如仇的率真性情和安貧樂道的人格操守。謝逸這樣贊美徐俯：

> 九衢塵裏無停輈，君居陋巷不出遊。滿城惡少弋鳧雁，對面故人風馬牛。别後夢寒燈火夜，歸來眼冷江湖秋。馮驩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提蒯緱。(《聞徐師川自京師歸豫章》，同前，第 14846 頁)

此詩爲徐俯傳神，也是江西宗派的羣體寫照。王直方"居京城之南，跬步天子之庭，而閉關却掃不調者十年，大署其寶曰'介庵'"[②]。謝逸本人却"八行"之薦，掃地而居，"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③]。汪革安守清貧，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④] 他們不因士失其職而怨懟憤懣，而是顯示出倔强的神采。在不得中道而行之的時代，江西諸派屬於狷者。如黄庭堅指出的——"水清石見君所知，此是吾家秘密藏。"(《次韻文潛》，《黄庭堅全集》第 117 頁）狷介，作爲一種姿態，不僅是對齷齪世態

① 但也不可一概論之。韓駒、高荷在政和後以歧路進身，但他們在崇寧、元符、大觀時期的表現，尚與諸友略同。

② 謝逸《介庵記》，《溪堂集》卷七，《四庫全書》第 1122 册，第 523 頁。

③ 惠洪《冷齋夜話》卷七，《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第 69 頁。

④ 吕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的消極躲避，更是在道德操守上作砥柱中流的積極承當，是“不顯於今兮，固傳於後”① 的信念堅持。謝逸《介庵記》一語而道破之：

> 人皆知通可以合於世，而不知合於世者不在乎通而在介也。不擇君而仕，不擇人而友，不擇利而取，舉斯心而遊於世，何所往而不合哉？然僞窮而隙生，詐窮而怨生，奸窮而禍生，小而其身危，大而赤其族也，謂之合，可乎？非其道不仕，非其賢不友，非其利不取，初若不合於世也。苟有合焉，確乎其不可拔也，屬屬乎其不可間也，膠漆不足以為固也，金石不足以為堅也，借不合於今之世，其必合於後世矣。是其合果不在乎通而在乎介也②。

狷介者的境遇不容於一時，却符合歷史的公理正義。陳師道曾書熙寧、元豐史，希望傳之後世；汪革却宗子博士之除，表示“吾異時不願附《奸臣傳》”③；潘大臨不受知於當時，“盡弃世俗目前之所樂，而獨待夫寂寥不可知之後世”④。歷史自有其公正評判：蔡京果入《宋史·奸臣傳》，而謝逸、汪革在南宋時期奉入祠堂，受到後人的景仰。楊萬里曾將李林甫、杜甫與蔡京、謝逸二

① ［宋］謝薖《潘邠老哀辭》，《竹友集》卷十，《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612頁。
② 謝逸《介庵記》，《溪堂集》卷七，《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523頁。
③ ［宋］周彥約《青溪汪先生（革）傳》，見［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1376册，第284頁。
④ ［宋］張耒《潘大臨文集序》，《張右史文集》卷五十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組人物作了有意味的對比，以爲“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①]。正直者有一生之窮，却有千古之通，與歷史的罪人正好相反。楊萬里的評論，正可爲謝逸《介庵記》注脚。

因爲選擇蟄伏，江西諸派祇能在“立德、立功、立言”中以“立言”作爲身份標志，成爲比較專業的詩人。他們選擇師友淵源而非聽命於科舉指揮的文學路綫，深有所植；以“立德”作爲人生根基，非僅僅寄意於文詞。故其詩文剛健挺立，無寒澀貧窘之態。他們的知交往往能道出其作爲下層官吏、隱居者與詩人的思想底藴：

> 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於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②]。
>
> 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為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③]。
>
> 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④]！

① 楊萬里《歐陽伯威脞辭集序》，《誠齋集》卷第七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晁説之《汪信民哀詞》，《嵩山文集》卷二十，《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吕本中《謝幼槃文集跋》，謝薖《謝幼槃文集》卷尾，《叢書集成初編》本。
④ ［宋］喻汝礪《晁具茨先生詩集序》，［宋］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詩集》卷首，《海山仙館叢書》本。

誠如斯言。江西諸派是狷士，却是“有志之狷士”[①]；以詩人名，却不以詩人立。黄庭堅勉勵後學以立身行義爲文學的根基，“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答洪駒父書》，《黄庭堅全集》第473頁）。在這一點上，江西諸派在崇、觀年間的表現，不負山谷的期望。

第二節　堅持：斯文的承傳

元祐黨禁不僅是政治浩劫，亦是一場文化的灾難。朝廷反對舊黨，就連舊黨學術一併反對。經學淪爲王氏之學、經術之學，洛學被禁，史學、文學被作爲元祐學術而禁止傳授，詩賦考試廢除，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急劇下降。“文章邇來氣焰低，聖經頗遭餘子弄”（潘大臨《和張文潛痛字韻》，《全宋詩》第13436頁），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以來爲宋人培植的深厚文學根柢，在這三十年中遭受嚴重的破壞。但數十年的禁廢，并未斷絶斯文的薪火相傳——江西宗派就是一股不屈的民間力量。他們不僅是山谷詩學，亦是整個元祐學術的繼承者。陸心源《重刊師友雜志紫微雜説序》云：

> 元祐極人才之盛，道學則有二程、張、邵，政事則有温

① 張耒《潘大臨文集序》，《張右史文集》卷五十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公、潞公，文章則有蘇、黄、晁、張，氣節則有器之、瑩中，居仁以名門子弟，師友羣公，目染耳濡，迥殊凡俗①。

道學、政事、文章、氣節，這不僅是吕本中，也是江西諸派所熏習的文化承傳。“人人垂首相公前，獨子低眉古簡編。江上新吟何慷慨，世間舊恨細窮研。”② 在荒謬的時代，江西諸派潛心於學問探究及詩歌創作，繼承了元祐之學與前代文化的優秀成果。他們對理學、禪學、詩學精神的承傳，正體現了時代思想發展的脉絡。

一、理學淵源——“詩人而入學派”

詩人入學派、學人入詩派，這是呈現在江西宗派詩人身上的一種典型文化現象。此論出於全祖望：

> 因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為，是言也蓋為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出於横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溪、謝無逸之學出於滎陽吕侍講，而山谷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范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楊尹之門而有吕紫微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學人而入

① 吕本中《師友雜志》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
② 晁説之《次韻師川郎中寄墨長句》，《嵩山文集》卷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詩派者也①。

以上名單所列，非江西派詩人（黄庭堅、汪革、謝逸、吕本中），即與江西詩派有深厚淵源的同道（張舜民、晁説之）及後學（曾幾、尤袤、楊萬里）。黄庭堅以心性修養爲詩文根柢，將儒學精髓熔鑄入詩歌精神的建構，這無疑已確定了詩學與儒學的親密關係。江西諸派進一步"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師從當世名儒，傳習理學。《宋元學案》著録江西宗派七人，他們是：

黄庭堅，李常、范祖禹、蘇軾門人，入"范吕諸儒學案"、"華陽學案"、"蜀學略"。

汪革、饒節、謝逸、謝薖、吕本中，吕希哲門人，入"滎陽學案"。其中吕本中卓爲一家，立"紫微學案"。

徐俯，楊時門人，入"龜山學案"。

北宋儒學發達，從學派上講，有安定學派、泰山學派、新學派、蜀學派、洛學派等；從代表人物上看，有胡瑗、孫復、石介、范仲淹、歐陽修、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而其中以程顥、程頤代表的洛學派影響最大。黄庭堅在文學上是東坡門人，學術上却屬安定後學。他師從李常、孫覺，兼學范祖禹，向徐積問道，心折於周敦頤。對文學與儒學的共同尊重是其思想的特色。延續這條路子，江西諸派不僅僅以詩人自居。他們勉力學術，追隨儒學發展的主流路綫，頗能登堂入室。其師承以洛學爲主體，主要師從吕希哲、楊時、陳

① ［清］全祖望《寶甈集序》，《鮚埼亭集》卷三十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瓘、晁説之等名儒，比較全面地吸取了時代學術的成果。

吕希哲，字原明，壽州（今安徽鳳臺）人，吕公著長子，以蔭入官，元祐中爲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説書。紹聖初，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俄分司南京，居和州，起知單州。徽宗初召爲秘書少監，改光禄少卿，以直秘閣知曹。旋入黨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宫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政和中卒，年七十八。學者稱滎陽先生。

吕希哲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後服程頤學問，首師事之。又與程顥、張載、孫覺、李常遊，并受王安石影響。其學未嘗專主一説，不私一門，以"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① 爲鵠的。他爲人樂易簡儉，行止有節，熙寧之時持異議於王安石，元祐時期又不苟同於蘇軾。紹聖之後以元祐黨人被貶，居宿州、真州（今江蘇儀徵）間十餘年，日讀《易》一爻，默坐沉思，天下學者聞風景仰。江西諸派中即有數人登堂入室。紹聖元年（1094），陳師道訪吕希哲於汴京城東華嚴寺，拜揖如親弟子②，此後一直以書信參問。崇寧二年（1103），吕希哲貶官廢居符離（今安徽宿縣）。時汪革爲宿州教授，饒節亦寓宿州，共拜入滎陽門下。汪、饒諸人本好譏刺時事，吕希哲作《麥熟》《繅絲》等詩，曉之以安樂平和的境界。"諸人得詩，皆慚懼，詣侍講引咎，因和其詩，不欲作前語。時

① ［宋］佚名《吕侍講·家傳略》，見［宋］朱熹《伊洛淵源録》卷七，《四庫全書》第448册，第465頁。

② 見《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5～366頁。

謂其師弟之間雍容感發，有儒者氣象。"[1] 遠在臨川的謝逸托汪革寄書吕氏，問道求學。其從弟謝薖也在乃兄處受到吕氏之學的熏陶。王直方亦曾寄書參問。吕本中乃希哲嫡孫，一直隨侍祖父，從小深受教誨，最全面和最深入地傳承了家學。此數人皆以節義著稱。他們在吕希哲門下學習理學，更受到平和樂易氣質的濡染。

楊時（1053～1135），字中立，南劍將樂（今屬福建）人，熙寧九年（1076）進士。調官不赴，從二程學，杜門不出十年。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任荆州教授。宣和中，以七十高齡起爲秘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説書。靖康初兼國子祭酒，不久罷。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尋致仕。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學者稱龜山先生。

楊時始從程顥學，程顥去世後又師事程頤，在程門弟子中名位最高，又獨邀耆壽。他"辟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説不作"[2]，給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爲南渡後洛學大宗。吕本中崇寧初聞楊時名，政和時期隨父親官揚州，始與楊時相見，以一個後學的身份虚心請教。徐俯曾受學於楊時。據《龜山先生語録》記載，有一次，徐俯因厭惡官場傾軋，欲棄官歸家。楊時問他："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官，如何？"又説："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

---

① ［清］黄宗羲、［清］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二十三《黎確傳》，中華書局，1986年，第2册，第912頁。

② 《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楊時傳》，中華書局，1978年，第36册，第11540頁。

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1] 曉以義命之説，指導徐俯在逆境中承擔道義，這與程頤對後學的教誨相似。崇寧初，吕本中叔父切問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今屬河南），請見程頤，問："方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 程頤云："衹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衹説義如何爾。"[2] 義命二字重點在義字，楊時對徐俯的教誨，正體現了伊川家法。

陳瓘（1057～1124），字瑩中，號了翁，南劍州沙縣（今屬福建）人，元豐二年（1079）進士。調湖州書記、簽書越州判官。檄攝通判明州。紹聖元年（1094）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校書郎。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以論蔡京，罷監揚州糧料院，尋改知無爲軍，建中靖國元年（1101）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忤曾布，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坐子正彙告蔡京失實，安置通州。政和元年（1111）移台州。五年後得自便，輾轉流徙。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學者稱了齋先生。

陳瓘的學問駁雜，以正心誠意、修己及人爲本，提倡轉益多師。要之本於豐稷，爲樓鬱、楊適再傳，於司馬光、程顥、邵雍爲私淑弟子，全祖望以之入"陳鄒諸儒學案"。他的學養不僅形之於著述，更表現爲身體力行：徽宗初，他以論蔡京著名；後著

---

① ［宋］楊時《龜山先生語録》卷三，《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吕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尊堯集》，批評紹聖史官以王安石私史爲據修《神宗實録》，因此獲罪遠謫而不悔。他以剛健挺立的骨氣警懦驚頑，獲得天下士子的景仰。饒節於元符三年遊於陳門。建中靖國元年、崇寧元年，徐俯"忍夏蚊之嚼膚而從瑩中遊"，被黄庭堅贊爲"真曠世之奇事也"（《與徐師川書》，《黄庭堅全集》第480頁）。同一時期韓駒亦有《上陳瑩中右司生日詩》、《上泰州使君陳瑩中》等詩，表達對陳瓘的景仰。吕本中早慕其名，政和中得見陳瓘於揚州，遂向他問學，此後保持書信來往。李彭有《聽了公孫彈琴》云："商飆吹菰蒲，船官雙停槳。中有陳太丘，堂堂道彌廣。容我拜床下，凛然增妙想。"（《全宋詩》第15891頁）又有《得了翁書》，是曾親見了翁，又與他通書信。此外，汪革得到陳瓘的愛敬，當亦曾從交遊①。其它未曾親見陳瓘的詩人，如謝逸、謝薖等，亦於崇寧、大觀年間，以《和陳倅泛舟寄瑩中德翁印老》、《和陳倅靈壁寄瑩中二首》（謝逸）、《三益閣》（謝薖）等詩，通過陳瓘弟陳城表達了對了翁的仰慕。

晁説之（1059~1129），字以道，一字伯以，開封人，元豐五年（1082）進士。元祐初，蘇軾以著述科薦，官兗州司法參軍，蔡州、宿州教授，知磁州武安縣。元符三年（1100）知定州無極縣，上書入邪中等。奉祠。監陜州集津倉。大觀間，監明州造船場。政和時期起通判鄜州。宣和時知成州，未幾致仕。欽宗即位，以著作郎召，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俄以議

① ［宋］周彦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1376册，第283頁。

論不合落職。高宗立，召爲侍讀，後提舉杭州洞霄宫。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一。學者稱景迂先生。

晁説之師承司馬光，私淑邵雍，博極羣書，通六經，尤以《易》學名家。晁冲之是他的從弟，受其《易》學①。吕本中因祖父與晁説之的交往得與從遊，有《寄晁以道》詩，以“洛陽佳少年，撫事多慟哭。此其於聖學，何異狗尾續。寧知草玄翁，萬事不挂目。深湛而雅澹，亦不在反復”、“誰能從公遊，歲月如轉燭”（同前，第18112頁），表達了向學之情。江端本、汪革、徐俯、夏倪、王直方、潘大臨、洪炎等亦與晁説之交往。或許是因爲出身文學世家，本人又是詩人的關係，較之其他理學家，晁説之對江西諸派更爲關注。他贊賞徐俯“人人垂首相公前，獨子低眉古簡篇”、夏倪“吾民因斯言而厚矣”②、汪革“斯人殆不可親疏耶”③、王直方“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④；視江端本爲“平生之畏友”⑤，汪革的去世爲“吾黨中失此一人”⑥；并爲王直方作墓志銘、汪革作哀辭，揄揚他們的氣節，引江西諸派爲同調。

除師長外，江西諸派還有不少精通儒學的朋友。劉義仲就是其中的一位。劉義仲（1059～1120），字壯輿，筠州高安（今屬江西）人。元祐元年（1086），以父修《資治通鑒》功爲郊社齋

① 晁説之《答朱子雲書》：“説之從弟冲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嵩山文集》卷十五，《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晁説之《跋夏均父萬言書後》，《嵩山文集》卷十八。
③ 晁説之《汪信民哀辭》，《嵩山文集》卷二十。
④ 晁説之《王立之墓志銘》，《嵩山文集》卷十九。
⑤ 晁説之《與張明仲書》，《嵩山文集》卷十五。
⑥ 晁説之《與吕舜徒書》，《嵩山文集》卷十五。

郎。任華容縣尉、鉅野簿、德安簿。崇寧元年（1102）自免歸廬山。政和八年（1118）爲唐州曹官，旋因薦召入，以宣教郎爲《道史》檢討官。宣和元年（1119），忤蔡京，致仕歸。宣和二年卒，年六十二。與祖渙、父恕合稱“三劉先生”。劉義仲父、祖皆長於史，他本人也以史學名家。立身端正，治學謹嚴，士論稱贊。他早與黄庭堅交遊。紹聖初寓居蘄春，與林敏功兄弟成爲相處莫逆的好友。紹聖四年仕鉅野，與陳師道相識。後者有《送劉主簿》詩云：“平生師友豫章公，矻矻談君口不空。半面相看吾已了，連城增價子何窮。”（《後山詩注補箋》第233～234頁）并爲他作《劉道原畫像贊》《是是亭記》。劉義仲與李彭有通家之好，他兩次回廬山歸隱都受到李彭鼓勵，與後者有“問字有誰堪載酒，談經許我或操戈”（李彭《寄劉壯輿將赴唐州儀曹》，《全宋詩》第15932頁）的親密來往。祖可有《觀壯輿所藏伯時馬》詩，當與壯輿在廬山交往。政和八年，劉義仲仕京師，與吕本中結識。從吕本中《本中將爲海陵之行念當復與子之作别意殊憒憒偶得兩詩上呈并告送與壯輿叔用也》（其二）“晁郎本京邑，劉子蓋楚産。江山兩秀異，與子日在眼”（《全宋詩》第18107頁）詩句來看，晁冲之、江端本也參與了他們當時的交遊。不畏權臣、慎於去就、沉潛入學問的人生態度使劉義仲與宗派詩人氣味相投，故他們之間交往密切。

以上是對江西宗派理學師承及交遊情況的撣要介紹。事實上，不僅如上所舉，兩宋之際幾乎所有大儒，如劉安世、張舜民、馬涓、謝良佐、游酢、尹焞、鄒浩、任伯雨等，皆對宗派詩人有深刻影響。用吕本中的話來説：“遊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

鈐椎，方能有成也。”① 經過先達的“鈐椎”，江西諸派較爲全面地吸收了宋儒學發展的成果，成爲理學傳承的重要人物。謝逸著《春秋廣微》《樵談》，聚學授徒，學者稱爲“溪堂先生”。汪革有《論語直解》，“其學欲明善惡，别是非”②，稱“青溪先生”。謝薖稱“竹友先生”，亦授徒。最有成就的是吕本中，他自小跟隨祖父，“每夜侍滎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③，學養極爲豐富。不主一師乃吕氏家風，這一點在居仁身上得到很好的體現。除吕希哲外，他還得到謝良佐、楊時、游酢、尹焞、劉安世、陳瓘、王蘋、晁説之的教誨，兼衆家之長，學者稱“東萊先生”。就家學而言，他上承吕希哲，下啓吕祖謙，“所以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吕氏，其餘大儒弗及也”④；從宋儒學的範圍來看，他“議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醖釀相傳而得者”⑤，是兩宋之際傳承儒學的重要人物。在吕本中身上，集中體現了江西諸派師友淵源的成就。

在江西諸派這裏，詩學與理學改變了元祐時期相互爲敵的狀況，延續黄庭堅的路子，走向交流融合。詩人和學人身份在他們身上没有抵牾，没有隔膜。吕本中有《臨川王坦夫故從溪堂先生謝無逸學北行過廣陵見余意甚勤其行也作詩送之》詩，頗能道出江西宗派詩學的思想底藴：

① 吕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② 周彦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1376册，第283頁。
③ 吕本中《師友雜志》。
④ 《宋元學案》卷三十六全祖望按，第2册，第1234頁。
⑤ ［宋］韓淲《澗泉日記》卷下，《四庫全書》第846册，第792頁。

王郎别我春已晚，索我題詩敢辭懶。讀書萬卷君所聞，祇要躬行不相反。聖人遺言凜可畏，小事未免書之簡。衣冠瞻視有法則，何獨文章要編刻，譬如逆風曳長艦，竭力正在千夫挽。君行念此須飽參，即是溪堂句中眼。（自注：無逸嘗有送吴君詩云："問我句中眼。"）（同前，第18088～18089頁）

詩歌之學不止於詩歌，更在乎躬行道德、踐履法則，爲國家之棟梁、頹波之砥柱。這種修爲亦即溪堂"句中眼"，無此則無溪堂詩也。儒學修養與道德根基，乃黄庭堅付與江西諸派、又由江西諸派傳遞給後學的句中之眼。這種道德修養的個體化、内省化，也改變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以來詩學精神的走向。江西詩派也因此注定與理學結緣，從而出現了詩派與學派的交叉、詩人與學人的統一。

二、佛學修養——"精於一而萬事畢"

江西諸派深於儒學，在伊洛淵源中，往往登堂入室，詩人入學派；而同時，他們也具備深厚的佛學修養，派中除有三個衲子外，還出現了幾個著名的居士，在禪宗門庭中佔據一席之地。北宋禪學以臨濟、雲門二宗爲盛。尤其是臨濟宗，自慈明楚圓下出黄龍慧南、楊岐方會，開黄龍、楊岐二派。這兩家禪學盛於江西，與江西諸人的關係最爲密切。

（一）臨濟宗黄龍派

黄龍派由黄龍慧南禪師開啓。他設三關以驗學者，常問僧

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雖有酬答，亦未嘗可否，名震叢林。其嗣法弟子有晦堂祖心、真净克文、東林常總等。黄龍派與江西宗派有極大因緣。黄庭堅曾參晦堂祖心而得道，與祖心弟子死心悟新、靈源惟清交遊，爲黄龍派得法弟子。與通常禪宗對文字的抵觸相反，黄龍派提倡文活而心死，講究死句活句，并不一般地反對文字。黄龍派僧人自慧南以下，多富文思才藻：文准讀諸葛亮《出師表》而知作文關鍵；宗杲早在湛堂門下，才思富贍，嘗作《頌古》百餘篇，了無窘澀；惠洪爲北宋末著名詩僧，命其詩文集爲《石門文字禪》，在“文字”與“禪”間轉圜自如；江西宗派詩人善權爲黄龍三傳弟子；祖可亦當爲黄龍派僧人。除他們外，黄龍門下詩僧還甚衆[①]。以文字表達參與性靈啓悟，這種門風也影響到派中居士黄庭堅的詩學思想，參與鑄造出“山谷句法”[②]。江西諸派亦與黄龍派淵源深厚。慧南的再傳弟子靈源惟清、湛堂文准、清凉惠洪，對這些詩人影響最著。

靈源惟清（?～1117），字覺天，俗姓陳，南州武寧（今屬江西）人。爲南嶽下十三世，晦堂祖心禪師法嗣。嘗爲晦堂侍者，後主持舒州太平寺、隆興府黄龍寺。政和七年卒。

靈源惟清是徐俯的開法老師。徐俯的父親徐禧、舅父黄庭堅

① 從《日涉園集》看，與李彭唱酬的詩僧，有珍上人、珠上人、瑛上人、環上人、慶上人、演上人、淳上人、崇書記、宗紱上座、暉書記、嗣首座、譽首座等。因李彭主要和黄龍派僧人交遊，這些詩僧應多屬黄龍派。

② 關於禪語機鋒和山谷句法的關係，參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皆參法於晦堂，與惟清爲法友，往往以疑問咨請參問。受父親影響，徐俯自少就熏習佛法。《五燈會元》記載：

>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什麽處？而今舍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什麽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個什麽，便恁麽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麽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①。

徐禧死國時，徐俯方八歲，以上關於孝址說法悟道的記載恐不可信。但徐俯實受父親與舅父影響，從靈源惟清參咨。元符初，黃庭堅鼓勵徐俯參法惟清，并寄書請惟清予徐俯琢磨。靈源惟清指點徐俯佛法之要云："古之達人所以鑒世間如影響，了聖道如蘧廬者，無他，自徹心源而已。"② 又曾向徐俯言蘇軾"猪肉、龍肉"說之弊。在他的影響下，徐俯終身篤信佛法，見地超邁。

湛堂文准（1061～1115），號湛堂，俗姓梁，興元府（今陜

①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卷十九，中華書局，1984年，第1298頁。
② ［明］釋心泰《佛法金湯編》卷十三，《卍續藏經》第149册，第1952頁。

西漢中）人。爲南嶽下十三世，真净克文禪師法嗣。隨真净十載，後開法於豫章雲岩寺，移隆興府泐潭寺、靖安寶峰寺。曾移居浙江，最後回到泐潭寺。政和五年卒，年五十五。

李彭爲湛堂文准的俗家弟子。他參學精進，時常來往於日涉園與廬山諸寺之間。曾大書雲庵（真净克文）偈，又嘗應宗杲之請，作《漁父歌》十首，頌臨濟宗尊宿自汾陽已下，慈明、雲峰、慧南、晦堂、真净、潛庵、死心、靈源、湛堂共十人[①]。湛堂示滅後，作行狀以獻。湛堂師弟惠洪對李彭有較高評價：

>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説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②]。

看來，李彭禪學修養很高，以至惠洪稱他爲“此道人”，不以普通居士目之。除李彭外，受湛堂文准影響的詩人還有洪芻。他曾叙湛堂語録[③]，當對其禪學思想有相當瞭解。

清凉惠洪（1071～1128），初名德洪，字覺範，俗姓彭，筠州新昌（今江西宜豐）人。爲南嶽下十三世，真净克文禪師法嗣。十四歲出家，十六歲從真净克文禪師學禪。十九歲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爲僧。歸廬山歸宗寺依真净克文，相隨七年。後雲遊各地，遍謁諸老，名振叢林。大觀初，應朱彦之請，開法於

① 見［宋］釋曉瑩《雲卧紀談》卷下，《卍續藏經》第148册，第0034頁。
② 惠洪《跋李商老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宋］釋祖琇《僧寶正續傳》卷二，《卍續藏經》第137册，第0580頁。

臨川北景德寺，後住金陵清凉寺。因與張商英等的交往四次入獄，兩褫僧籍。晚年轉輾於江西、湖南兩地，潛心著述。建炎二年卒，年五十八①。

作爲黄龍派的著名詩僧，惠洪與江西宗派交遊最廣。據陳自力《釋惠洪研究》考證，與惠洪交遊的江西宗派詩人，有黄庭堅、李彭、徐俯、洪芻、洪炎、謝逸、謝薖、汪革、饒節、夏倪、韓駒、林敏功、善權、祖可，共十四人。陳文并對惠洪與江西宗派的交遊情況有詳細考述，可參，兹不贅言。在這裏還值得一提的是，與惠洪的交往，爲江西諸派帶來詩禪相通的思想啓發。惠洪嘗輯叢林軼事爲《林間録》，謝逸爲作序曰：

> 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筆，肆談而書，無遇而不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按：指樂廣、潘岳）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耶？余是以知士不可不知道也②。

作文須有“美才”與“妙思”，惟體悟禪道、定亂兩融者能兼之。强調詩人之“體道”，乃是指出詩禪相通。禪學對詩人的影響終將作用於他們的詩學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説，與詩僧惠洪的交遊，對江西諸派的詩歌創作不無啓迪。

① 據陳自力《釋惠洪研究》，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論文，2003年。
② 謝逸《林間録序》，《溪堂集》卷七，《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520頁。

除以上僧人外，江西諸派還與黄龍派居士張商英交遊。張商英（1043～1121），字天覺，號無盡居士，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人。至平二年（1065）進士，調通川主簿，辟知南州縣，得章惇賞識，薦之于王安石。熙寧五年（1072）擢權監察御史，尋責監淮南酒税。元豐初，除館閣校勘、檢正刑房，責監赤岸鹽税。元祐元年（1086）爲開封府推官。二年，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攻元祐大臣甚力。尋責監江寧酒税，起知洪州。元符元年（1098）爲江淮轉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因與蔡京不和，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大觀四年（1110）除中書侍郎，拜尚書右僕射，爲政持平，大革弊事。爲蔡京黨人羅織陷害，政和元年（1111）出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後令自便。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

張商英始不信佛，欲作《無佛論》。後閲佛書，肅然起敬。元祐六年爲江西轉運使，謁東林總禪師。後按部至分寧，遍訪禪僧，與真净克文弟子兜率從悦語。夜宿下床，觸翻溺器而悟道。從此登堂入室，成爲黄龍派的著名居士。嘗作《護法論》駁斥歐陽修的辟佛之説。張商英政治上屬於新黨，在禪學淵源上，却與黄庭堅及諸多江西派詩人同列黄龍門墻。山谷後學頗能突破政治糾葛，向這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居士表示敬意。湛堂文准圓寂後，弟子們商議後事，李彭説：“無盡張公於真净父子有大法緣，吾師行解相應，非張公之文不足取信後世。衆中有可往見公者乎？

彭願録行狀以獻。”宗杲請行。此行得到張商英爲湛堂作的塔銘，宗杲本人也因此得到張商英的賞識，聲名大著①。韓駒曾與宗杲一起“倚杖話荆州（張商英)”②。饒節稱“無盡先生如古人”(《送宋秀才》，《全宋詩》第14553頁)。徐俯有《跋護法論》云：

> 無盡居士護法之心可謂至矣，於三教中皆有勸戒。然苦口者是良藥，逆耳者是忠言，其實，指歐陽修之過者，余知無他，亦罰一戒百之謂也。鑒者宜悉焉③。

北宋末年崇興道教，壓制佛教，甚至一度改僧爲道。在這種局面下，張商英作《護法論》，徐俯贊同該論，以及李彭勸宗杲往訪張商英，都出於護法的考慮。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護法義務，是聯繫黄龍派居士的紐帶。

（二）臨濟宗楊歧派

楊歧派由楊歧方會禪師開啓。嘗言：“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獅子吼，演説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爾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以大機大用之法接引學人。其再傳弟子有五祖法演，法演門下有著名的“三佛”：佛果、佛鑒、佛眼，尤以佛果——圓悟克勤禪師及其法嗣大慧宗杲爲兩宋間大德。

---

① 見［宋］釋祖泳《大慧普覺禪師年譜》，《明嘉興大藏經》（以下簡稱《嘉興藏》）第1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第794～795頁。

②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1册，第795頁。

③ 《佛法金湯編》卷十三，《卍續藏經》第149册，第1952頁。

圓悟克勤（1063～1135），字無著，彭州崇寧（今四川郫縣西北）人，俗姓駱。爲南嶽下十四世，五祖法演禪師法嗣。幼見佛書如獲舊物，遂祝髮。始學《楞嚴》等經論，後弃而學禪，參太平法演悟道。從法演遷五祖山，分座説法。崇寧中，還蜀住六祖山、昭覺寺。政和間，居夾山，遷湘西之道林。樞密鄧子常奏賜紫服并佛果禪師之號。政和末，詔住金陵蔣山。宣和中，補東都天寧萬壽寺。建炎改元（1127），住鎮江金山，賜號圓悟禪師。後歸雲居，復歸成都昭覺寺。紹興五年卒，年七十三。

圓悟克勤爲徐俯的證法老師。靖康元年，徐俯爲尚書外郎，與朝士之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擇木堂，力參圓悟克勤，勤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圓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曰："瓮裏何曾走却鼈?"俯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徐俯休去[①]。二人所論爲識取自性，從這段對話，頗見徐俯訶佛駡祖之風。因爲有這段力參的經歷，故《五燈會元》以徐俯爲克勤法嗣。韓駒亦嘗與圓悟克勤通書信[②]，想亦曾從參學。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字曇晦，號妙喜，宣州寧國（今安徽宣城）人。爲南嶽下十五世，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年十七出家，初參學於湛堂文准，後尊湛堂遺命，於宣和七年（1125）投入圓悟克勤門下。克勤許其分座授徒。右丞呂好問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後克勤住雲居寺，令居第一座。紹興四年

① 《五燈會元》卷十九，下册，第 1298 頁。
②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 1 册，第 798 頁。

(1134）入閩。後住臨安徑山能仁禪院、臨安府明慶院。因與張九成交遊，於紹興十一年斥還俗，屏居衡陽。力辟默照禪，著《正法眼藏》。紹興二十年移居梅陽。二十五年，特恩放還，復僧服，住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後改徑山。紹興三十一年退居明月堂。隆興元年卒，年七十五。

大慧宗杲早年與李彭同在湛堂門下。李彭"遇山舒水緩，必拉大慧老師爲禪悦之樂"[①]。宗杲曾因訪李彭滯留逾年而受到楚源首座的責備[②]，可見二人之莫逆。他們不僅是道友，還是詩文之交。李彭爲宗杲作《清餓賦》《佩韋賦》，及贈詩若干[③]，并應宗杲之請，作《漁父歌》以頌臨濟尊宿。宗杲嘗作《爲觀音請竹靈叟疏》，李彭手録而題其後曰：

> 妙喜為觀音請竹靈叟疏，作語奇峭，若久致力於斯文者，乃知般若之靈驗如此，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也[④]！

讀宗杲文啓發了李彭對文學本質的反省：文學的精髓不在四庫之書，乃在"般若之靈驗"，即心靈的要妙。這與謝逸在惠洪處所得略同。李彭、宗杲的文學交流是相互的。宗杲後作《頌古》百餘篇，與李彭《漁父歌》參印，正可見二人的彼此影響。

韓駒是宗杲的另一個知交。政和八年（1118），韓駒宰分寧，

---

① 《雲卧紀談》卷下，《卍續藏經》第148册，第0034頁。
② 《羅湖野録》卷下，《卍續藏經》第142册，第0994頁。
③ 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④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1册，第795頁。

與宗杲"裁書訪彭澤，倚杖話荊州"①，親切交遊了三年。建炎二年（1128）十月，宗杲覲圓悟於雲居，途經金陵（今江蘇南京），訪韓駒，留五宿而别。建炎四年，二人又曾於豐城相見②。紹興三年（1133）九月，宗杲又與珪禪師來臨川，館於韓駒西齋半年。"晨興相揖外，非時不許講，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蓋相忘於道術也。"③ 明年，宗杲别韓駒之閩，韓駒贈詩曰："幻世吾方夢，迷津子作舟。禪心如密付，當爲少淹留。"④ 表達了深切的向學之情。二人從法喜之遊出發，發展爲深厚的私人交誼。韓駒去世後數年，宗杲猶有《祭韓子蒼待制文》表達對故友的懷念⑤。此外，徐俯、吕本中也經常致書或拜訪宗杲求益。江西諸派的禪學淵源主要是臨濟宗的黄龍、楊岐二派。大慧宗杲兼有二派法緣，故與江西派詩人交情深厚。

（三）雲門宗

北宋中期以後，黄龍、楊岐二派禪學盛於江西。江西諸派多江西人，故多受江西禪風，尤其是黄龍一派影響。不僅徐俯、李彭、謝逸、洪芻等江西詩人如是，就連韓駒這個蜀人，其與佛教的緣分，也是"平生探學海，中年悟禪悦"（《飲酒次人韻》，《全宋詩》第16596頁），從政和八年知洪州分寧縣後，與江西僧人惠洪、宗杲、善清交遊後發生。然江西諸派的禪學淵源又不囿於

---

① 韓駒《送宗杲之荊南》（擬題），《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1册，第795頁。

② 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③ 《雲卧紀談》卷上，《卍續藏經》第148册，第0010頁。

④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1册，第799頁。

⑤ 同上，第801頁。

此，他們另有一系雲門宗的傳承，這與吕希哲有關。吕氏《家傳略》云："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遊，盡究其道，别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1]與吕希哲交遊的宗本、修顒禪師皆爲雲門宗傳人。吕氏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則他門下的弟子亦兼習禪學與理學。與其理學路綫一樣，滎陽門下禪學路綫也不專一門、不名一師。吕本中的參禪路徑就很開闊。他除如上文所述，從黄龍派、楊岐派禪師參請咨决外，還曾勸李彭參雲門宗的雪竇下禪[2]。饒節更因吕希哲指點，往見修顒禪師的法嗣香岩智月，從而出家爲僧，成爲雲門宗的大德。

香岩智月禪師，號海印，青原下十三世，投子修顒禪師法嗣。久參證悟，深達法源。自京師出居潁州薦福寺。紹聖三年，移鄧州香岩寺。崇寧年間，饒節因吕希哲的介紹往鄧州（今河南鄧縣）見智月，參禪有悟入處，以書報吕本中曰：

> 某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海印老人處請話咨决，從此日日去參。正月半間，瞥然有個省處。奇哉！奇哉！世間元來有此不可説不可説不可説無量無邊勝事，佛言一大事因緣，豈欺我哉！便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墻壁瓦礫、鷄鳴狗吠、著衣吃飯、舉手動足處，一一見本來面目，始悟無始以來生死顛倒，為物所轉，到這裏如燈破暗，一時失却，豈

① 《伊洛淵源録》卷七，《四庫全書》第 448 册，第 466 頁。

② 見李彭《戲次吕居仁見寄韻（居仁見督參雪竇下禪）》，《全宋詩》第 24 册，第 15931 頁。

不是無量大緣乎[①]?

此書講述參禪頓悟的體驗，驚喜之情溢於言表。既窺此奥域，饒節就在天寧寺祝髮，法名如璧。他每以人生真諦在彼不在此爲論，勸舊友弃俗向道。嘗答吕本中詩曰："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磨雙頰紅。"（《次韻答吕居仁》，同前，第14574頁）又對汪革説："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②] 督促吕本中、謝逸、汪革等精進參禪。數人者頗受其影響。

由於資料散佚的關係，其他詩人與佛教的關係不易深究。略可知者，陳師道篤信佛教，躬行戒律，以"平生功名意，回作香火願"（《寄答王直方》，《後山詩注補箋》第139頁）而結願西方，語山谷云："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③] 汪革"晚聞祖師之道，而知生死之説"[④]，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參禪甚力。其他詩人也往往留下與禪僧交往的詩作。如晁冲之、江端本、吕本中與後入黄龍派的僧人萬年法一交遊，晁冲之爲作《送一上人還滁州琅琊山》詩云："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我聞大士入詞海，不起宴坐澄心源。禪波洞徹百淵底，法水蕩滌諸塵根。迅流速度超鬼國，到岸捨筏登昆侖。"（《全宋詩》第13871頁）此詩

① 《嘉泰普燈録》卷十三《香岩倚松如璧禪師傳》，《卍續藏經》第137册，第0200頁。

② 見吕本中《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0頁。

③ 陳師道《與魯直書》，《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大字本，1984年。

④ 謝逸《祭汪伯更教授文》，《溪堂集》卷十，《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554頁。

深刻闡述了詩禪相通之理，契合山谷詩學的内在訴求。

我們看到，江西諸派之學禪，與時代精神相通。江西宗派崇尚儒學，而北宋儒學，尤其是濂溪、伊川一派，頗受佛學濡染。這種傾向在兩宋之際尤爲明顯。吕希哲論二程之排佛“祇爲見得太近”①。游酢學禪，以爲“要之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②。劉安世自謂參禪有所得。晁説之早期辟佛，晚年亦留意於天台教，日誦《法華經》，自號“老法華”、“天台教僧”。楊時、謝良佐、陳瓘等，皆信仰佛教。一時名儒皆入佛教藩籬，後學亦不能免。黄宗羲稱汪革之近禪，爲“篤直剛直，惜不免於禪學，則侍講（吕希哲）之所夾雜也”③。《師友雜志》録陳瓘與吕本中書“論學問本末”云：“華嚴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無有内外，亦無中間，異夫世儒以精粗爲二致，始終爲兩途，得本遺末，語道弃事者也。”此正可見理學家佛教信仰對青年詩人的影響。儒學近佛、詩學近佛，成爲當時潮流。如果説，太平時代士人對佛教的興趣還停留在學理層面的話，北宋末期儒者、詩人則爲佛學的親身履行者，有實證實悟的體會。江西宗派之學禪，乃出於安頓心靈的需要。而既入詩人之心，禪學修養也就滲入文學的内部，參與詩學精神的構造。黄庭堅鼓勵徐俯參靈源惟清云：

所寄詩，度超今人已千百，但恨未及古人耳。杜子美

① 《吕侍講·家傳略》，朱熹《伊洛淵源録》卷七，《四庫全書》第448册，第466頁。
② 吕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③ 《宋元學案》第2册，第911頁。

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此作詩之器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無妙手故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老夫學道三十餘年，三四年來方解古人語，平直無疑，讀《周易》《論語》《老子》，皆親見其人也。太平清老，老夫之師友也，平生所見士大夫，人品未有出此公右者。方吾甥宴居，不嬰於王事，可數至太平研極此事，精於一而萬事畢矣。(《答徐甥師川》，《黄庭堅全集》第 2028～2029 頁)

山谷以"研極此事"爲獨得之秘，在禪悟的基礎上解讀儒家、道家經典，更以之作爲作文的"妙手"之法，啓動詩歌創作的幾微之境——所謂"精於一而萬事畢矣"。從獲得"利器"到領悟"妙手"，要須得之於心地，是爲山谷詩學的精髓。兩宋之際，江西諸派傳承禪宗諸派，熔鑄禪學入詩學精神的建構，這無疑是山谷思想的繼續。

三、詩學傳承——"知味者當能别之"

江西諸派以山谷爲"宗"，對他們的師弟子關係，歷來存在着不少誤解：或以爲山谷一派與東坡争名；或認爲江西諸派衹師法山谷，詩學資源狹窄。這些都是對江西宗派的簡單化理解。在黄庭堅的提倡下，江西諸派注重詩學傳承的轉益多師，對蘇軾尤爲尊敬。他們的詩宗山谷，并非衹是簡單地學習詩歌句法，更是對其詩學範式的認同、詩歌精神的呈遞。

元祐時期蘇、黄齊名，這總是給多疑的批評家以蘇、黄争名

的臆想。事實上，黄庭堅對蘇軾始終以弟子自居，終身敬仰。下面這段話最能代表他對蘇軾的態度："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遊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黄庭堅全集》第1629頁）江西宗派其他詩人也莫不如此。蘇軾不僅在詩歌成就，亦在人格風範及其所代表的元祐文化意義上成爲他們崇拜的對象。陳師道爲"蘇門六君子"之一，稱蘇軾爲"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送蘇公知杭州》，《後山詩注補箋》第69頁），每以衛青門下任安、揚雄門下侯芭自比。二潘、何顒嘗從蘇軾遊，這成爲他們終身驕傲的回憶。王直方元祐時期從蘇軾及其門下士遊，以自家園林爲他們提供了戲謔談笑的場地。李彭叔祖公擇、父親秉彝是蘇軾至交。父親去世後，他還負墓蓋去請蘇軾題銘。蘇軾爲題大小兩種，并給他"德叟有子不亡"的評價。江端本的哥哥端禮，晁冲之的哥哥載之遊於蘇門，端本、冲之間接受蘇軾影響。韓駒則從蘇軾弟轍受學。他們無一例外崇拜蘇軾，絶無誹謗和非議的情况。吕本中政和三年（1113）贈外弟趙才仲言："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衆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極風雅之變，盡比興之體，包括衆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當永以爲法。"[①] 就文學史地位而言，蘇軾、黄庭堅爲元祐詩學乃至整個宋代詩學的兩座高峰，這是時代的共識，也爲江西諸派所認同。不僅如此，他

① ［宋］陳鵠《耆舊續聞》卷二《吕東萊贈趙承國論學帖》，中華書局，2002年，第305頁。

們還充分認識到蘇、黄間的師弟子關係。建炎時期洪炎編次《豫章集》，特地將坡、谷訂交，黄庭堅得以列入蘇門的《古風上子瞻二首》置之卷首——“以明淵源之所自”。這無疑是在對蘇軾態度問題上代表江西宗派的一次鄭重發言。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宗派對蘇軾并非僅是泛泛的景仰，他們幾乎都作過蘇詩的整理、注釋工作。元祐黨禁中，蘇詩首當其衝被毀版、禁止傳習，而王直方獨“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①，用心收集蘇詩，并著《詩文發源》箋釋其本事。林敏功爲北宋末期蘇詩編年注“五家”之一，對蘇詩有全面的編年箋注。其他詩人亦多詳注過蘇詩。今存署名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編纂於南宋時期，彙集百家詩注，從中猶可見北宋注蘇的大體風貌。據阮元統計，這部書中，北宋注家有 47 人②。而從此書卷首“姓氏”所録，有江西諸派 24 人；書中實際收録的有 21 家注，計有：洪朋注一則，洪芻注十二則，洪炎注十一則，徐俯注十四則，李彭注六則，祖可注十則，善權注四則，謝逸注一則，謝薖注二則，饒節注三則，汪革注十一則，潘大臨注十則，潘大觀注一則，何（覬）［顒］注四則，林敏修注三則，晁冲之注一則，李錞注十則，韓駒注三則，吕本中注六則，林敏功注六百一十五則，另有諸注家引用王直方《詩文發源》八則。無論是 24 家還是 21 家，江西諸派在北宋注家 47 人中，都是絶對的主力。

---

① 晁説之《王立之墓志銘》，《嵩山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清］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江西諸派注蘇詩，包括作品繫年、名物箋釋、出處注釋、義理發明等幾個方面，用力甚勤。詩人作詩注，意味着揣摩、體會，從而深入地學習。在北宋末禁毁蘇軾詩文的政治環境中，江西諸派熱衷於蘇詩并爲之作注，無疑是一種需要勇氣的行爲；而他們不約而同的注蘇，又成爲江西宗派一個鮮明的羣體特徵。江西諸派詩歌中，化用蘇詩字句、次韻蘇、模仿蘇詩的寫作比比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除黄庭堅外，蘇軾詩歌是江西派詩人積極汲取的一種詩學資源。

雖然崇拜和學習蘇軾，江西諸派却主要是黄庭堅的弟子，這是江西宗派形成的内在邏輯所在。蘇、黄詩歌并稱元祐，共有“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傾向，風格却不盡相同。蘇軾評論黄詩“如蝤蛑、江瑶柱，格韻高絶，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①]，黄庭堅批評蘇軾詩文“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答洪駒父書》，《黄庭堅全集》第474頁）。他們相互的批評，正是蘇、黄詩學分野之所在。坡、谷之别，如陳與義所言：“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味之餘，而索之益遠。”[②] 方回所言：“坡詩天才高妙，谷詩學力精嚴；坡律寬而活，谷律刻而

① 蘇軾《書黄魯直詩後二首》其二，《蘇軾文集》卷六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第5册，第2122頁。

② ［宋］晦齋《簡齋詩集引》述陳與義語，［宋］陳與義《簡齋詩外集》卷首，《四部叢刊初編》本。

切云。"[1] 蘇作詩思開闊，氣盛言宜，"波瀾富而句律疏"[2]；黄作格韻高絶，步驟謹嚴，"鍛煉精而情性遠"[3]。這是兩種不同的詩學範式。有治心養氣傾向、具備深厚的理學與佛學素養、在性格上屬於"狷者"的江西諸派明確選擇了後者。無論從氣質還是詩學傾向上，他們更適宜受黄庭堅的接引。李彭有《夜坐食蛤蜊》云：

> 紞紞寒鼓鳴，稍稍華月上。蒲薦蔽幽齋，夜鼎驚暗浪。但見煮蛤蜊，許事付塵坱。獷殼雖外緘，甘腴實天相。霜臍貴抱黄，雀醢詩挾纊。江瑶初脱柱，蚝山憐叠嶂。盤飧得此生，風期特高亮。如跨大宛兒，凡馬羞駿駔。嗟予鬢成絲，山林真獨往。會心不在遠，坐有濠濮想。（《全宋詩》第15881頁）

這首詩稱贊蛤蜊"獷殼雖外緘，甘腴實天相"、"盤飧得此生，風期特高亮"的風味格調，表達了自己對這種品格的傾心認同，可視作就蘇軾"如蝤蛑江瑶柱……多食則發風動氣"的批評，爲黄詩所作的辯護。洪炎更在《豫章黄先生退聽堂録序》中闡述如下詩學觀點：

---

①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888頁。

②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一百七十四《詩話前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同上。

> 大抵魯直於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巧妙，他士莫逮，而尤長於詩。其發源以治心修性為宗本，放而至於遠聲利、薄軒冕，極其致，憂國愛民，忠義之氣藹然見於筆墨之外。凡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窮，增出增奇，所謂包曹、劉之波瀾，兼陶、謝之宇量，可使子美分座、太白却行者耶。蘇公嘗評魯直曰："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頗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蘇公知魯直者，然此評則未盡。夫詩人賦咏於彼，興托在此，闡繹優遊，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見其端，使人三復玩味之久而不厭，言不足而思有餘，故可貴尚也。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關》《花門》之什，白公《秦中吟》《樂遊園》《紫閣村》詩，則幾於罵矣，失詩之本旨也。舉世雷同，未必皆知魯直，蘇公真知魯直者，又可嘆如此，信乎知我之難值也[①]。

洪炎認識到黄庭堅"以治心修性爲宗本"、"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窮"的詩學範式，贊同他"賦咏於彼，興托在此，闡繹優遊，而不迫切"的詩學風格，而不贊同詩歌的"察察言"而"幾於罵"。這是對黄庭堅"詩者，人之情性也"詩學主張和他内省化詩學觀的全面認可。至於名列"蘇門六君子"却從黄庭堅學詩的陳師道，他在蘇、黄間的詩學選擇極具代表意義，對此，將在第四章陳師道"師黄與學杜"一節作專門論述。如果説，蘇軾對黄庭堅詩歌的評價還有所保留的話，江西諸派就是黄庭堅真正的

① 《黄庭堅全集》附録三，第 4 册，第 2380 頁。

知音。陳師道詩歌“十次欲言九次休，萬人叢中一人曉”；晁冲之詩歌“既以油然栖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疏亮，未嘗爲凄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①，皆爲黄庭堅“發爲呻吟調笑之聲”、“不怨之怨”的同調。這是一種帶有時代風向的詩學範式的選擇。《五總志》説“師坡者萃於浙右，師谷者萃於江右”②。其實元祐之後，學坡與學谷的詩人非能二分。作爲時代詩學的選擇，黄庭堅的後學佔據了主流并主導了南宋詩風的走向，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現象。

江西諸派之學黄，分親受指導和聞名欽敬兩種。陳師道、三洪兄弟、徐俯、李彭、潘大臨、潘大觀、何顒、王直方、高荷等曾親聆山谷教誨，接受山谷家法的指導，其中又以山谷四甥（三洪及徐俯）自少年時期即受舅氏詩風的熏陶，爲山谷詩學的嫡派。而其他未親見山谷的詩人，無一不對這位前輩心懷景仰。其中，謝逸、韓駒早年詩經山谷品題；江端本受詩學山谷的兩位哥哥的影響；晁冲之師從後山，自當列入山谷門下；其他的江西派家詩歌中亦有濃厚的山谷體氣息。對山谷詩歌的琢磨領悟，對其詩學理論的理解體會，成爲江西諸派學詩的主要途徑。而諸派之中，陳師道作爲山谷詩學的上首弟子、集大成者，亦以相當於副導師的身份，爲其他詩人崇敬師從。

《江西宗派圖》的寫作參考了禪宗燈録。正如禪宗之傳燈，除依本師開悟，還須廣參諸方一樣，江西諸派亦於黄庭堅之外廣

① 喻汝礪《晁具茨先生詩集序》，《晁具茨先生詩集》卷首。
② ［宋］吴坰《五總志》，《四庫全書》第 863 册，第 817 頁。

求學養，這正好體現了山谷家法。山谷論詩，講究法度、涵養，提倡學習前作（尤以老杜爲法），江西諸派遂以飽參作爲悟入的不二法門。所謂“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韓駒《贈趙伯魚》，《全宋詩》第16588頁）。他們曾精注杜詩。今存《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自黄庭堅以下，收江西宗派共19家注①，入卷首注家“姓氏”者24人。其中，吕本中還曾編次門類杜詩②，在當時流行的編年注外爲杜詩提供了一種新的分類方法。因爲下了如此工夫，他們學杜往往能够落到實處。陳師道、晁冲之更以學杜名家。此外，韓駒還有陶淵明詩注本③。柳宗元詩、韓愈文，亦可見江西派詩人用力其中的痕迹④。李彭屢摹《文選》詩，徐俯教人多讀《選》詩；江西宗派詩歌中，還可見晚唐詩家、西昆體的影響。吕本中説：“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黄，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⑤ 這個次序正是江西諸派學詩的階梯。他們的詩歌呈現出雄渾、深刻、瘦硬、險澀、清麗、淺净等不同的

① 這19家爲：黄庭堅、洪朋、洪芻、洪炎、徐俯、李彭、何（覬）[顒]、謝逸、饒節、汪革、夏倪、楊符、李錞、王直方、吕本中、晁冲之、林敏功、高荷、韓駒。

② ［唐］杜甫撰、［宋］佚名集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四部叢刊初編》本）卷首“姓氏”云：“東萊徐氏，字居仁，編次門類詩。”卷四《望嶽》注中，提到“吕居仁本”。可見吕本中曾編次杜詩，前引“東萊徐氏”爲“東萊吕氏”之誤。

③ ［晋］陶淵明撰、［宋］李公焕箋注《箋注陶淵明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多引韓駒注，卷三《述酒》詩注曰：“從韓子蒼本。”可見韓駒有陶詩注本。

④ ［唐］柳宗元撰、［宋］潘緯注《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保留有洪芻注一則；［唐］韓愈撰、［宋］朱熹考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保留有洪芻注兩則、洪炎注一則。

⑤ 吕本中《贈趙承國論學帖》，《耆舊續聞》卷二，中華書局，2002年，第304頁。

風格，昭示着不同的詩學資源。但在種種風格中，却貫穿着一脉共同的精神氣質，即方回所説的：

> 江西詩，晚唐家甚惡之。然粗則有之，無一點俗也①。

不俗乃黄庭堅標舉的“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境界，是建立在修身礪行基礎上壁立千仞的風格。山谷本人作詩“務爲峭拔，不肯隨俗爲波靡，此其一生命意所在也”②。“無一點俗也”，昭示着江西諸派對山谷的繼承深入到其詩學精神的内部，有了可供辨别的風味——苦心孤詣、格律謹嚴乃不俗風格反映在江西宗派詩歌内容和形式上的特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楊萬里將“江西之詩”與“世俗之作”區别開來，説：“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别之矣。”③

第三節　團結：羣體的力量

在荒謬的時代面前，個體是孤單的。但當這些孤單的個體團結起來，就足以形成羣體的力量。元祐黨禁時代，民間有兩條師友承傳的綫索，一爲伊洛淵源的暗中流傳，一爲江西宗派的形成

① 《瀛奎律髓匯評》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1753頁。
② ［清］趙翼《甌北詩話》卷十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69頁。
③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誠齋集》卷七十九。

發展。黄庭堅指出的師友淵源路綫在後學詩人身上得到很好的體現。從地域型的小羣體到全國性的大羣體，“江西宗派”的命名，標志着超越地域限制的詩歌流派的成型。這些詩人并未結爲一個共同的詩社，却聯繫密切，具有鮮明的羣體特徵。其盛况如江西宗派詩人李彭《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韻》一詩所云：

> 夢中逐客幻中歸，荆楚甌閩好賦詩。誰謂涪翁呼不起，細看宅相力能追。太冲文價輕皇甫，籍也辭源怯退之。丘壑同盟從已定，莫令鬼祟作愁眉。（《全宋詩》第 15936 頁）

爲繼承涪翁的文源而定下“丘壑同盟”，爆發出創作的熱情，形成羣體的力量，這就是江西宗派形成的動力。

一、同聲相應——地域型小羣體的出現

江西諸派二十六人中，除陳師道去世時間稍早，高荷和其他人關係不可知外，其餘人是很好的朋友。其中，洪芻、洪朋、洪炎、徐俯爲南昌人，謝逸、謝薖、饒節、汪革爲臨川人，潘大臨、潘大觀、何顒爲黄岡人，李彭、祖可、善權活動在南康，王直方、夏倪、晁冲之、江端本生活在汴京，林敏修、林敏功隱居在蘄春。他們年齡差别不大，從青少年時期起就聚集在一起切磋詩文，在其生活的地域形成幾個小的詩人羣體。

（一）南昌詩人羣體，包括列入江西宗派的三洪、徐俯，及未入宗派的洪羽、潘淳等人。四洪爲兄弟，徐俯是他們的表弟，潘淳等與他們年歲相當。在成長的歷程中，他們“數能文字集”

（洪朋《立秋日諸公過敝廬得秋字》，《全宋詩》第14458頁），或相約於南昌境内大梵院、邃清閣、秋屏閣等名勝，或相互造訪，分韻賦詩。其中洪朋最年長，詩歌也早有成就，爲南昌詩人的領袖。其《過師川偶行》云：

吾廬城北頭，捷徑實咫尺。欻思論五字，聊復訪三益。高尋風雅源，洞入屈宋域。波瀾到蘇李，光焰及元白。自來磊落人，聞見資博極。（《全宋詩》第14444頁）

互爲三益之友，共論五言之詩，開拓心胸，資長聞見，共探文源，是爲南昌諸友文字交往之況。南昌詩人中，四洪與徐俯是山谷的外甥，數與山谷見面，又常常寄近作及諸友和篇請舅父指點。潘淳等人亦曾主動寄書山谷。黄庭堅也很關注家鄉詩人的成長，曾寄詩與徐俯，叮囑他與潘、洪諸友共觀，鼓勵他們彼此交往。作爲黄庭堅的同鄉後學，洪州青年詩人受黄庭堅的影響最大。南昌詩人羣體，是日後出現的江西宗派最核心也最基礎的力量。

（二）臨川詩人羣體，包括二謝、汪革、饒節，以及《江西宗派圖》外的吴賀、汪莘等人。臨川是文化名郡，鄉先賢有晏殊、王安石等，後學中也名流輩出。臨川詩人成員衆多，以謝逸《吴迪吉載酒永安寺會者十一分韻賦詩以字爲韻予用逸字》詩來看，僅這次聚會，與會詩人就有十二人，除謝逸外，他們的字分别爲：迪吉、子珍、宗魯、君澤、伯更、澤民、叔野、文美、文康、中邦、樂之。其中，名字可以考知的有吴賀，字迪吉，謝逸

表弟；吴琛，字子珍，吴賀兄；汪革，字伯更；汪莘，字叔野，汪革弟；黄洙，字宗魯。其他集會還有别的詩人加入。他們“每月一會面”（謝逸《遊逍遥寺以野寺江天豁山扉花木幽爲韻探得山字》，《全宋詩》第 14814 頁），相約於西塔寺等名勝，好取古人詩一聯分韻賦詩，爲文字之集；又曾各取古人寬厚一事，退而録爲一集，“庶幾人人勉勵，相師成風”[①]。臨川詩人中，饒節早去鄉里，汪革紹聖四年（1097）後宦遊在外，他們在符離的交往給臨川詩人帶來新的師友淵源。謝逸則始終盤桓鄉里，與諸友唱酬不輟，爲臨川諸人之領袖。作爲山谷後學的一支重要力量，維繫時間久、參與人員多、開放性强，是臨川詩人羣體的特色。

（三）黄岡詩人羣體，包括二潘、二何。黄岡位於長江中游，處在中國的腹心，是從江西東下、北上的必經之地，也是遷客騷人時集的地域。元豐三年至七年（1079～1084），蘇軾貶黄州，潘、何父輩與東坡交遊，潘大臨兄弟、何頡兄弟亦獲陪杖履。紹聖四年至崇寧五年（1097～1106）間，張耒兩度貶謫、一次通判黄州，又與潘、何交遊。獨特的地理位置使黄岡詩人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潘大臨還入京問學於黄庭堅，何頡、何顒學詩於陳師道。他們是山谷詩法的傳人，受元祐文化的影響較深，又與其他地域的青年詩人過從緊密。饒節早年離開家鄉，即往黄岡依潘大臨。洪芻、洪炎、李彭等都曾寓居黄岡，與潘、何交遊。黄岡詩人羣體是元祐詩學和江西詩派諸地方詩人羣體間的聯繫紐帶。開放性和包容性，是其最大特徵。

---

① 謝逸《寬厚録序》，《溪堂集》卷七，《四庫全書》第 1122 册，第 520 頁。

（四）其他詩人羣體。除以上三大羣體外，《宗派圖》的構成中，還有幾個地域性詩人羣體。如開封詩人羣體，其一支由王直方、夏倪、李錞等人組成。他們同出身於官僚家庭，好在一起談詩論文，今輯本《王直方詩話》、《李希聲詩話》中尚保存了一些他們評詩的言論。另一支的主要成員爲晁、張兩家的青年詩人。晁、江有通家之好，晁説之、咏之、載之、冲之，江端禮、端友、端本皆爲有名的詩人，彼此交往唱酬。又如林敏功、林敏修兄弟同隱居蘄春，互爲補益；李彭居住的建昌（今江西永修）與祖可、善權二僧所在的星子（今江西星子）同在南康，往往唱和。如上地域詩人羣體，與前三處詩人羣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餘下的一些詩人，如韓駒、吕本中[①] 等，他們不屬於如上所説的鄉里詩人羣體，但在以後的經歷中與這些羣體有了密切的交往，吕本中更成爲整合這些詩人羣體的重要人物。大大小小的詩人羣體，是後來形成的江西宗派的主幹。

我們看到，江西諸派大多可首先劃分爲數個地域性的詩人小羣體，由數組志趣相投的詩人組成。這些詩人一般都生活在文化較發達的地區，出身當地望族，是在共同詩學興趣基礎上共同成長的伙伴。以上詩人羣體有相似性：其成員都受元祐文化的熏陶，政治上同情舊黨，詩歌以蘇、黄，尤其是黄庭堅爲榜樣，在本質上有溝通的基礎。一旦機緣成熟，這些基於鄉里過從的地域性詩人羣體，必將相互交融，呈現出新的氣象。

---

① 吕本中雖然是開封人，但他十四歲起，即隨侍父祖踏上貶謫之途，非開封詩人羣體成員。

二、同氣相求——宗派型大羣體的確立

黄庭堅的擇友標準，不在功名權勢，而在於“草木臭味”。江西諸派正是山谷的同調。同氣相求是同道詩人相互交流的内在訴求，但這種交流并非一蹴而就。《宗派圖》詩人大多數終身居鄉里，但其偶爾的流動，如應舉、遊歷，以及少部分人的仕宦等，都會給他們帶來溝通的機會。往往是兩個人的相識、相知，就會帶來兩個詩人羣體的整體溝通，從而出現越來越多的聞名思見面的情況。這樣詩人與詩人相識、羣體與羣體溝通，交叉往復，承遞發展，編織成一張交往的網絡，將同道中人緊緊聯繫在一起。它成型的樣式，就是江西宗派。

江西宗派的形成，有地緣的聯繫與詩學風氣激蕩交融兩條綫索。將上述詩人羣體作一個繫連，我們發現：南昌、臨川、建昌、星子、黄岡、蘄春六地，地緣十分接近。南昌、臨川同在江西，相距不過百餘里。建昌、星子在北宋末劃歸江南東路，但在歷史上它們與南昌同屬豫章地域，爲洪州的北鄰。黄州、蘄春在淮南西路，與江西隔江相望。此數地同居長江中游，舟楫相通，交通十分方便。早在元祐年間，數地詩人即有來往。元祐三年（1088）左右，洪芻仕黄爲知録，帶洪炎同往，帶來了南昌詩人與黄岡詩人的聲氣相通。四洪、徐俯、潘大臨、何頡、潘淳同賦洪炎倦殼軒，黄庭堅爲作《書倦殼軒詩後》，對九人予以高度評價。詩人羣體的初次融合，即昭示着年輕一輩詩人步入歷史舞臺，給詩壇帶來新的希望。約與此同時，謝逸兄弟訪道南昌，饒節亦往黄岡依潘大臨，臨川詩人與南昌詩人、黄岡詩人間開始有

了來往。洪朋《送謝無逸還臨川》詩云："昔我未知子，籍甚大江右。"（《送謝無逸還臨川》，《全宋詩》第 14440 頁）他們往往聞名思見面，也確實有機會相互往來。從謝逸《寄徐師川戲效其體》《贈權師》《舟中不寐奉懷齊安潘大臨蘄春林敏功》，謝薖《寄李商老》《寄洪鴻父》，洪芻《次韻謝無逸送謝幼槃》《次韻李商老見懷之什》，李彭《寄臨川諸舊兼悲二謝》《自豫章歸書齋題壁》《戲何人表》，徐俯《次可師韻》等詩來看，數地詩人間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其中，又以南昌——臨川——建昌——星子詩人爲核心，形成了"江西諸人"這一詩人羣體[①]。在他們中間，徐俯爲山谷生前所看重，詩學成就亦較爲卓著，"江西諸人皆從服焉"[②]，成爲諸人的領袖。

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詩學山谷畢竟不是江西或淮南士子的專利。故江西宗派的形成，更是超越地域限制的以時代詩學風尚爲紐帶的羣體整合。在這個整合的過程中，王直方和吕本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王直方爲人熱情、豪爽，他在汴京城南有一座著名的園子。元祐時期，蘇軾、黄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人乃此園的常客。紹聖之後，蘇、黄遠貶，園中的客人換爲與王直方年輩相當的青年詩人。如晁説之所言："客有遊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爲恨已。"[③] 王直方園接待過洪朋、洪芻、謝逸、謝薖、潘大臨、徐俯、李錞、楊符等來自各地的詩人，爲他們提供了溝通交流的平臺。"憶昔京城隅，王郎古遺直。當時會合地，爛漫存轍

① 關於"江西諸人"，參緒論第二節相關論述。
② 吕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③ 晁説之《王立之墓志銘》，《嵩山文集》卷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迹。”（饒節《豫章寶智上人持高子詩求和》，《全宋詩》第 14554 頁）紹聖、元符年間，青年詩人即是以王直方園爲據點，作詩論文，戲噱談笑，彼此相識與理解，慢慢地聲名相通。

吕本中是元祐宰相吕公著的曾孫，理學家吕希哲的孫子。他的詩歌早爲蘇轍所稱，在二十歲之前已頗有成就。崇寧元年（1102），吕希哲因元祐黨事貶官，吕本中隨祖父寓居符離。當時汪革爲宿州教授，饒節也寓居符離，他們二人拜入吕希哲門下，與吕本中兄弟等每旬以詩文會課，切磋道德與文藝。符離本陋邦，但因吕希哲祖孫寓居於此，遂爲天下士子所向。汪革、饒節在符離的交往，爲臨川詩人帶來了新的師友淵源。謝逸托汪革致書吕希哲祖孫，從此與吕本中保持書信來往；謝邁於乃兄處見吕本中詩甚多，大相敬服；汪革弟汪莘亦從吕氏交遊。符離——臨川詩人，形成一個新的交往網絡①。它使臨川詩人在鄉里過從外獲得一個新的交往維度，也使吕本中等江西詩人外的山谷後學與江西諸人有了密切聯繫。

與江西——淮南詩人的地緣性整合相比，符離——臨川詩人羣體的整合更體現了時代風會。元祐時期，詩學與理學不協，蘇軾與程頤互相鄙薄。黄庭堅作爲蘇軾門人，超然於蘇、程交惡之外，在内省化的個人修養上具有與理學相近的傾向。紹聖以後，二程理學與蘇、黄詩學同爲禁學，在民間師友淵源的傳授中融會溝通。吕本中與汪革、饒節等人在程頤高足吕希哲門下會集到了

---

① 後來雖然吕氏離開符離，但吕本中、汪革、饒節、二謝的符離交往帶來的友誼，一直緊緊地維繫，故即使在吕氏離開符離後，筆者還是用“符離——臨川”這兩個地名來説明吕氏祖孫與臨川詩人間的關係。

一起，砥礪節操，切磋詩藝，將文學與理學精神打通，反映了對元祐文化的兼收并蓄。如果説，江西諸人因得山谷親傳而傳承了山谷句法，符離——臨川詩人則更多地是在文化心理和詩學範式意義上對山谷的繼承。在理學修養和詩歌成就上，吕本中深得諸友贊賞。大觀三年，謝邁有《讀吕居仁詩》云："徐侯南州杰，論文極根柢。讀君詩卷終，曰此有餘地。期君高無上，二謝以平視。"（《全宋詩》第15764頁）予吕本中高度評價。政和元年，謝逸寄書與吕本中，推舉他爲海内文壇的盟主[①]。大觀、政和年間，吕本中已成爲山谷後學中另一支綫索：符離——臨川詩人羣體的領袖，與徐俯影響略同。作爲山谷後學的兩個分支，江西——淮南與符離——臨川詩人羣體并非各行其道。它們有重合的部分；又兩大羣體的詩人有同情元祐黨人，學習蘇、黄詩學，傳承二程理學的共同傾向，本質上有溝通的要求。崇寧初徐俯見吕本中詩，就大加贊賞。吕本中與李彭兄弟長期保持書信聯繫。他們又各自團結着王直方、李錞一系和江端本、晁冲之一系的開封詩人。在元祐黨禁的時代中，這兩條地下師友淵源的綫索，有團結更多的山谷後學、走向融合的需要。

從時間綫索來看，如萬涓成流，紹聖後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山谷後學的交往是平静而小心的。但在元符三年（1100）到崇寧二年（1103）間，隨着時局的變動，《宗派圖》詩人的活動一度掀起高潮。山谷從戎州貶所放歸，又被貶往宜州，隨着他東歸、北上、南下的行程，高荷、洪炎、李彭、洪芻、潘大臨、潘大

① 見吕本中《師友雜志》。

觀、何顒或來謁見，或與相會，或從交遊，徐俯、洪朋亦以書信參問，江西諸派緊緊團結在山谷周圍。陳師道於元符三年得秘書省正字，明年供職於汴京，饒節、王直方、洪芻等與他交往。建中靖國元年（1101），陳瓘出知泰州，徐俯、韓駒遊其門。崇寧元年，吕希哲落職居宿州，次年饒節、汪革拜入其門下，與吕本中交遊，符離——臨川詩人羣體開始形成。此數年間，政局一度予人以希望，旋即陷入苦寂的沉悶。然經這一番動蕩的山谷後學，却因爲這次洗禮，更堅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政治立場，團結在山谷周圍，以理學大師、元祐舊臣爲師，交天下士，有了更爲明確的師友淵源訴求。加之這個時候他們的詩歌也超越少作，開始走向成熟，超越地域限制，尋求更宏通氣局與更廣泛交流的努力，必將把他們推向歷史的前臺。

大觀時期，元祐黨禁稍弛，江西諸人交往頻繁。洪芻、李彭一度寓居臨川，與臨川詩人深入交往。大觀二、三年（1108、1109）後，江西諸人的活動中心北移，南昌成爲他們唱酬的熱土。與此同時，吕本中與徐俯、洪芻、李彭、潘大臨等人的聯繫更密切。他還在這兩年間結識洪炎、謝薖、江端本，并開始與王直方通信。大觀末、政和初，徐俯、洪芻、李彭等在南昌結社，吕本中寄詩入社，并以“東”字韻詩挑動諸友酬唱。（詳見下節論述）各地青年詩人“同作并和”，形成詩歌創作的熱潮。至此，江西——淮南與宿州——臨川山谷後學匯合，在大觀末、政和初，形成了一個以江西詩人爲主體，却又超越狹隘的地緣概念，詩宗山谷，更以元祐文化承傳多元性爲特色的全國性詩人羣體。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圖》，所列江西諸派二十五人，除高荷和他

人的關係不可考外，其他詩人正是江西——淮南和符離——臨川這兩條綫索發展、融合和交叉關係中的相關人物。同氣相求是其整合的動力，故江西宗派詩歌呈現出“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① 的整體特徵，體現出從思想內蘊到詩學範式上的共同風貌。

三、標志性唱和事件

江西宗派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關於此過程，許多材料已散佚，但仍有不少蛛絲馬迹可尋。尤其是幾個標志性的唱和事件，它們覆蓋了宗派詩人從集會、結社到書信往來幾種交往唱酬方式，體現了江西宗派初具雛形、發展壯大直至成型的經過，揭示了從山谷認可、元祐精神傳遞到宗派詩人情感認同這樣的羣體凝聚內核，較爲全面地反映了江西宗派的整體風貌。

（一）親得山谷印可——倦殼軒詩唱酬

前面我們已多次提到倦殼軒詩唱酬。在江西宗派形成過程中，它標志着洪州、黄州詩人羣體的融合，是一個重要的唱和事件。倦殼軒是洪炎的軒名，元祐四、五年（1090）左右，四洪、徐俯、潘大臨、二何、潘淳共賦此軒。倦殼軒詩多已失傳，祇留下洪朋與潘大臨的兩首。洪朋詩《玉父賦倦殼軒韻得殼字》：

今弟岩壑姿，問道困南朔。歸來敞蝸牛，真成倦龜殼。曲肱梧桐影，日夜洞庭樂。誰何藝根本，歲久栖鸑鷟。靜言

① 楊萬里《江西詩派詩序》，《誠齋集》卷七十九，《四部叢刊初編》本。

人間世，變化如風雹。笑語尊俎同，茲理要商榷。時不與人遊，安燕正當學。(《全宋詩》第14444頁)

看來洪炎曾寓居洞庭湖地區，歸來後名室云"倦殼軒"，賦詩，諸友同和作。潘大臨詩云：

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①。

此詩以東晋四謝比洪氏兄弟，時人以爲急口令。無論如何，"四洪"的名聲從此之後蒸蒸日上，與他們共賦倦殼軒的詩人也同時嶄露頭角。山谷爲作《書倦殼軒詩後》，對倦殼軒九人皆有品題，并説："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予猶能閲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絶塵萬里矣。"他還在書信中多次提到"七八少年"、"倦殼軒詩卷中人"：

觀斯舉詩句，多自得之，他日七八少年，皆當壓倒老夫。但須得忠信孝友，深根固蒂，則枝葉有光輝矣。(《答何斯舉書》，《黄庭堅全集》第1860頁)

凡倦殼軒詩卷中人，但能訥於言而敏於行，皆足以追配古人矣，今人不足驕也，不審甥與諸友嘗如此念之否？(《與徐師川書》，同前，第1869頁)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22頁。

可見，黄庭堅對“倦殼軒詩卷中人”寄予很高的期望。倦殼軒詩唱酬乃山谷後學以集體姿態進入歷史舞臺的標志。在衆多標志性事件中，它以親得山谷印可，揭示了山谷與江西諸派間的授受關係。九個倦殼軒詩人就有六個列入後來的《江西宗派圖》，“倦殼軒詩卷中人”，遂成爲江西宗派最早的雛形。

（二）集會——王直方園雅集

如前所述，宗派詩人本分屬幾個地域性詩人羣體。他們分散在各地，很難有機會會面，汴京王直方園却提供給他們集會的場地。開封本盤桓着幾個江西宗派詩人，每逢大比之年，各地舉子輻輳京師，同道中人往往在王直方園中集聚。《王直方詩話》中，就有洪朋、饒節、吴賀載酒來過，會飲題詩的記載。而真正稱得上標志性唱和事件的，還是崇寧二年（1103）的上巳日雅集：

> 癸未（正）［三］月三日①，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吴君裕、饒次守、楊信祖、吴迪吉見過，會飲於賦歸堂，亦可為一時之盛。潘（一）［十］作詩歷數其人云：“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吴十九成雅奏，饒三百煉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信祖真成德祖，立之無愧行中。吴生可兵南郡，老夫寧附石崇。閑雅已傾重客，説談仍得王戎。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餘風。客

① 此則《宋詩話輯佚》據《詩話總龜》前卷八輯録，《詩話總龜》各本或作正月三日，或作三月三日，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年校點本作“三月三日”（上册，第 88 頁）。按三月三日乃上巳節，士人聚會之日，而潘大臨詩中“老夫寧附石崇”、“山陰未掃餘風”，用的正是東晋名士上巳日蘭亭雅集的典故，故此處文本以“三月三日”爲優。

散日銜西壁，主人不道尊空。”徐師川輩皆言此詩殊不工，又六字無人曾如此作，想為五言亦可。遂去一字，句皆可讀，至“老夫附石崇”，坐客無不大笑[①]。

參加這次聚會的十個詩人，後被列入《宗派圖》的即有徐俯、謝逸、林敏功、潘大臨、饒節、楊符、王直方，共七人。如此大規模的詩人集會，應當有廣泛的唱和，雖然這裏衹録了潘大臨的一首詩歌。這是黨禁最嚴的時期，天子脚下的王直方園，竟聚集着如此多的蘇、黄後學，飲酒賦詩，確實可以稱得上“一時之盛”。上引潘大臨詩，看上去衹是他《倦殼軒詩》歷數諸人姓字思路的繼續。但從“東山行起謝公”、“老夫寧附石崇”這樣的句子，我們看到，這首表面上的戲作，事實上可能深有寄托。徐俯又以雅噱發衆人一笑。在布滿陰霾的時代，與會諸人因嬉笑怒罵顯得神情激昂。相會一笑，聊勝道路以目，這不僅可以一洗他們心底的積鬱，更可以憑相互的鼓勵，獲取堅持的力量。

（三）結社——豫章詩社

詩社是北宋時期出現的一種詩人集會方式，它有一定的組織、章程，有相應的發起人和組織者。前述洪州詩人羣體、臨川詩人羣體就具備這些特徵。王直方園聚會也被同仁們視爲結社[②]。在山谷後學組織的大大小小詩社中，最有影響力也最具典型意義的，是大觀、政和年間的“豫章詩社”。

---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33 頁。

② 饒節《豫章實智上人持高子詩求和》：“憶昔京城隅，王郎古遺直。當時會合地，爛漫存轍迹。緊君入社晚，感事一嗟惜。”《全宋詩》第 22 册，第 14554 頁。

崇寧末、大觀初，江西詩人頻繁交往。經數年熱烈唱酬，大觀二、三年間，他們的活動中心由臨川移到了南昌。是時前輩詩人已退出歷史舞臺，江西諸人也進入詩歌創作的成熟期，成爲新的詩壇領袖。徐俯、洪芻、李彭盤桓南昌。在他們周圍聚集着大批詩人，發起廣泛的唱和，是爲“豫章詩社”。現存洪芻《同師川商老追凉徐賢亭》《同蘇伯固遊東山寺》，李彭《奉同伯固駒甫師川聖功養直及阿虎尋春因賦問柳尋花到野亭分得野字》，汪藻《次韻洪駒父集東山》等詩，皆爲詩社唱和之作。據詩社成員張元幹、向子諲後來追憶：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駒父、弟（琰）［炎］玉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彥（璋）［章］、向子諲伯恭，為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攘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①。

大觀庚寅閏八月秋，鄉林老、顧子美、汪彥章、蒲庭鑒，時在諸公幕府間。從遊者洪駒父、徐師川、蘇（仰）［伯］固及李商老兄弟。是夕登臨，賦咏樂甚②。

上列“爲同社詩酒之樂”的豫章詩社中人，有“江西諸人”徐俯、洪芻、洪炎、李彭、李彤、潘淳，他們的舊交蘇堅、蘇

---

① ［宋］張元幹《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甲卷》，《蘆川歸來集》卷九，《四庫全書》第1136册，第660～661頁。

② ［宋］向子諲《水調歌頭》序，《酒邊詞》卷上，《四庫全書》第1487册，第527頁。

庠，江西的後進詩人汪藻、向子諲，以及時遊於南昌的青年後學張元幹等人。江西諸人爲豫章詩社的核心，而“江西諸人皆從服焉”的徐俯，自然也成爲詩社的領袖。汪藻、張元幹都曾向徐俯問作詩句法。豫章詩社的廣泛唱和一直維繫到政和初年，在禁錮詩賦的時代，這是難得的詩歌繁榮。它標志着以徐俯爲領袖的江西諸人超越鄉里過從階段，在更廣闊的視野中，以更開放的氣勢，進行了新的整合。南昌也因此成爲山谷後學的主要活動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張元幹記載的入社諸人名單中，吕本中亦具名其内。考居仁行踪，這段時期實未至江西，他與豫章詩社的關係，當是遥寄詩入社。

（四）書信往來——“東”字韻詩唱和

江西宗派是一個詩人羣體的實體，但這個實體又帶有一定的觀念性，是超越地域限制的同道詩人同氣相求的結果。所謂“蘭蓀無異縣，臭味同此舉”（李彭《次韻吕居仁見寄》，《全宋詩》第 15862 頁），不同地域間詩人的交流，除聞名思見面，偶爾有機會相識相聚外，書信交流是他們交往的主要方式：吕本中和謝逸、李彭，在會面之前保持了長期的書信交往；王直方與吕本中終身未嘗謀面，靠書信傳遞了詩文與情誼；更多的詩人雖已相知相識，因爲分隔異地，也往往需要鴻雁傳書。江西諸派以詩代簡的作品很多，而真正有效運用書信這種傳播方式，有意識地促成詩人間密切交往的，要數吕本中大觀年間挑起的“東”字韻詩唱和。第一首“東”字韻詩是寄給時已出家、法名如璧的饒節。詩云：

> 符離城裏相逢處，酒肉如山放手空。已見神通過鶖子，未應鮮健勝龐公。且尋扇子舊頭角，一任杏花能白紅。破箬笠前江萬里，無人曾識此家風。（《寄璧公道友》，同前，第18040頁）

如璧很快寄來了和詩：

> 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婆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磨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次韻答吕居仁》，同前，第14574頁）

原唱高挺，和作亦健拔。如璧的和詩用典活而有味，善用借代，富有理趣，語言筋骨勝肉，意蘊豐富，很好地反映了江西詩風。也許正是這首和詩的優秀激發了吕本中挑動諸友唱和的興趣，他再和、三和如璧詩，并先後作《用前韻寄商老》《又寄無逸信民》《奉答璧公兼簡諸友》《得李去言詩次韻答之》《督山伯蕭遠和詩并示舍弟》《用寄璧上人韻寄范元實、趙才仲，及從叔知止，兼率山伯同賦》等詩寄友，這些詩歌都當收到了和作。李彭并有同韻《寄如璧上人》、《次韻寄居仁二弟》、《次韻寄山伯蕭老二弟》，與諸友迭相唱和。在一次次挑戰、一次次應戰中，“東”字韻詩唱酬的聲勢益發壯大，幾乎成爲山谷後學的一次集體活動，以至一些未收到寄詩的詩人也積極參與。據《紫微詩話》記載，“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

對山公。'……然斯舉與余初不相識。"[1] 何顗顯然是從朋友處瞭解到吕本中和他發起的"東"字韻詩唱和，因志趣相投，故主動參與。謝薖偶見吕、李唱和詩，不肯落單，亦和作兩首來補上。其和詩以"渭水流清終異濁，池花變碧舊能紅"、"似聞諷諭能知白，豈但詩詞要比紅"（《余嘗會李商老於海昏識吕本中於符離今已五六年矣偶見二公唱和詩各次其韻一首》，同前，第 15804 頁）爲主題，表達了强烈的羣體認同感。"東"字韻詩唱和將同道之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此次活動至少有十五人參加。其中江西宗派六人（吕本中、饒節、李彭、謝逸、汪革、謝薖），無疑是唱和的主角。

上述豫章詩社，吕本中作爲成員，乃寄詩入社。"東"字韻詩唱和亦可視爲吕氏應社方式之一種。他在寄給李彭的詩中說："衹今江西二三子，可到元和六七公。"（《用前韻寄商老》，同前，第 18049 頁）對當時逐漸興旺的江西詩人唱酬，這次活動無疑更增添了一把火勢。它聯絡了豫章詩社及南北東西的同道者，標志着徐俯爲領袖的江西——淮南詩人羣體與吕本中爲代表的符離——臨川詩人羣體走向交融，使江西詩風不局限於江西地域。"東"字韻詩唱和，遂和豫章結社一起，作爲兩個重要的標志性事件，展示了江西宗派"同作并和"的盛況。

（五）元祐精神的傳遞——梅花詩唱和

上面四次唱和事件是江西宗派形成過程中四個較爲鮮明的點，將它們連接起來，可以粗略地勾勒出江西宗派的形成綫索。

---

① 《歷代詩話》上册，第 367 頁。

另有一些案例，集中呈現了江西宗派形成中精神與情感方面的內在凝聚力。梅花詩唱和就是這樣的一個主題。

梅花傲寒而開，它骨力遒勁、色澤清麗、臭味淡雅，對應着宋人追求風骨氣韻的審美理想。宋人賞梅、愛梅、咏梅有很長的歷史，但關於梅花的感受，每一個時期都有所不同。元祐時期梅花詩盛於京師，這與王直方與元祐諸公的交往有關。王直方園有蠟梅、多葉梅、紅梅、單白梅四種梅，每當梅花盛開的季節，他或邀請賞梅，或送梅，或贈梅花詩，挑動蘇軾及門下士唱和。蘇軾、張耒等人都曾咏王直方園梅，而以黄庭堅所吟佳而多。黄庭堅酷愛梅花，元祐初曾咏蠟梅，使蠟梅之名盛於京師。元祐三年（1088）三月，王直方父棫遣人送黄紅多葉梅數種，山谷作詩答之，又有《急雪寄王立之問梅花》《又寄王立之》《王立之承奉詩報梅花已落盡次韻答之》，與王直方就梅花詩唱和。有與王直方帖云：

昨日市中已見蠟梅開者數枝矣。

蠟梅風味想已能動人耳。

蠟梅佳句，併荷勤意。

花極香，恨日月逾邁耳。明日晁、張欲奉謁，晚當一到繞北園也。

《銷梅》二詩呈上，不知園中更當咏到何物也？（《與王立之承奉直方》，《黄庭堅全集》第1909～1912頁）

風流況味，可以想見。

元祐詩壇上縈繞着淡淡的梅花香味，這成爲王直方與蘇、黄諸公交往中值得珍惜的美好回憶。王直方很珍視他與蘇、黄的這段交往，他在紹聖元年弃官歸家，取《南史·謝晦傳》"宋武帝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的意思，名亭曰"頓有"，一時文人吟咏甚衆。蘇、黄二公獲罪遠謫，頓有之玉人不復回來，對他們的思慕與懷念，就寄托在頓有亭前。陳師道《酬王立之二首》（其一）曰：

頓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憔悴兩公客，獨倚東風遣信來。（《後山詩注補箋》第425～426頁）

爲"憔悴兩公客"遣信的"頓有亭前玉色梅"，在陳師道詩中，無疑是一種寄托着深厚情感的象徵之物。後來詩人來王直方園，往往與主人同賦梅花詩。晁冲之有《和王立之蠟梅二首》，又有《過王立之故居》云："此地與君凡幾醉，年年同賦蠟梅詩。"（《全宋詩》第13903頁）謝逸亦曾題梅花詩於王園。饒節有《賦王立之家四梅》，又有《爲謝無逸賦梅花二首》：

頓有亭前春耐寒，年年扶杖雪中看。不知謝子題詩處，比得王家第幾般。

聞道香寒卧雪枝，瓊樓玉户巧相依。可憐今日移根處，王謝堂前燕子飛。（《全宋詩》第14568頁）

王直方園的梅花詩，元祐時期主人與蘇、黄同賦，紹聖之後

又與江西諸派同賦，以至梅花本身都成爲與王園相連的回憶。晁冲之《感梅憶王立之》云："王子已仙去，梅花空自新。江山餘此物，海岱失斯人。"（同前，第13901頁）世道時局變異，王直方園梅花依舊年年盛開。梅花詩傳遞的，不僅是不受俗塵污染的清絶氣韻，亦是元祐諸公的風貌氣息，以及後人對他們的景仰與思念。

（六）孤高氣韻的共勉——貫時軒同賦

草木臭味是聯繫江西宗派的紐帶，而與宗派詩人共臭味的草木不止梅一種。似乎是爲了呼應汴京的梅花詩唱和，江西詩人組織了一次關於竹的吟咏，這就是貫時軒同賦。

約在元符末或崇寧初，臨川人陳公美作軒竹中，謝逸取《禮記·禮器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①]意，名之曰"貫時"，發動臨川及異地詩友賦詩。今存貫時軒詩尚有四首：

舊時王子猷，愛竹僅成癖。斯人向千載，論世心莫逆。吾軒謚竹友，寓意比三益。俗士舊雨來，今雨定掃迹。城北有陳侯，眉宇初未識。似聞臭味同，炯炯見胸臆。願言登子軒，哦句呼阿客。看君陰森下，玉潤映連璧。龍吟秋夜永，卧聽風槭槭，或當命柴車，獨咏此君側。興盡悠然返，誰能暖君席。（謝薖《貫時軒》，《全宋詩》第15781頁）

①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二三，《十三經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册，第1430頁。

西園拱羣木，嚴霜損天和。豈不惜嘉陰，柰此風雨何。青青繄此君，凡材不同科。君知不同科，何必葉與柯。試看一尺根，節已倍身多。故令卷籜中，高韻不可摩。陳侯定可人，厚禮為君羅。視此種竹心，知君減悲歌。吾徒涉世疏，投足得詆訶。何如雪月際，對君自婆娑。但無我履聲，與子相經過。（饒節《為謝無逸賦陳氏貫時軒》，同前，第 14545 頁）

古人憩息地，不種凡草木。數竿何必多，可以慰幽獨。忘憂玩芳草，怡顏眄庭柯。豈無艷陽節，搖落將如何。彼美軒中人，澹然對浮雲。此君有佳處，心期暗相親。蕭蕭四時色，目擊道逾妙。君看竹得風，夭然向人笑。（洪芻《寄題貫時軒詩》，同前，第 14475 頁）

春風著萬物，粉飾相明鮮。雪霜摧壓之，不情如世權。問誰不可犯，揖此蒼玉椽。斫頭未易屈，槍地猶傲然。相逢凋零中，秀色披晴烟。陳侯我輩人，逸氣傾羣賢。開軒冷相向，酬酢忘歲年。我來作風聽，夜雨雜山泉。携被願假宿，與子對床眠①。

從謝逸在臨川詩人和宗派諸友中的影響力來看，參加貫時軒賦詩的人應該不在少數。雖然今天大多數作品已不可見，從如上數詩作者，亦可窺見當時唱和規模：謝薖爲臨川本地詩人，饒節爲臨川詩人之在外地者，洪芻則代表了臨川詩人的異地詩友，他

① 惠洪《陳氏貫時軒》，《石門文字禪》卷一。

們三人正是江西宗派中人。至於惠洪，他與臨川詩人的交往當在大觀初，其《陳氏貫時軒》詩略晚於謝薖等作，可以算作貫時軒詩唱和的餘波。

中國詩歌舊有香草美人的傳統。黄庭堅《古風二首上子瞻》就是以江梅——桃李、青松——小草爲喻，用比興之法托物引類，塑造了蘇軾和自己的高潔形象。貫時軒唱和也是如此。青青翠竹之貫四時，歷寒冬而不凋，謝逸以“貫時”名軒，寄托可謂深矣。諸君又賦五言古詩贊成此意，借對竹的吟咏，贊美了不俗、有節、耐歲寒的品格，表達了同氣相求的交往訴求。這無疑是江西派詩人在艱難時節中對立身大節、詩歌品質的明確發言。孤高氣韻的共勉是這次唱和的主題，也貫穿了宗派詩人終身的創作。如果説，江西宗派體詩歌有“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的整體特徵的話，貫時軒唱和正是其濃縮、精練、典型的體現。

（七）情感的複奏——“滿城風雨近重陽”詩的多次補作

江西諸派是艱難時局中的同志者。在元祐黨禁的時代，他們擇善固執，甘願沉淪下寮，默默傳承着學術和道義，支持着他們的，是羣體的力量和“吾道行將伸”（謝逸《冬至日陳倅席上分賦一陽來復探得復字》，《全宋詩》第 14829 頁）的信念。無奈個體的生命往往無力與時間抗衡，江西宗派大部分詩人没有活到元祐黨禁解除之日。於是“傷逝”之作，就成爲江西宗派詩作中最難堪亦最動情的主題。

“滿城風雨近重陽”是潘大臨所作的一句詩。潘大臨曾寄此

句與謝逸，令補足全詩[1]，并道作詩緣起云："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閑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2] 秋來風雨催人詩興，惜爲催租人所敗，遂以僅得佳句請朋友代爲補足，這本是一樁韻事。當時謝逸補此詩否現不可考。然不數年間，潘大臨去世。在一個"滿城風雨近重陽"的日子，謝逸睹景生情，因詩懷人，寫下《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絶句》：

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黄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

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黄。

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同前，第 14854 頁）

重陽風雨本是詩情，如今化爲觸目的感傷，來襲人心。謝逸還有《重陽示萬同德》詩，連亡友王直方一齊懷念：

唤起無誉著帽遲，蕭疏霜鬢任風吹。病懷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自注：在京師重陽日，與王立之飲酒。

① 見謝逸《重陽示萬同德》自注，《全宋詩》第 22 册，第 14847－14848 頁。
② 惠洪《冷齋夜話》卷四，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0 頁。

又潘邠老嘗得一句，云滿城風雨近重陽，令予足之。今二公皆捐館，令人心折。）寧效騷人餐菊蕊，敢希朝士賜萸枝。白衣不至慚元亮，空對門生與二兒。（同前，第 14847－14848 頁）

這首詩又引起吕本中的感慨，他有《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托謝無逸綴成無逸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蓋爲此語也王子立之也作此詩未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無逸窮困江南未有定止感嘆之餘輒成二絶》[1] 詩云：

漫晉新句補殘章，寄與烏衣玉樹郎。他日無人識佳景，滿城風雨近重陽。

好詩政似佳風月，會賞能知已不凡。萬里潘王舊鄉縣，半江斜日落歸帆。（同前，第 18066 頁）

居仁此作，落寞低徊，與無逸情緒正相同。吕氏作此詩時謝逸還健在，而不久謝即亡故。在新的風雨重陽時節，又有謝接續此主題，寫下《潘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兹重陽祇數日風雨不止淒然增懷作二絶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也》：

---

① 詩題中説謝逸作“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是不正確的，實際上，謝詩作於王直方、潘大臨去世後，本即悼念之作。此當居仁誤記。

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泪一巾。

阿兄温潤玉介導，我友淡薄朱絲弦。衹疑蟬蜕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同前，第15790頁）

“滿城風雨近重陽”本爲佳句。秋風秋雨填滿着空間，牽引着時間，觸摸着人的身世之感，虚靈飄忽，漫無邊際。此蘊含淡淡惆悵的斷句，因詩人的去世給宗派諸友留下更爲複雜的感受，在他們的一次次回憶、一次次補作中，演爲“傷逝”主題的複奏。謝薖作此詩後不久亦亡故。在道義和强權的對抗中，個體生命的消失令人悵惋。但薪盡火傳，活過南渡後的江西宗派詩人，如吕本中、徐俯、韓駒等，成爲了傳遞斯文的核心人物，他們的成就離不開羣體的力量。患難中的真情是聯繫羣體的紐帶。從這個角度來説，在“滿城風雨近重陽”的多次補作中，回響着的，不僅是感傷的音符，也是激昂的旋律。

第四章
陳師道

從本章開始，考察江西諸派的生平事迹與詩學成就。在江西諸派中，陳師道是獨具身份的人物。他同時跨越元祐文學與江西詩派兩個文學時代，與派中其他詩人一樣師從黃庭堅，又同時被派中一些詩人所師從。比之禪門宗派，陳師道可視爲黃庭堅的上首弟子。因早卒，他與江西宗派其他詩人的交往有限，也不及見大觀、政和年間“同作并和”場面之盛，但在江西諸派中，他的詩歌成就最高，足以成爲其他詩人的榜樣。故吕本中圖之爲山谷以下第一人，方回更尊之爲“一祖三宗”之一宗。不僅在江西宗派，在宋代文學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中，陳師道都佔有崇高的地位。

第一節　生平：窘困生涯的承擔[①]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自號後山居士，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祖陳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歷官臺省，終三司鹽鐵副使。父陳琪，仕至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外祖龐籍爲仁宗朝宰相。陳師道生於皇祐五年（1053）。他自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爲進取計。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參知政事，以經義試策取士，罷詩賦明經諸科。陳師道是年十六歲，心非其説，遂絶意進取，以文謁曾鞏於江漢之間。曾鞏一見奇之，留受業。在曾鞏門下，陳師道讀《史記》有味，文字愈加簡潔，成長爲一位優秀的古文作者。

熙寧十年（1077），蘇軾守徐州，陳師道以當地士子的身份往謁[②]。元豐元年（1078），因治水有功，蘇軾建黄樓於徐州東門，八月樓成，九月，合大樂以落之，使蘇轍、秦觀作賦，陳師道作銘。陳師道後來預蘇門六君子之列，此即他參與蘇軾文人集團活動的開始。元豐四年（1081），曾鞏充史館修撰，主持五朝史的編修，薦陳師道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朝廷

---

① 本節内容，除特别標注外，據《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傳·陳師道傳》、魏衍《彭城先生集記》、任淵《後山詩注》《後山年譜》、冒廣生《後山詩注補箋》、陳兆鼎《陳後山年譜》。

② 《後山居士文集》卷十六《秦少游字序》：“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大字本，1984 年。

難之。明年曾鞏以憂去朝，此事不了了之。元豐六年，曾鞏卒，後山作《妾薄命》二首，表達了對恩師的懷念。

陳師道娶朝請郎郭槩女，因家貧，寄食妻子於岳父處。元豐七年（1084）五月，郭槩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帶女兒和三個外孫上路。"夫婦死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陳師道《別三子》，《後山詩注補箋》第 14～15 頁）江西宗派多狷者，而陳師道無疑是狷者之尤。他不願以學問與文筆換取功名，也就衹好忍受養不活妻子的尷尬與骨肉分離的痛苦。送走妻子後，陳師道客闕中，在潁昌（治今河南許昌）遇見赴德州途中的黄庭堅，二人一見如故。在此之前，陳師道作詩已過千首，氣質格調不凡，藝術表達上也頗有成就，至此盡焚其稿，傾心投入山谷門下。黄庭堅亦對陳師道深深贊賞，爲作《字序》云："噫來陳子，在汝後之人，則我不敢知。我觀萬世，未有困於母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旮晝，文章滿脰。士之號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爲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陳師道字説》，《黄庭堅全集》第 620 頁）體現了心心相印和惺惺相惜。這種相知與相惜伴隨着黄、陳以後的交往，每當提到陳師道，黄庭堅都不吝用最高的贊揚。

元祐元年（1086）初，陳師道客汴京，寓居陳州門。新黨人物章惇時任樞密使，托秦觀致意陳師道，欲薦之於朝，希望他前往謁見。陳師道作報書云："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①] 予以婉拒。時蘇軾、黄

① 陳師道《與少游書》，《後山居士文集》卷十。

庭堅、張耒、晁補之在汴京供職，他們纔是與後山意氣相投的師友。晁補之、張耒聯合舉薦陳師道爲太學學録，不就。元祐二年，蘇軾、傅堯俞、孫覺再次舉薦他，遂起爲亳州司户參軍，充徐州教授。這一年，陳師道作《丞相温公挽詞三首》，被山谷嘆爲不可及。何頡兄弟亦投詩前來受教。回到家鄉後，陳師道教授於州學，跟他學詩的私人門生也達到十餘人。進而論道，退而作詩，是後山這一時期的主要生活内容。

元祐四年（1089）五月，蘇軾因策題之謗不安於朝，自請外出，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道由南京（今河南商丘）。陳師道稟告徐守，希望去南京爲蘇軾送行，未得到允許，就托疾謁告，私自前往南京，與蘇軾同舟東下，信宿而歸。七月，陳師道本因梁燾請除太學博士，後因謁告送蘇軾事被劉安世彈劾，仍罷爲徐州教授。陳師道在《（代）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中，述説了自己往見蘇軾的理由：

> 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為兩途之後悔。又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惟其信之既篤，所以行之不疑①。

劉安世彈章有“徇情亂法”的指責，而陳師道謝啓，却申明自己的“行之不疑”。可見，不論窮通，師友淵源而非功名前程，内

① 《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二。

心法則而非朝廷法令，始終是理解陳師道思想與行爲的關鍵。

元祐五年，陳師道改官潁州（治今安徽阜陽）教授，其冬往赴。明年八月，蘇軾知潁州。對陳師道而言，此番與蘇軾相聚，“間以重江之阻，莫期再歲之逢。使一有於先顛，爲兩途之後悔”的擔心就化爲烏有，他與歐陽棐、歐陽辯、趙令畤等從蘇軾遊，留下《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次韻蘇公涉潁》等膾炙人口的詩作，得暢平生師友之歡娱。這段時期陳師道心情較爲舒暢，詩歌也受到蘇軾影響，恣肆橫放，詼諧有趣。這一段潁州唱和歷時雖短，却也是蘇門酬唱的重要組成部分，爲蘇軾外放、黄庭堅廢詩後略顯沉寂的元祐後期詩壇，增添了幾分生動的色彩。

元祐七年正月，蘇軾改知揚州，繼知潁州的是後山素來反感的韓川。官場交往不再有詩酒酬唱，繼之而來的是“早投林野違風雨，晚傍塵沙飽送迎”（《迎新將至澧城暮歸遇雨》，《後山詩注補箋》第126頁）的乏味生涯。後山將目光退回自己的內心，以《十五夜月》《雪》等詩爲標志，詩歌境界更趨老硬。

紹聖元年（1094），時局大變，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治今廣東惠州）安置。陳師道坐蘇軾餘黨，罷潁學，謫監海陵酒税。二年，授彭澤令，以母喪未行。歸徐州葬母之後，後山往曹州（治今山東菏澤）寄食於岳父郭槩。紹聖三年（1096），他到雍丘（今河南杞縣）爲外祖龐籍掃墓，路過陳留（今開封陳留鎮），投宿在黄庭堅曾羈居題詩的深明閣，睹物思人，寫下“窈窕深明閣，晴寒是去年”的深情詩句，表達了對遠在黔州的黄庭堅“飄渺金華伯，人間第一人”的欽佩和“暮年身萬里，賴有故人憐”（《宿深明閣二首》，同前，第203～204頁）的挂念。

後來他不怕牽連，多次寄書問候黄庭堅近況，執弟子禮益恭，正是表現了“暮年身萬里，賴有故人憐”的古道熱腸。

紹聖四年，郭槩卒，後山回到徐州，從此家居四年。元符二年（1100），他在《與魯直書》中説：“罷官六年，内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①] 可見貧窮之況。然在此期間，他仍閉門讀書，有魏衍、黄預等數弟子相從，“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爲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②]，表現了君子固窮的高尚節操。後山從早年起學佛，禁絶酒肉，持律甚嚴，這一願力到晚年尤甚，所謂：“暮年功力歸持律，不是騷人故獨醒。”（《雪後》，同前，第198頁）陳師道學佛偏於念佛、持律，和蘇、黄偏重學禪不同。佛教的皈依對他而言不止於哲學開悟，更在宗教信仰。彼岸的想象空間予此岸之人以心靈安頓，亦使此岸的現實生活虚化，陳師道就在這樣的修爲中閉門覓句，作詩尤多。他這一時期的詩歌，如《和黄預感秋》《和魏衍元夜同登黄樓》《和黄預病起》《雪後》《雪中寄魏衍》等，清雅幽獨，言簡意豐，達到瘦硬通神的境地。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七月，陳師道除棣州（治今山東惠民）教授，其冬往赴，未至間，十一月，召爲秘書省正字。秘書省正字，據陳師道自己説：“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③] 在當時新舊并用的政治局面下，徵召爲正字似乎是後山政治生涯的閃亮起點。他滿懷感激之情，寫下“扶老趨嚴召，

① 《後山居士文集》卷十。
② ［宋］魏衍《彭城陳先生集記》，《後山詩注補箋》卷首，第13頁。
③ 陳師道《謝正字啓》，《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三。

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除官》，同前，第422頁）的詩句，表達了鉛刀一割的心願。在汴京，他與王直方、饒節交往頻繁。黄庭堅時在江陵，鼓勵洪芻、王雲、歐陽元老等往見後山，并作《病起荆江即事》（其八）云：“正字不知温飽未?”（《黄庭堅全集》第227頁）表達了對陳師道的掛念。黄庭堅的擔心并非多慮。建中靖國元年（1101）冬，陳師道扈從南郊，没有足够的冬衣，又因憎惡連襟趙挺之的爲人，拒絶穿妻子從趙家借來的衣服，感寒疾，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去世，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以斂，王直方割地十畝以周其孤，黄庭堅聞之，痛恨嘆息。當時政治風向已變，如方回所説：“更二十年不死，何限好詩垂世，亦恐無處着身耳。”[①]

後山遺著由門人魏衍編爲二十卷。其中詩六卷，四百五十六篇，文十四卷，一百四十篇，在宋代諸傳本中最善，已佚。今存宋蜀刻本《後山居士文集》二十卷，藏國家圖書館，以魏本爲基礎，又有所增益。另外，任淵據魏衍本作《後山詩注》六卷，紹興間與《山谷黄先生大全詩注》合刻於蜀中，有宋蜀刻殘本、黄丕烈所得殘本、日本内閣文庫藏本傳世。除詩文外，陳師道還有《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四庫全書》以明弘治《後山先生集》爲底本收録[②]。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251頁。
②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二《後山居士集》、卷十三《後山詩注》，中華書局，1999年。

第二節　詩歌淵源及特色

陳師道爲宋詩大家。其詩歌體現了江西宗派體詩歌的成就，同時又具有强烈的個人風格。對陳詩的理解與評價，應當放入詩學歷史的經緯中，溯其根源，查其新變，方能得其真實。於是，陳師道詩學淵源的師黄、學杜兩條綫索，苦吟而達到的文字境界，就成爲我們把握其詩學風格的入手點。

一、師黄與學杜

（一）師黄：地位不遠，故能師之

劉克莊評價後山之學云："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① 文章之學且不論，對詩歌之學，我們需要瞭解：陳師道自己的詩歌本來寫得很好，他爲什麼甘心學山谷？與黄庭堅相比，蘇軾的詩名更大，陳師道對他也極爲崇拜，爲什麼不以蘇軾爲師？他對黄庭堅詩歌的學習主要在哪些方面？由於本文是江西"宗——派"研究，這些問題也具有典型意義，值得好好回答。

陳師道於元豐七年（1084）與山谷相見，在此之前，他已創作了近千首詩歌，且卓有成就。但他一見山谷就拜之門下，贈詩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陳後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曰：

> 相逢不用早，論交宜晚歲。平生易諸公，斯人真可畏。見之三伏中，凜凜有寒意。名下今有人，胸中本無事。神物護詩書，星斗見光氣。惜無千人力，負此萬乘器。生前一樽酒，撥弃獨何易。我亦奉齋戒，妻子以為累。君如雙井茶，衆口願其嘗。顧我如麥飯，猶足填饑腸。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何以報嘉惠，江湖永相望。(《贈魯直》，《後山詩注補箋》第 485～486 頁)

如果說，元豐元年，黄庭堅以《古風二首上子瞻》贈蘇軾，成爲元祐文學的起點的話，陳師道此詩的投贈亦可視爲江西詩派的起點。晚歲論交，非少年學子對前輩的單純崇拜，而是參遍諸方後的擇善而從。從這首詩看，後山對山谷的詩歌與人品極爲景仰。以道德爲本源、疏離政治的思想取向，自持心性、佼佼不羣的精神氣質，弃絶聲色、尋覓淡泊的趣味，是黄、陳相知的基礎；而高韻絶俗、句中有眼的山谷體詩歌，更令陳師道佩服、讚嘆。後來在《答秦觀書》中，陳師道對自己拜師的情况作了詳細介紹：

> 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争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

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常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疏，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授）［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邪？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①。

陳師道認爲，黃庭堅詩歌的成就，在於學杜甫而有自己的進境。黃庭堅以杜詩爲主要參習對象，爲他的"候蟲之聲"找到了"以意勝"的表達方式，形成了格韻高絶、句法精嚴的山谷體詩歌，這種獨特的詩學建樹，非同氣味者不能體會。這種成就正是陳師道努力的方向，故他一見不疑，"盡焚其稿而學焉"，甘心拜入門下。劉克莊説："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法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着，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人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②頗有見地。正是因爲陳師道地位去山谷不遠，能領會山谷詩歌的好處，纔會虚心師法。他對山谷詩法的理解，穿透表層而深入其精髓，對山谷體詩歌的學習，最終轉化爲自身創造的動力。方回

① 《後山居士文集》卷十。
② 《江西詩派·陳後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説，後山“未嘗學山谷詩，字字句句同調也。意有所悟，落花就實而已”①，誠不易之語。

那爲什麽陳師道不選擇蘇軾作爲自己的導師呢？這可以從文化人格和詩學範式兩個方面進行解釋。陳師道對蘇軾極爲傾慕，但并不完全贊同他感激論天下事的態度，曾規勸蘇軾：“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欲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② 這與黄庭堅“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之學道，深探根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與王子飛》，《黄庭堅全集》第1376頁）處世態度的提倡，如出一轍。當道德修養不能轉爲當世之志，則趨於内省化，這是山谷、後山共同的修爲。葛立方説：“魯直酷愛陳無己詩，而東坡亦不深許。”③ 與蘇軾相比，黄、陳二人更是一對有深切同情、同感、同志之氣的知己。道德自律的文化選擇，是陳師道選取黄庭堅而非蘇軾作爲導師的本質原因。

在詩學範式上，陳師道也傾向於對黄庭堅的詩學觀表示贊同。試看下一則詩論：

> 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仁）［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

---

① 方回《讀後山詩話跋》，《桐江集》卷五，《宛委别藏》本。
② 陳師道《上蘇公書》，《後山居士文集》卷十。
③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歷代詩話》下册，第496頁。

> 德成於心，而後才為用；才足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①。

詩歌的情感，不怨近乎麻木不仁，怨則有身家之憂，所以應該在怨與不怨間把握一個適當的度，而這個度的把握，要靠人的品德修養來控制。這與山谷基於治心養氣功夫的“不怨之怨”提法類似。陳師道還贊同黄庭堅對詩歌藝術的孜孜探索，稱他爲“句中有眼黄別駕，洗滌煩熱生清凉”（《答魏衍黄預勉予作詩》，《後山詩注補箋》第218頁）；對蘇軾詩歌，則提出這樣的批評：

>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②。

陳師道對蘇詩“怨刺”、“失之粗”、“得之易”的批評，正體現了在道德根基和文學本位方面對山谷詩學觀的認同。可見，在元祐詩學“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③的兩種典範中，陳師道選擇了後者。他在《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詩中，對這種選擇有明確説明：

> 公詩端王道，亭亭如紫雲。落手不敢學，謂是詩中君。獨有黄太史，抱杓挹其尊。韻出百家上，誦之心已醺。黄鍾

---

① 陳師道《顔長道詩序》，《後山居士文集》卷十六。
② 陳師道《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06頁。
③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詩話前集》卷一百七十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毀少合，大裘擯不文。世事如病耳，蟻門作牛聞。苦懷太史惠，養豹烟雨昏。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同前，第 478 頁）

這首詩推尊蘇軾爲“詩中君”，但又表明自己“落手不敢學”，而醉心黄庭堅的詩歌。蘇詩的天才放浪，不可規模形容是原因之一，而黄庭堅的格韻高絶，令自己深深傾倒，則是更爲主要的原因。在這首詩中，他還將黄詩的高妙與以許渾爲代表的晚唐詩之淺俗作對比，這反映了江西詩派產生時期詩壇的現狀。終北宋南宋，晚唐體去而復來，始終作爲江西詩派的對立面而存在。品格的高低、雅俗，始終是江西詩派與晚唐體抗衡的主題詞。宋末元初方回論詩，“以格高爲第一”，反對晚唐體詩歌，推“魯直、無己上配淵明、子美”爲“格之尤高者”[①]。格調之高，是黄庭堅、陳師道詩顯著鮮明的特色，是二人惺惺相惜之所在，亦是師弟子間，拈花微笑中所授受的無形氣息。

值得指出的是，後山是山谷所謂“高師一着”的人物。他能指出黄詩“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②] 的缺點，對山谷并不盲從。於是，“未見豫章，其詩一時，既見豫章，其詩百世”[③]。在元祐文學的整體性中，陳師道得風氣之先，首先看到黄庭堅詩歌的價值并拜入門下，成爲江西宗派的第一個派家，更

① 見方回《唐長孺藝圃圃小集序》，《桐江續集》卷三十三，《四庫全書》第 1193 册，第 682 頁。

② 《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06 頁。

③ 方回《唐師善月心詩集序》，《桐江續集》卷三十二，《四庫全書》第 1193 册，第 657 頁。

在自身氣質血性的基礎上，學黄而黄、陳并稱，自成一家，開闢了屬於自己的詩歌天地。

（二）學杜：有孔竅始得

後山師黄，而黄庭堅學杜。學杜是山谷家法的重要内容，陳師道進一步提出了系統的杜詩學理論，并在詩歌創作上體現了學杜的成就。江西諸派中，黄庭堅獨許後山得杜詩句法。後山之學杜，與他的師黄一樣，是江西諸派中具典型性的現象，值得專門論述。

後山提出學杜，首先是看見杜詩集大成的成就。他説：

>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①。
>
>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黄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②。

杜甫身經開元、天寶盛世和安史之亂，親歷封建社會的由盛及衰，在複雜動蕩的時代背景中，以誠摯的詩心與宏富的詩才，創造性地繼承了前代的成就，開拓出闊大的詩歌天地，展現了深刻

① 《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06頁。
② 同上，第315頁。

的歷史圖景。杜詩地負海涵，衆體兼備，風格多樣，表現手法豐富，爲後人開無數法門。從中晚唐以至北宋，杜詩的好處一步步被人們發現。秦觀就總結出杜詩“集大成”的特色①。後山此論，對杜詩之“無不有”及“莫不好”的體會，反映了時代的共識。

認識到杜詩的集大成，并不意味着能學習其成就。作爲一座寶藏，它可以熔鑄，也可以偷竊；可以取其字句，襲其手法，也可以用其體制。錢鍾書先生說：“自唐以來，欽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學習的恐怕以黄庭堅爲最早。”② 如果說，在杜詩學史上，黄庭堅的貢獻是最早倡言以杜爲師的話，陳師道則進一步提出系統的學習方法。他說：“有人問：‘老杜詩如何是巧處?’但答之：‘直須有孔竅始得。’”③ 得到黄庭堅稱許。至於何爲學杜孔竅，《珊瑚鉤詩話》保留有一段記録：

> 陳無己先生語余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内，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鷄行》，言鷄蟲得失，不如兩

① 見秦觀《韓愈論》：“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淮海集》卷二十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錢鍾書《宋詩選注·黄庭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96頁。
③ 見黄庭堅《答秦少章帖》，《黄庭堅全集》第3册，第1866頁。

忘而寓於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蕊上蜂鬚’，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煉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①

在陳師道看來，學習杜詩，要超越“規規然髣像之”的表面工夫，而“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在這裏，“格”指詩歌的體制格度，“意”指意蘊内涵，“字”指詩歌用字。“立格、命意、用字”，包括詩歌内容、形式幾個主要方面的内容。學者當從這幾方面入手，學習杜詩“妙”、“深”、“精”的好處，而不是簡單的模擬。如上認識建立在後山自己詩學實踐的基礎上，是杜詩學史上第一個全面、深刻的學習綱領，這標志着宋人對杜詩參習的深入。

陳師道稱贊山谷“學杜而不爲”，這也是他自己學杜的方向。他的五言律詩，紀昀評曰：“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者。”② 所謂“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論述十分深刻。後山學杜，而詩歌多冷淡幽獨，這是他基於自身性情的詩學進境，非老杜所能規範。但在古今詩人中間，後山詩歌却有難得的全首似杜者，如《寄外舅郭大夫》《晁無咎張文潛見過》《寄無斁》《病起》等。這是因爲，後山感情誠摯似

① ［宋］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卷二，《歷代詩話》上册，第464頁。
② 紀昀《後山集鈔題記》，《後山集鈔》卷首，《鏡烟堂十種》之一。

杜。無論是對親情、友情表達的淋漓盡致，還是自我認識的深刻，敢道人所不能道語方面，其詩都遠邁他人，直逼杜甫。親情詩的誠摯人所共見，玆不論述，且論敢道人所不能道語方面，以下詩爲例：

應俗敢辭疾，衝風寧小驅。聊為一日役，不憚百金軀。雪路無行迹，冰枝有落烏。寒門閉蕭瑟，窮里聽嚱吁。(《晚出》，《後山詩注補箋》第134～135頁)

這首詩，似一幅運筆草草的速寫。畫中人在蕭瑟、寒冷的冬夜，爲應一日之役而衝風小驅。對自重百金軀的詩人來説，應役乃百無聊賴之事；而以此不堪之事入詩，詩人真實的感受亦隨詩境生出。就像在這首詩的末尾，空空的巷道中，奔走於塵沙之人遭逢“寒門閉蕭瑟，窮里聽嚱吁”的瑣碎情事，觸發一種悠長、孤寂的情懷，這樣的情景無所依傍，千載猶新。因感情的真實不僞飾，使詩歌具有遇物而奇的氣勢和觸摸人的力量，前此衹有陶潛、杜甫達到這個境界。陳師道在詩中表達的感情絶不虛飾。如寫孩子遠別歸來，言“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示三子》，同前，第54頁），劉辰翁説此句“以爲精透亦可，以爲鄙褻亦可”[1]，摹寫情狀深刻到骨；赴棣州教授任，在寒夜中感嘆：“留滯常思動，艱虞却悔來”（《寒夜》，同前，第415頁），寫出了士

① ［宋］劉辰翁《陳生詩序》，《須溪集》卷六，《四庫全書》第1186册，第542頁。

大夫之常態；在《宿合清口》中，他又自陳“卧家還就道，自計豈蒼生”（同前，第410頁），紀昀以爲“虚憍者必不肯道”①。真實賦予陳師道詩歌以醇厚之感。他標舉“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② 的詩學境界，詩歌字錘句煉，却又韻味流轉。真摯的情感内涵，賦予後山詩蒼勁的骨力，豐滿的意態，這就是他學杜的成就。

二、苦吟詩人的文字境界

陳師道是一個苦吟詩人。苦吟詩人往往爲詩話、筆記留下談資。宋、元文獻中，就流傳着一個關於陳師道“吟榻”的故事：

> 陳正字無己，世家彭城，後生從其遊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閑則與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歸，竟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瞿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間，坐卧哦咏，有竄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弃去之。故平生所為至多，而見於集中者纔數百篇③。

> 世言陳無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④。

---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551頁。

② 《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11頁。

③ ［宋］徐度《卻掃篇》卷中，《四庫全書》第863册，第770頁。

④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經籍六十四》引葉夢得語，中華書局，1986年，下册，第1885頁。

陳師道作詩，卧榻蒙被，連嬰兒稚子都要寄放到鄰家，不容一絲的打攪，苦心經營幾乎到了極端的地步。黄庭堅將這種創作狀態和秦觀的“對客揮毫”對舉，稱之爲“閉門覓句”[①]。正如《文心雕龍·神思》“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之而致績，難易雖殊，并資博練”[②]的比較，黄庭堅對“閉門覓句”并無貶義，在才思飛動和慘淡經營兩種創作狀態中，他毋寧説更欣賞後者。他的《贈陳師道》詩，可以看作是對陳師道“閉門覓句”的闡釋：

> 陳侯學詩如學道，又似秋蟲噫寒草。日晏腸鳴不俛眉，得意古人便忘老。君不見向來河伯負兩河，觀海乃知身一蠡。旅床争席方歸去，秋水黏天不自多。春風吹園動花鳥，霜月入户寒皎皎。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貧無置錐人所憐，窮到無錐不屬天。呻吟成聲可管弦，能與不能安足言！(《黄庭堅全集》第1039頁)

原來，陳師道的苦吟，有詩歌創作態度、表達方式上的多層内涵。首先，在創作態度上，“陳侯學詩如學道”，對文字抱有崇高的敬意，不敢輕易出之，是陳師道苦吟的根本原因。陳師道自己説：“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换。縹緲鴻鵠上，衆目焉能玩。”

① 黄庭堅《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其八：“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黄庭堅全集》第1册，第227頁。

②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下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94頁。

（《次韻答秦少章》，《後山詩注補箋》第467～469頁）他所説的“學詩如學仙”，指借體悟前人詩作達到對藝術手法的掌握，也指通過努力，在内質上脱去凡俗的境界。在後面這個意義上，“學詩如學仙”就是黄庭堅標舉的“學詩如學道”。對黄、陳而言，詩歌不僅是藝術的表達，更是心靈提升、净化的途徑，是本於詩人精神追求的合真合善合美之“道”的呈現。這是一種詩道的提倡。它建立在文學本體的基礎上，又以文字深契人的生存感悟，以憂患人生爲詩性努力的指向，同時提高文學與人生的品格，賦予文學本體以生存論的意義。在上引詩歌中，黄庭堅描繪出陳師道“日晏腸鳴不俯眉，得意古人便忘老”的精神意態，“旅床争席方歸去，秋水黏天不自多”的詩學境界，就是“詩道”在後山人品與詩格上的體現。在另一首詩中，黄庭堅贊陳師道“陳侯大雅姿，四壁不治第。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薄飯不能羹，牆陰老春薺。惟有文字性，萬古抱根柢”（《次韻秦觀過陳無己書院觀鄙句之作》，《黄庭堅全集》第29頁），直指出其在“惟有文字性，萬古抱根柢”態度中人品與詩格的同構。山谷本人悟得“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贈高子勉四首》其四，同前，第201頁）的境界。句中之眼與意之無弦、詩藝與詩道、文字與精神間的幽微折轉，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學詩如學道”的態度是山谷詩學之命脉，亦是後山苦吟之所以然。於是，“對客揮毫”和“閉門覓句”的效果，就如陳與義所説“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内丹”①，羅大經所説“然少游特流連

① 見［宋］方勺《泊宅編》卷九，中華書局，1983年，第52頁。

光景之詞，而無己意高詞古，直欲追踪雅正，正自不可同年語也"[①]，功力與境界迥異。從"學詩如學道"的態度出發，得到"意高詞古，直欲追踪雅正"、"如養成内丹"的成果，陳師道的苦吟，正如葛立方所評"此豈尋常琱章繪句者之可擬哉"[②]，真可謂"萬古抱根柢"者。

其次，"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與"學詩如學道"的創作態度相對應，詩歌的表達曲折幽深，不可出之輕易，故難免苦吟。上引詩句又被視爲黄庭堅的夫子自道，是江西詩派重要的詩學綱領。正如黄庭堅自己體會到的，詩歌的深度反映了思想的深度，而思想的深度要表現爲詩歌的深度，非"命意曲折"——有表達的深度不可；這種表達，無疑又需要推敲琢磨。"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鬚"本詩人常態，而所謂苦吟詩人，更以高深而非闊大境界爲尚，苦心孤詣，慘淡經營。後山作詩"又似秋蟲噫寒草"，乃山谷所謂"候蟲之聲"。他從"徜徉林下"之有所思、"愀然而歸"之有所感，經"引被自覆，呻吟久之"之慘淡經營，到"瞿然而興，取筆疾書"的一氣呵成，更益之"揭之壁間，坐卧哦咏"的修改訂正，至"有終不如意者，則弃去之"的慎於取捨，這種暗中摸索、欲言還休的甘苦，確實是罕逢知音。陳師道苦吟的結果，是他的表達獨具特色，形成了一家句法，這將在下一節專門論述。此外，他還開闢了"極瘦有骨，盡

①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六，中華書局，1983年，第100頁。
②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歷代詩話》下册，第495頁。

力無痕，細看之句中有眼"[①] 的獨特詩學境界。兹舉其《元日》詩爲例：

老境難為節，寒梢未得春。一官兼利害，百慮孰疏親。積雪無歸路，扶行有醉人。望鄉仍受歲，回首望松筠。(《後山詩注補箋》第 152 頁)

這首詩作於元祐九年（是年四月改元爲紹聖），詩人時在潁州學任上，過着迎來送往的違心生活，感受到“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氛圍。元日的到來，這個年年帶來欣喜和希望的日子，却觸動他當前的無限感慨。於是，在這首詩中，詩人的心境與已至的佳節之間，應到的春天和蕭瑟的枝梢之間，出現了“難爲”與“未得”：一種難堪、複雜、傷心的斷裂。究其原因，個體在生存境遇中是不自由的，他衹能在“一官”之“利害”與“百慮”之“疏親”中承受、消解與體會。積雪阻礙了視野中的歸路，惟有酒醉之人相扶而行。這是元日之景象，亦是詩人心中的意象啊！眼望家鄉，惟有心靈的朝向不被阻隔——在這辭舊迎新之日，也衹能回望先人丘墓而已。這首詩中，出現了“寒梢”、“積雪”這兩個常見詩歌意象，後山不對這兩種意象展開描摹，而是用“未得春”、“無歸路”，阻礙讀者習慣的閱讀期待，指引出詩人欲説還休的意之曲折。詩歌不着色相，在對照、對比、對

① 方回語，見《瀛奎律髓彙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上册，第 351 頁。

面寫法中騰挪跌宕，用力深刻，境界却渾成。難怪方回評價："讀後山詩，若以色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全是骨，全是味，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也。"① 這就是"閉門覓句"的詩歌。閉門覓句，不僅是後山詩歌的創作狀態，亦是對其生存境遇的寫照。阻隔了外界的空間，并不意味着剩下的空間一定很狹小。詩文領域與世俗空間本來就不是重合的。人生的固窮，是後山擇善固執後逃不脱的命運，但他以求仁得仁的勇氣和皈依净土的願力，超越了對人生苦難的斤斤計較，跳出愁苦不釋的境地，開拓出絶去色香聲味、瘦硬獨立的詩境。他的閉門覓句，非元好問批評的"可憐無補費精神"，亦與唐代苦吟詩人李賀、賈島、孟郊等的嗟困傷貧異趣，而是如敖陶孫所評"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②，於幽獨之外，散發着恬淡、冲和的神采。窮困乃詩人通病，而在窮困之中，傲世獨立，遁世而不悶，有所恃也有所守，則是詩人陳後山的獨特氣質，亦是其詩歌魅力之所在。

第三節　後山句法

方回説："後山詩句句有關鎖，字有眼，意有脉，當細觀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六，同上，中册，第577頁。

② ［宋］敖陶孫《臞翁詩評》，［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19頁。

之。"① 陳師道詩歌精於鍛造，他在章法與句式上的造詣，筆者稱之爲"後山句法"者，自成一家，是後山體詩歌的主要特色。

一、章法——縮地法

陳師道對晁冲之説過這樣一番話："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② 這是他創作中的甘苦之言。作爲詩文兼長的作家，陳師道本人作詩就具有史遷神采，在章法和句法上獨具特色。

陳師道挽詞多名作。作爲對逝者的蓋棺定論，挽詞可視爲廣義的史之一種。在這類作品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後山詩歌的史傳筆法。兹以《丞相温公挽詞三首》第一首爲例：

> 恭默思良弼，詩書正百工。事多違謝傅，天遽奪楊公。一代風流盡，三師禮數崇。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後山詩注補箋》第 37～38 頁)

此詩首聯以帝王之良弼、百僚之表率評價司馬光，贊賞他爲相的稱職。頷聯用前代賢相謝安、楊綰的事迹比擬司馬光的辛勤職事、勞累至死。頸聯叙述司馬光死後朝廷予他的哀榮。最後，以天下有公議立論，肯定了司馬光千古的英名。我們看到，這首挽詞，從不易之道理與天下之公論入手，獨提精要之語，大開大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下册，第 1596 頁。
②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03 頁。

闔，却又經緯綿密，在短短四十個字中間，儼然包含着史傳與史論，叙事穩重典雅，用字精確有力，幾乎一字不可易。

非獨挽詞，陳師道詩歌以立論嚴謹、語言精煉爲總體特徵，以得之於古文修養的意度、步驟遣詞，章法上有咫尺萬里的氣勢。後山詩歌，尤其是古詩，往往用寥寥數語先陳立篇大意，兹舉下例：

夫婦死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别三子》，同前，第 13 頁）

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送秦覯二首》其一，同前，第 71 頁）

師法時難得，親年富有餘。端為李君御，盡得鄴侯書。（《送秦覯二首》其二，同前，第 72 頁）

五士三不同，煩公以詩訴。强酒古所辭，妙語神其吐。（《次韻蘇公勸酒與詩》，同前，第 116 頁）

行者悲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著錐地，何賴汗牛書。（《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同前，第 119 頁）

人情校往復，屢勉終不近。新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寄答王直方》，同前，第 138 頁）

平生經世策，寄食不資身。孰使文章著，能辭轍迹頻。（《寄答李方叔》，同前，第 149 頁）

聞名欣識面，異好有同功。我亦慚吾子，人誰恕此公。（《送吴先生謁惠州蘇副使》，同前，第 167～168 頁）

去年米賤家賜粟，百萬官倉不餘掬。青錢隨賜費追呼，

昔日剜創今補肉。(《嗚呼行》，同前，第55頁)

饋糧千里古無策，木牛流馬功不極。邊頭數米换黄金，將軍汗馬未伏櫪。(《送杜侍御純陝西轉運》，同前，第59頁)

如上詩歌開端，短短四句，承遞、轉折有力，如一篇篇言簡意賅的史論，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這種開端法，元人劉壎評曰："凡此語皆語短而意長，若他人必費盡多少言語摹寫，此獨簡潔峻峭，而悠然深味，不見其際，正得費長房縮地之法。雖尋丈之間，固自有萬里山河之勢也。"[①] 其實，不僅詩歌開端，後山詩歌的整體章法都可以用縮地法來比喻：步驟謹嚴，結構精密，却又騰挪跌擲，盡其委曲。試看他的《送蘇公知杭州》：

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遠。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為馬口銜，今為禁門鍵。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同前，第68頁)

這首詩的開頭，以郭奕送羊祜出界被免官、巴西放掉小鹿被驅逐兩個典故，説明了越境出送蘇軾的理由：非有意蔑視法度，而是平生師友情誼，不送有所不忍的緣故。言情、叙事、辨理，四句已盡。下面的叙述亦極簡略：對東坡的深深景仰使自己不惜越境送行；但受所任官職的束縛，自已的行爲又不得不有所顧

① [元]劉壎《隱居通議》卷八《後山》，《四庫全書》第866册，第91頁。

忌。兩個矛盾事理的對舉揭示出詩人複雜的心情。至此詩人又筆鋒一轉，言送別的風帆、追隨的目光。五月的雨也好，漲滿的江也好，都印同着詩人此時的離情別緒。轉眼間人去江空，惟留下深深的惆悵。此詩章法峻嚴，情感却舒展，正見後山縮地法之妙。

二、句式——造句法

與黄庭堅一樣，後山詩歌也有“以意勝”的特點，反映在句式上，爲善琢意句。意句以詩人之意爲主導，打破傳統詩歌的章法節奏，有所提挈與統領，在陳師道詩歌中，就反映爲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和以文爲詩的句式創造。這三種手法非陳師道首倡，我們可以分别爲它們找出杜詩、黄詩和韓詩的典範，但對這三種手法綜合、廣泛、有意識、富創造性的應用，無疑又以陳師道爲集大成者。

(一) 以俗為雅：用諺語句法造警句

在陳師道詩中，往往能看到俗諺的引用，如：

青錢隨賜費追呼，昔日剜瘡今補肉。(《嗚呼行》，《後山詩注補箋》第 55 頁)

不應遠水救近渴，空倉四壁雀不鳴。(《嗚呼行》，同前，第 56 頁)

巧手莫為無麵餅，誰能留渴須遠井。(《送杜侍御純陝西轉運》，同前，第 60 頁)

堂下觳觫牛何罪，太山之陽人作膾。同生異趣有如此，

> 缾懸甕間終一碎。(《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其三，同前，第109頁)
>
> 老裏何堪病再來，愁邊不復酒相開。一生也作千年調，兩脚猶須萬里回。(《卧疾絶句》，同前，第145頁)

上引“昔日剜瘡今補肉”、“遠水救近渴”、“巧手莫爲無麵餅”、“留渴須遠井”、“缾懸甕間終一碎”、“一生也作千年調”，皆唐宋以來的諺語。諺語，即口頭流傳的言語，它是古老智慧的結晶，一般用生活中常見現象作比喻，説明樸素而深刻的道理。直到今天，上述部分諺語還流傳在我們的生活中，足見其旺盛的生命力。采俗諺入詩始於杜甫，而在陳師道詩中得到大規模的應用。上引詩歌汲取民間智慧，予口頭語言以書面的形式，亦爲書面語言注入口語的活力。它們的生動、活潑、新鮮，正體現了以俗爲雅的力量。

除直接引用諺語外，陳師道還有意使用諺語的造句方法，以口語般的語言説明樸素的道理：

> 斫水水可斷，續弦弦可完。如何鄭公客，不作百年看。(《絶句》，同前，第94頁)
>
> 潛魚避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次韻蘇公觀月聽琴》，同前，第112頁)
>
>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寄黄充》，同前，第342頁)
>
>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

好懷百歲幾回開。(《絶句四首》其四，同前，第336～337頁)

中年患别多作别，早日諱窮常得窮。(《五子相送至湖陵》，同前，第398頁)

“斫水水可斷，續弦弦可完”、“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用比喻的手法講理；“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中年患别多作别，早日諱窮常得窮”，用對比的手法講人情世故。這些句子頗似俗諺。如摩尼寶珠，定濁水而使清澈，諺語和諺語句法的應用也使詩歌中講述的道理化繁爲簡，朗朗上口，頗易傳誦。陳師道本人就得意“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句，兩用之皆有神采，這不得不説是因爲其近似俗諺的魅力。

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陳師道善於在紛繁的世事中提煉出常情、常理，濃縮出警句，如：

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丞相温公挽詞三首》其一，同前，第38頁)

人情較往復，屢勉終不近。(《寄答王直方》，同前，第138頁)

英英黄金花，論時不論美。(《次韻答子實少章二首》，同前，第469頁)

忍事如忍欲，可遏不可騁。(《次韻德麟吴越山水》，同前，第483頁)

相逢不用早，論交亦晚歲。（《贈魯直》，同前，第485頁）

世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送秦觀二首》其一，同前，第71頁）

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贈趙奉議》，同前，第292頁）

酒亦有何好，人盡未肯忘。苟無愁可解，何必醉為鄉。（《答田生》，同前，第344～345頁）

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寄侍讀蘇尚書》，同前，第142頁）

是物皆為萬世計，闔棺猶有一朝窮。（《柏山》，同前，第231頁）

世間何事非迷途，挾筴未必賢樗蒱。（《答無咎畫苑》，同前，第498頁）

多方作計老如期，百疾交攻遽得衰。晚有勝緣逢異士，生須快意闋前知。（《贈石先生》，同前，第452頁）

錢鍾書先生曾經這樣評論宋詩的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①] 而陳師道詩歌基本没有這個毛病。他不是化簡爲繁，對粗淺的道理作冗長發揮，而是化繁爲簡，在複雜的事情中看出常情、常理，用一句話概括出來，讓人一讀便能明白，便能認同。如《丞相温

① 錢鍾書《宋詩選注·序》，《宋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7頁。

公挽詞》，司馬光的歷史功績非三言兩語所能了，他所遭受的褒貶不一的評論，也不易在詩中加以辨正。而陳師道衹說："若無天下議，美惡併成空。"短短的一句話，是非公道自在其中。這就是後山詩用諺語句法造警句的功勞，亦是其化繁爲簡的成就。

在紛繁的事理中理出頭緒，化爲簡單的言句，這個工作看似尋常却艱辛，需要極高的概括能力。後山以俗爲雅，又能以雅爲俗，其警句往往結合用典、化用前人字句，包含豐富的信息量，却又渾然無迹，保持淳樸的本色。如"女生願有家，名妾不以聘。田里亦慕君，又惡不由正"（《次韻答晁無斁》，同前，第182頁），這四句詩取《禮記·内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典故，用經語，典雅却不迂腐。又他的《憶少子》詩，寫憶念兒子，下轉語曰："吾母亦念我，與爾寧相望。"（同前，第18～19頁）用《唐書·肅宗張后傳》："端午日，肅宗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用典貼切而令人不覺。又如"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衹作去年香"（《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同前，第75頁）句，用陶潛詩"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的句意、李昱"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黄"的詞彙，却如脱口而出。詩人對世事有透過現象見本質的洞察力，對語言有化繁爲簡的把握力，故雅俗兩方面的歷史信息，在詩人筆下，皆能凝結爲簡單樸素的道理。在常情、常理的陳述中，詩歌簡單、醇厚，却有勿庸置疑的力量。

（二）以故為新：用經史語而不用其意

後山詩歌用俗語，也用雅語，造諺語，也用經史詞彙。但經史詞彙、故書語言，在他筆下却不陳腐，而是熠熠生輝，重新獲

得了生命。我們來看這樣的句子：

> 聲烈與風來不盡，音書無使去難頻。(《寄單州張朝請》，《後山詩注補箋》第323～324頁)

句中的詞語皆有來歷。“聲烈”出自《文選·琴賦》：“聲烈遐布。”“聲烈與風”出自《東京賦》：“聲與風翔，澤從雲遊。”用字與造句出自如上兩處，但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的“名聲隨風而流”，方是其意義的出處。“聲烈”這個古詞與“名聲隨風而流”的含義相濟，這句詩就傳達出不同於以上出典，却又與這些出典相關的詩句新意，既古雅典重，又自然流暢。又如下句：

> 欲留歌舞盡客意，風雨和更作三厄。(《九月九日與智叔鵬堂宴集夜歸》，同前，第333頁)

“三厄”有出典，《漢書·翟方進傳》曰：“危亂漢朝，以成三厄。”在上引後山詩中，“三厄”指“風”、“雨”、“更”這三個事物，與《漢書》所指不同。它用《漢書》語而不用其意，爲詩歌添加了典重與幽默。後山集中如此類甚多。這就是楊萬里總結的“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爲妙法”[①]。山谷詩中，如《和答錢穆父咏猩猩毛筆》等，就運用了這一寫作手法。陳師道因此法

① 楊萬里《誠齋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册，中華書局，1983年，第141頁。

而發揚光大之，遂爲造句特色。

陳師道説自己作詩“小家厚斂四壁立，拆東補西裳作帶”（《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其三，同前，第109頁）。這“拆東補西”的結果并不瑣碎，而是通過藝術的剪裁與拼貼，讓天吴與紫鳳顛倒短褐，給人一種新奇的裝飾之美，對不熟悉這些陳言的讀者來説，這就形成閲讀的障礙。如錢鍾書先生所説：“假如讀《山谷集》好像聽異鄉人講他們的方言，聽他們講得滔滔滚滚，衹是不大懂，那末讀《後山集》就仿佛聽口吃的人或病得一絲兩氣的人説話，瞧着他滿肚子的話説不暢快，替他乾着急。”① 事實上，并非陳師道説話不暢快，而是有一部分人聽不明白。藝術的表達是有針對性的，一些人覺得有趣的表現手法，對另一些人來説就毫無意義。如果我們考慮到陳師道是一個比較專業的學者型詩人，而像他這樣的人已形成一個寫作與閲讀羣體的話，就應當承認，這種“拆東補西”的藝術手法自有其美感，也是有其接受空間的。

（三）以文為詩：以古文筆法造生新句

以文爲詩，就是以文章的章法結構、寫作手法入詩，改變詩歌原有結構，給詩歌帶來新的形式與新的張力。這體現在句法中，就是以古文筆法造句。與諺語造句的清新流利相比，古文筆法所造的句子峭拔瘦硬，有一種戛戛獨造的生新美。後山句法即是參用此二者，在雅俗之間、流利與生澀之間展開創造的筆力。就以文爲詩而言，後山采用了如下造句方法：

---

① 《宋詩選注·陳師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102頁。

其一，字詞的重複。後山詩中有多處字詞的重複。其中，有動詞的重複，如“平生忍欲今忍貧”（《謝憲臺趙史惠米》，《後山詩注補箋》第 324 頁）、“欲落未落雪迫人，將盡不盡冬壓春”（《謝趙使君送烏薪》，同前，第 349 頁）；有名詞的重複，如“復作騎驢不跨驢”（《騎驢二首》其一，同前，第 337 頁）、“舊雨不來今雨來”（《秦少章見過》，同前，第 564 頁）、“自痴那得使人痴”（《贈吳氏兄弟三首》其二，同前，第 445 頁）、“中年患別多作別，早日諱窮常得窮”（《五子相送至湖陵》，同前，第 398 頁）；也有形容詞的重複，如“不讀世書談世事”（《和趙大夫鹿鳴宴集》，同前，第 325 頁）等。重複手法的運用，爲詩歌帶來複沓的韻律與節奏。一般說來，詩歌的重複常在句與句之間。而後山慣用句中字詞的重複，以錯落有致的句中重複，使詩句內部充滿節奏感，并帶來了句法的收斂、精煉。

其二，句法的壓縮與伸展。正如其章法有“縮地法”，陳師道詩歌的句子，也往往濃縮、精煉。他常將兩句乃至數句詩壓縮爲一句。如下例：

> 老稚持車車不留，歸人不行行轉頭。（《送杜侍御純陝西轉運》，同前，第 61 頁）
>
> 人言婚患情欲本，我始求脱君已半。（《寄晁載之兄弟》，同前，第 136 頁）
>
> 忘年屈勢不虛辱，公取為德吾何取。（《寄鄧州杜侍郎》，同前，第 211 頁）
>
> 法施老人卧不出，呼我取別行問疾。（《別圓澄禪師》，

同前，第 169 頁）

這是將兩句詩壓縮成一句的例子。就所壓縮句子間的關係而言，“老稚持車”——“車不留”、“歸人不行”——“行轉頭”爲轉折關係，“我始求脱”——“君已半”、“公取爲德”——“吾何取”爲對比關係，“呼我取别”——“行問疾”爲遞進關係。詩人利用這些意義的聯繫將兩句詩組合在了一起。句中的一些成分承前後省略，如“君已半”承前省“脱”字，“行問疾”承前省“我”字。壓縮後的句子生新，緊凑，精煉，而轉折、對比、遞進的關係更得到了强調，呈現出表達的力度與美感。

還有一種獨特的壓縮方式，更能體現後山句法：

有憐其窮與不朽，我亦牽連書《玉海》。（《次韻蘇公西湖徙魚三首》其三，同前，第 110 頁）

觸寒歷險來特特，愧無以當欣有得。（《湖陵與劉生别》，同前，第 399 頁）

滕大夫伯陽父孫，烹小鮮治大國原。（《寄滕李奉議》，同前，第 400 頁）

早歲相知晚相識，抵掌回頭已陳迹。（《送鄜州關司法》，同前，第 495 頁）

這是將兩個句子壓縮在一起：“有憐其窮”——“與不朽”，“愧無以當”——“欣有得”，“烹小鮮”——“治大國原”，“早歲相知”——“晚相識”，施動者是同一個主體，我們可稱之爲“連

動結構”。兩個動作的相連，使詩歌出現千手千眼，應接不暇的繁複美感。動作的節奏以意義的陳述爲主導，因此在上引諸詩中，除七言常有的“四”——“三”句式外，還有不符合詩歌自然節奏的“三”——“四”句式。這種句法彰顯詩人的主體意識，帶有强烈的意句特徵。除上引詩句外，連動結構的壓縮句法，還有承前省略動詞的情況，如：“有愁萬斛才八斗”（《古墨行》，同前，第187頁），“才八斗”承前省“有”字；“不讀世書談世事”（《和趙大夫鹿鳴宴集》，同前，第325頁），“談世事”承前省“不”字。這是連動結構的變體，反映出後山句法靈動活潑、揮灑如意的神采。

與句法壓縮相對，陳師道有時又故意伸展句子，將一句延伸到兩句，如：

> 頓悟而漸修，從此辭世故。（《次韻蘇公勸酒與詩》，同前，第117頁）
>
> 風濤兼盜賊，恩重覺身輕。（《宿泊口》，同前，第411頁）
>
> 後歸栖未定，不但衹昏鴉。（《晚坐》，同前，第415頁）

上引三組詩中，前後兩句分別有遞進、補充、説明的關係。在緊張、省略的結構之間，間出舒展、補充的詩句，抑揚之間，愈覺頓挫之妙。

其三，虛字拘旋。虛字是“以文入詩”的産物。宋詩多用虛字，而如陳師道這樣，虛字用得多而且好的詩人并不多見。如下

面這首詩，通篇以虛字提起：

酒亦有何好？人盡未肯忘。苟無愁可解，何必醉為鄉。剩欲論奇字，終能諱秘方。直饒肌骨秀，正要畫眉長。（《答田生》，同前，第344~345頁）

這首詩中，後山以虛字拘旋句中，提携和疏通文氣，使詩歌筋骨兼備、氣質疏宕，是爲用虛字之妙。富有特色的是，後山在詩中好用反問句法，這也是虛字造句的結果。試看下面的句子：

向來期北上，可復改南轅。（《送何子温移亳州三首》其二，同前，第300頁）

邇來結字穩且匀，豈不見我參寥君。（《答黄生》，同前，第296頁）

才難孰為吾君惜，果滿寧容我輩先。（《送詹司業》，同前，第301頁）

紅緑相催春事闌，可能無意待人看。（《西郊二首》其一，同前，第302頁）

静中取適庸非計，林下相從會有時。（《寄答泰州曾侍郎》，同前，第305頁）

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敬酬智叔三賜之辱兼戲楊理曹二首》其二，同前，第329頁）

豈是神仙未賢聖，不隨時事向人疏。（《徐仙書三首》其二，同前，第353頁）

可能略不解春意，祇有尋枝摘葉人。（《三月二十二日榴花盛開戲作絶句》，同前，第 369 頁）

這些句子中，後山用“豈”、“寧”、“庸”、“可”等副詞提起疑問，加重了肯定或反問的語氣。它們在詩中打破了平穩的句法，爲强烈的感情提供了强烈的表達方式，使詩歌富有情感色彩。

如果説，以上尚爲詩歌的常用句法的話，如下隱藏反問副詞的句子，就是後山的獨造：

屢失南鄰春事約，祇今容有未開花。（《春懷示鄰里》，同前，第 359 頁）

容有，其實是豈容復有的意思。將“豈”——“容”——“復”三義濃縮到“容”這個實詞身上，省略掉虚詞，虚詞的意味反而更加濃鬱。這種無理而妙的造句法是詩人的專利，我們惟有在上下語境中體會其抑揚頓挫的旋律。後山詩中這樣的句子還很多，如：

政好遭頻藉，詩清得暗投。（《送何子温移亳州三首》其三，同前，第 301 頁）

生前祇為累，身後更須名。（《懷遠》，同前，第 344 頁）

折腰真耐辱，捧檄敢輕投。（《元符三年七月蒙恩復除棣學喜而作詩》，同前，第 376 頁）

寄書長不達，書達得無愁。（《寄袞州張龍圖文潛二首》

其二，同前，第 406 頁）

“得”、“更”、“敢”、“得”前面，都隱藏了一個“豈”字。如是句法戛戛獨造、陳言務去，不能說不是陳師道古文修養益於詩歌的成就。

以上是對後山章法、句式的論述。後山詩歌，境界幽僻而氣質沉鬱，精於錘煉而不傷樸拙，情感真摯，語言典重，句法凝練，境界崇高。和其成就相比，目前學術界對後山詩歌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够。受能力的局限，以上主要探討了後山句法。對其詩歌整體藝術成就的把握，還待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第五章
山谷四甥

山谷四甥，也就是江西宗派中的四位洪州詩人：洪朋、洪芻、洪炎、徐俯。洪氏兄弟本四人，其中四弟洪羽元符上書入邪上尤甚，入崇寧三年元祐黨籍，貶江州酒税，早卒，没有被《宗派圖》收録。徐俯八歲失去父親，四洪自幼父母雙亡。黄庭堅嘗受六舅李常教養，承傳了舅父“文章被甥侄，孝友諧婦女”（《庭堅得邑太和六舅按節出同安邂逅於皖公溪口風雨阻留十日對榻夜語因咏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别後更覺斯言可念列置十字字爲八句寄呈十首》，《黄庭堅全集》第 984 頁）的忠厚家風，對這幾位外甥格外疼愛。在他的關懷下，三洪和徐俯成長爲著名的詩人。四人詩歌皆有似乃舅之稱，但因際遇、材質的差别，造詣并不相同。他們學黄的得失，正可爲他人之鑒。

第一節　洪　朋

洪朋是洪氏兄弟中的長兄。作爲南昌詩人羣體的領袖，他在三洪中成名最早，最早得到舅氏的認同，也早卒。在他身上，體現出早期江西宗派詩人學黄而未及於化的特色。

一、生平簡述

洪朋，字龜父，號清非居士，洪州南昌人。約生於嘉祐七年(1062)[①]。父洪民師，黄庭堅表弟，仕至石州司法參軍。母黄氏，黄庭堅胞妹。洪朋父母這樁親上加親的婚姻并不幸福。黄氏嫁入洪家後一直悶悶不樂，生朋、芻、炎、羽後，於熙寧三年(1070)亡故。數年後，洪朋的祖父與父親也相繼去世。是時洪氏兄弟尚幼，由祖母文成君李氏教養。李氏是李常之妹，善詩，治《春秋》，能持門户如士大夫，但心胸狹窄。她對黄氏有宿怨，安葬丈夫、兒子之後，將黄氏尸骨抛弃江中。黄庭堅有《毁璧》賦及序，即爲此事而作。賦云："弃汝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雛嬰。衆雛羽翼兮故巢傾。"（《黄庭堅全集》第

① 據周裕鍇《黄庭堅姻親考》(《九江師專學報》1988年第2期)，洪朋母親大約嘉祐六年(1061)嫁入洪家；又洪朋有《送謝無逸還臨川》云："少年厲鋒氣，鄙夫成老醜。"(《全宋詩》第14440頁)從詩意推測，當至少長謝逸五六歲以上。謝逸生於熙寧元年(1068)，則洪朋約生於嘉祐七年(1062)，黄氏嫁入洪家一年之後。

1360頁）悲憤之情溢於言表。他將對亡妹的思念寄托在四個外甥身上。山谷集中，有《洪氏四甥字序》，以及爲四洪所作的書齋銘、深衣帶銘，更有不少指點他們爲學作文的書信。對失去父祖的洪氏兄弟而言，黄庭堅是最值得他們尊敬的男性長輩。山谷的關心、寄望，伴隨着他們的成長。

洪朋是洪氏兄弟中的老大，他手不釋書，落筆成文，尤長於詩，與舅父的關係最爲密切。元豐年間是黄庭堅詩歌藝術的定型期，洪朋時已成人，見證了山谷體詩風的趨於通變。據《王直方詩話》記載：

> 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等篇?"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户牖，蟻穴或夢封侯王"，及"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為我生凉秋"，以為絶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①

黄庭堅與洪朋的這次交談當在元豐六年（1083），是年山谷移監德平，赴任前曾返鄉探親。洪朋所舉兩聯，一出《題落星寺》，一出《登快閣》，皆七律拗句，分别是山谷元豐三年和元豐五年的作品。元豐中期正是山谷用力於七言拗律的時期，洪朋體會到山谷詩的進境，并指出山谷拗律和杜詩的關係，得到山谷首肯，可見其見識的敏鋭。

洪朋詩歌受黄庭堅指導，很早就嶄露頭角。他有"一朝厭蝸

① 《宋詩話輯佚》上册，中華書局，1980年，第53～54頁。

角，萬里騎鵬背"[1] 這樣的句子，無論從"蝸角"、"鵬背"意象的選取，還是流水對的形式，都有受山谷影響的痕迹，但又寫得流暢自然，得到黄庭堅的讚賞。另外，如下面一首詩歌："胡生畫山水，烟雨山更好。鴻雁書遠汀，馬牛風雨草。"據王直方說："潘邠老愛其第二句，余愛其第三句，山谷愛其第四句，徐師川愛其第三第四句。"[2] 受到諸人不同角度的喜愛。作爲一個詩學風格形成較早的人物，洪朋在元祐時期已受到諸友認可。黄庭堅說：

> 龜父筆力可扛鼎，它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兹能事。（《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黄庭堅全集》第 703 頁）

從盡心克己工夫出發，用輝光照其本心，輔之以千卷書的修養，然後再着力於詩文，這正是山谷詩法的正脉。可見，對這個外甥，黄庭堅寄望甚高，要求也極爲嚴格。

洪朋詩名早著，却屢舉不第。黄庭堅很同情他的處境。元符二年（1099），洪朋往舒州（治今安徽潜山）依表叔李廣心，準備應考。山谷遠在戎州，尚記挂此事，作《與李廣心書》云："龜父外甥老於場屋作人，亦自清苦。客遊邑中，當承豈弟之蔭，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53 頁。
② 同上，第 35 頁。

不知今舉利鈍何如?”（同前，第1873頁）此舉似乎有所起色。洪朋鄉試得洪州舉首，滿懷期望地入京參加省試，却又功虧一簣，點額而歸。他在京師與王直方、饒節等遊，嘗失意載酒，與饒節、吴迪吉過王直方園，題壁云：

再為城南遊，百花已狂飛。更堪逢惡客，騎馬風中歸。

饒節和之曰：

當時為舉首，滿意望龍飛。而今已報罷，且歸[①]。

從《王直方詩話》中這段記載，可見洪朋窮愁潦倒之況。

洪朋與黄庭堅感情深厚。山谷遠貶黔州、戎州後，洪朋每每“發函伸紙數行空，永懷渭陽涕横落”（《得戎州書》，《全宋詩》第14454頁），深以爲念，并與舅父保持書信往來。崇寧四年（1105）九月，山谷以微疾不起，卒於宜州（今屬廣西）。洪朋以《跋山谷帖用其韻》詩表達了自己的懷念：

學書右軍盡善，下筆少陵有神。無復向來金馬，可惜埋此玉人。

① 《王直方詩話》，同上，第80～81頁。按：《王直方詩話》此條并云：“蓋龜父是年自洪州首薦，自今上初即位，無（建）［廷］試也。”（“建”字訛，據《四部叢刊初編》本《詩話總龜》前卷三十九校正）是年爲元符三年（1100），徽宗初即位，爲哲宗服孝，確實不設廷試。但洪朋既已省試落第，又不符合特奏名的條件，似乎與廷試没有關係。所謂“無廷試”者，不可解。

壓倒詩中宰相，鼓行文苑宗公。毒霧瘴氛作祟，英姿爽氣成空。（同前，第 14467 頁）

崇寧五年（1106），洪朋猶有《謝李洪州莅學》[1]，或許在他生命的後期，一度擔任當地學官。本年洪芻從汀州（今福建長汀）放回，徐俯、李彭前來迎接，却無其兄洪朋的踪影。洪芻詩云："鴒原凄斷手足戚，隴水悲傷甥舅情。"（《次韻徐師川喜余來還之作》，同前，第 14491 頁）可知洪芻卒於是年，年約四十五。《四庫全書總目》言洪朋三十八歲卒，又引《豫章續志》，云黄庭堅猶得見其遺稿[2]，殆不可信。

洪朋詩文，《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詩集類》著録黄汝嘉重修《江西詩派》本《清（虚）［非］集》一卷[3]。《文獻通考》卷二四四引《解題》，作《清非集》二卷。《宋史·藝文志》著録《洪龜父集》一卷。宋本久已失傳，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釐爲二卷，成爲目前數種洪朋詩集的底本[4]。

---

① 李洪州即李景直，崇寧五年（1106）至大觀元年（1106）知洪州，據李之亮《宋兩江郡守易替考》，巴蜀書社，2001 年，第 309 頁。

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引《豫章續志》云："及其没也，同郡黄君著裒其詩百篇爲集，庭堅在宜州見其本，又稱爲篇篇可傳。"（中華書局，1965 年，下册，第 1342 頁）按［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引［宋］曾慥《百家詩選》云："朋字龜父，同郡黄著集龜父詩百篇爲一集，山谷以爲句句可傳也。"（《四庫全書》第 933 册，第 38 頁）此當《豫章續志》等書所本。但《百家詩選》没有説黄著編輯的是洪朋遺稿。"及其没也"之説，當爲後人臆測加入。

③ 洪朋號"清非居士"，此處《清虚集》爲《清非集》之誤。

④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四《洪龜父集》，中華書局，1999 年。

二、擺脱、超脱和解脱的主題

時代的逼仄和個人際遇的沉淪在洪朋詩中反映出來，發爲黄庭堅所説的“候蟲之聲”。他的詩中有“道喪千載餘，世路日險澀。朋知得若人，風流有所及”(《立秋日諸公過敝廬賦詩》,《全宋詩》第 14445 頁)、“丈夫功名志，天機不我謀。願言快心意，身世真悠悠”(《和元樂教授南軒》，同前，第 14443 頁)、“歲華還向晚，世事衹長嘆。千古功名外，致身良獨難”(《將曉》，同前，第 14459 頁）這樣發牢騷的句子，但并不多見。更多的時候，洪朋不是用詩歌咏嘆身世，而是以之作爲擺脱、超脱和解脱的媒介，滌蕩、化解、平息自己内心的抑鬱。以《幽尋（師川令余賦之)》爲例：

> 華鯨喚起曲肱夢，竹蹊幽尋小雨乾。風吹龍沙江流斷，日下烏塔松蔭寒。冰雪照人徐孺子，手捉玉麈對西山。安得洪崖八瓊藥，令我飛出六合間。(同前，第 14450 頁)

僧寺的木鼓喚起詩人曲肱的小夢，從被小雨潤濕的竹徑走來，到開曠處看風吹江水，日落松蔭。朋友手捉玉麈，冰雪照人，和西山相互輝映。詩歌到這裏還詩意盎然，但當詩人吐露出他的心願：哪裏有飛升的仙藥，令我擺脱這個局促的塵世呢？我們纔發現，原來前面的詩情，并非從容恬淡的閑情。“竹蹊”、“江流”、“松蔭”、“玉麈”、“西山”，甚至“冰雪照人”的朋友，皆是“華鯨喚起曲肱夢”後和俗世生活對應的一組意象，是詩人

煩悶心情的寄托。所謂“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洪朋向往超脱的境界，每以記夢詩、遊仙詩表達出來。如：

> 秋風插羽翰，樓觀天上行。朝霞帶空洞，海日注疏櫺。（《夢中所作》，同前，第14446頁）
>
> 鷄鳴深林裏，犬吠幽徑中。不知誰子宅，乃是僊人宫。（《紹聖二年秋七月乙未夜夢遊一勝處非平生所經行見一道士延余坐飲以醇酒酒酣道舊故恍然不知所以因而賦詩既覺漫不復記憶戲作五言以補之》，同前，第14446頁）
>
> 疇昔之夢非想因，倏欻遊遨出無垠。旁日挾月超昆侖，虚無上下列宿分。（《記夢》，同前，第14454頁）
>
> 吾聞三山在海底，貝闕珠宫照天地。誰其尸之玉煉顔，耕耘五德長不死。我欲遐登不憚遥，隔以弱水三萬里。（《蓬萊仙人歌》，同前，第14451頁）
>
> 十頃琉璨下赤日，旦日飆臺排雲出。金宫銀闕遠杳冥，瓊樹瑶林近蒙密。（《感興》，同前，第14455頁）

洪朋并不崇信道教，他嚮往的是道家擺脱六合、飛生無垠、霞日璀璨的境界。與此相似，他對佛教的解脱境界也心向往之，作了不少遊觀佛寺的詩歌，如《遊天宫寺上方瑜道人出漫題》：

> 攝衣禪界中，高步上方外。乾坤更空闊，川嶽謝埃塊。行人杖履底，地與烟霞會。道人遊四衢，行止各無礙。竹日弄清影，松風聽寒籟。心將萬化冥，始覺斯遊最。（同前，

第 14441 頁）

從這首詩來看，洪朋會得的禪理，非於日用百事，而是在上方之外、烟霞之會，擺脱塵俗境界後的空闊、清涼。這對應着他的心境。遊仙、參禪、作詩，皆成爲他擺脱苦悶的工具。

“須信天宫迥，誰言世界寬”（《大梵寺前對月》，同前，第 14458 頁）、“擺落紅塵想，追隨汗漫遊”（《偶成》，同前，第 14460 頁），是爲洪朋詩歌中貫穿的情感。記夢詩如是，遊仙詩如是，登臨詩如是，與諸友唱和之詩亦往往如此。他好用凉飀、鮮飆這樣表示滌蕩煩悶的意象。在這種情感的指引下，他的詩歌也往往如鮮飆凉飀，跌宕跳擲，激越清揚。如《晚同師川駒父玉父遊大梵院小軒》：

> 山氣夕巃嵸，川光暮澄凝。欞軒俯川嶽，拄杖相與登。脱履就閑曠，秉羽居高明。盤礴飛鳶上，揮斥蜿虹横。令弟各英妙，舌本淮湖傾。朋也老無能，前身雲水僧。蕭蕭緣坡竹，凉飆為我興。執熱快一濯，何必踏層冰。（同前，第 14441～14442 頁）

詩歌前半部分保持一種向上超越的氣勢，後半部分則盤礴回旋、側筆皴染，最後點明“執熱快一濯”的情感動力。詩歌節奏就在此情感的推動下，隨詩人之行程起伏不已。他還有一類詩歌，能爲向往中的仙界造境。如《寫韻亭》：

紫極宫下春江横，紫極宫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彩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同前，第 14455 頁）

紫極宫是一個據點，主導着看的方式——俯視下界，仰觀宫觀，使詩人以方州爲棋局、連山爲屏風，獲得上方的視野。再以此視野移步换景，回到寫韻亭中，就出現了今人古人難辨、神界凡界混同的幻境，空汎清寂，無以名狀。此詩受到吕本中的激賞，説："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1]

三、尚未脱盡的摹擬

從上引詩歌已經可以看出，洪朋詩歌頗受山谷影響。如《寫韻亭》詩，氣韻風格仿佛山谷《題落星寺》。而"水入方州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的善用比喻，"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的倒裝句法，都可見與山谷略同的避免平熟、精於鍛煉的傾向。又如《晚同師川駒父玉父遊大梵院小軒》的"蕭蕭緣坡竹，凉飆爲我興"，倒用山谷"王侯鬚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黄庭堅全集》第 84 頁）——緣坡竹的比喻義，仍舊用竹與風的組合，却回復"緣坡竹"的本來用意，與山谷詩歌形成互文。洪朋稱舅氏爲"詩家今獨步"（《懷黄太史》，《全宋詩》第 14465 頁），對黄庭堅推崇備至。他的詩歌學習山谷，氣韻孤迥，句法瘦硬，頗見鍛煉之功。

---

① 吕本中《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60 頁。

黄庭堅對洪朋的影響，首先在格律謹嚴。洪朋有《獨步懷元中》詩：

净盡西山日，深行城北村。琅璫鳴佛屋，薜荔上僧垣。時雨慰枵腹，夕風清病魂。所思渺江水，誰與共忘言。（同前，第 14461 頁）

“琅璫”本作“琅玕”，“琅玕”和“薜荔”，這兩個詞從表面字形上相對，但“薜荔”爲叠韻詞，“琅玕”則否，内在結構不同。山谷改“琅玕”爲“琅璫”①，是對洪朋作詩基本功的規範。洪朋後來又有“薜荔封寒井，檀欒度短墻”（《報國寺藏經院小閣同師川駒父作二首》其一，同前，第 14457 頁）的句子，就没有再犯同樣的錯誤。他還注意煉字煉句，如：

不覺日還至，方驚歲已殘。（《代簡答師川》，同前，第 14456 頁）

莫鴉翻古木，候雁造秋江。（《報國寺藏經院小閣同師川駒父作二首》其二，同前，第 14457 頁）

雲飛賓雁急，水泛浴鳧輕。（《漫遊二首》其一，同前，第 14459 頁）

市聲不廢西山白，春色先從南浦青。（《奉同師川遊大梵院小軒即事》，同前，第 14461 頁）

---

① 見《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53 頁。

細草一方圍野色，遊絲百尺上晴空。（《題馮川驛壁》，同前，第 14467 頁）

上舉諸例，或用字有力，或造句生新。總的説來，洪朋詩歌章法謹嚴，對偶精確，好作硬語，時多警句，頗見學黄之功。以《陪諸公步城北分韻得亦字》爲例：

去月霜雪交，咫尺澀如棘。今朝雲霧散，春氣恍如昔。九衢慰眼新，百草隨意出。俯仰亮有觀，兹辰底空擲。陶謝何許遨，發興在郭北。净界集兩楹，層閣倚百尺。風日已可人，江山亦德色。四睇感終古，五字辦即席。想見盤礴地，鮮飆生兩亦。（自注：見許慎書）良遊不相待，發函三嘆息。（同前，第 14442 頁）

此詩叙事井然，意氣昂揚。“净界集兩楹，層閣倚百尺”、“四睇感終古，五字辦即席”爲佳句；“亦”字是險韻，洪朋造之，無艱辛晦澀之色；又用“兩亦”僻典，反映了以學問爲詩的風格。

洪朋詩歌有刻意造語、刻意學黄的痕迹；也有學黄而化、自爲己出的作品。以下面兩首詩爲例：

徐郎春晚意如何，相見蕭然水竹居。近得柏梁七字句，俱來繭紙數行書。賞心不減遠公社，到眼全勝（正）［匡］俗廬。首夏清和吾定往，勿令彈鋏食無魚。（《次韻徐十見招》，同前，第 14464 頁）

已約龍沙看江浪，更從寶塔上晴空。蕭蕭雨墮兹遊阻，靡靡秋殘吾道窮。不見江州竹葉酒，空餘彭澤菊花叢。去年此日尤蕭瑟，兩地相思目斷中。（《九日同駒父作》，同前，第 14462 頁）

這兩首詩各有一聯佳對。第一首，頷聯以“柏梁七字句”對“繭紙數行書”，又以“近得”、“俱來”流水對，顯用力之功。第二首，頸聯以“江州竹葉酒”對“彭澤菊花叢”，復以“不見”、“空餘”抑揚頓挫之，鍛煉之極，反見從容。這兩首詩，第一首摹仿山谷的痕迹明顯，步驟略顯僵硬；第二首就情感飽滿、收放自如，有了自己的風貌。山谷家法，以自成一家爲最高成就。可能是因爲天不假年的緣故，洪朋詩歌總體來説尚未脱盡摹擬。其詩瘦硬生警、洗練深刻，得山谷之一體，但題材狹窄，藝術上的創新也不够，未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江西宗派圖》列之爲陳師道、潘大臨、謝逸之下第四人，恐過譽。

第二節　洪　芻

三洪之中，洪芻影響最大。崇寧五年，洪朋去世，而洪芻從汀州放回，與徐俯、李彭一起帶來江西詩歌的繁榮。從此徐、洪并稱，洪即指洪芻。他晚年因品行的紕漏，觸犯國法，落得長流沙門島（今山東蓬萊西北）、永不叙復的下場；其詩也不副其大

名，初啓江西惡調。

一、生平簡述

洪芻，字駒父，洪朋弟。出生於嘉祐八年（1063）至治平三年（1066）間①，少失依怙，在祖母文成君的教養下長大。

洪芻曾參加元祐三年（1088）省試。落第後，可能是因爲黄庭堅的推薦，仕爲黄州知録，帶三弟洪炎前往②。他在黄州作“壁陰齋”，以官餘時光勉力學習，但行爲缺乏檢點，往往以詩酒廢王事。黄庭堅聞之，深以爲憂，作書告誡他要“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與洪駒父》，《黄庭堅全集》第1365頁），又鼓勵他與潘大臨交往。洪芻、洪炎在黄岡與潘、何的交往，帶來了南昌詩人與黄岡詩人的融合，這在第三章已經論述，此略。

元祐六年，洪炎得第，洪芻復有意應舉。兩年後，他回到南昌，參加本年的秋試。黄庭堅有《答洪駒父書》云：“既不免應舉，亦須温習文字，詩酒須少輟也。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古今，乃所望者。”（同前，第473頁）可見，洪芻詩酒自放的情況，自黄州爲官以來并未少輟，引起舅氏深深的憂慮。

---

① 據其兄洪朋、弟洪炎生年推算。

② 黄庭堅有《與洪氏四甥書》云：“駒父：别後惘然者累日，雖道途悠遠，鴻雁相依，頗不寂寞。黄州人來，得平安之音，甚慰也。即日想安勝，太守書頗相知，更希善事之。”（《黄庭堅全集》第1869頁）洪芻、洪炎曾同參加元祐三年（1088）省試，寓山谷廨中，落第歸。黄庭堅這封信當作於二洪離開汴京後不久，從該信内容來看，洪芻下第歸家後即仕黄。

與長兄的屢試不售相比，洪芻頗爲幸運。紹聖元年（1094），洪芻得第。是年紹述之論大興，元祐諸公紛紛被貶。洪芻在汴京與王直方、李錞等交遊，作詩云：“眼中人物東西盡，肺病京華故倦遊。”[①] 表達了蕭條時局中的落寞之感。他後除官得晋州（治今山西臨汾）教授，紹聖四年，寫信問候時在黔州貶所的山谷，并寄近詩及文。山谷答書云：“《罵犬文》雖雄奇，然不作可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答洪駒父書》，同前，第474頁）可見紹聖時期的洪芻滿腹牢騷、激憤時事，《罵犬文》等，無非是他發爲怨刺的文學作品。

元符三年（1100），徽宗登極，召求直言。洪芻對時事的意見終於有了表達的機會。他應詔上書，批評紹聖、元符政治，一吐心中之快。孰知元符三年的“小元祐”氣象衹是曇花一現，政權很快又落回到新黨手中。崇寧元年（1102）九月，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爲三等，洪芻入邪下。崇寧三年四月，洪芻以元符上書降兩官監汀州酒稅[②]，同年六月入元祐黨籍碑，成爲江西諸派中惟一入黨籍的詩人[③]。是秋，洪芻抵達汀州，開始了他的貶謫生涯。他在閩鄉倍感苦悶，所謂“異域三秋百感生，愁腸一日九回縈”（《次元禮題余詩卷後韻》，《全宋詩》第14491頁）。在這個時候，家鄉好友徐俯、李彭諸人以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82～83頁。

② 《皇宋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二《禁元祐黨人下》，臺灣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7册，第3691頁。

③ 同上，第3697頁。

《題駒甫詩卷後韻》等詩寄贈[1]，令洪芻“每聽足音聊粲笑，蹔教覓句解憂酲”（同前），予他莫大的精神安慰。

崇寧五年（1106），徽宗以星變大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劉摯以下一百餘人叙復有差。洪芻復宣德郎，回到南昌，徐俯、李彭以詩來迎。洪芻次韻和之云：

> 謫去蹔經牛斗分，歸來重賦豫章行。鴒原凄斷手足戚，隴水悲傷甥舅情。半世問津今老大，一丘散髮得生平。長卿句法鋒難犯，隱若蒙公萬里城。（《次韻徐師川喜余來還之作》，《全宋詩》第 14491 頁）

在這兩年“牛斗分”的時間內，洪芻的舅父黄庭堅、兄長洪朋、弟弟洪羽相繼去世，物是人非，令他感懷；而洪芻與徐俯、李彭的重新相聚——“歸來重賦豫章行”，又揭開了江西詩歌新一輪繁榮的先聲。

大觀初，洪芻一度仕於臨川，爲撫州假守陳瑊僚屬[2]，與謝薖等密切交往。不久可能是因爲陳瑊改官的緣故，他回到南昌，閑居故鄉十餘年之久。在此期間，他與徐俯、李彭等共倡豫章詩社，聲名籍甚。因徐、洪盤桓南昌，南昌遂成爲江西宗派的主要

---

① 李彭有《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韻》，洪芻有《次元禮題余詩卷後韻》，可見次洪芻詩卷後者至少有三人。

② 陳瑊字虚中，陳瓘弟，崇寧時期（按：當爲崇寧末、大觀初）曾知撫州（見《能改齋漫録》卷一七）。洪芻、謝逸、謝薖、李彭皆與唱酬。洪芻有《次陳使君韻三首》（其一）云：“不因皂蓋班春去，誰喚青衫老吏來。”（《全宋詩》第 14495 頁）以“老吏”自況，當被陳瑊辟爲僚屬。

活動中心和全國詩歌繁榮的温床。洪芻因此與徐俯齊名，被共推爲山谷詩學的傳燈嫡子。宣和年間，惠洪又以洪芻、徐俯、李彭三人爲南州人物之冠[①]。這段時期雖然是洪、徐等仕宦的歉收期，却帶來江西詩學的巨大收獲。

宣和中，洪芻起爲信州（治今江西上饒）通判，數年後奉祠[②]。靖康元年（1126），洪芻、徐俯同被徵召。洪芻仕尚書郎，三遷至左諫議大夫[③]。本年正月，金兵渡河攻汴。經二月議和退兵後，八月復入侵。十一月，集百官於延和殿，議與金人三鎮與否，洪芻持論不與[④]。閏十一月，汴京淪陷。如果説城陷之前，洪芻尚能議不與三鎮，持國家、民族大義正論的話，城陷之後，他却爲虎作倀，欲令智昏，没有經受住良心和道德的考驗。

金人入城，大肆搜括。靖康二年（1127）二月，洪芻與余大鈞、王及之等受金人差遣，入諸王府再括金銀。他們因緣爲奸，隱匿財物數萬，聚飲歌樂，無所不爲。洪芻更於景王府看上景王寵姬曹三馬，托余大均放出，納爲己妾。洪芻早有詩酒自放的毛病。如果説，他年輕時候的不護細行還衹是小節問題的話，納景王寵姬這件事情，則以對陷於亡國境地的北宋政權之毫無顧忌，嚴重觸犯了儒家名教，體現的是大義的虧損。本年五月，宋高宗趙構即位於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十八日，召御史臺鞫括金銀事。六月，洪芻罷左諫議大夫，下臺獄。八月案結，議者以爲洪

① 見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②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引曾慥《百家詩選》，《四庫全書》第933册，第38頁。
③ ［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卷五上，《四部叢刊三編》本。
④ ［宋］佚名《靖康要録》卷九，《四庫全書》第329册，第598頁。

芻、陳冲、余大均等人罪重當死，高宗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詔洪芻等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①]。洪芻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②] 才華依舊，正印證了黄庭堅的忠告："然孝友忠信，是此物根本。"（《與洪駒父》，《黄庭堅全集》第 1365 頁）無此，則一無行文人耳。至遲至紹興二年(1132) 洪芻還健在[③]，後卒於貶所。洪芻晚節有負舅氏教誨及兄長、朋友的囑托，伴隨他餘生的，想必是深深的悔恨。

洪芻博學多才，著述頗豐。著有《老圃集》一卷[④]、《香譜》一卷[⑤]、《豫章職方乘》三卷[⑥]、《洪駒父詩話》一卷[⑦]，并編《楚漢逸書》八十二篇[⑧]。這些書籍除《香譜》尚存外，其餘皆已亡佚。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輯佚》輯録《洪駒父詩話》二十二條。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鈔出洪芻詩歌一百七十首，編爲《老圃集》二卷，是爲目前所見洪芻詩集的底本[⑨]。

二、初啓江西惡調

洪芻少經舅氏稱許，又盤桓江西十餘年，詩名頗盛。周紫芝

① 見［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四庫全書》本。
② 《玉照新志》卷五，《四庫全書》第 1038 册，第 665 頁。
③ 是年洪炎有《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説明洪芻尚健在。
④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
⑤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第三下，《四部叢刊三編》本。
⑥ 《郡齋讀書志附志》卷五上。
⑦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八》，中華書局，1995 年，下册，第 1799 頁。
⑧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八。
⑨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五《老圃集》。

云："大洪昔時詩用意精深，頗加雕繪之功，蓋酷似其舅。"①《四庫總目》亦稱是。然觀洪芻詩作，雖用意精深，頗加雕繪，與乃舅之風却是形似神遠，體現了學黄而不得其要領的平庸造作。

山谷詩好造硬語險句，講究鍛煉，洪芻學之，表現爲刻意雕琢。玆舉其《題雲居寺詩》爲例：

雙澗遠輸功德水，四山深閟法王家。曲肱聊寄吉祥卧，緩帶來嘗安樂茶。亦有同行木上座，初無引路鹿衘花。孤峰頂上却歸去，回首冥冥雲霧遮。(《全宋詩》第 14493 頁)

這首詩或即周紫芝所説"蓋酷似其舅"之類。山谷詩講究對偶，此詩以"雙澗遠輸"對"四山深閟"，以"吉祥卧"對"安樂茶"，以"木上座"對"鹿衘花"，運用了數字對、切對和借對等多種手法，在每一聯的鍛造上狠下功夫；山谷詩好用借代，此詩用"木上座"代指木手杖；山谷詩以虚字拘旋，此詩以"亦有"、"初無"提挈其内。然而與山谷詩以意驅遣相反，洪芻詩的表達缺乏精神靈魂的驅使，優孟衣冠、土木形骸，以一組套路的比劃，拼湊爲平庸之作。這樣的詩歌在洪芻集中比比皆是：

君雖四禪侶，自是一詩家。白足濯蛟井，清風振龍沙。

① [宋] 周紫芝《書老圃集後》，《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七，《四庫全書》第 1141 册，第 473 頁。按，洪芻行二，此處"大洪"筆誤。

虚室無長物，多文富生涯。懷人有詩作，粲粲菖蒲花。（《懷瑛上人懷汪彥章韻》，同前，第14480頁）

塞翁失馬吾何有，濠上觀魚每自慚。探袖空漫禰衡刺，叩門徑就阿戎談。但思濁酒同元亮，底用清談學仲堪。回首世間皆苦累，蟻封蝸角戰方酣。（《呈彥章》，同前，第14493頁）

撩人滕六索題詩，賴有支郎為解圍。永夜衹宜燋兔好，彤雲不見織烏飛。少林未許齊腰立，青女無端接手歸。想得廬山幽絶處，酒林壓竹更增輝。（《雪》，同前，第14504頁）

第一首詩，“四禪侶”、“一詩家”，“白足”、“清風”，“虛室”、“多文”，刻意爲對，不對也罷。第二首詩，用老莊語及南朝二三事連綴成詩，又用“蟻封蝸角”喻，摹仿山谷，得其表皮。第三首用禁物體，連用“滕六”、“燋兔”、“織烏”、“青女”等借代詞，如同蹩脚的謎語。更有甚者，洪芻詩歌往往還故作硬語豪語，有“酒兼賢聖醒還醉，風有雌雄雨復晴”（《遊東禪寺》其二，同前，第14488頁）、“地偏袖舞長沙窄，心遠胸通夢澤寬”（《次韻閱道見贈》，同前，第14494頁）的夾雜不清，“雄辯接公如豁霧，清狂誚我作顛雷”（《再用前韻呈閱道》，同前，第14494頁）、“天氣暖如寒食後，桃花酷似暮春時”（《人日》，同前，第14495頁）的流爲粗率。南宋之後，有詩人“每有所作，

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①，後來二馮又譏之爲“江西惡調”，洪芻實已啓之。

《能改齋漫録》卷三譏洪芻之學東坡：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脉不相屬②。

膠於形迹，而失其本旨，洪芻學蘇之失，也正是他學黄的誤區。山谷詩法講究“利器”、“妙手”，基於内心修養，成於自爲主出。駒父從具體詩法上步趨乃舅，孰知得其“利器”而失其“妙手”，以世智下聰運作詩歌，才情不副其技法，勞而無功、愈似愈遠，不僅未創造出獨特句法，反效山谷詩而成惡調。是時山谷詩學流弊初生，洪芻諸友不僅未察此弊，反而有如下詩贊：

洪駒父有《過李公擇尚書墓》一篇。其間云：“鹿場兔徑白晝静，稻壟松□青嶂深。”説者以為大逼老杜③。

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④。

① ［宋］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歷代詩話續編》上册，中華書局，1983年，第182頁。

② 《能改齋漫録》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4頁。

③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83頁。

④ 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洪語自奇嶮，餘子傷剽賊。大似樊紹述，文字各識職。（李彭《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全宋詩》第 15878 頁）

以上文字，都以洪芻之善學立論。就《王直方詩話》所引一聯，果然大逼老杜。問題在於，杜詩與洪芻詩的區別，正在於杜詩通體雄渾，不可句摘。對前代詩人，洪芻能步趨，但未必是“風神步趨”，惠洪所論恐過譽。至於李彭“大似樊紹述，文字各識職”的詩獎，正好説明了洪芻詩歌尚處於摹仿階段，未形成自家特色。對洪芻詩歌亦步亦趨產生的問題，山谷後學未能察覺，這無疑反映了他們自身詩學眼光的局限。

詩如其人，洪芻與諸友似同而異。與山谷“不俗”的定義相反，洪芻平居異於俗人，遇大事輒可奪，其俗在骨，無才情以副其筆力，情韻格調皆不勝。但其集中不是没有好的作品。他與徐、李的唱和詩，以及汀州時期的作品，有飽滿的情感底藴，故多佳。如《送師川還龍舒》：

灊嶽西山各滯留，江頭相遇話神州。送君歸去還為客，破涕成歡轉復愁。明日東湖人已散，朝雲南浦水空流。郎官好在能乘興，準擬歸驄踏素秋。（同前，第 14490 頁）

此詩文筆流暢，情感貫穿，無造作之態。“爲文造情”與“爲情造文”是文學批評中的一句老話，但它屢試不爽，在江西宗派研究中，也是檢驗詩歌優劣的試金石。山谷詩學建立在個人本位和詩歌本體的基礎上，詩人主體意識的貫注而非具體的作詩方法方

是其精髓。可惜在大多數詩歌中，洪芻表現爲捨本逐末、膠柱鼓瑟。這就不是老師的過錯，而是嗣法者本身的問題了。

第三節 洪 炎

洪炎是四洪中的老三。他得功名最早，在宦海中沉浮的時間較多，比之兩位哥哥，多一些城府，少一些疏野，然在骨子裏，他還是江西諸友的同調。有意思的是，三洪的作品在時代先後上恰好形成補充——洪朋《清非集》集於崇寧五年（1106）前，洪芻《老圃集》多收大觀、政和年間詩歌，而收入洪炎《西渡集》的，則是建炎三年（1129）後的作品。《西渡集》以《己酉歲十一月二十六日避寇至龍潭院十二月十五日作五首》詩爲開端，在家國之痛中展開壯闊的人生畫卷。從三洪詩歌，可略見江西宗派體詩的發展演變。

一、生平簡述

洪炎，字玉父，洪朋、洪芻弟。英宗治平四年（1067）生①。他早期與諸兄弟家居，是南昌詩人羣體中的一員。元祐中期跟隨洪芻寓居於黄州，參與了黄州詩人羣體與洪州詩人羣體的

① 洪炎生卒年，據王兆鵬《宋南渡六詩人生卒年考辨》，載《古籍整理與研究》第六期。

融合。

洪炎早入仕途。他參加過元祐三年（1088）、元祐六年兩次省試[①]，於元祐六年馬涓榜登第[②]。紹聖初得官，爲穀城（今屬湖北）令[③]。崇寧三年（1104），洪芻、洪羽入元祐黨籍，洪炎同坐貶竄[④]。後復官，知潁上（今安徽潁上縣北）、譙縣（今安徽亳縣），并有循政[⑤]。宣和年間，蔡京從籠絡人心的目的出發收用時望，令其子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洪炎遂與楊時等相繼進用[⑥]，由此名位漸顯，累官著作郎、秘書少監[⑦]，但也因此陷入政治紛爭的怪圈。宣和三年（1121），蔡京、王黼争權，王黼云："洪炎，京所用，黄庭堅甥也。"徽宗令御史臺彈劾，洪炎遂免[⑧]。罷官後，洪炎閑居家中，與徐俯、洪芻、李彭諸人來往。靖康元年（1126），洪芻、徐俯徵召入京，他作《奉送駒父師川二郎中赴召四言》送之，末云："嗟予去國，三葛於休。止車生耳，永謝鳴騶。揮袂江干，長嘯林丘。"（《全宋詩》第14752頁）可見，對於去國閑居的生涯，洪炎不無幽憤之感。

---

① 見洪炎《豫章黄先生退聽堂録序》，《黄庭堅全集》第4册，第2379頁。

② 《師友雜志》："玉父戲信民曰：'某是范淳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 范祖禹（淳夫）元祐六年（1091）同知貢舉，洪炎爲是榜進士。

③ ［清］謝旻等《江西通志》卷六十六《洪炎》引《南昌耆舊記》云："舉進士，爲穀城令。"（《四庫全書》第515册，第311頁）而《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引《百家詩選》，云洪炎"登第元祐之末，試吏紹聖之初"。（《四庫全書》第933册，第38頁）

④ ［清］陸心源《宋史翼》卷二七："坐以兄弟罹元祐黨，同貶竄。"中華書局，1991年，第284頁。

⑤ 謝旻等《江西通志》卷六十六，《四庫全書》第515册，第311頁。

⑥ 見《能該齋漫録》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99頁。

⑦ 謝旻等《江西通志》卷六十六，《四庫全書》第515册，第311頁。

⑧ 見方勺《泊宅編》卷七，中華書局，1983年，第40頁。

本年金兵渡河。洪炎遷居故居東北隅，有《遷居》詩云："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咨謀愚見（拾）[捨]，就列筋力微。竊食奉祠禄，永負伐檀詩。松楸幸在望，鄰曲不見遺。葛巾隨里社，庶以保期頤。"（同前，第14753頁）準備終老故里。建炎初，洪炎除秘書少監，不赴[①]。建炎二年（1128），黄庭堅故人胡直孺知洪州，囑洪炎編次山谷文集。洪炎早留心收集舅氏詩文，自言："撰次既契夙心，而外家所托，他人或不預聞，故不復辭。"[②] 他主持編撰的《豫章先生文集》，後來成爲黄庭堅文集中最權威的版本，也是我們今天黄庭堅研究的基本資料。

北方點燃的戰火很快燒到了江西。建炎三年（1129）秋冬間，金兵渡江南下。十月，金人陷壽春府（今安徽壽縣）、黄州，復自黄州渡江，自大冶縣（今屬湖北）趨洪州。十一月，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洪州陷。洪炎倉皇逃到南昌西面某地的龍潭院，他有一個喜愛的侍兒小九在這場逃難中失散。十二月，金人居洪州。洪炎聞之，作《己酉歲十一月二十六日避寇至龍潭院十二月十五日作五首》（其五）："宵旰憂雖切，咨謀策靡長。築壇推騎劫，假節得糜芳。已矣重江險，哀哉古豫章。蓬茅今在否，矯首恨難忘。"（同前，第14735頁）戰火燃燒到家門，帶給他的是切膚之痛。

建炎四年（1130）四月，入侵江西的金兵始自荆門（今屬湖北）北歸。六月四日，洪炎回到家鄉，發現南昌已成爲一座空

①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十九，中華書局，1988年，第2册，第1023頁。
② 洪炎《豫章黄先生退聽堂録序》，《黄庭堅全集》第4册，第2380頁。

城，自己的故居亦無復尺椽。江西本年又有盜賊馬進、李敦仁的進犯，他遂離家避難。年底至建昌麻姑山。紹興元年（1131）年初，至行在越州（今浙江紹興），登越王山①。其後又南行，經信州上饒（今屬江西）② 到達福州（今屬福建），遂寓居於此③。紹興二年（1132）正月，徐俯除左諫議大夫，自昭州（今廣西平樂）召赴行在，八月途經福州，與洪炎見面。洪炎有《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詩云："欣聞白鶴歸華表，更想黄能出羽淵。客舍一樽雙淚落，相逢里社復何年。"（同前，第 14749 頁）徐俯的徵召使洪炎不由對洪芻的放還寄予了幻想，而里社之友竟相逢於異鄉，其中的況味，是悲喜參半。

是年十月洪炎亦因宰相薦，起爲秘書少監④。取道信州，抵達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十一月，洪炎兼權起居舍人⑤。紹興三年正月（1133），以秘書少監守中書舍人⑥。"時方倥偬，除目填委，炎操筆立成，訓詞典雅，同列嘆服。"⑦ 顯示出深厚的文學素養。可是洪炎此時耳朵重聽、老病纏身。他對高宗説："臣中年頗病於聽，老而益增，然世人皆聾於心，臣則聾於耳。

① 洪炎《静思院上元日二首》作於紹興元年，詩云："麻姑山换越王山，憶昨下元今上元。"（《全宋詩》第 14744 頁）

② 見洪炎《信州逢寒食》，《全宋詩》第 22 册，第 14745 頁。

③ 洪炎有《次韻和古田縣丞方景南見惠詩》云"低飛乳燕聲相接"（《全宋詩》第 14746 頁），可知初夏到福州古田縣。又有《福州程使君止戈堂二首》，想見他當寓居福州治所候官，故得與太守唱酬。

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十九，中華書局，1956 年，第 2 册，第 1023 頁。宰相薦事，見《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

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同上，第 1038 頁。

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二，同上，第 1065 頁。

⑦ 《江西通志》卷六十六，《四庫全書》第 515 册，第 311 頁。

心則了了，惟上所使。”[1] 到了本年四月，又以足疾不能上朝，罷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既而言者論之，遂寢前命。洪炎再乞外祠，許之。五月，改崇道觀[2]。十一月，洪炎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臺州崇道觀的身份卒於信州，年六十七，詔轉一官致仕，官給葬事[3]。

洪炎嘗與王銍同作《侍兒小名録》[4]。又編列仙臞儒事迹三卷，號《塵外記》，并手録雜家小説行於世[5]。其詩文集，有《江西詩派》本《西渡集》一卷，爲《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詩集類”及《宋史·藝文志》著録。是集有宋漫堂一卷本鈔本、鮑氏知不足齋二卷本鈔本流傳，而以漫堂鈔本較古較善。傅增湘嘗借宋漫堂鈔本以校惜分陰齋本，補諸本所遺《初至臨安》及《再任秘書監》等詩五首，藏國家圖書館[6]。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輯《全宋詩》，未參傅增湘校本，故此五詩依舊遺漏。

二、人生境遇的悟證

洪炎詩歌，《直齋書録解題》《宋志》著録《西渡集》一卷，

---

①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引《百家詩選》，《四庫全書》第933册，第38頁。

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四，中華書局，1956年，第2册，第1090～1091頁。

③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十，同上，第1177頁。

④ 舊題洪芻、王銍同作。《清波雜志》卷九《侍兒小名》條注云：“性之（王銍）之子明清云：‘先公與洪玉父共成此編，非駒父之所續也。’意此語當得其實，煇傳本誤矣。”（《清波雜志校注》，第390頁）既是當事人兒子的聲明，自當信從。

⑤ 謝旻等《江西通志》卷六十六，《四庫全書》第515册，第311頁。

⑥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五《西渡集》。

今《西渡集》鈔本傳世，學者多以此本爲洪炎詩歌完帙[①]。其實，從《己酉歲十一月二十六日避寇至龍潭院十二月十五日作五首》至《盛彦光次韻見和復用原韻因以自嘆》詩有條不紊的繫年編次來看，《西渡集》當爲洪炎自編詩集中之一本，起於建炎三年，終於紹興二年[②]。此集入《江西詩派》本而爲《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而編撰於此集之前的洪炎其他詩集，未經《詩派》本收録，早已在時間的流逝中亡佚。

與兩位哥哥一樣，洪炎詩歌也步趨山谷。《西渡集》中不乏"輟哭人歌行路難，畏人無地出人間"、"此國非燕南趙北，我琴無濮上桑間"（《公實示閑字韻詩悵然有感次韻奉和三首》，《全宋詩》第 14737 頁）、"亂山中斷水横流，水際招提對山起"（《二月十二日偶成》，同前，第 14745 頁）、"人隨乘雁集，地隔一牛鳴"（《信州逢寒食》，同前，第 14745 頁）這樣刻意鍛煉的句子。而整首詩歌如：

> 青山愛客長青眼，白水知時泛白雲。少日悲歡纔一瞬，中星寒露又平分。稻粱狼藉餘栖畝，雀鼠穿窬自立勛。一葉已驚秋意早，映階黄落更紛紛。（《戲和公實感秋對酒》，同前，第 14740 頁）

---

① 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六云："炎詩酷似其舅，今全集巋然獨完，殊足寶貴。"（中華書局，1965 年，下册，第 1346 頁）

② 今傳本《西渡集》自《盛彦光次韻見和復用原韻因以自嘆》後，尚有《夢中作四言用前韻二首》等詩十七首，編年無序，顯爲後人增補洪炎逸詩，綴原《西渡集》後。

前三聯，對偶頗爲講究。首聯運用句内重複之顔色對，以工整見長。頷聯以“悲歡”對“寒露”，是方回所説的“用字虚實輕重”、“外若不等，而意脉體格實佳”的“變體”[①]，以異質平衡的原則，牽連安排着時間、情感、日月星辰。頸聯亦爲變體——前半“稻粱狼藉餘栖畝”語序倒裝、表達意義爲正，後半“雀鼠穿窬自立勛”語序爲正，而又拗折以曲喻表達。在一系列曲折張力之後，以“一葉”牽動“紛紛”落葉作結，又回復到自然的平衡。此詩有意學習山谷，表達却頗爲自如。錢鍾書先生説洪炎“雖然没有擺脱《山谷集》的圈套，還不至於像鸚哥學舌，頗能够説自己的話而口齒清楚”[②]。在揣摩山谷句法的同時“能够説自己的話而口齒清楚”，在三洪中間，這就很不簡單。

不僅如此，《西渡集》所收乃洪炎生命最後幾年内的作品。此數年間，洪炎本期頤養天年，孰知遭逢家國之痛、流離之苦、君王眷顧之恩，情勢千變萬化，人生波瀾洶涌起伏，爲他久經磨煉的詩筆展開一幅可堪揮灑的畫卷。在生活的歷練下，洪炎詩歌超越對詩藝的追求，上升到人生境遇的直接悟證，因詩記事，有爲而發，溯黄庭堅而上，得窺杜詩奥域。兹以《庚戌歲六月四日至洪城舊廬無復尺椽悵然傷懷用丙午歲遷居詩韻》詩爲例：

南州一炬火，我歸無所歸。六月下驚湍，一葉正復敧。空城何所有，城闕雙闔扉。遺氓四五輩，喔咿蟲鳥栖。潭潭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1128頁。
② 錢鍾書《宋詩選注·洪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109頁。

> 大都府，灰滅餘空基。委重者誰子，汝實凡且卑。螻蟻輕民命，泥沙捐國貲。犬狼肆噬嚙，驅逐乃其宜。胡為使羣吠，如惡草蔓滋。哀哉三萬室，鍾此百六期。故居不可識，將是復疑非。階前手種花，自憐托根微。露草相對泣，吟風作悲詩。人言城門火，魚禍自靡遺。我亦無泪哭，且復一解頤。（同前，第 14739 頁）

國破山河在。詩人筆下的南昌，不再是少年時與諸友盤桓的都會，而是經金人屠戮後觸目駭然的空城。此詩沉鬱頓挫，一氣而下。中間一段文字論守臣之弃城降敵，以正論史筆，提虛字之拘旋、節奏之排比，此乃得之老杜。又《山中聞杜鵑》：

> 山中二月聞杜鵑，百草爭芳已銷歇。緑陰初不待薰風，啼鳥區區自流血。北窗移燈欲三更，南山高林時一聲。言歸汝亦無歸處，何用多言傷我情。（同前，第 14736 頁）

此作於避寇山中之時。非杜鵑多言，乃詩人驚心。而啼鳥之流血，實亂世詩人之感慨。江西宗派以學杜爲綱領，然多局限於篇章字句的察察然計較。洪炎晚年有與杜甫相似的經歷，在苦難的承受中，以詩歌的語言直契人生境遇，雖未能如杜詩之悲天憫人，也寫出了亂世中人的真切感受。從這一點來説，傳世之《西渡集》，應體現了洪炎詩歌藝術的最終成就。

第四節　徐　俯

黃庭堅在《書倦殼軒詩後》中，對四洪的評價是"皆能獨秀於林"，而對徐俯的評價却是"萬人敵"，意思是：四洪皆能名家，而徐俯可以有更大的成就。後來果然如此。與三洪的規行矩步相比，徐俯學習山谷詩法，對其詩學趣尚却不完全奉行。他曾說："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①] 這正可見他自爲主出的氣魄。

一、生平簡述

徐俯（1075～1141），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洪州分寧人。他的母親是黃庭堅從姊。父親徐禧，字德占，黃庭堅表兄[②]。徐禧是宋史中一個頗具争議的人物。他少有志度，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遂以布衣充檢討，從此節節高升。元豐五年（1082）四月，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遷給事中。五月，遣治鄜延邊事。九月，永樂陷，力戰死國。贈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書，謚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

永樂之役在新舊黨争中是一個轉折性事件。神宗變法的根本

① 惠洪《冷齋夜話》卷十，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2頁。

② 參周裕鍇《黃庭堅姻親考》，載《九江師專學報》1988年第2期。

目的是要强大邊事，解除北方及西北邊疆的隱患。對西夏的軍事行動，是牽制北方强大遼國的重要戰略步驟。而永樂的慘敗，無疑是對新法運動的一個重大打擊。據説兵敗的消息傳到朝廷，神宗涕泣悲憤，爲之不食。事關黨争，舊黨人士往往苛責徐禧的志大才疏、妄開邊釁，而不體諒他的以身殉國。對此黄庭堅深感不平，有《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寄望於年少的徐俯：

> 余聞師川同學諸生言，師川胸中磊磊，殊不類童子。每念德占心醉六經，知其要處，龜玉毁於櫝中，未嘗不隕涕也。今師川尚能似其先人，以澡雪天下横議德占者。(《黄庭堅全集》第1606頁)

徐禧死國時，徐俯方八歲，以恤典授通直郎。如山谷所言，徐俯"尚能似其先人"。他禀承了父親的文采與感激論天下事的氣概，很早就表現出高遠志向與過人的文學才能。徐俯七歲能詩，十三歲以《紅梅》詩受到東坡贊賞①，曾向山谷表示："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② 以修養與志節自期。五甥中間，黄庭堅對徐俯最爲看重。他曾見徐俯《雙廟》詩，鼓勵諸洪進步。與四洪相比，黄庭堅對徐俯没有太多具體詩法的指導，而是提出"君子之言行，不但爲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與徐師川書》，同前，第1868頁）的

① 見曾季貍《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306頁。
② 見黄庭堅《與徐甥師川》，《黄庭堅全集》第2册，第485頁。

寄望，期之於大者、遠者。

徐俯是新黨子弟，并娶新黨二號人物吕惠卿的侄女[①]。他激憤於蘇軾“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②] 語對乃父的苛刻評價，却深受蘇黄詩學、二程理學的熏陶，澡雪經義，砥礪志節，究心詩文，成爲元祐文化的擁護者。在他生命的前半期，“一向以詩酒自娱，放浪江南山川間，食祠禄者四十年”[③]，顯然對元祐黨禁下的時局有不滿。紹聖年間，他擇交不妄出，曾擔任有“莞庫之煩”的微官，元符元年（1098）辭去，奉祠，寓居同安(即舒州，今安徽潛山)[④]。元符三年，他上書直言，入邪下等。建中靖國元年（1101），在海陵（今江蘇泰州）從陳瓘遊，爲士論所壯。不久後，徐俯回到家鄉，閑居南昌。看來，這種閑廢的狀態有利於他文藝的發展。崇寧初，徐俯就已經被江西諸人佩服，大觀、政和年間，更因倡導豫章詩社，被視爲山谷詩學的傳人、江西詩壇的領袖。

宣和年間（1121），徐俯被辟爲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從此步入仕途。而甫入仕途，徐俯就暴露出其性格上的缺點。他恃才傲物，不肯居人下，嘗取太守陳珹所判而抹改之，然非所長[⑤]。後弃官去。靖康元年（1126），徐俯與洪芻同被徵召，仕尚書員外郎。靖康二年三月，金人扶植張邦昌稱帝，徐俯不拜僞

① 見李廌《師友談記》，中華書局，2002年，第31頁。
② 蘇軾《吕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蘇軾文集》卷三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册，第1100頁。
③ [宋] 王明清《揮麈録後録》卷八，《四部叢刊初編》本。
④ 見黄庭堅《與徐師川書》，《黄庭堅全集》，第2册，第479頁。
⑤ 《揮麈録後録》卷八。

帝，憤而致仕。當時一些官員，如工部侍郎何昌言及其弟昌辰改名以避張邦昌諱，徐俯獨名婢曰“昌奴”，客至則呼前驅使之。他又曾在大庭廣衆下當着吕本中的面大駡其父好問，雖然這件事情後來被證明是徐俯的誤會，但在當時，足見其嫉惡如仇的性格。如上數事，都是在國家危難時節著名的節氣示範，與洪芻的爲虎作伥形成鮮明對比。

建炎三年（1129）七月，徐俯落致仕，奉祠。爲躲兵亂，他先後流徙於太湖流域、廣中等地。高宗屢於山谷集中（即洪炎所編《豫章先生文集》）見稱道徐俯，對他頗有好感，内侍鄭諶及徐俯故友胡直孺、汪藻又叠相推薦，遂擢之以不次。紹興二年（1132）正月，除徐俯右諫議大夫，詔赴行在。他從昭州出發，取道福建，經漳州（今屬福建）、福州，十一月，抵達行在臨安。高宗賜他同進士出身。徐俯甫任言職，就慷慨言事，十二月，劾罷汪伯彦[①]，從此青雲直上，仕途頗爲順利。

紹興三年正月，徐俯兼侍讀。二月，爲翰林學士，旋改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按舊例，僉書樞密院下執政一等。高宗爲表示對徐俯的禮遇，特詔均禮，又例外賜金帶以示榮寵。紹興四年二月，徐俯參知政事[②]。此兩年間，徐俯的政治事業達到頂峰，但其志大才疏的毛病也顯露無疑。他往往蔑視同僚，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又與吕頤浩争權，縱門下僧犯罪，有玩弄權術的嫌疑。紹興四年三月，襄陽（今湖北襄樊）失

①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一，中華書局，1956年，第2册，第1052頁。
②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二至七十三。

守，中書集議。趙鼎主收復，徐俯主放弃[1]；趙鼎建議用岳飛，徐俯持議不可。二人論兵不合，徐俯傲然曰："公何足以知此！"被趙鼎以"鼎不足以知之，豈若師川之讀父書耶"語反唇相譏[2]。紙上談兵確實是徐氏父子的毛病[3]，徐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又劉光世乞入奏，徐俯欲許之，趙鼎以爲不可。紹興四年四月，徐俯以議事不合罷，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宫[4]。紹興九年知信州。明年十月，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紹興十一年，徐俯卒於信州，年六十七[5]。

徐俯治《春秋》，嘗向高宗進《春秋解義》[6]，已佚。乾道三年（1167），周煇輯徐俯奏議十卷、雜文一卷[7]，亦不傳世。其詩則板行，《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東湖集》三卷，《宋史》本傳著録詩歌全集六卷，皆佚。惟《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一四《東湖居士集》一卷及保留在宋人文集、筆記、詩話中的一些單篇、斷句傳世。

二、悟入與中的

與三洪一樣，徐俯從小接受黄庭堅指點，受舅氏詩風的影響。但與三洪籠罩在山谷光芒下亦步亦趨相比，徐俯在學習的同

① 據《朱子語類》卷一三二，中華書局，1986年，第8册，第3171頁。
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十五，第2册，第1244頁。
③ 後來岳飛出兵，果復襄陽（見《宋史》卷三百六十《趙鼎傳》），可見徐俯持議差矣。
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十五，第2册，第1244頁。
⑤ 《宋史》卷三百七十二《徐俯傳》，中華書局，1978年，第33册，第11540頁。
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三，第2册，第1067頁。
⑦ 《清波雜志校注》卷五，中華書局，1994年，第194頁。

時，似乎隨時準備提出自己的意見。如《童蒙詩訓》記載：

> 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為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衹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説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緻耳。”①

好一幅山谷訓甥圖！在親切的交流氣氛中，徐俯的率而對答與諸洪的“皆以爲然”形成鮮明對比，反映了他們性格的差異。徐俯詩歌善學山谷，性格却禀承乃父，恢弘疏闊，不肯居人下。他不滿於吕本中《宗派圖》中給他的第七位排名，説：“我乃居行間乎?”晚年更以山谷爲外家，欲高自標立。嘗答客以小啓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又序《修水集》有“造車合轍”之語②。徐俯如此標榜，有數典忘祖的嫌疑，但自成一家正是山谷對後學的要求。徐俯詩歌雖未脱盡摹仿，但確乎有自己的感悟，所謂“知之濠上”，也非爲誑語。

徐俯作詩重視章法、句法，嘗語人曰：“作詩要當無首無尾聲”③、“作詩回頭一句最難道”④。他的學生曾季貍在《艇齋詩話》中指出，徐俯作詩好點化前人詩句，如“一朝因王造，千年與客遊”之用杜詩“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此身終擬拂衣

① 《宋詩話輯佚》下册，第 592 頁。
② 《清波雜志校注》卷五，中華書局，1994 年，第 194 頁。
③ ［宋］吴可《藏海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338 頁。
④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296 頁。

間”之出謝靈運“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吕侯離筵一何綺”出選詩之“高談一何綺”、“高文一何綺”等；又他作詩精於鍛煉，如“沙邊真見雁，雲外醉觀星”星（醒）醉、真雁（贋）之借對，“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之用同姓事而不覺，“早弃魚須伴我閑”之善用借代，如上種種，無一不體現出山谷家風。然徐俯對詩歌的體悟還不止於此，正如曾季狸的歸納：

後山論詩説换骨，東湖論詩説中的，東萊論詩説活法，子蒼論詩説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①。

“中的”就是恰到好處。徐俯關於“中的”的原話已不存，我們可以從他有關“作詩法門”的論述，看他對詩歌本質的認識：

汪彦章為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棬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忘實之想也。”彦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準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96頁。

故彦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①

所謂"即此席間杯棬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乃强調作詩要有實感。詩思觸發之後，則又須"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行文布局接受"意"的統轄。徐俯還説："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祇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鋭，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② 徐俯所説的"意"，不僅是如山谷詩歌的寫意手法，也包含了詩人情感的觸發。在對景能賦的基礎上，纔談得上以意剪裁，這就是徐俯於詩歌悟入所在。

三、法度與情韻

徐俯又答人問句法云：

人言春事已，我言未遽央。試向後湖去，菰葉如許長③。

學者問作詩句法，徐俯却説：人人都道春事已了，而我却要告訴你，離春天的結束還早着呢！不見後湖的菰葉如許之長？這

①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四，《四庫全書》第1039册，第545頁。
② 《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89頁。
③ ［宋］吴聿《觀林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125頁。

首詩告訴學人，詩歌的句法非在察察然詩句本身，而在能看見春事未遽央的詩人之眼，是詩思的觸發、詩情的撩撥。這在江西詩派重法度的詩論中，無疑是一種自省與反撥——畢竟，無論章法如何穩妥，句法如何新奇，若無詩的心靈、詩的感受，也不過是壓韻的散文而已。

徐俯崇尚清麗一派詩風。詩云：

> 憶昔余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祇今耆舊無新語，賴有廬山病可師。（《畫虎行為吉州假守蘇公作》，《全宋詩》第15834頁）

荆公詩清麗工雅，祖可詩情韻悠長。在重理致而欠情韻的宋詩人中，徐俯心許此二人，詩學好尚可見。他還進一步推崇晚唐詩，説："荆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① 又説："韋蘇州詩，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② 在宋人稱贊古淡的地方看到流麗，這就是見仁見智。宋詩以筋骨思理見長，山谷"以意勝"的詩歌又是宋詩的成熟樣式，深於法度、勝於氣骨，但於情韻略遜。徐俯所見，正可矯江西之弊。他曾説："吾平生正坐老杜見誣。"③ 反對祇取法某位詩人，哪怕這個詩人是杜甫。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93頁。

② 《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二《經籍六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下册，第1915頁。

③ 見周紫芝《書徐師川詩後》，《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四庫全書》第1141册，第475頁。

又告訴後學："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黄，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① 將詩學取法的資源上溯到《文選》，在意態自然的古詩中，挹取法度凝固前的情韻芳芬。徐俯自已的詩歌在苦心經營的同時，也正能够清雅流麗，如《戊午山間對雪》：

雪中出去雪邊行，屋下吹來屋下平。積得重重那許重，飛來片片又何輕。檐間日暖重為雨，林下風吹再落晴。表裏江山應更好，溪山已復不勝清。(同前，第 15832 頁)

據説徐俯以"積得重重那許重，飛來片片又何輕"聯自矜，以爲比黄詩的"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咏雪奉呈廣平公》，《黄庭堅全集》第 158 頁）後出轉精。此詩前半字字推敲，有摹仿山谷的痕迹，但由於詩歌情感的豐裕有餘韻，故本詩雖出於鍛煉，仍輕倩可喜。他善作清空自然、婉轉流麗的絶句，如名作《春日遊湖上》：

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蘸水開。春風斷橋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陰來。(《全宋詩》第 15838 頁)

這首詩構圖精工，設色濃鬱，情思婉轉，餘韻悠然，爲絶句之正體。又如下面兩首：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296～297 頁。

嶺近山相屬，江通水不流。無雲方萬里，有月正中秋。（《廬陵中秋對月》，同前，第15837頁）

水面無波千里鏡，日斜倒影一溪紅。漁舟不動飛鳥急，淡淡碧烟蘋末風。（《章江晚望》，同前，第15838頁）

惠洪論徐俯詩云："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州落照中，未暇寫也。"① 爲徐詩傳神寫照，不愧爲僧中詩史。翁方綱論徐俯詩"清逸"②，亦爲有識。如李彭的評論："徐詩到平澹，反自窮艱極。周鼎無款識，賞音略岑寂。"（《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同前，第15878頁）徐俯詩法度、情韻并重。如果説，他前期詩歌還以工飭清麗爲主要特色的話，到了晚年，則更去其雕琢，趨於平淡，自稱"作詩至德興，方知前日之非"③。對他而言，詩歌的感受是一個不斷發展的人生悟境，至少在這一點上，他有自成一家的氣度和膽略。論者或以爲："師川詩律疏闊，其説甚傲，其詩頗拙。"④ 非平情之論。

① 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清］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23頁。
③《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93頁。
④ 方回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816頁。

第六章
臨川四友

呂本中晚年作《師友雜志》，第一則追憶他的臨川朋友：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相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為詩文，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德操早去鄉里，至黄州，從潘大臨邠老遊。後遊京師。元符間，客知樞密院曾布子宣家。子宣遇之極厚。上皇既踐阼，稍收用舊人。德操上子宣書，請引用蘇子瞻、黄魯直諸公。不能，即辭去。崇寧初客宿州，從予父祖遊。後往鄧州。滎陽公使之見香岩智月師，遂悟道，祝髮，更名如璧。後遊江淮間，與予家數相遇，相親如骨肉也。無逸浮湛里閭，雖甚困，然未嘗少屈。汪革信民少饒、謝數歲，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兄。

上述饒節、謝逸、汪革三人，加上謝逸的從弟謝薖，是爲臨川四友。此四人有山谷詩法的淵源、伊洛淵源的傳承，是江西諸人的重要成員，又與呂本中保持密切交往。他們不僅以詩歌，亦

以節義著稱，是江西宗派的重要人物。

第一節　謝　逸

謝逸數舉未第，終老鄉里，却因爲良師益友的琢磨，成爲理學傳人和臨川詩人的領袖。他的詩歌風格雋拔，時露清新，以古詩見長。吕本中圖之爲江西諸派第三人，無論於詩品於人品，他都當之無愧。

一、生平簡述

謝逸，字無逸，一字夷季，陽夏謝氏後裔[①]，其五世祖自金陵徙臨川[②]，遂爲臨川（今江西撫州臨川區）人。謝逸生於熙寧元年（1068）[③]，少孤，力學，築溪堂於臨川城北，爲臨川詩人之佼佼者。元祐時期，他往南昌訪洪朋，得到後者“春來入詩壘，窺杜逮户牖。筆力挾雷霆，句法佩瓊玖”（《送謝無逸還臨川》，《全宋詩》第14440頁）的評價。據説黄庭堅和陳瓘讀謝逸詩，認爲不亞於張耒、晁補之，將其詩文置於張、晁集中，連蘇

① 其從弟謝薖有《約諸人遊羅坊觀》云：“陽夏吾鼻祖，人物傾九州。”（《全宋詩》第15783頁）

② 見謝逸《江夫人墓志銘》，《溪堂集》卷九，《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547頁。

③ 二謝生卒年，據王兆鵬《南宋十六家詞人生卒年小考》，《唐宋詞史稿》，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340～344頁。

軾也不能分辨[1]。看來謝逸詩名早著，并得到文壇宗主的許可。

謝逸與汪革、饒節友善。崇寧初，汪、饒二人在符離從吕希哲學，謝逸也托汪革寄書吕希哲，成爲理學的傳人，也從此聚徒授學。他參加過紹聖四年（1097）、大觀三年（1109）、政和元年（1111）幾次省試，皆落第，生活十分貧困。據説溪堂東鄰有雕刻佛像的匠人，嘗遊京師，得將仕郎回家，每日華裾細馬，閭里聚觀。謝門弟子爲此不懌者數月，而謝逸本人安之若素。大觀元年（1107），蔡京設“八行”科取士，以“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内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凡有八行實狀，鄉上之縣，縣延入學，審考無僞，上其名於州”[2]，頒各路實行。知撫州朱彦欲薦謝逸於朝，謝逸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在出處去就之間以節操自守。本年惠洪曾訪謝逸，留下關於他生活片段的記載：

> 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蕴。予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無逸誦書掃除。顧見予，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至。弃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説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面，做作不

① 惠洪《跋謝無逸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選舉三》，中華書局，1978 年，第 11 册，第 3666 頁。

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更若不會，换手槌胸。"①

這段記録生動地描繪出謝逸安貧樂道的風範。不過，這種風範更多的是有顔子簞食瓢飲在陋巷的意味，惠洪以龐居士相比，并不十分貼切。謝逸非但不忘情世事，相反，他有强烈的淑世情懷，衹是在黑暗的年代，不得不走着一條獨善其身的道路而已。曾經，謝逸晞髪庭中，被童子指出有星星白髪，"深懼湮滅無聞，而道不行於世也"②，作《感白髪賦》云：

余弱齡之多艱兮，蓋嘗苦其心志。矧思之刻深兮，衹益戕乎血氣。惟白髪之生兮，孰不驚夫老之將至！年幾有立兮，竟何補於斯世？道若塗若川兮，雖勤而不濟；茫茫無所歸宿兮，聖賢何簡予而遐弃！蹈前修之軼軌，愛而不見兮，猶彷佛乎夢寐。事業不加進兮，宜聲名之晦晦。固欲顯其親兮，嗟立身而無地。朝夕藜藿之不充兮，妻子之裘葛不備。矧欲行其他兮，致當今之平治。曷以宣吾心之湮鬱兮，將轉喉而觸諱。聊寄懷於翰墨兮，兹亦不試而故藝。字漫滅而無誰語兮，不若緘縢於篋笥。抱耿耿之壯懷兮，無蒯緱而疾視。嗟秋菊之未掃兮，俄春蘭之可刈。悲床下之蟋蟀兮，又鳴蜩之嘒嘒。何羲和之不我留兮，馳日車而迅逝。吾固知浮沉於閭里兮，衹悵悵而卒歲。非不欲潔己而澡行兮，奈托身

① 惠洪《冷齋夜話》卷七，《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頁。

② 謝逸《感白髪賦序》，《溪堂集》卷一，《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476頁。

乎鮑肆。日三沐而三熏兮，常恐同於臭味。人生一世之間兮，孰不求於適意！居悒悒而不聊兮，徒孤笑而永慨。君之閽深且遠兮，曷不上書而陳事？公侯之門高而峩峩兮，亦有長裾之可曳。胡不駕言而遠遊兮，四海豈乏乎兄弟！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漱濯乎污人之膩。望鴻鵠之高舉兮，凌赤霄之逸翅。聊以快平生之孤憤兮，雖星星而不愧。蘄有所遇兮，又以謝童子之戲[①]。

人到中年，突然發現老之將至，回顧來路，檢點目前的生活狀態，不由百感交集。“懼湮滅無聞”是個人價值不能實現的焦慮，“而道不行於世也”意味着人生理想的懸置。少年時就苦其心志，老大却無補於世，報國無門，立身無地，惟孤笑而永慨而已。政和元年（1111）冬，謝逸與弟赴京師參加省試，風雪載途，病困於道路，於明年初歸家後去世，年僅四十五歲。這是數年間繼洪朋、潘大臨、王直方、汪革後，江西詩派文星的又一次黯然凋落。

謝逸文集《溪堂集》二十卷，紹興二十二年（1152）由撫州守趙士鵬與謝薖《竹友集》同刻於學官。“刀筆方興，士大夫翕然稱贊，工未訖功，而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其書者惟恐後也。”[②] 此本曾經淳熙二年（1175）重修。已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得詩文數百篇，釐爲

① 謝逸《感白髮賦》，《溪堂集》卷一，《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476頁。
② ［宋］苗昌言《謝幼槃文序集》，［宋］謝薖《謝幼槃文序》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

《溪堂集》十卷、《溪堂詞》一卷。“其存者，詩詞約十之七八，文亦約十之四五，已可略見其大概。”① 另有《溪堂詞》一卷，爲《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一所著録，單行傳世②。此外，謝逸尚有《春秋廣微》《樵談》③，及汪革侄孫大經所裒《溪堂師友尺牘》六卷④，已佚。

二、贈答詩的風采

在“徒孤笑而永慨”的生涯中，與朋友的交往是謝逸情感生活的重心，他的詩歌，十之八九爲贈答、唱和之作。其中，有與臨川詩人的分韻唱和、與宗派諸友的書信贈答，還有與其他師友、門生的酬酢。這些詩歌不僅數量衆多，而且成就突出，很能體現江西宗派體詩歌的特色。

謝逸生活在一個“廉耻喪盡、忠義氣塞”的時代，作爲理學家和江西宗派詩人，他肩負着傳承斯文和團結同道的使命，每以道義、節氣與朋友互勉，骨力挺拔、立意高邁，就成爲其贈答詩的第一個特點。他往往在詩中贈人以言：

炙手公卿門，眼底端不乏。吾人倘聞道，執圭同荷鍤。（《送曾伯長》，同前，第 14823 頁）

---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中華書局，1965 年，下册，第 1338 頁。

② 以上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四《溪堂集》。

③ 謝旻等《江西通志》卷八十，《四庫全書》第 515 册，第 739 頁。

④ 見《宋史》卷二百九《藝文八》（中華書局，1978 年，第 16 册，第 5401 頁）、《新安文獻志》卷七七《青溪汪先生（革）傳》（《四庫全書》第 1396 册，第 284 頁）。

科名蓋餘事，文章徒媚嫵，欲築平生基，更師黄叔度。(《送汪叔野》其二，同前，第 14823 頁)

杳杳舉子萬馬奔，傾動場屋風塵昏。失身白袍青幕底，平生乾没三家村。(《送譚子仁遊太學》同前，第 14835 頁)

散見於詩中的這些議論，正大、剛健，予人崇高莊嚴的美感，但不小心的話，這些高論也會成爲詩之外的“意圖謬誤”，使詩歌淪爲説教。與大多數理學家詩人不同，謝逸很少犯這個毛病。他往往以命意之曲折組織議論爲詩歌的結構性因素。這成全了詩歌的立意之美，也可見謝逸詩藝的高妙。舉三首詩爲例：

庵居已是介，又以介名庵。胡為酷好介，毋乃在律貪。人生要當介，君侯恐不堪。富貴不相貸，安得作禪龕。客去自無事，客來不妨談。但能了諸幻，起卧俱無慚。慎勿作住想，如繭縛老蠶。興來出庵去，叢林禪可參。(《王立之園亭七咏·介庵》,《全宋詩》第 14820 頁)

進不驕富貴，立朝如在山。退若羞貧賤，林泉作闤闠。喧静本無相，了在一念間。人皆諳此理，何事可作難。每月一會面，十客九不閑。良時况易失，逝者不復還。老境不汝貸，毛髮半已斑。遊從皆勝事，栖息况禪關。兹會若不勉，對客恐厚顔。諸人胸曠達，高韻不可攀。此意固同曉，作詩勉我頑。(《遊逍遥寺以野寺江天豁山扉花木幽為韻探得山字》，同前，第 14814 頁)

龜以氣而壽，龍以仁而靈。蛇以無足行，蜩以無腸鳴。

大哉天地間，百怪不可名。洋洋西津水，念子行西征。與道如有聞，雁來當寄聲。（《送胡民望入京》，同前，第 14827 頁）

第一首詩咏王直方“介庵”。詩歌首四句從王直方以“介”名庵的用意入題，述庵居之介、以介名庵之介，提問好介之原因，并給出解釋，二十個字抵一大篇議論，對詩歌而言，不過是點題已畢。往下，詩人的思緒回旋在朋友所以“介”的原因及其“介”的情狀，以“君侯恐不堪”的假設，引出“安得作禪龕”的系列假想。最後，詩歌以禪理對“介”居的拔高一路作爲收束，衝破“介庵”的境界，更見詩意高健。詩人深得朋友以介名庵之意，但這種基於共同生存境遇的知己情感的表達，又控制在理性演繹和智性觀照内。詩歌在層層議論中呈露筋骨思理，格韻高遠，蹊徑獨闢。第二首詩的主題是勉勵諸友作詩，開篇却以“進不驕富貴，立朝如在山。退若羞貧賤，林泉作闤闠”的正大議論提起，似乎是小題大做。然而，臨川諸友的“每月一會面”，事實上正是以志節之砥礪、心性之涵養、詩文之切磋爲主要内容。以這樣的高論提起全篇，正見切題而妙。第三首詩送人入京，以四種動物之百怪難名、各得其道立論，寄言門生一路增益見聞，議論而出之於比喻，自然新警。在這些詩歌中，謝逸都能將意圖化爲篇章結構，體現了高超的藝術成就。

與立意高邁相呼應，謝逸贈答詩的第二個特點，是善遺貌取神，描摹友人的氣韻神采。這可溯源到漢末“黨錮之禍”以來興起的人物品鑒之法。漢末宦官當政，處士横議。他們以“清議”

在官方標準外樹立起一種新的輿論系統，更進一步作用於人物的品評，發掘人性美的光彩。北宋末期，黨禍的局面又再現。部分堅守道德的士人選擇蟄伏。他們無赫赫之事功，涵養於内的神采光芒，惟知己能發明、領會。謝逸贈友詩就能勾勒出故人的氣度風貌：

舊聞諸李隱龍眠，伯時已老元中少。一行作吏各天涯，故人落落疏星曉。西山影裏識君面，碧照章江眸子瞭。向來問道渺多歧，祇今領略歸玄妙。老鳳垂頭噤不語，古木槎枒噪春鳥。身在幕府心江湖，左胥右律但坐嘯。第愁一葉釣魚舟，不容七尺堂堂表。我今歸卧靈谷雲，君應紫禁鶯花繞。相思有夢到茅齋，細雨青燈坐林杪。（《豫章别李元中宣德》，同前，第 14835～14836 頁）

薛老峰前古遊俠，脱冠賣劍剪鬚鬣。閉關孤坐百念空，面上老色如秋葉。飄然飛錫華子岡，浪逐西風移步屧。攝衣升堂搥大鼓，是中不賞嗇夫喋。四衆圍繞如堵墻，要觀霹靂飛牙頰。人生一夢幾時覺，相逢栩栩皆蝴蝶。何當蠟屐從師遊，遮莫馮驩老彈鋏。（《送子侃禪師》，同前，第 14832 頁）

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顔。謗書盈篋不復辯，脱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滚滚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送董元達》，同前，第 14833 頁）

木落野空曠，天迥江湖深。登樓眺退荒，朔風吹壯襟。

> 望望不能去，勤我思賢心。此心何所思，思我逍遥子。挂冠卧秋齋，閲世齊愠喜。念昔造其室，微言契名理。擊考天玉球，四坐清音起。别來越三祀，洋洋猶在耳。宵長夢寐勤，月明渡淮水。(《懷李希聲》，同前，第 14815 頁)

如上詩歌刻畫了下層官吏、禪僧、被貶謫及挂冠歸隱的官吏幾種形象。他們的人生失意，意志却不消沉，或“身在幕府心江湖，左胥右律但坐嘯”，或“攝衣升堂搥大鼓，是中不賞嗇夫喋”，或“謗書盈篋不復辯，脱身來看江南山”，或“擊考天玉球，四坐清音起”，兀傲、有節，守道不屈，立身有地，又以清曠閑遠的意味神態，指向審美生存的人生境界。這讓我們想起魏晋名士的神采。謝逸在與友人的贈答、唱和詩中刻畫了許多令人難忘的形象。如《王立之園亭七咏》中的王直方，《贈權師》中的善權，《送汪叔野》中的汪莘，《遊西塔寺分韻賦詩懷汪信民以淵明停雲詩豈無他人念子實多爲韻探得念字》中的汪革，《嘲潘邠老未娶》中的潘大臨，《送惠洪上人》中的惠洪，《聞徐師川自京師歸豫章》中的徐俯，等等。這些詩歌善以實筆寫人物的動作、神情，又能以虚筆發掘其精神境界，似一幅幅簡潔有味的人物素描，合而觀之，則爲艱難時代“狷者”的組像。詩中人物沉淪下寮的生涯并不枯瘠，而是“碧照章江眸子瞭”、“歸來眼冷江湖秋”，因道德的充實、内心的篤定從而氣韻生動。據説黄庭堅讀《豫章别李元中宣德》，到“老鳳垂頭噤不語，古木槎枒噪春鳥”句，大驚曰：“張、晁流也！”陳瓘讀到《送子侃禪師》“攝衣升堂搥大鼓，是中不賞嗇夫喋”的句子，也説：“計其魁杰，

不減張、晁也。”[①] 吕本中則出於宗派詩人的同氣相求，喜愛謝逸寄徐俯（《聞徐師川自京師歸豫章》或下引《寄徐師川》）及李錞（《懷李希聲》）等篇詩[②]。他們正是在這些詩歌中感受到共同的氣味，産生了情感的共鳴。謝逸詩歌一定在當時團結和鼓舞了同道中人，到了今天，還能讓我們擊節喝彩。

最後，謝逸贈答詩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謝逸集中甚少自咏懷抱之作。看來，在“曷以宣吾心之湮鬱兮，將轉喉而觸諱”的時代，他已習慣保持一種克制的沉默。但與二三子的交遊往往能觸動其情感的關塞，啓發他傾訴的欲望。於是，在謝逸這裏，贈答詩不僅具有交際的功能，還充盈着豐沛的情感，“可以興”也“可以怨”。舉二詩爲例：

金風吐商管，秀色浮山椒。苔乾石骨瘦，水落溪毛凋。埃塵暗箯輿，風霜緇客貂。藜羹浥野飯，松醪酌村瓢。會當對榻語，竹塢風蕭蕭。浣腸去舊學，詞源涌春潮。（《懷汪信民村居》，同前，第14827頁）

門外荒園一畝餘，長抛筆硯把犁鉏。天邊風露秋期近，海外交遊音信疏。揚子家貧惟嗜酒，嵇康性懶不便書。龍沙江水連天闊，尺素何嘗寄鯉魚。（《寄徐師川》，同前，第14845～14846頁）

---

① 惠洪《跋謝無逸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見《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97頁。

這兩首詩都以詩人對友人的相知、懷念爲情感底蘊。第一首詩刻畫了山石嶙峋、溪毛脱落、塵埃漫天、風霜黯淡的秋景。它對應着詩人心目中的汪信民村居，於寂寞清寒中皮毛脱落，真實獨存，而又百怪叢生、無施不可的境界，乃詩人的刻意造境。第二首詩，在初秋的背景下，從“門外荒園一畝餘”的狹窄，到“龍沙江水連天闊”的壯闊，把狷者的生涯、知交的繫念寫得意態豐滿、情韻悠然，很能够動人心弦。强烈的抒情性，使謝逸贈答詩結語清幽、造境寒瘦、氣質沉鬱、感慨浩大，極具個性色彩。

謝逸是江西宗派的重要詩人，他有自覺的羣體意識，又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其贈答、唱和詩具“興”、“觀”、“羣”、“怨”四態，很能够反映江西宗派體詩歌的特色。我們可以從他的《寄洪駒父戲效其體》《寄徐師川戲效其體》等戲仿之作，看到江西詩風在唱酬中因相互影響而趨同；也可以從《遊西塔寺分韻得巽字》、《汪信民頃赴符離約謁告還家爲盛集戲作詩嘲之以助一笑仍率諸友同賦》等分韻賦詩中，體會到同道詩人集會，因交遊的愉悦、訪勝之興致，在旗鼓相當的競争中生成的靈犀相通之美妙氛圍；而更重要的，是在道義的互勉和情感的相通上，看到唱和、贈答詩在羣體凝聚上的作用。“兩家子弟俱無恙，一體文章是有師。”（《王立之寄書言其子阿宜漸學作詩及問余稚子夢玉安否作詩奉戲》，同前，第 14849 頁）江西宗派詩人間有大量的詩歌唱酬。其中謝逸所作，無疑最多、最好、最典型，充分體現了江西詩人以道義相勉的成就。

謝逸是一個在尚新時代堅守古道的詩人，詩歌也“學古高

潔，文詞鍛煉，篇篇有古意"[①]。他擅以古體詩抒寫激越清揚、又能回波停滀的情感，五古簡而有法，清真閑曠，七古矯矯不羣，聲律鏗鏘，詩學風格顯豁。他還善於援引古文筆法入詩，以意遣辭，在立意、造境和表達方式上皆有獨造。至於他的律詩，有劉克莊所論"輕快有餘，而欠工致"[②] 的毛病，略欠回鋒逆筆，但并非没有沉鬱頓挫的作品，如前引《寄徐師川》《聞徐師川自京師歸豫章》《重陽示萬同德》等。總的説來，謝逸是宗派詩人中的佼佼者。他的詩歌尚氣質，遒骨力，饒情韻，對應着他本人嚴毅剛正，却又一往情深的氣質，高古挺拔，自成一家。四庫館臣云："今觀其詩，雖稍近寒瘦，然風格雋拔，時露清新，上方黄、陳則不足，下比江湖詩派，則渢渢乎雅音矣。"[③]

第二節 汪 革

汪革，字信民，一字伯更，臨川人。祖籍婺源（今屬安徽），爲唐越國公汪華之後[④]。汪革生於熙寧四年（1071），性孝友，家貧好學，少從饒節、謝逸等遊，敬事二人如親父兄。他曾説，

① ［宋］佚名《漫叟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365 頁。
② 劉克莊《江西詩派·謝無逸》，《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中華書局，1965 年，下册，第 1338 頁。
④ ［宋］周彦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 1376 册，第 283 頁。

家鄉出了兩個丞相，一爲天下之大幸，一爲天下之大不幸。前者指晏殊，後者指王安石[①]。看來，對新黨與新法的批判，是臨川諸友私下裏交流的内容。師友淵源始終是理解汪革的主綫，亦成爲尋找其生命軌迹的連接點。

汪革參加了三次省試，紹聖四年得第，被取爲當年的南省第一。同年謝逸落第。從世俗的眼光來看，汪、謝二人，一青雲直上，一落魄潦倒，地位判若雲泥。然而，汪、謝以道德所在而非世俗眼光相貴賤，在汪革得第這一人生轉折的關鍵時刻，謝逸給了他有益的規勸。汪革得第後，預計自己當爲學官，大量收集時文，以備今後教材之用。謝逸曰："前日不免爲此，爲覓官計爾。今尚復爾，是無時而已也。"[②] 并作《送汪信民序》，勉勵他慕古人之學。汪革虚心受教。他盡焚時文，語人曰："我初從科舉求禄，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椓割之惟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胸臆爲新奇苟異，坐誣古人。"[③] 在以後的官宦生涯中，汪革没有走平步青雲的道路，而是終身守着冷冷的學官，以道德而非功名爲立身標準，不負畏友對他的囑托。

汪革初爲潭州（今湖南長沙）教授。時張舜民爲潭州帥，紹聖元年的狀元畢漸任潭州通判。張舜民待汪革甚厚，而素薄畢漸的爲人。紹聖元年是風會大變之時，時考官取進士答策者多主元祐，及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此紹述

① 晁説之《與呂舜徒書》，《嵩山文集》卷十五，《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見呂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③ 晁説之《汪信民哀辭》，《嵩山文集》卷二十。

之論大興。畢漸爲紹聖元年之狀元，實爲政治風向的產物。而他在潭州通判任上的作爲，也確實令人不齒。元符二年（1099）九月，畢漸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詔從之①。和前科狀元畢漸的相處使汪革進一步認識到科舉制度的弊病，知道自己省元身份的不足恃，更加留心於道德自守。學官的俸禄微薄，但他持身清廉，告誡家人毋持官下一物。嘗丁外艱，同寮醵金爲賻，辭不受。其妻曾置錫水壺，他將此壺投之江中，說："以是污我。"體現了廉潔的操守②。

結束潭州學官任後，汪革調官爲宿州教授。他傍溪築室，取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其二）"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③句，匾堂曰"青溪"。崇寧元年（1102），吕希哲以元祐黨人落職，携子好問、孫本中等寓居符離。汪革早對吕希哲心存景仰，至此誠心投入其門下。吕希哲見他也頗歡喜，比之爲黄憲、茅容。除經史的學習外，吕希哲篤定、冲和、處困境而不惑、履亂世而不驚的氣度，亦予汪革以深刻影響——"於是信民中益邃静，所植遠矣"④。汪革還曾問作文之法於張耒，張耒答之云："足下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功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⑤孰知如水納百川，以能下人而得匯衆長，善擇明師，從善如流，正是汪革的優點。吕氏弟子中，汪革尤稱高

---

① 《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六，中華書局，1957年，第5册，第2188頁。
② ［宋］周彦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1376册，第283頁。
③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一版，下册，第833頁。
④ 晁説之《汪信民哀辭》，《嵩山文集》卷二十。
⑤ 張耒《答汪信民書》，《張右臣文集》卷五十八，《四部叢刊初編》本。

弟。他曾代呂希哲作《毗陵張先生哀辭》，受到乃師的稱贊。詞曰：

> 維古制行必中庸兮，出處用舍道之從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山栖木茹初無庸兮，鳥獸之羣烏可同兮。偉哉先生蹈厥中兮，達不苟進退不窮兮。以仁為爵峻且崇兮，祿雖不富義則豐兮。忠信孝友施家邦兮，載瞻眉宇心則降兮。激貪敦薄助教風兮，固非亂倫而潔躬兮。惠泉遼遶山複重兮，窅然其深如有容兮。桂枝相繚舊青葱兮，先生之廬今一空兮。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詞寫予衷兮①。

此辭高峻危仄，慷慨激烈，再現了死者固窮守節的人格境界，也是汪革本人心志的抒寫。據宋人周彥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汪革“生平深厚不伐，無辭色可見，稠衆中似不能言，赒親友之急，解衣推食無難色。嘗謂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爲?’其學欲明善惡、别是非。張右史耒、陳司諫瓘、遊漢陽皆愛敬之”②，修養可謂厚矣。

大觀元年（1107），汪革宿州學官任滿，入京調官。時蔡京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宗子學博士待之。汪革執手板立政事

① 呂祖謙《皇朝文鑒》卷一百三十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周彥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1376册，第283頁。

堂下，說：“貧不能官京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① 而私下告訴朋友：“吾異時不欲附奸臣傳！”遂還爲楚州（今江蘇淮安）教授。汪革此舉，表現了匹夫之志不可奪的氣概，爲天下所壯。晁説之後來與他見面，發出這樣的感慨：

> 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髮能者。予益多之，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予復嘆曰：“斯人殆不可親疏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於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②

改官楚州後，汪革與謝逸等相約謁告還家而未果。後在楚州學官任上，曾與吕本中、洪炎、晁説之見面。此數年間，汪革喪妻，生活貧寒，身體狀況轉差，惟有與這些師友的交往，成爲他生命後期亮色的回憶。他後期篤於佛教信仰，作詩云：“富貴空中葉，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③ 大觀四年（1110）秋，汪革卒於楚州，年四十歲。旅櫬寄於佛寺。

汪革的去世引起臨川諸友的震痛。政和元年（1111）二月十八日，由吴賀、謝逸等九人籌資，接汪革靈柩還鄉，以城南之地

① 晁説之《汪信民哀辭》，《嵩山文集》卷二十。
② 同上。
③ 見劉克莊《江西詩派·汪信民》，《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安葬。謝逸作《祭汪伯更教授文》，臨風祭奠。當哭的長歌，盡演爲蕩氣回腸的旋律：

> 嗚呼哀哉！廉耻道喪，忠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俗者滔滔皆是，乞食墦間、舐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讒邪如山貪墨成市，而莫之救藥；正人端士無辜籲天，而無以明白。嗚呼哀哉！孰有記問該博文章敏贍如吾伯更之學？孰有忠孝純全操守堅正如吾伯更之德？孰有貧賤困厄而不為利勢所回如吾伯更之勇决？孰有居稠人廣衆中而防患周身如吾伯更之慎默？人誰無兄弟，孰有如吾伯更之愛敬？人誰無朋友，孰有如吾伯更之諒直？至於晚聞祖師之道，而知生死之説，則伯更之高妙超逸，又非寡聞淺見者之可測。奈何家貧母老而益之以憂患，妻死無後而困之以奇疾，一卧不起，奄忽以逝，而遂有幽明之隔也[1]！

這一幕場景不僅昭示着臨川諸友的情誼，在江西宗派歷史中，亦是值得銘刻的情感高潮。汪革一生，年不過四十，位不過學官，但他去世後，吕希哲銘其墓，晁説之爲作哀辭，吕本中欲發動朋友議私謚，足見爲天下士論所重。到了後世，汪革名益高。吕祖謙云："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滎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2]

---

① 《溪堂集》卷十，《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554頁。

② 吕祖謙《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東萊集》卷七，《四庫全書》第1150册，第63頁。

淳熙三年（1176），與謝逸一起繪像祠於郡學[①]。

汪革去世後，其詩文由諸友集爲《青溪集》，謝逸所謂“但餘（清）［青］溪編，萬丈垂光焰”（《集西塔寺懷亡友汪信民以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爲韻探得念字》，《全宋詩》第 14829 頁）者。《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著録《（清）［青］溪集》十卷、《附録》一卷，卷二〇著録《青溪集》一卷，前爲全集，後爲《江西宗派》本，皆佚。《全宋詩》輯詩七首。除詩文集外，《宋史》卷二百二《藝文一》尚著録汪革《論語直解》十卷，已不傳世。

汪革詩歌惟存數首，皆可采。以《寄謝無逸》爲例：

> 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全宋詩》第 14758 頁）

此詩問訊友人，想象對方幽居的環境、安閑的神情，表達自己的同氣之感，訴説惟可爲知者道的心志，更以“妻子同鉏五畝蔬”的互勉作結，疏雋清壯。此詩謝逸、謝薖皆和作，而以原唱爲上。管中窺豹，所見已如此，《青溪集》的亡佚，實在是極大的遺憾。

---

① 周彦約《青溪汪先生（革）傳》，《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四庫全書》第 1376 册，第 284 頁。

第三節 饒 節

饒節在臨川四友中年齡最大，呆在臨川的時間却不長。他很早就離開家鄉，曾遊太學，爲曾布門下客，積極參與政治。此路不通後，他轉從呂希哲問學，後更皈依佛門，成爲禪宗大德。饒節的一生，經歷了從天下志到解脱願人生取向的轉變。與祖可、善權不同，他把禪學參修而非詩歌創作放在首要地位，但禪悟益詩的情況在他身上却得到更好的體現。

一、生平簡述

饒節，字德操，一字次守、進父，臨川人。他生於治平二年(1065)，少與謝逸友善，以志節相尚。十餘歲時即去鄉里，先往黄州依潘大臨，後遊汴京，入太學，數舉不第。在這段日子裏，他衣食窘迫、寄人籬下，飽嘗人情冷暖，但也在王直方、夏倪這兩位朋友處得到真誠的關懷。所謂："世上紛紛走車轍，交情回互作冷熱。縉紳豈無酈寄賣，山林漫有嵇康絶。我窮四方但餬口，一丘一壑志未了。得交天下能幾人，直道如君可偕老。"(《得交行贈王立之》，《全宋詩》第14548頁)"四海交情未有君，解衣推食見情真。平生爛漫如一日，萬里周旋覺更親。"(《寄夏均父二首》其二，同前，第14573頁)他時常參與王直方園的聚會，與洪芻、洪朋等載酒論詩。"當時會合地，爛漫存轍迹"

(《豫章寶智上人持高子詩求和》，同前，第 14554 頁)，王直方園，留下饒節早期窮愁潦倒、放浪不羈的軌迹。

饒節以詩文鳴上庠。元符末，曾布知樞密院，聞饒節名，禮爲上客。陳瓘、陳師道皆與之交遊。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登極，十月，以曾布爲尚書右僕射。曾布當政後引門下士布滿朝廷，在這樣的機會面前，饒節却非合時宜者。他不以曾布爲進身之階，而是希望他參用舊黨，實現中正平和的新政。拜相之初，曾布本人確有此意，但隨着局勢的轉變，他却轉爲倡言紹述，粉碎了饒節對他的期望。饒節曾上書曾布，請用蘇、黄諸公，遭到曾布拒絶。據《老學庵筆記》記載，饒節“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①]。頗有魏晋名士“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的況味。抱着没有出路的苦悶，他於崇寧二年左右離開汴京[②]，往宿州依好友黎確的親戚孫氏，遂與黎確一起，投入當時寓居符離的吕希哲門下。

饒節與汪革、黎確、吕本中兄弟同學，每旬會課，好於切磋學業之餘譏評時政。吕希哲聞之頗不以爲然。有一次，他大病初愈，作《麥熟》《繰絲》等詩歌咏當世。饒節等得詩慚懼，詣吕氏引咎，且和其詩，不欲作前語。饒節和詩尚存：

黄雲千頃起邛山，瓶缶村村自往還。懸知大作今年社，

①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中華書局，1979 年，第 20 頁。
② 據《王直方詩話》，他崇寧二年三月三日尚在汴京，參加了王直方園的聚會。可能在不久之後離開汴京投奔宿州。

我欲從渠季孟閒。(《麥熟》)

摀鐮霍霍穟紛紛，多謝遺餘畀後人。負載歸來對妻子，始知身是太平民。(《拾麥》)

絲在機頭角未乾，兒孫衣褐眼中完。茅檐翁媪自相壽，飽暖渾家感縣官。(《蠶熟》)

似聞有盗起空舍，聞説驅除唾手間。枹鼓不驚鷄自午，先生閉户養三關。(《盗獲》，《次韻吕原明侍講歡喜四絶句》，同前，第 14569～14570 頁)

這組和詩的要義爲：處不平之事，不當有不平之心。看得出，饒節此時已正確理解了老師的深意。這種看透世事而不作爲的態度，是高壓環境中不得已的選擇，亦是佛學修養的成果。吕氏本人參禪信佛，曾在貶謫途中渡橋墜水而不驚，有過一次悟道的經歷。來宿州之前，饒節的思想狀態是走投無路。走投無路者易撞入無路之路，吕希哲爲他指引了一條淡泊世事、不計得失、接近佛學的路綫。後來饒節往鄧州（治今河南鄧縣）依俞彦明，吕希哲介紹他往見鄧州老宿香岩智月禪師①，此行遂扭轉了饒節人生的軌迹。

饒節始見香岩智月，與語，欣然有得。又有一次，僕人詹榮占對異常，怪而問之。詹榮曰："某向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海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體究，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

① 饒節往鄧州，應在崇寧二年以後。《嘉泰普燈録》卷十三言饒節"世壽六十有五，夏臘二十有七"，則饒節出家時間在崇寧一二年左右，恐誤記。

它也。"饒節慨然道："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智月禪師處問道。旬餘，忽掣鏁而悟印，印之以偈，作書報吕本中云："世間元來有此不可説不可説不可説無量無邊勝事，佛言一大事因緣，豈欺我哉!"於是弃婚宦，盡發囊橐而市之，與僕同祝髮。法名如璧，自號倚松道人。僕名如琳，尊爲兄[①]。饒節之出家，乃尋路於無路，最契合禪悟的時機，故一經禪悟，便確定不移。他寄詩吕本中，檢討自己的過去爲"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婆餉遠空"(《次韻答吕居仁》，同前，第 14574 頁)。在他看來，向來與諸友共勉的濟時之志，衹是如佛經所言"譬如人以頻伽瓶貯遠空，以餉他國"[②]，以空濟空而已。世事虚妄，惟有生死大事，決計難逃。饒節從此不再是憂國之士，而成爲一個信心篤定、戒行嚴謹的高僧。難怪賢士大夫初聞饒節祝髮，皆嘆息道："吾黨中失一國士，重爲四海惜。"

饒節早期偕如琳遍參諸名宿，所至蒙肯可。後歸結茅香岩之鶻壁，又曾駐錫杭州靈隱寺。晚年應襄陽守趙公岍之請，於天寧寺開法，衲子争集，方盛而弃去。鄧州帥王仲嶷復請居香岩。當時徽宗聽信道士林靈素之言，抑佛崇道，叢林内部也"苞苴幸引援，側媚乞朝夕。争傳外道語，盜履祖師閾"(《贈卿書記》，同前，第 14554 頁)、"出有造請惡，入懷薪米憂。雖云學道輩，坦途多不由"(《閲舊詩軸見夏均父和晁之道詩次其韻寄伯容仲成均父諸友》，同前，第 14558 頁)，弊端叢生。饒節痛心之餘，感

---

① 據《嘉泰普燈録》卷十三《香岩倚松如璧禪師傳》。
② 據《漫叟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367 頁。

慨道："我欲獨挽之，難哉推陸舟。歸來擁白雲，草茅有前修。"（同前）復弃香岩寺去，隱於鶻壁故廬①。宣和元年（1119）正月，朝廷下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宫，院爲觀。"② 天下衲子茫然失措。饒節時居鶻壁，作《改德士頌五首》云：

自知祝髮非華我，故欲毁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憐憫，復令加我舊冠巾。

舊説螟蛉逢蜾蠃，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物化渾如夢，夢裏惺惺却自由。

德士舊嘗稱進士，黄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

衲子紛紛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缾盤釵釧形雖異，還我從來一色金。

少年曾着書生帽，老大當簪德士冠。此身無我亦無物，三教空名何處安。（同前，第14580頁）

表面上接受德士身份，骨子裏仍保持僧人的本色，這種外柔内剛的態度，正是當年《次韻吕原明侍講歡喜四絶句》的重複。明年六月，詔復寺院額，尋又復德士爲僧。饒節復出茅住持香岩，大力宏揚佛法。他接引後參針綫綿密，每以"不辭傾倒爲君甜，衹

① 據《嘉泰普燈録》卷十三《香岩倚松如璧禪師傳》。
②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四》，中華書局，1978年，第2册，第403頁。

要教君脱舊粘”（《蜜蜂頌四首》其一，同前，第14586頁）的蜜蜂自比，屢勸諸友向佛。曾專爲武將念佛而作《佛米贊》。又説偈曰：“剥剥剥，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剥剥剥。”（同前，第14600頁）可見老婆心切。建炎三年（1129）四月，饒節書偈遺衆，無疾而逝，年六十五。五月，奉全身塔於白崖之下①。

饒節有士人所集《語録》，早佚。其詩文《倚松集》，所録大半爲僧以後作。《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著録全帙十四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二卷。十四卷本久佚，二卷本有影殘宋本及清鈔本傳世。今有沈曾植刊《西江詩派韓饒二集》本、《四庫全書》本，皆以影宋本爲底本②。

二、木上座與管城公——詩禪相通的合理性認同

與祖可、善權兩位廬山詩僧不同，饒節出家後把佛教戒律、禪學義諦放在首位，對他而言，要創作詩歌，應首先取得詩禪相通的合理性認同。這一認同并没有很快地實現。初爲僧時，饒節回復吕本中“東”字韻詩云：“我已訂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次韻答吕居仁》，《全宋詩》第14574頁）表達了掃除文字習性的願望。然此詩一出，却引出吕本中“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③ 的贊嘆。鄙弃“舊管城公”而詩更高妙，這個悖論根植於詩禪關係之間，從來就不易説清。就饒節後來的

① 據《嘉泰普燈録》卷十三《香岩倚松如璧禪師傳》。
②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四《倚松老人詩集》。
③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3頁。

發展而言，他不僅没有因爲“木上座”冷落“管城公”，或因“管城公”疏遠“木上座”，反而同時以高僧與詩僧名世，在禪學修養與詩歌創作上更上一個臺階，其中緣由，值得深究。

“丁寧佛法苦無多，文房四物來作魔。”（《送江南景喜上人》，同前，第14553～14554頁）饒節最初對詩禪關係的理解，是詩歌妨禪，祇是由於實在未能忘情，纔没有斷然放弃創作。在下引《韓升之主簿惠示襄陽雜咏詩淳深高古吟諷不置輒用最後書懷贈彦履韻以釋其意》詩中，他生動描述了自己對詩歌的迷戀：

> 刮磨習氣如洗爵，惟餘好古情未薄。向來詩軸入松門，便對屠門先大嚼。吾儕事業如石田，筆墨磨人妨夜眠。如公萬卷瘖不吐，使者旁午誰見憐。方今神武拓疆土，超擢賢才固其所。莫嘆簿書官禄微，黄鍾大吕生一黍。（同前，第14550頁）

看來，初入佛門，饒節首先要求自己刮磨習氣。但文字習作爲最根深蒂固的執着，却時時蠢動。“向來詩軸入松門，便對屠門先大嚼”的情態，便是他無法抵禦詩歌魅力的寫照。於是，在這段時期，饒節雖然創作詩歌，却視它爲努力革除之物。“吾儕事業”與“筆墨”、“木上座”和“管城公”之間，充滿着緊張感。

然而，“吾儕事業如石田，筆墨磨人妨夜眠”者，無非是尚未透關的拘墟之論。隨着饒節禪悟體驗的加深，他對文字的看法也有了改變：

時人浩浩説無言，政使無言恰是邊。若道阿師能答話，五刑何止更三千。(《送浹上座如餘杭刻慈覺老人語録五首》其四，同前，第14587頁)

此言禪師語録。禪宗講究不立文字，但所謂不立文字、所謂無言者，又何嘗不是一種執着？語言文字，是魔障還是般若，衹在言説者與聽説者之内心轉關。在此基礎上，饒節對詩禪關係也有了更爲透脱的認識。他在《答惇上人七首》中，對這新的體悟作出系統説明：

平生跌蕩坐窮詩，今日論詩似舊時。第一義中無適莫，為君重賦楚人辭。

因君撩我强題詩，却憶當年夢裏時。不識江南好風景，采蘋人唱鷓鴣辭。

朝學中庸暮學詩，晚年長憶蚤年時。如今老大渾彫落，稍欲從君理繫辭。

少矜平子四愁詩，晚學趙州十二時。千里故人不解事，書來猶寄竹枝辭。

漫説一言能蔽詩，五千同具刹那時。嚮來可與言詩者，得志方能不害辭。

鐵面禪師罵學詩，為憐虚度太平時。須知十萬八千偈，不比人間絶妙辭。

非是談禪非説詩，相逢無處亦無時。爐烟趺坐對終日，舊社知音去不辭。(同前，第14588頁)

在這裏，饒節將作爲詩人的舊我和新我作對比，說“今日論詩似舊時”。其實今日雖然“重賦楚人辭”，但與“不識江南好風景”的“當年夢裏時”已大異其趣。套用黃龍派僧人青原惟信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經過“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階段後，重新回到的“見山衹是山，見水衹是水”境界。如果能作到“得志方能不害辭”，則“人間絶妙辭”又與“十萬八千偈”何異？說到底，從參禪的角度來說，作詩與日用百事一樣，悟之前，聖即凡，悟之後，凡即聖，都是參禪的工具和結果；從作詩的角度來看，禪悟的結果使詩人突破習慣思維的桎梏，從盲人摸象的觸摸看到提燈破暗的觀看，觸目皆是、無施不可，開啓了新的境界。至此，饒節取得了詩禪相通的合理性認同，詩歌也突破前作，化煩惱爲菩提，有了般若根性。

三、“舉似雲門第二關”[①] ——爲僧後詩更高

饒節詩歌，可以以出家爲界，分爲前後兩期。前期詩歌，對應着他志不能伸的苦悶，多用歌行、七古、五古等容量大、表現力强的樣式，在騰挪跌擲之間，表達冰炭交煎、牢騷滿腹的感受。《立之作詩譏僕沉浮於酒次韻答之》頗爲典型：

頹俗不可挽，我思陳孟公。胸中一噫氣，浩蕩滄海東。初余亦拙謀，墮身尺度中。昔為吾家駒，今為客子蓬。人生百年耳，過鳥欻無踪。何至自矛盾，身與衆敵逢。仲尼固玄

① 饒節詩語，見《寄夏均父二首》其一，《全宋詩》第22册，第14573頁。

聖，道大自不容。落落少年場，誰復識呂蒙。古今一丘貉，同赴三尺封。乃知常滿尊，慰藉吾人窮。君詩苦相厄，欲抗輒喪雄。但恐百錢債，負我葛陂龍。（《全宋詩》第 14543 頁）

此詩申述士不遇、齊物論、酒徒三大詩歌主題，抒寫看似消極實欲有所作爲的情緒。筆陣堂堂，一力回旋，氣度風味不減古人，吕本中説“德操才高”，看來并非虚言。不過，這種詩歌以個人境遇爲焦慮中心，有唐人風采，却未免與宋代詩歌的走向脱節，可拓展空間并不開闊。

饒節是一個個性鮮明的詩人。出家之後，貫穿他前期詩歌無路可走的苦悶情感找到了突破口，詩歌的主體意識向另一個方向轉變。他仍舊關注自身，但不再是遇不遇，而是悟不悟。試看下詩，體會其詩歌主題的改變：

敝貂去國漫西東，聞説鄉閭夢寐中。賈豎裹頭仍納婦，驪駒將子又追風。雲山何處非投老，文史他年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懶，眼看餘子化王公。（《遇里人道及鄉閭事作詩寄謝無逸》，同前，第 14563 頁）

以前强烈的士不遇的主題，在這裏淡淡地宕開，詩歌呈現别樣疏散的風致，而章法之嚴謹飽滿，語言之流暢自然，又勝於前期詩歌。饒節詩本有感情充沛、筆力雄勁的特徵，出家之後，題材更加開闊，語言更加恣肆，意度更加從容，七律之作尤爲雄

健。他次韻吕本中“東”字韻詩的《次韻答吕居仁》及《再次前韻》皆勝原唱，爲吕本中贊嘆不置。兹以《再次前韻》爲例：

曾將千古較窮通，芥孔能容幾許空。借問折腰辭五斗，何如折臂取三公。四時但覺風雨過，一飯奚須刀匕紅。要識壞魔三昧力，更培根撥待春風。（同前，第 14574 頁）

紀昀評曰：“次句粗，七句亦鄙。”[①] 其實體味此詩，所謂粗處、鄙處，正見饒節以高格爲骨，曠度爲韻，起承轉合於自由之境、自鑄偉詞的氣力法度。

自透禪關之後，饒節以“第一義中無適莫，爲君重賦楚人辭”的體悟作詩，觸目都是新的境界。試看下一首詩：

瑣瑣榆下錢，貼貼水上鏡。蝸牛共飲吸，水馬競馳騁。静中觀至妙，度此春日永。舟師挽且嗶，俚語相譏病。勞逸各有役，不必盡乘興。公緣升斗窮，我訪山水勝。雖云異出處，同是縛垢净。何當俱一掃，歇此風中艇。携持少室去，從渠謂捷徑。（自注：無求約同為嵩少之遊。）（《次韻吕無求同泛汴水》，同前，第 14555～14556 頁）

此詩爲三個層次的遞進。首先是“静中觀至妙”，體會在微小如榆錢、水鏡、蝸牛、水馬之物中自然妙機的顯現；第二個層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下册，第 1755 頁。

次，詩人之眼從文人雅興的小我中跳脱出來，看見舟師“俚語相譏病”的另一種生活空間，獲得“勞逸各有役”的認識；第三個層次，詩人與友人酬酢——對方因謀禄疲勞於道路，自己因訪勝徜徉於山水，但這兩者之間，“雖云異出處，同是縛垢凈”，亦不必厚薄彼此。以上以道眼觀而産生的三種體悟，似乎是三個不斷向上提升的層次，但在詩人這裏，却衹供如下一轉語——“何當俱一掃，歇此風中艇”用，齊物而不消磨於物，并以“携持少室去，從渠謂捷徑”的向上一路作結。雲門之三種語：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涵蓋乾坤句，交織周旋其内。心靈的要妙接通了語言的要妙，境界的高度標識了詩歌的高度，故其詩歌得道理、情思之妙，頗有新語、妙語、勝語、一轉語。其詩句如“百年七萬二千飯（自注：見《胞胎經》），檢校勞生豈無限。巍巍孰是真丈夫，應作已作所作辦”（《爲卿曇輔作一枝庵詩》，同前，第14551頁）之用佛經典故、句式，拗折新穎；“懸知草木皆憑藉，聊爲形骸作主張”（《病中兩絶句》其二，同前，第14569頁）之通達透脱，未經人道；“新詩似錦誰能濯，高論如天不可升”（《用前韻答湛長老》，同前，第14577頁）之設喻新警；“莫怪海棠不受折，要令笄珥絶凡緣”（《病起觀垂絲海棠感慨作二絶句》其二，同前，第14571頁）之高韻難攀；“知公不減王子敬，乘興何妨見戴還”（《王通判雪中來訪以頌謝之》，同前，第14591頁）之反用典故，皆源於心靈的通透自由。所謂“不求佛祖是男兒”（《臘月八日送塵禪者往長蘆》，同前，第14587頁），參禪而益於詩，在饒節這裏得到充分的體現。

“果得雲門函蓋句，肯忘黄蘗老婆心”（《答惠海首座五首海

乃圓照禪師小師》其二，同前，第 14572 頁），饒節不主張獨悟。他每以老婆心腸指點他人領會佛法，這個主題在他的詩歌中有充分體現。指點禪理的方式，無非道破、不道破兩種。所謂道破語，如《用前韻示謝公定學士》：

買金須是識真金，學道先防邪見林。切忌隨言因作解，直須見色便明心。大圓覺海波瀾闊，優鉢羅花根蒂深。只者若還親薦得，十方俱現海潮音。（同前，第 14571 頁）

此詩直陳道理，苦口婆心，自有一種誠摯深切的意味，然對詩歌的表達而言，則未免太直白。《倚松集》中不乏這樣的作品，如《次韻吕居仁送李商老兼簡李去言兄弟諸同參五首》《用蔡伯世韻作詩寄之兼簡吕居仁兄弟十首》等。不過，對禪師而言，道破乃不得已爲之。所謂“禪家妙用似孫吴，奇正相生非一途”（《送池州諸化士四首》其一，同前，第 14587 頁），饒節另有一類不道破的詩歌，指示出詩與禪通的自由心境，似詩歌也似禪偈：

溪邊小立聽溪聲，日到溪心衮衮明。獨木自横人不渡，隔溪黄犢轉頭鳴。（《山居雜頌七首》其四，同前，第 14585 頁）

白蘋風作蓼花秋，萬頃寒濤卷底流。八百道人禪定起，送君持鉢上行舟。（《送通上人為長蘆行乞》，同前，第 14590 頁）

松下柴門閉緑苔，衹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股大如繭，

應是前山花已開。(《偶成》,同前,第14590頁)

天寒歲暮山骨冷,一枝兩枝梅半開。酌泉煮茗湯欲竭,彌天道人猶未來。(《待不愚入山未至》,同前,第14591頁)

上引絶句風情宛然,餘韻無窮,得詩人之體,同時也是禪林活句。饒節晚年不認爲“吾儕事業如石田,筆墨磨人妨夜眠”,而是“寄語滿堂枯木衆,野花香徑好携笻”(《芍藥花開招大衆看》,同前,第14597頁),以禪悟後的活潑潑心境創作了許多情致婉約的詩作。這些詩歌是“人間絶妙辭”,對“滿堂枯木衆”而言,也是點撥他們的“十萬八千偈”。詩之益禪,禪之益詩,自兹而見。

第四節　謝　邁

謝薖是謝逸從弟。他在謝逸教誨下長大,學問、志節與乃兄略似。就詩歌而言,他有德人之胸襟,學人之才力,却乏詩人之情致,成就不如謝逸,表現爲重意詩歌的情致偏枯。

一、生平簡述

謝薖,字幼槃,謝逸從弟。他生於熙寧七年(1074),小謝逸七歲,自少受其教誨。正如他在《祭無逸兄文》中回憶:“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稺。凡視我爲,不曰兒

戲。教之誨之，以俟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歡然之思，不惟弟兄。"[1] 除受謝逸影響外，他有《寄饒次父》詩云："從來不識面，便作平生語。但緣臭味同，請君莫訝許。"（《全宋詩》第15787頁）又有《次汪信民寄無逸韻》："樂天官滿應早歸，揚子家貧衹晏如。他日往來隨二老，共甘盂飯與盤蔬。"（同前，第15802頁）對早去鄉里的饒節、汪革表達了敬慕。及他成人，就進入謝逸等的交往圈子，成爲符離——臨川詩人羣體的一員，與諸友在文藝與理學修養上互勉。

謝薖性情嚴毅，不伍於俗。他數舉不第，嘗爲漕司首薦，省試落第，以琴弈詩酒自娱[2]。其妻董氏，賢而知學。幼槃每與客論古事，有所遺忘，妻必能記之[3]。李彭贈詩所謂"深閨復見解圍手，勝日應多贈婦詞"（《奉酬謝幼槃》，同前，第15944頁）者。因生計窘迫，謝薖崇寧、大觀間客於異鄉，"十年餬其口，不食故園葵"（《集庵摩勒園會者十人以他年五君咏山王一時數爲韻得時字》，同前，第15775頁），日子過得頗爲艱難。後回到臨川，政和年間，在"詩壇失老將，一鼓氣已衰"的情況下，"賴我如虎賁，典刑猶在兹"（同前），主持失去謝逸後的臨川詩壇，并與李彭、洪芻等交往唱酬。政和六年（1116），謝薖卒，年四十三。紹興三年（1133），吕本中應謝薖子請，作《謝幼槃文集跋》云："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爲世

① 謝薖《祭無逸兄文》，《竹友集》卷十，《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611頁。
② 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六，中華書局，1991年，第277頁。
③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册，第852頁。

俗毫髮污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① 這成爲對謝薖的蓋棺定論。

謝薖詩文集《竹友集》十卷，其中詩歌七卷，文三卷，由其子訥編輯，於紹興二十二年（1152）與謝逸《溪堂集》同刻於學官，有吕本中題跋。淳熙二年（1175）經趙煜重修。詩歌七卷由《江西詩派》本收録。《竹友集》今有《四庫全書》本、《小萬卷樓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乃以明鈔淳熙重修本爲底本。而紹興原刊本，清末楊守敬於日本訪得，1935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入《續古逸叢書》②。

二、重意詩歌的情致偏枯

謝薖詩，四庫館臣云："本中稱薖詩似謝元暉，不免譽之太過。劉克莊《詩話》則謂薖視逸差苦思，而合元暉者亦少。王士禎《居易録》又謂薖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沉雄剛健之氣，去之尚遠。所評隲俱爲不誣。"③ 在筆者看來，謝薖雖然以一些"清逸可喜"的詩歌名世，但總體來看，他的詩歌以氣質而非情韻爲長，走重意詩歌之一路，反映爲情致的偏枯。

謝薖詩歌多以意行，其佳作，如《寄饒次守》之跳擲騰挪，《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詩》之詩語老健，皆有犖犖之大氣。以受到王士禎贊賞的《十八學士寫真圖》爲例：

---

① 吕本中《謝幼槃文集跋》，《謝幼槃文集》卷尾，《叢書集成初編》本。
②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五《竹友集》。
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中華書局，1965 年，第 1339 頁。

虬髯少年龍鳳姿，手提一劍平九維。瀛洲學士十八輩，如雕虎嘯清風隨。到今風姿傳粉繪，皎如琪木參瓊枝。秦王功高蓋天下，脱略細故容小疵。數公不語意有在，敬宗流輩曾何知。儻收王魏文學館，事如辰嬴當早諫。美哉貞觀猶有憾，洗蘇衆像一長嘆。(《全宋詩》第 15763 頁)

此詩題畫却不對畫圖作詳細描述，而是由畫及史，由史生論，一意盤旋，咫尺萬里，見詩人沉雄之氣。又如被方回收入《瀛奎律髓》而引起諸家爭議的《飲酒示坐客》詩：

身前不吝作蟲臂，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牙籌在手彼為得，塊石支頭吾所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云公痴。(同前，第 15805 頁)

此詩首先把自己物化，再放入有情（劬勞母氏生育我）、無情（造化小兒經紀之）的人世，觀“牙籌在手”的“彼”，堅持“塊石支頭”之“吾”，最後，點出詩人沉醉的意態與不解世事的兒童的嘲笑，回復開篇以蟲臂、豹皮自擬的緣由，體會着冷暖自知。詩歌以拗律表達强烈却不得不内斂、兀傲却有所欲發的情緒，是對老杜、山谷一脉重意詩歌的繼承。然在藝術的表達上，此詩過露過硬。尤其是頷聯，雖然如方回所説“尤極詩之變態”，然過於變態，越過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的界限，就不成詩語，難

免如紀昀所譏“通體粗野，三、四尤甚”[1]。

總的來説，謝薖有德人胸襟，學人才力，却略遜詩人之情致。因此，他的詩歌有的失之粗豪，缺乏細針密綫的穿織與承前啓後的貫注；有的失之輕易，流爲平鋪直叙。劉克莊説謝薖詩“差苦思”[2]，所指即在此等處。故謝薖詩歌整體水平不一，他與謝逸齊名，然詩歌成就不逮乃兄。他的一些“清逸可喜”的篇章及斷句，如受到王士禎贊賞的“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黄花三徑秋”句、“靡靡江籬衹唤愁”詩，顯示的衹是其一鱗半爪的工夫，而非他詩歌的常態。這些詩句的受人喜愛，正説明詩歌需要情致的摇曳。當將氣質和情致完美結合時，謝薖就創作出好的詩歌，如《寄汪信民二首》：

泮水傳經老，蓬山佐著才。宦遊思引去，禄養可歸來。要路眼誰白，浮雲心自灰。少年馬何駛，君馬獨虺隤。

繫纜符離日，君行殊未歸。寄書問亳社，有夢過江西。不見揮犀柄，頗驚響馬蹄。殷勤具鷄黍，多謝德公妻。（同前，第 15791 頁）

像這樣的詩歌，幾乎於沉鬱頓挫，可惜在謝薖集中并不多見。他的詩歌總的説來用力過多，而表達不副，有偏粗偏枯之病，不能到達山谷詩歌“沉雄剛健”的境地。

---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中册，第 1124 頁。
② 《江西詩派·二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第七章
南康詩人

南康詩人，包括建昌詩人李彭，廬山詩人祖可、善權。他們之間有交往唱酬。祖可與善權是兩位詩僧，與世事交涉不多，與江西諸人的交往是他們名列《宗派圖》的關鍵。李彭則不同，他有强烈的羣體意識，與宗派諸友廣泛交往，并以富贍宏博的詩歌創作，爲江西宗派增色。

第一節　李　彭

李彭是黄庭堅的表侄，但他以後學而非後輩的身份拜入山谷門下，體現了從自身性情而非血緣關係出發的詩學選擇。他灌園於修水之上，勉力禪悟，却又憤世嫉俗，豪氣未除。李彭對詩歌有自己的思考、體悟，這種思考、體悟又與他的創作實踐相表裏。無論於人品於詩品，李彭的表現都值得稱述。

一、生平簡述

李彭，字商老，南康建昌人。祖父李布，李常兄，有文名。父秉彝，字德叟，是一位著名詩人。李布早卒，李秉彝由李常撫養，與黄庭堅“往在舅氏旁，獲拼堂上帚”（黄庭堅《用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爲韻寄李秉彝德叟》其五，《黄庭堅全集》第 915 頁），情同手足。李秉彝誚薄進士得官，提倡師友淵源[①]。他的詩歌，得到黄庭堅這樣的評價：“《再過普惠》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朝以來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横空蟠硬語，妥帖力排奡’，惟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幹矣。”（《評李德叟詩》，同前，第 741～742 頁）受他的影響，李彭兄弟三人皆以詩名世，尤以老大李彭詩名最著。

“憶昔少年日，濡毫輒塗竄。蒼苔時覓句，賦雪起爲亂。麟經析凡例，義易明象彖。”（《發故篋獲端石蟾蜍研形模極小蓋予幼小時几案間物對之肅然如與故人相遇感而賦詩》，《全宋詩》第 15859 頁）從這首詩的描述可知，少年時代的李彭，勤奮好學，天真爛漫。他早歲從父親宦遊，嘗居關輔、汴京、蕲春，結識了可能包括蘇軾、黄庭堅在内的前輩詩人，與饒節謀面，又曾遊歷三峽、宣城（今屬安徽）等地，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交天下士的閱歷中，成長爲一個知識淵博、眼界開闊的青年。約在紹聖末，李秉彝去世。李彭結束了隨父遊宦的生涯，“恨乏一廛地，

① 見吕本中《師友雜志》，《十萬卷樓叢書》本。

歸來屢擇鄉。親交標鬼録，卜築近僧坊”（《上黄太史魯直詩》，同前，第 15927 頁），歸鄉葬父。他曾負墓蓋遠請蘇軾題銘，後者作大小兩種令其擇而用之，并對李彭詩文以“閲味再三，悲喜兼懷。知德叟有子不亡也”[①] 的高度評價。

元符末，李彭客黄岡，與二潘、二何交往。元符三年（1100）五月，大赦州縣編管人等，蘇、黄亦得放歸。聽見這個消息，這些年輕的詩人們歡欣鼓舞，以《何生復用塗字韻喜予從東坡遊作三篇見寄次韻答之從篇東劉壯輿》《喜二何從山谷遊復用塗字韻詩》等詩相互唱酬。然明年七月，蘇軾行至常州去世[②]，時局也向紹述之政轉變。是年李彭告别黄州諸友，回到故鄉建昌。冬，有《雪夜書懷》云：“夜烹伏雌歌偪側，泰山其頹吾道阨。天邊奎壁殞蘇公，諸公往往瀕蠻貊。”（同前，第 15913 頁）在與政治氣候一樣酷寒的時令中，詩人追懷蘇軾，預見到更偪側時局的到來，心情也降到了冰點。

如李彭所料，艱難時局即將到來，但元符三年以來對元祐舊臣的寬宥還有一段時間的滯後。崇寧元年（1102），黄庭堅已東歸，尚未再度南放。這一年五月，黄庭堅自家鄉赴知太平州，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遊廬山，枉道過李彭，在佛寺相會三日後别去[③]。李彭爲黄庭堅表侄，但他以前隨父親宦遊，與山谷見

① 蘇軾《與李商老帖》，黄庭堅《跋東坡與李商老帖》附録，《黄庭堅全集》第 2 册，第 777 頁。

② 按，蘇軾本年四月曾過南康，李彭歸家可能略晚於此，不及與蘇軾見面。

③ 李彭《重遊草堂》：“涪翁初釋僰道縛，枉道過我臨水湄。梵宫三托吉祥卧，悠悠東泛長淮涯。”（《全宋詩》第 15903 頁）按，此“三托吉祥卧”的“梵宫”，當爲西林寺。黄庭堅有《題西林寺壁》云：“黄庭堅、弟叔豹、侄柄、子相及朱章、劉義仲、李彭同來……崇寧元年五月癸亥。”（《黄庭堅全集》第 3 册，第 1600 頁）

面的機會較徐俯、四洪爲少。他景仰山谷由來已久，這次相會，便以“勤我十年夢，持公一瓣香。聊堪比遊夏，何敢似班揚。尚愧管中見，應須肘後方。他時解顏笑，何止獲升堂”（同前，第15927頁）的《上黄太史魯直》詩呈示，正式拜入門下。許多年後，他重遊舊地，猶賦《重遊草堂》云：“德人昔遊居寢處，一草一木可敬之。”（同前，第15903頁）可見，與黄庭堅的這次會面，確定了李彭山谷門人的身份，亦被他視爲人生中最值得珍藏的回憶。

自歸鄉後，李彭灌園於修水之上，以陶潛“園日涉而成趣”名園，自號“日涉園翁”、“海昏逸人”，賦詩云：

> 虚舟縱逸棹，冉冉成老大。隨食蟲寄居，行年蟻旋磨。來歸修水頭，視地不敢唾。俚言亦屢陪，灌畦常往佐。每於休作時，弄筆聊頓挫。自謂老於斯，晏然歌楚些。年來尤屢空，非關學高卧。時節閭里歡，觴豆競繁夥。我獨蓬窗底，達曙發清餓。賴有竺乾書，開顏真自賀。近局可憐人，鷄黍起頹墮。整冠禮甚修，坐客仍虚左。浩歌為之唄，樽為歌長破。（《赴鄰舍召》，同前，第15866頁）

從這首詩的描述，可略見李彭的家居生涯。南康境内有廬山、鄱陽湖，景色優美，禪風濃郁。李彭時常來往於日涉園與歸宗、簡寂、開先、雲居、同安、寶峰、西林等著名禪寺之間，參湛堂文准，勉力禪悟。他還是一個著名的書法家，“其字畫有鍾、王之風，自言法右軍之贍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於誠懸，體韻度

於凝式"[①]，筆畫一出，人皆傳寶。佛學與隱居生涯給李彭帶來清逸之氣、烟霞之色。但他立場鮮明、個性强烈，灌園修水，却并不忘情世事，嘗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爲韻賦詩：

> 丈夫志四海，摶風類鵬舉。方其未遇時，潔身閨中女。晝伏夜動者，貪冒如倉鼠。炯炯抱名誼，所慎在出處。(《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為韻賦十詩》其四，同前，第15879頁)

堅持原則，慎於出處去就，這是典型的"狷者"態度。故李彭詩歌如其鄉先賢陶潛，寓豪放於平淡之中，"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②]，憤世嫉邪之氣時時溢出。《老坡自海外歸爲書簡寂觀雲卿閣榜今爲煞風景者毁之》之"十年呵禁煩神物，奈爾焚琴煮鶴何"(同前，第15957頁)，爲其尤者。

崇寧五年 (1106)，李彭遊於南昌，與徐俯共同迎接洪芻的歸來。大觀初，他一度寓居臨川，後回到南昌，與徐俯、洪芻一起成爲"豫章詩社"的中堅，活躍在江西詩壇。值得一提的是，李彭有强烈的羣體意識。他與《宗派圖》詩人二潘、何顒、徐俯、洪芻、饒節、謝薖、吕本中、韓駒、祖可、善權、林敏功等交往，有意識地將他們相提并論[③]，并對諸友以"要當疊些湘水

① [明] 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四庫全書》第814册，第734頁。

② 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如李彭在《送敦詩遊臨川》詩中，同提吕本中、徐俯、謝薖；《慶上人以再聞誦新作突過黄初詩爲韻作十詩見寄次韻答之》詩中，同提饒節、韓駒；《演上人以權詩示余歸其卷演詩繫以長句》詩中，同提潘大臨、饒節、善權。

濱，唤起猶足張吾軍”（《觀吕居仁詩》，同前，第 15899 頁）、“丘壑同盟今已定，莫令鬼祟作愁眉”（《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韻》，同前，第 15936 頁）相期，號召振興山谷詩學。他還積極參與了“東”字韻詩唱和。正是在與他的唱和詩中，吕本中指出：“秖今江西六七輩，可到元和二三公。”種種跡象使我們猜測：《宗派圖》的寫作可能有李彭的贊成。

李彭一度任臨川或洪州學官[①]。大約在政和初期，他回到家鄉建昌，留下與大慧宗杲交往的韻事，并與南昌諸友保持密切的聯繫。政和末、宣和初，韓駒知分寧，李彭與之來往。靖康元年(1126)，徐俯、洪芻徵召入京，他還有詩相送。建炎三年(1129)，吕本中避地高安（今屬江西），與李彭的兩位弟弟相遇，作《李文若季敵訪余高安留連累日臨行贈之》。詩云：“斯文未喪欲誰托，交遊十人九不樂。百川東下障狂瀾，伯兄嶷然如斷山。蒼蒼在上久無意，空使妙句留人間。”（同前，第 18128 頁）是時李彭已亡故。他當卒於建炎初。

李彭有《日涉園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十卷，久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鈔撮編次，共得七百二十餘首，仍釐爲十卷[②]。在江西諸派中，存詩較多。

---

① 李彭有《泮宫曝書恭覽御書故事行鄉飲酒禮諸老率諸生皆在楊先生病足不至賦詩見寄次韻答之》，又《發故篋獲端石蟾蜍研形模極小蓋予幼小時几案間物對之肅然如與故人相遇感而賦詩》詩云：“翻思辭學官，瞰月復不淺。”（《全宋詩》第 15859 頁）

②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敘録》卷十五《日涉園集》。

二、高格與妙理的底蘊

與江西宗派其他詩人一樣，李彭對詩人之心，首先强調高亮氣格的錘煉。他説：

> 學詩如食蜜，甘芳無中邊。陳言初務去，晚乃換骨仙。我昔實知此，老懶挽不前。兒曹喜吟諷，快意艷陽天。(《謝靈運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取以為韻遣興作十章兼寄雲叟》其三，《全宋詩》第 15861 頁)

陳言務去是形式上，也是詩人内在心性上的錘煉。與兒曹的“快意艷陽天”相比，李彭體悟到的，是經由内到外的脱胎換骨所達到的戛戛獨造境界。這是對黄庭堅“學詩如學道”和陳師道“學詩如學仙”觀點的繼承，帶有濃厚的内省化氣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彭批評柳宗元的“奈何吐憤辭，投荒猶未悟”爲不達“性與是身俱，巧拙有常度”之理[①]，而欣賞“盤飧得此生，風期特高亮”（《夜坐食蛤蜊》，同前，第 15881 頁）的風韻氣度，表達了對山谷詩學範式的認同。

除氣格修養外，李彭還看重詩歌對圓妙心性的抒寫，這和他的禪悟經驗有關。他有《題〈妙喜爲觀音請竹靈叟疏〉後》：

> 妙喜為觀音請竹靈叟疏，作語奇峭，若久致力於斯文

① 見李彭《七夕》，《全宋詩》第 24 册，第 15876 頁。

者，乃知般若之靈驗如此，何必讀四庫書然後為也[1]。

妙喜（大慧宗杲）原文如下：

道須神會，妙在心空。體之不假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無容擬議，豈用提撕！長老從公，心契一如，道超三際。白雲岩畔，紅蓮已散於秋風；章水岸頭，玉芷再敷於春色。念羣生之擾擾，嗟六趣之紛紛。背正投邪，迷源逐浪。不逢達士，誰挑暗室之燈？罕遇當人，孰指衣中之寶？願從勸請，無用勞謙[2]。

禪宗講究内心的啓悟。道以神會，空爲心妙，不從思量計議知、言語聞見入。但於這“無容擬議，豈用提撕”處，若賦文字以遊戲神通力、般若真實觀的指向，殺人劍就可以變成活人刀，在不即不離、即真即假間，以無挂礙的表達擺脱習慣知見的桎梏。“般若之靈驗如此”，這就是宗杲請疏給李彭帶來的感觸。因此，李彭論詩，以“詩律期三昧，庵居役二空”（《次文虎韻戲暉書記》，同前，第15919頁）、“要知境静心亦遠，不是年衰成語偷”（《再和》其五，同前，第15954頁）爲尚，要求文字能打通向上一路，賦詩歌以般若智慧的觀照。

詩歌乃得之心而喻之手的體悟與表達。李彭的詩學興趣在内

① 見《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1册，第795頁。
② 同上。

不在外，他對詩人心性修養的關注，是對黄庭堅内省化詩學觀的繼承，也是他本人“一身拱璧重，萬事秋毫輕”（《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爲韻賦十詩》其十，同前，第 15879 頁）人生態度的體現。李彭詩歌，無非以畫寫景的景物詩、以詩寫畫的題畫詩、用以自酬的述懷詩、與友人酬的贈答詩等數種。這些詩歌取徑狹窄，却往往能開闢出高遠、深邃的意境，這就是得益於詩人高格與妙理的底蘊。

三、詩畫相通的審美認同

作爲灌園於修水之上的隱者，李彭生活的環境與數百年前的陶潛略同，并與這位鄉先賢一樣，對自然風景有獨特的喜愛。他在詩中這樣聲明：

> 病夫世味薄，野處隨年深。以彼有限景，寫我無窮心。緬懷太冲語，山水有清音。時尋松桂約，勿遣嘲書淫。（《次九弟遊雲居韻兼簡鄭禹功博士》其五，《全宋詩》第 15887 頁）

“野處”與“世味”相對，是詩人在山水之間獲得的脱離日常功利計較的審美生存狀態。山水景物入人詩眼，出人詩筆，乃是對内心逸興的抒寫；心與景遇，相宣成文，遇之有限，而出之無窮。山水因詩人的觀照呈現清遠意趣，而這種意趣，又和前輩詩人“山水有清音”的體認契合。李彭多次和王羲之、陶潛、謝靈運、謝朓、韋應物詩，正體現了對清曠一系山水田園詩傳統的

認同。他的寫景詩，如《次韻元亮行沙頭》《遊廬山懷叔粲季敵兼憶小子氓等次謝康樂寄惠連韻》《宿翠岩》《雨後望雲居》等作，承六朝陶、謝，尤其是謝靈運一派風格，精工密麗，生氣遠出，善寫山水之色。

不僅如此，李彭在繼承山水詩傳統的同時，還對它有所發展。其獨特的標記，是匯合了時代藝術成果的審美體驗的詩畫相通。李彭對繪畫極有鑒賞品位，經他題品的畫作，有張僧繇《胡僧看經》、韓熙載《宴客圖》、胡九齡《夏景牛》、文同《晚靄横春圖》、李伯時《邵平種瓜圖》《蓮社圖》、米芾《金山圖》、盧鴻《草堂圖》、魏煉師《四松畫軸》等。在古今名畫中間，李彭最欣賞的是宋初畫家李成的作品。試看下一首詩歌：

> 昨日觀畫笶，李成山水真難忘。寒林遠近烟暗澹，絶壑稠叠雲微茫。忽看清溪下野艇，驚殘鷗鳥不成行。我嘗指此語座客，安得仙骨來中央。此事數日爾，忽落圖上鳴漁榔。山重水複灘瀨急，雅飛不過吴天長。嗟予老矣兩鬢蒼，放浪自得宜深藏。煩於畫笶試檢校，恐我割取附益歐峰旁。（《舟中戲作雜言》，同前，第 15915 頁）

李成爲北宋山水畫三大家之一，品性高潔，嗜酒善詩，好畫平遠寒林。其畫惜墨如金，有濃厚的文人意趣，顯見詩歌意境的影響。詩情流露爲畫意，又反過來增益詩情。在李彭詩中，畫意濡染詩人心境，而詩境又從心境中宣出，李成山水叠加在真實的山水上，山水遂在人的意趣内而非外，成爲詩人吟咏的對象。這

就是審美體驗的詩畫相通。李彭每以畫境置換真實的景物，以引入詩境：

身在瀟湘黄篾舫，眼看惠崇歸雁圖。(《南至日離同安舟中寄阿弓》，同前，第 15899 頁)

一天欲放山陰雪，六幅如觀栗里圖。(《城上》，同前，第 15928 頁)

妙手春工如畫史，鵝溪百幅挂城隅。却將李成驟雨筆，掩映邊鸞花鳥圖。(《幽園風雨》，同前，第 15966 頁)

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聚。行人深藏鳥不度，便覺非復鵝溪素。龍眠老腕作陽關，北風低草雲埋山。行人客子兩愁絶，未信蒲萄能解顔。兩郎了了解人意，似是畫我封家市。戲作新詩排晝睡，忽有野雁鳴天際。(《阻風雨封家市》，同前，第 15912 頁)

又把詩中人比作畫中人：

生綃他日寫荒寒，咫尺渾如萬里寬。我據笋輿烟霧裏有人應作畫圖看。(《二絶》其二，同前，第 15958 頁)

江都著足寫餘酣，頗怪朝暉變夕嵐。我與諸峰俱是畫，解隨歸鳥過山南。(《自西林投宿歸宗》，同前，第 15966 頁)

所謂："觀山如觀畫，入眼詩輒進。厭則收卷之，去留情不吝。"(《次九弟韻》，同前，第 15862 頁）李彭以遊無窮於放浪的

山水審美態度打通詩畫境界，抒寫對清曠之景的喜愛，使發展到成熟期的詩畫藝術在詩人心中相生、互證，豐富和提高了文學體驗。茲以下引《歸舟》詩爲例，體會這種詩畫相通：

> 旌陽峰頭千仞石，溪光却照楚天碧。歸客操舟暝色時，怒雷濺雪多灘磧。夜榜時驚烏鵲喧，星光破碎月映門。訪戴人歸剡溪曲，問津客出桃花村。香醪獨酌吾静寄，萬事不理端復細。俗交從來薄於紙，小黠大痴聊一戲。（同前，第15915頁）

歸舟在時間和空間中經行。詩人隨舟前行，以詩筆寫沿途風景，又能跳出風景，用畫家的眼光構圖，看歸舟中的自已，詩歌因此充滿複雜的美感，詩情畫意，處處洋溢。

"每逢勝絶處，賦詩要難忘"（《次九弟阻雪不得遊雲居》，同前，第15893頁），山水是李彭詩歌的主要題材。李彭眼中的風景，不是有大美而不言的風景本身，而是經詩人和畫家層層叠叠吟咏、構畫後的有意味風景，是予人寄托、適人性情的審美體驗。這種體驗又進一步累積入藝術經驗，參與構築了眼前風景。惠洪《至豐家市讀商老詩次韻》詩云："心疑輞川摩詰圖，目誦匡山商老詩。"[①] 將清景比喻爲王維圖畫、李彭詩歌，又以李彭詩歌爲目誦而非口誦，這無疑是對李彭詩歌詩畫相通審美體驗的契認和贊同。

---

① 《石門文字禪》卷二。

四、平夷、奇崛相濟的詩風

作爲江西宗派詩人，李彭詩歌貴理致格調，重學問修養，如吕本中所贊“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①]。然而在江西宗派整體風格外，李彭對詩歌還有獨特的體驗，即對平夷、淺净風格的崇尚。其《寄珍首座》詩云：

> 詩寧淺而静，不貴深而蕪。觀公秋懷作，峻潔仍紆餘。譬之列華饌，陸海盈中厨。食蟹貴抱黄，食魚先腹腴。多入出或少，我昔聞先儒。年來病蹇拙，意廣材復疏。之子禪定起，焚香滿晴虛。坐看氤氳處，綿綿詩思俱。應作牛腰束，能寄草堂無。（《全宋詩》第 15847 頁）

李彭論詩，貴淺静而病深蕪。這種淺静非無學識的淺顯，而是博覽羣書、歷練世事、深悟真實之後的寧静清澈。他贊賞“豈惟足風露，定復多皇墳”（《有慶上人數以詩見贈慶始學詩於祖可爾來擺脱故步進而不已未可量也作短句以報之》，同前，第 15857 頁）的詩歌創作，又嘗與人“論文時掇百家衣”（《寄贈擇言兩絶句》其一，同前，第 15948 頁），以多讀書爲見地之資本。對他而言，三墳五典之書，不能梗塞在詩中成爲異質，而是要“譬之列華饌，陸海盈中厨。食蟹貴抱黄，食魚先腹腴。多入出或少，我昔聞先儒”，深入淺出，一點就透。他提倡平夷、淺净、

①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68 頁。

流利的詩風：

心静境云寂，默居宣妙言。（《和季敵戲書》，同前，第15848頁）

托諷本寓辭，語亦要流轉。（《觀諸少移瑞香花詩皆屬意不淺次轉字韻戲之》，同前，第15865頁）

老境喜平夷，落紙風雨迅。誰能肝腎愁，虚名媒疾疢。（《次九弟韻》，同前，第15862頁）

歸來出新詩，老眼聊一閲。雖非天姥句，淺净亦可悦。（《次九弟遊雲居韻兼簡鄭禹功博士》其四，同前，第15886～15887頁）

含毫未下無新句，安得毫端飛迅霆。（《自和六絶句》其三，同前，第15954頁）

要知境静自心遠，不是年衰成語偷。（《再和》其五，同前，第15954頁）

對淺净風格的崇尚，是李彭詩歌和詩論的鮮明特色。但正如他對徐俯詩“徐詩到平澹，反自窮艱極”（《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同前，第15878頁）的評論，淺净、流轉之作，實際上正需濟之以奇矯，否則會流於淺弱。李彭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的詩作對應着自身寓豪放於閑適的生存狀態，平淡中饒思致，流利中見婉轉。《喜遇洪仲本於山南以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爲韻作十詩寄之兼呈駒父》這組詩，頗能體現李彭的詩學特色。這組詩從遊山開始，轆轤而下，今録其後半部分：

窗上飛野馬，酒中鳴山鳥。俯仰幾何時，秋林風裊裊。高懷凡情盡，虛齋塵事少。卧讀若耶詩，意寄在雲表。

緑鬢嗜翰墨，頗徂成章程。耽思且傍訓，僅有能詩聲。老語如凍芋，時時强抽萌。公等極英妙，每聞鸞鳳鳴。

禹金貢九牧，鑄鼎知神奸。博學如地負，能發鍵與關。奇貨衹希價，妙語期藏山。要當繼三代，何勞追二班。

豺祭秋事畢，蓐收遂為政。爽氣挾曙來，風露頗輝映。祛我中夜懶，起予維摩病。回首問炎蒸，暴謔子難更。

倚杖覽清曠，江皋事事幽。戰勝名義府，策勛逾徹侯。世故每情得，塵緣成語偷。長吟撫孤松，濯足清江流。（同前，第 15890～15891 頁）

上引詩歌，寫景駘蕩，寄意兀傲，寓辭流轉。平夷和奇矯這兩種看似衝突的詩風，在這裏參用之而對立統一起來，這無乃是一家句法的鑄造。不過，在多數詩歌中，李彭還是未能處理好抒寫人生清歡和不平之慨間的張力平衡，個人風格呈現，却不够鮮明，有自身句法的鍛造，却不够成熟，整體水平并不臻極。《四庫全書總目》對李彭詩作出這樣的評價：

集中所與酬倡者，如蘇軾、張耒、劉義仲等，皆一代勝流。故其詩具有軌度，無南宋人粗獷之態。吕居仁稱其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劉克莊《後村詩話》亦稱其博覽强記，而獨惜其詩體拘狹少變化。今觀所作，克莊所論為近之。然邊幅未宏，而錘煉精研，時多警策，頗見磨淬之

功，在江西派中，與謝逸、洪朋諸人足相頡頏，終非江湖末派所能及也[①]。

如四庫館臣所論，李彭雖然未足爲大家，但不失爲一位出色的詩人。錢鍾書先生說他“平庸”[②]，并不公允。

第二節　祖　可

祖可，字正平，俗名蘇序，丹陽（今屬江蘇）人。父蘇堅，字伯固，有詩名。兄蘇痒，字養直，嘗以《清江曲》見知於東坡。祖可因病癩，自少出家爲僧，居廬山，江西人目之爲“癩可”。關於其生平，可知者不過數事：他與善權齊名，與惠洪、李彭、徐俯等人交往唱酬；嘗爲秦湛畫在歸宗寺墻壁的松石圖題詩；又曾與王銍共結廬山詩社。另外，他還有美慶上人、珍首座等弟子[③]，“餘波所及，蒙潤者多近歲江南高僧逸民，出語可觀，皆可之化也”[④]。祖可詩詞俱佳，自稱“病僧”，飽受癩病折磨，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中華書局，1965年，下册，第1339頁
② 見錢鍾書《宋詩選注·徐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106頁。
③ 李彭《紫霄道中》自注：“世未甚知可，而美慶上人者學詩於可。”（《全宋詩》第15945頁）謝薖《次韻董彥速送珍上座還漳江》自注：“珍云：嘗從權、可二詩僧也。”（《全宋詩》第15789頁）
④ ［元］佚名《京口耆舊傳》卷四引徐俯語，《四庫全書》第451册，第160頁。

大約於崇寧末亡故①。《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録《江西詩派》本《瀑泉集》十二卷，《文獻通考》卷二四五因之，作十三卷。《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作"僧祖可詩十三卷"，已佚。《全宋詩》輯佚二十八首詩歌及斷句。《全宋詞》輯祖可詞三首。

李彭説："可師句句是廬山景物。"② 確乎如此。"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亂山争夕陽"（《句》，《全宋詩》第14614頁）、"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天台山中偶題》，同前，第14610頁）等，這些祖可的名句，無不清新可喜。又如下詩：

> 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霜餘溪上》，同前，第14610頁）

這是典型的衲子詩。景物悠然，意氣灑然，若非長佔清風明月不能出此語。但祖可詩歌，又有華朗富贍的一面，如惠洪所言"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③。據徐俯説，祖可初作詩，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目爲顛倒篇，自後其詩大進④。看來他的創作，不僅有山水之助，還

① 據王銍《頃在廬山與故友可師爲詩社，嘗次韻和予詩云："空中千尺墮柳絮，溪上一旗開茗芽。絶愛晴泥翻燕子，未須風雨落梨花。重江碧樹遠連雁，刺水緑蒲深映沙。想見方舟端取醉，酒酣風帽任欹斜。"後三十年避地剡溪山中，時可師委蜕亦二紀矣。靈隱明上人追和此爲贈，感念存没，泪落衣巾，因用韻謝之》（《雪溪集》卷三，《四庫全書》第1136册，第564頁）。王銍避地當爲建炎三年（1130）左右，往前推二紀，則祖可當卒於崇寧五年（1106）前後。

② ［清］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録·祖可》引，《叢書集成初編》本。

③ 惠洪《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④ 見《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83頁。

得益於書卷的工夫。祖可存詩不多，但各體皆佳。六言絕句如《書性之所藏伯時木石屏》：

此自是我輩物，而乃落君家房。尚喜周旋顧盼，無憂犖确風霜。

淡巃嵸烟雨色，老槎牙霜霰痕。想見湘岑落木，霧連江月昏昏。

胸中定自有此，筆端乃一見之。摧却岌峨天柱，來成咫尺峨嵋。（同前，第 14611 頁）

老筆蒼蒼，以虛字拘旋其中，節奏變化多端，全然宋調。五古如《靖節祠》：

靖節非傲世，帶耻為人束。鬱然霜雪姿，受正如松獨。高歌歸去來，自種松與粟。寓意琴書間，處己審纓足。傾觴三徑醉，頹然忘寵辱。江山有遺迹，庶以拯流俗。（同前，第 14612 頁）

咏淵明之幽居，而氣度兀傲、音調危仄，可見祖可的關心對象不僅是清風明月。五律如《贈中上人》：

能來不能款，竟欲與公言。促策望山去，未須違世喧。輕帆收落日，獨鳥向前村。我亦動歸思，一峰烟靄昏。（同前，第 14612 頁）

此詩含思婉轉，有唐律風采，而“能”、“不能”、“竟欲”、“未須”、“亦”之虚實詞彙的提携，又涌動着以意遣詞的草蛇灰綫。而七言絶如：

> 琴到無弦聽者希，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虚堂下指遲。（《絶句》，同前，第 14612 頁）

此詩在無弦琴、陽春曲，以及高山流水故事的背景下，刻畫詩中人下指而遲的情態、欲説還休的情懷。後來朱熹書此詩刻石於家，想必是欣賞其中的雅人深致。另外，七古如《次吴伯江所藏文湖州山水韻》《觀壯輿所藏伯時馬》，七律如《書秦處度所作松石》《秋懷》，亦自權奇。徐俯嘗爲祖可作詩引云：

> 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嘆，問誰所作，則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譽兒而非癖，養直舉親不避，余特深知之。蓋遊刃有餘、遣言不滯，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為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皆發於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子瞻、黄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①。

① 《京口耆舊傳》卷四引，《四庫全書》第 451 册，第 160 頁。

據說“東湖於近世詩人，專喜癩可”①。出於對祖可詩的偏愛，上文的稱贊可能太過。但文中指出的帶廬山烟霞之氣、得前人詩歌之妙，確實是祖可詩歌的特色。此外，祖可詩還有以意遣辭的特點，筆力健舉，鍛煉精淬，如劉克莊所言：“祖可默讀書詩料多，無蔬笋氣，僧中一角麟也。”②

第三節 善權

善權，字巽中，號真隱，因相貌清臞，人稱“瘦權”，俗姓高氏，洪州靖安（今屬江西）人。高氏爲洪州大族，以詩禮世家。善權父高廣，隱居不仕，好與禪衲交遊。母馮氏，篤信佛教。善權少俊發，其母曰：“此兒非仕林可致也。”捨之出家，師從時居石門的應乾禪師③。應乾乃東林常總禪師法嗣，常總之師爲黄龍慧南。善權遂爲南嶽下十四世、黄龍慧南的三傳弟子。自爲僧後，善權習禪定，“以高才卓識振於叢林，一時賢士大夫加手足之敬”④。然而正如惠洪的描述：“孤坐定非禪病，剃頭猶有詩斑。”⑤ 善權落魄嗜酒，更是作爲一名詩僧而非高僧名世。

---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97頁。
② 劉克莊《江西詩派·三僧》，《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③ 見惠洪《馮氏墓銘并序》，《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九。
④ 惠洪《德効字序》，《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四。
⑤ 惠洪《寄巽中三首》（其三），《石門文字禪》卷十四。

善權曾挂單各地。他在元符中客遊京師①，亦一度客遊吴中，往蔣山謁華藏二長老②，又曾歸鄉爲父親守孝③。但他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廬山，一度住持廬山某寺④。與祖可齊名，稱“瘦權、癩可”。前述祖可弟子珍上人等，亦同時是善權的弟子。王銍在廬山倡導詩社，以所藏李公麟畫出而題咏，并將李公麟《歸去來圖》及自書陶淵明《歸去來辭》刻於琢玉坊，善權與祖可一起參與了唱和。除此之外，善權還與惠洪、蘇庠、饒節、謝逸、李彭、韓駒等交遊，惠洪所謂“觀其所以遊，因以知其爲人”⑤也。善權之卒年，從其避寇寄兄的《寄致虚兄》詩來看，當在宋室南渡以後。

善權詩，《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真隱集》三卷，久佚。其佚詩《全宋詩》失輯，周裕鍇先生手録十二首惠示。

據方回説，《真隱集》中，律詩不過二三首，今存善權律詩，有五律《春》《寄致虚兄》。七律《謝吴令惠越紙詩》，另有失題一首。其中，《春》詩較清新：

急雨高槐暮，微風新竹凉。要須携麈尾，來此據胡床。稍稍雲生砌，低低月度墻。平生興不淺，衰謝意俱忘⑥。

① 見饒節《送善權歸豫章》，《全宋詩》第14540～14541頁。
② 見韓駒《送權師謁蔣山華藏二長老》，《全宋詩》第16618～16619頁。
③ 見謝逸《贈權師》，《全宋詩》第14821頁。
④ 見惠洪《遊廬山》，《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
⑤ 惠洪《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⑥ ［明］李蓘《宋藝圃集》卷二十二，《四庫全書》第1382册，第932頁。

而另外兩首則顯得粗糙。以收入《瀛奎律髓》的《寄致虚兄》爲例：

避寇經重險，懷君屢陟岡。空餘接淅飯，無復宿舂糧。衣袂饒霜露，紫荆足虎狼。春來何所恨，棣蕚政含芳①。

此詩平鋪直叙，乏善可陳，連一貫左袒江西詩派的方回也不得不這樣評價："如此詩亦出老杜，而避寇寄兄，題目甚易，無一唱三嘆之風。謂晚唐雕蟲小技不及此之大片粗抹，亦恐過矣。老杜之細潤工密，不可不參，無徒曰喝咄以爲豪也。"②

不僅律詩如此，善權的古詩亦有粗豪之弊。如《王性之得李伯時所作歸去來圖并自書淵明詞刻石於琢玉坊爲賦長句》：

王郎玉女妙天下，眉宇清揚聚風雅。道山延閣歸有時，吐霧珠綃已無價。乃翁勛業誰與儔，惠愛宛同陳太丘。胡床夜據興不淺，江波漲月明江樓。鄴侯牙籤三萬軸，玉川五千貯枯腹。掌上雙珠照庭户，人間爽氣侵眉目。愛君義獻來仍昆，草聖真行事逼真。是家此僻古不少，奇書異畫原通神。龍眠解説無聲句，時向烟雲一傾吐。戲拈禿筆臨冰紈，寫出淵明賦歸去。林端飛鳥倦知還，陌上征夫識前路。因君勒石柴桑里，便覺九原人可起。廬山未是長寂寥，挽著高風自君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1731頁。
② 同上。

始[①]。

這首詩筆力雄健，報度開闊，然轉折太過瘦勁，缺少潛氣内轉的功力。惠洪論善權詩云："巽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棱。"[②] 徐俯曰："巽中下筆，豪俊崚嶒，余每誦之，輒能興起。"[③] 氣度開闊是其長，粗獷乏韻味是其短。瘦權、癩可齊名，但從現存詩歌來看，權詩似乎略爲遜色。

① ［宋］孫紹遠《聲畫集》卷一，《四庫全書》第1349册，第817頁。
② 惠洪《題權巽中詩》，《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
③ ［清］劉坤一等修《江西通志》卷一百七十八仙釋引《府志》，清光緒八年刻本。

第八章
淮南詩人

淮南詩人，指黄岡詩人潘大臨、潘大觀、何顒，蘄春詩人林敏功、林敏修。其中，黄岡詩人曾親見蘇、黄，深受元祐文學的熏陶，與宗派諸友交往密切；蘄春詩人堅持隱逸，與黄岡詩人及夏倪、謝逸等人保持着聯繫。淮南詩人的詩文嚴重散佚。潘大觀與何顒在南宋時期已"有姓名而無詩"①，潘大臨、二林，詩歌也無全帙。本章將考述他們的生平，并對其詩歌面貌作盡可能詳細的勾勒。

第一節 潘大臨、潘大觀

一、二潘生平

潘大臨（1060~1107），字邠老；其弟大觀，字仲達。潘氏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祖籍滎陽（今屬河南），自大臨兄弟六世祖、唐太僕卿潘季荀起占籍福建，又從他們的曾祖父潘衢開始，定居黄岡[①]，遂爲黄岡人。潘衢曾任黄州通判，其子潘革不仕。二潘父潘鯁，舉元豐二年（1079）進士，歷仕蘄水縣尉、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監楚州都監倉、吉州軍事推官、監漢陽軍酒税等職，以奉議郎致仕。潘鯁治經師承福建周希孟，入仕前在黄州教授經學，聚徒常百餘人，爲當地學者之望，賦詩亦有奇語[②]。在他的教導下，大臨兄弟自小學習勤奮，有文名。

張耒在《潘大臨文集序》中説："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悦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輩行與之交。"[③] 潘大臨兄弟交往的第一個名士，是鼎鼎大名的蘇軾。元豐二年十二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責授黄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於次年二月到達黄岡，在黄州居住了四年。這四年是蘇軾人生的挫折時期，却是其創作的高峰期。遭到文字獄的重創後，他從激揚論事轉向關注自己的内心，詩詞風格轉趨清曠。蘇軾初到黄州，始寓居定惠禪院，後在友人幫助下，得到故營地數十畝，營爲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這個"東坡"，正與潘家相鄰。蘇軾還從潘大臨叔父潘丙處求得一塊地，在上面營造了著名的雪堂[④]。潘大臨父親、叔父皆從蘇軾遊。蘇軾嘗號潘家所釀逡巡酒

① 據黄庭堅《潘處士墓志銘》，《黄庭堅全集》，第1668頁。
② 據張耒《潘奉議墓志》，《張右史文集》卷六十，《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張耒《潘大臨文集序》，《張右史文集》卷五十一。
④ 據蘇軾撰、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卷二十一《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注，中華書局，1982年，第4册，第1077頁。

爲“錯著水”，傳爲佳話[①]。潘大臨、大觀兄弟當時二十歲左右，亦獲陪杖履。元豐七年（1084）三月，蘇軾離開黄州，雪堂即付潘大臨兄弟居住[②]。

潘大臨曾赴元豐五年（1082）省試[③]，元祐年間，又入京應考。此時蘇軾在京供職，黄庭堅、張耒、晁補之等會集門下。潘大臨前往拜訪黄庭堅，給後者留下“比辱車馬，瞻想風度，殊有塵外之韻，中心竊獨喜，知足下胸中進於忠厚之實，故見此光華爾”（《與潘邠老帖》，《黄庭堅全集》第1885頁）的好印象，二人遂保持來往。潘大臨向黄庭堅請教詩文，黄庭堅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指出其毛病：

> 公所作詩文甫跋有餘，然每讀之十數過，輒使人恨之。自以作文從來少功，未得所謂。公試讀司馬遷《孟子》《伯夷》《荀卿傳》韓愈《原道》，求其故，因來示教，所謂方鞭其後，甚善甚善。流俗毁譽雖不足解免，要必有自來對病之藥，莫勉於孟子之自反。承相與致不疏，故及此耳。（《與潘邠老》，同前，第1908頁）

元祐六年（1091），潘大臨落第，悻悻而歸。黄庭堅又開導道：

---

① 《劉監家煎米粉作餅字，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携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蘇軾詩集》卷二十二，同上，第1190～1191頁。

② 據［宋］祝穆撰、祝洙增訂《方輿勝覽》卷五十，中華書局，2003年，中册，第886頁。

③ 據蘇軾《送潘邠老赴省詞》，見《能該齋漫録》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下册，第483頁。

比承慰有司之不知，已草草治行，遂不過我而東，鄙心甚怏怏。此乃學為舉子之文，僥幸一日既得人爵而弃之者也，豈所望邠老者邪？（《與潘邠老帖》，同前，第1886頁）

黄庭堅對潘大臨相期甚高，要求也很嚴格，潘大臨虚心受教。在黄庭堅的鼓勵下，潘大臨兄弟與洪芻兄弟在黄岡密切交往。元祐四五年左右，潘、何、洪、徐共賦《倦殼軒詩》，得到山谷品題。這標志着"蚤得句律於東坡"（黄庭堅《書倦殼軒詩後》，同前，第742頁）的潘大臨，同時作爲山谷後學的一員，與諸友同登上歷史舞臺。

紹聖年間，二潘隨父親官漢陽（今湖北武漢），闢公舍之東軒，名"左史"，潛心著書①。紹聖四年（1097），潘鯁致仕歸黄州，於元符元年（1098）十月去世②。父親的去世是二潘生活困窘的起點。潘鯁致仕時，就已"家無一金，骨肉衣食僅給"③，他去世後，潘氏兄弟更失去收入的來源，還要受到租税的逼迫。黄庭堅時在戎州，聞此深爲擔憂，有《與徐師川書》云："潘邠老居憂，莫不貧否？"（同前，第479頁）

紹聖四年，張耒落直龍圖閣添差黄州酒税，元符二年離開；元符三年，又起通判黄州。在此期間，潘大臨作詩開解過張耒内

① 據［宋］賀鑄《題潘大臨東軒》序："潘字豳老，隨親官漢陽，闢公舍之東軒著書，名左史，賦詩見寄，因答之。丁丑八月江夏賦。"《慶湖遺老詩集》卷四，《四庫全書》第1123册，第238頁。

② 張耒《潘奉議墓志》，《張右史文集》卷六十。

③ 同上。

心的抑鬱[①]，潘大觀曾陪他共遊廬山[②]，好好地盡了地主之誼。元符三年（1100）七月，張耒改知袞州（今屬山東），臨行前以所借書盡歸潘大臨，惟留下蘇軾爲潘鯁所寫正草行書詩一卷作爲紀念，戲書云："予與邠老，皆蘇學士徒也，捨潘歸張，奚擇焉！邠老懼後東坡復徵此書，疑於收視之不謹也，使書此以爲據。"[③]時徽宗登極，收用元祐舊人，蘇軾遇赦北歸，故張耒有"東坡復徵此書"之戲。次年七月，蘇軾在常州病逝，張耒、潘大臨共勉的"柯山潘子應鼓舞，與子異時從杖履"[④] 的期望落空，積蓄多年的翹首期盼，剛剛得到的歡欣鼓舞，至此盡化爲猝不及防的悲痛。張耒時知潁州，出己錢俸於薦福禪院，爲軾飯僧，縞素而哭。潘大臨作《哭東坡絶句十二首》，尤以其中二首："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道出了公道與人心，在當時廣爲傳誦[⑤]。

蘇軾去世，黄庭堅幸無恙東歸。建中靖國元年（1101），潘大臨作《贈張聖言畫柯山圖》詩云："黄公不肯直南省，一麾已具東南舟。請君援筆待公至，畫我迎公竹陰裏。"（《全宋詩》第

① 《王直方詩話》云："張文潛嘗作《齊安行》，詞甚不美，末云：'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九人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遊。'而潘邠老，黄人也，爲作解嘲云：'爲邦雖陋勿雌黄，我曾侍立蘇公旁。見公顔色不憔悴，不似賈誼來江湘。它州雖粗勝吾州，無此二公相繼遊。'"《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80 頁。

② 張耒《自廬山回過富池隔江遥禱甘公祠求便風至黄溉酒而風轉日行二百里明日風猶未已又風勢徐緩不奔駛可畏甘公蓋吴將甘寧云》跋："元符庚辰，耒同男秬率潘仲達同遊匡山。"《張右史文集》卷八。

③ 張耒《東坡書卷》，《張右史文集》卷四十。

④ 張耒《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張右史文集》卷十一。

⑤ 見《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74 頁。

13434頁）這一期望没有落空。黄庭堅自戎州歸，崇寧元年（1102）領太平州事，九日而罷，寓居鄂州。時黨論復起，張耒因哭蘇軾貶房州别駕、黄州安置。鄂州、黄州相距不遠，黄庭堅時常過江看望張耒，二潘、二何遂得從遊。下舉山谷二書，可略見他們交往之况：

> 來日欲屈文潛過觀音晨飯，午後具數杯，祇是斯舉兄弟、邠老兄弟，共六分耳。（《與人》，《黄庭堅全集》第1932頁）
>
> 繫舟樊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携此書往來研味，髣髴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董仲達、李文舉、陳元矩、何斯舉。（《跋歐陽率更書》，同前，第1602頁）

這種愉快的交往保持了一年，崇寧二年（1103），山谷因《承天塔記》被指爲"幸灾謗國"，貶宜州，於十二月十九日夜發鄂渚，赴宜州貶所。潘大臨奉《江夏别魯直送之宜州》詩送别。詩云："翰墨精神全魏漢，文章波瀾似春秋。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全宋詩》第13435頁）受到山谷贊賞。這次分别遂成永訣，但黄岡詩人對山谷的挂念却没有停止。崇寧三年，山谷過浯溪（今湖南祁陽），作《書摩崖碑後》，潘大臨後來尚有和作。

潘大觀曾爲鄉校首薦，不第[①]。潘大臨則屢試不第，“與百千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於困者”[②]，生活十分貧困。他中年喪妻，獨自撫養兩個年幼的孩子，嘗得句“滿城風雨近重陽”，美妙的詩思，竟因催租人的拍門而打斷。大觀二年（1108）左右，潘大臨客死蘄春，年四十九。他的英年早逝引起朋友們的悲痛。“矧比年之凋喪兮，嵬然皆國之楨。君雖學而未仕兮，天又敚之而莫之壽。意君死而無恨兮，從諸公於九泉。奈生者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予謂不朽。於今之世兮，祇以覆瓿。不顯於今兮，固傳於後。嗚呼！君身槁壤兮，君名星斗！”[③] 是爲謝所作《潘邠老哀詞》。張耒聞潘大臨死訊，太息出涕。“滿城風雨近重陽”斷句，遂演爲宗派諸友傷逝主題的複奏。一二年後，謝逸有《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絶句》，其第三云：“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同前，第14854頁）看來，潘大觀餘年貧困落魄，其卒年不詳。

潘大臨集，其子戆集爲若干卷，政和初曾請張耒作序。《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柯山集》二卷，已佚。今惟《兩宋名賢小集》本《潘邠老小集》一卷傳世。潘大觀集則未收入黄汝嘉重修《江西詩派》本，早佚。

---

① 據張耒《戲二潘》：“所欣家有弟，鄉校首稱賢。（自注：黄州奉行學制，仲達首與學論之選。）”《張右史文集》卷二十六。
② 張耒《潘大臨文集序》，《張右史文集》卷五十一。
③ 《竹友集》卷十，《四庫全書》1122册，第612頁。

二、潘大臨詩歌：意與力的失衡

潘大臨在《江西宗派圖》中排在陳師道下。然從現存詩歌來看，潘大臨詩學老杜，受蘇、黄影響，意氣壯闊，但氣息未融，有夏倪所評的“深蕪”之病[①]，不足以當江西諸派第二人的位置。王直方對邠老詩亦有批評。《王直方詩話》云：

>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説者以為着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倦殼軒，邠老作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謂龜父駒父玉父鴻父也。時人以為急口令。又寄人詩，有“思君孔帶移”之句。惟和張文潛痛字韻詩，頗有佳語。其云“文章邇來氣焰低，聖經頗遭餘子弄。公歸除□□□□，荆舒之説懲應痛。”蓋王介甫始封於舒，後封於荆，故邠老云耳。邠老作詩，多犯老杜，為之不已，老杜亦難為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共潘十厮炒[②]。

如王直方指出，潘詩“兩屐上層樓”、“拄頰西山雲”兩句，

---

① 夏倪論邠老詩“深蕪”，見劉克莊《江西詩派·潘邠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② 《宋詩話輯佚》上册，第21～22頁，闕字符號據《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二加。

分别用《世説新語》中庾亮與王獻之的故事，但所用典故與詩中情景并不貼切，故此兩句詩刻意用典，而針綫失緘、意不相隨。黄庭堅曾向潘大臨提出“願公終所以而後載言”（《與潘邠老》，《黄庭堅全集》第490頁）的建議。看來，不能“終所以而後載言”的毛病，他并没有完全改掉。潘大臨作詩講究用力，《童蒙詩訓》記載：

> 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①。

以七言詩第五字、五言詩第三字響，刻意用力，反容易形成詩歌行文過程中的呆力、阻力，成爲詩意表達的障礙。吕本中濟之以“活”，正可糾其偏失。

除了用力而意不隨外，潘大臨詩歌還有意行而力不至的情况。如“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哭東坡》，《全宋詩》第13435頁）、“剛腸肯爲藜羹轉，病骨聊堪竹杖扶”（《答王立之惠書》，同前，第13437頁）這樣的詩句，作壯語而無壯筆，筋脉顯露，直白無餘；又如其“封胡羯末謝”五言詩被譏爲“急口令”，“胡子雲中

① 《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87頁。

白鶴”六言詩，徐俯諸人皆説無如此作者，説明潘大臨缺乏詩歌法度的規範，有時會顯得傖野。這些都是作詩力不逮意的表現。劉克莊説潘大臨詩歌“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①]，指出其意與力的失衡，是爲具眼。

潘大臨才高學贍，有詩學淵源。他不乏好的作品，但即使是這些佳作，也因力、意之不隨而影響成就。如《江間作》四首：

白鳥没飛烟，微風逆上舡。江從樊口轉，山自武昌連。日月懸終古，乾坤别逝川。羅浮南斗外，黔府古河邊。

波浪三江口，風雲八字山。斷崖東北際，虚艇有無間。卧柳堆生岸，跳魚水搗彎。悠然小軒冕，幽興滿鄉關。

西山連虎穴，赤壁隱龍宫。形勝三分國，波流萬世功。沙明拳宿鷺，天闊退飛鴻。最羡魚竿客，歸舡雨打蓬。

落日春江上，無人倚杖時。私蛙鳴鼓吹，官柳舞腰支。獵遠頻翻臂，漁深數治絲。我猶無彼是，風豈有雄雌。(《全宋詩》第 13436 頁)

人生短暫，而江流千古。面對淘盡風流人物的滔滔江水，詩人在永恒和短暫的遭遇中體會到天地之悠悠，也找到屬於自己的當下感受。這組詩視野開闊，氣勢充沛，筆力健舉，但句意頗犯老杜，“我猶無彼是，風豈有雄雌”的結語也顯得粗糙，收詩不住，暴露出作者意行力不至的缺陷。他的名作《浯溪》也有這樣

① 《江西詩派·潘邠老》，《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的毛病：

公泛浯溪春水船，繫帆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當時治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謬，乾坤付與哥奴手。骨肉何傷九廟焚，蜀山騎驢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蒼忙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胡虜。南內凄凉誰得知，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顏真卿，去年不答高將軍。老來讀碑泪橫臆，公詩與碑當共行。不賞邊功寧有許，不殺奉皇猶敢語。雨淋日炙字未訛，千秋萬歲所鑒多。（同前，第 13437 頁）

此詩以史筆爲詩，議論精警、叙事有法、轉折有力，“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被傳爲警句，但與山谷的《書摩崖碑後》相比，沛然之氣稍欠，依舊有喫力痕迹。吕本中説潘大臨詩歌“精苦”[①]，或許正爲此。

意與力的結合，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到了後代，包括《浯溪》在内，潘大臨平生精心打磨的詩歌皆在歲月的流逝中次第褪色，倒是因興而發、敗興而止，妙手偶得的“滿城風雨近重陽”斷句傳之後世，成爲與陶令黄花一樣的重陽口實。可見文章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所有的詩歌創作、詩學觀點，惟有經受住時間的檢驗，方能最終參與中國詩歌審美趣味的建構。“滿城風雨近重陽”的流傳，對我們的江西宗派研究，是一個有益的啓示。

---

①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63 頁。

第二節　何　顒

何顒，字人表，黄岡人。兄何頡，舊名頏，字頡之，後經黄庭堅“奉字曰‘斯舉’”①，易名頡，一名頡之，字斯舉②，與何顒并稱“二何”。就現存文獻來看，何顒的名字往往和兄長聯繫在一起，而他的資料留存很少，也需要以何頡作爲參照，故在述其生平時，多二何同述，略及何頡。

何家住在黄州東門外之沙湖③，在柯山之西，世與潘氏通婚④。何頡生於神宗熙寧六年（1073）⑤，二何少二潘十來歲，他們之間不僅是朋友，還是姻親，故潘、何齊名，在文學道路上，更有相同的師友淵源。

元豐三年，當二何尚是兒童的時候，蘇軾來到黄州。他躬耕東坡，與潘家爲鄰居，又買田沙湖，與何家交往密切。據冒廣生先生考證，東坡《遊定惠院記》“夤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乞其叢橘，移種雪堂之西”，所謂何氏園，

---

① 見黄庭堅《答何斯舉書》，《黄庭堅全集》第 3 册，第 1859 頁。

② 《道山清話》，《四庫全書》第 1037 册，第 648 頁。

③ 據陳師道撰，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後山詩注補箋》卷一《次韻答學者四首》箋，中華書局，1995 年，第 42 頁。

④ 張耒《潘奉議墓志》云：“娶何氏，有賢行。”（《張右史文集》卷六十）蘇軾《送潘邠老赴省詞》云：“清潤潘郎，更是何郎婿。”（《能改齋漫録》卷十六，第 483 頁）可見：潘鯁、潘大臨父子皆娶何氏。

⑤ 據周裕鍇先生《何頡考》，載《九江師專學報》1991 年第 4 期。

即二何家園①；而著名的《沙湖道中遇雨作》《定風波》詞，亦往來何家附近所作②。蘇軾在黄州停留了四年，創作了大量炙膾人口的名作，何頡、何頡雖年少，亦得以“因侍教誨”③，對這位詩文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成爲二何一生中值得驕傲的回憶，也爲他們後來的詩文創作與師友交遊奠定了高的起點。

何氏兄弟早慧，很早就表現出過人的文學才能。元祐二年(1087)，二何入京，以詩往謁陳師道，後者作《次韻答學者四首》(自注：黄州何郎兄弟）云：

> 津津爽氣貫眉目，十五男兒萬里身。筆下傾倒三峽水，胸中别作一家春。
>
> 黄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熏沐不為杯酒污，飛揚未許老夫量。
>
> 暗中摸索不難知，眼裏輪囷却見稀。行地徑須先八駿，刺天終不羨羣飛。
>
> 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切。至柔繞指剛則折，善而藏之光奪月。(《後山詩注補箋》第43～45頁)

---

① 見《後山詩注補箋》卷一《次韻答學者四首》箋，中華書局，1995年，第42頁。按，引文所謂何氏“作堂竹間”之堂，當爲“寒碧堂”，蘇軾曾爲書榜。釋道潛有《何氏寒碧堂》云：“城東十畝春蕭瑟，修竹漫山藹如櫛。……虛堂正在無有處，不惜千竿開翠密。……蓬萊仙人爲書榜，筆端矯矯龍蛇密。壯觀南來無與倫，千載風流君不失。”(《參寥子詩集》卷一，《四部叢刊三編》本)《明一統志》卷六十一《寒碧堂》云：“在府東門外，宋時有何氏兄弟作此堂以待蘇軾之至，軾爲畫竹石及賦詩。”(《四庫全書》第473册，第277頁)

② 同上。

③ ［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一引曾慥《百家詩選》,《四庫全書》第933册，第293頁。

此時何頡十五歲，何顒更年幼，就已受到陳師道如此的讚揚。這次見面當還得到陳師道的教誨，如黄庭堅所言："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己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書倦殼軒詩後》，《黄庭堅全集》第 742 頁）而幾乎與此同時，潘大臨亦在汴京向黄庭堅問學。後來黄庭堅"因邠老故識二何"（同前）。至此，尚未弱冠的何氏兄弟，已在元祐文化的熏陶中，親炙元祐詩風三大代表人物——蘇軾、黄庭堅、陳師道的教導，實爲難得的機緣。

元祐三年左右，洪芻赴官黄州，帶其弟洪炎、洪羽前往，促進了洪州詩人與黄州詩人的融合。二何也與諸友共賦《倦殼軒詩》，成爲"倦殼軒詩卷中人"，得到黄庭堅的品題。元祐八年，洪羽與何家女子結婚，何氏與黄庭堅"相與遂有瓜葛"，有了連帶的親戚關係[①]，保持着書信往來。元符末，李彭客黄州，與潘、何交遊，有《戲何人表》云：

> 示疾維摩難共語，誰堪問疾坐繩床。也知世乏長桑手，盡用枕中鴻寳方。馬價不須勞廣漢，牛衣何用泣王章。清凉心地俱安穩，特訪名園顧辟疆。（《全宋詩》第 15938 頁）

從這首詩來看，李彭和何顒關係親密，故以嘲戲的口吻問候其病況。徽宗即位，大赦州縣編管人等，二何喜李彭曾從東坡遊，李彭喜二何曾從山谷遊，互有贈作。崇寧元年（1102）九月至明年

① 據黄庭堅《答何斯舉書》："外甥鴻父，得托貴門，相與遂有瓜葛，良以爲慰。"《黄庭堅全集》第 3 册，第 1859 頁。

十二月間，山谷寓鄂州，時往還黄岡，何氏兄弟又得到了非常難得的與黄庭堅、張耒的從容交遊。二何曾送螃蟹與山谷，山谷爲作《謝何十三送蟹》云："形模雖入婦女笑，風味可解壯士顔。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黄庭堅全集》第236頁）又有《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代二螯解嘲》《又借前韻見意》，可見與二何詩酒相交的興致。崇寧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山谷帶家眷與亡弟知命家小發鄂渚，赴宜州貶所，離開之前，尚留書與何頡作别[①]。

張耒兩次貶謫、一次通判黄州，除二潘外，亦與二何親密交往。崇寧二年冬，何氏兄弟或他們中的一人收留了居無定所的張耒，後者作《移居柯家山何氏第》云："謫官求便安，僦舍柯山隅。灑掃勤汝力，真成野人居。"[②] 要知道，這是黨禁最嚴的時期。當許多人忙着對元祐黨人落井下石或劃清界限時，二何却冒着受牽連的危險收留張耒，僅從這點就可判斷他們的人品。就師友淵源而言，何頡、何頔以蘇、黄、陳、張爲師，以二潘、四洪、徐俯、李彭等人爲友，視野極爲開闊。何頡與吕本中素不相識，大觀年間，見其"東"字韻唱和詩，亦寄"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對山公"[③] 詩參與唱和，表達了明確的羣體認同感。"二何"并稱，何頔想也在這個時候進入吕本中的視野，從而進入《宗派圖》名單。

---

① 周必大《跋曾無疑所藏黄魯直晚年帖》，《文忠集》卷五十一，《四庫全書》第1147册，第541頁。

② 據邵祖壽《張文潜先生年譜》，吴洪澤等編《宋人年譜叢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册，第3266頁。

③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中華書局，1981年，第367頁。

何頡連蹇場屋，晚得一官[①]，大約被辟爲地方長官的僚屬，終老鄉里。他在靖康元年（1126）留下與韓駒交往唱酬的故事[②]。紹興初，黄州有道士自籌資金，重建東坡雪堂，何頡猶爲作《上梁文》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换鵝，無復《黄庭》之字。"[③] 看來，對這個六十歲左右的老人而言，兒時對蘇軾的記憶已化爲前世之塵，但仍舊是縈繞他心中的美好舊夢。何頡晚年事迹不詳。二何當卒於紹興十一年（1141）前。這一年，吕本中有《送曾宏甫知黄州四絶》（其四）云："潘何子弟能傳業，當奉遺書與使君。"（《全宋詩》第 18208 頁）[④] 潘、何等人，顯然皆已去世。

與潘大觀一樣，何頡詩歌未見《直齋書録解題》等書目著録，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云"有姓名而無詩"[⑤]，可能在南宋初期就已亡佚。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輯出他的數則注文，片言隻語，聊勝於無，成爲他留給後世僅有的痕迹。

---

①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一，《四庫全書》第 933 册，第 293 頁。
② 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九，中華書局，2002 年，第 253 頁。
③ 見［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675 頁。
④ 王兆鵬《吕本中年譜》繫此詩於是年，見《兩宋詞人年譜》，第 449 頁。
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四部叢刊初編》本。

第三節　林敏功、林敏修

林敏功，字子仁，别字松坡，蘄州蘄春人。他十六歲的時候以《春秋》預鄉薦，下第歸，嘆曰："軒冕富貴，非吾所樂!"杜門不出二十年，該通六經，貫穿百氏，尤長於詩。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新黨人物蔡卞自池州（治今安徽貴池）召還，路過蘄春相訪，據説是愛其蓬户樞牖，安貧樂道，力薦於上①。朝廷下詔，令蘄州以禮敦遣。林敏功聞訊逃往山中，終不奉詔。他在當地享有很高聲譽，張商英、徐澤之來守蘄州，皆加禮敬。政和五年（1115），林震知蘄州②，對同僚説："吾宗有德君子。"每旬出郊與林敏功相見。政和七年（1117），林震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視朝散大夫，旌表門閭。告詞曰："爾好學博古，遂志山林，蕭然無爲，恬不願仕，朕所嘉尚，賁以令名。"③ 林敏功稱疾不受告。有旨，守令率鄉黨、親戚、耆老親臨勸諭，遂不得辭。謝表略曰："自是難陪英雋之遊，奚敢妄意高尚之事？卧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

---

① 本書林敏功生平論述，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三。原文"元符末，蔡元度被召，經過訪之"語繫年有誤。蔡卞於元符三年五月因任伯羽、陳瓘等彈劾，免職，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召知樞密院事。故蔡卞被召、訪林敏功事應繫之建中、崇寧年間，而非元符末。

② 據李之亮《宋兩淮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書社》，2001 年，第 383 頁。

③ 告詞見［宋］陳郁《藏一話腴》内編卷下，《四庫全書》第 865 册，第 552 頁。

至。”又云：“守令親臨，賓友咸集。諭臣以雨露之澤，俱可均沾；戒臣以雷霆之威，不宜輕忤。”①

宋人陳郁稱道林敏功：“學既高明而服膺《中庸》，故發於言行，不爲險怪奇靡，守節令終，圭璧無玷。”② 這個評價不錯。他在當時被視爲著名隱士，但没有故意養望，也并非朝廷升平的點綴。在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建中、崇寧之際，他拒絶權臣籠絡，不赴朝廷徵召；十多年後，又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面對“高隱處士”的賜號，保持了自己獨立的人格，確實稱得上“守節令終，圭璧無玷”。江西宗派中，他與夏倪、饒節、謝逸、李彭、潘大臨等有交往。李彭《過林子幽居》詩云：“我非當世可領袖，君合於今稱楷模。”（《全宋詩》第15937～15938頁）足見深賞。宣和末，林敏功寄夏倪詩云：“嘗憶他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疏。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③ 平生情誼，可以想見。他約卒於南宋初。

在隱居生涯中，林敏功鋭意著述，有詩文百卷、千餘篇，號《蒙山集》（一説：《松坡集》）。南宋初，曾慥《百家詩集》云其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④，是經兵火後，《蒙山集》大半散落，尚存詩文十卷左右。其中，詩歌大約悉數收入《江西詩派》本，名《高隱集》，共七卷，爲《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所著録；詩文集稱《林敏功集》，存十卷，爲《宋史》卷二〇八

①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三，《四庫全書》第933册，第497頁。
② 《四庫全書》第865册，第552頁。
③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1頁。
④ 見《江西詩派·二林》，《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藝文志七》著録。此二集皆佚。《全宋詩》輯詩八首。另外，林敏功有編年蘇詩注本，雖亡佚，但其成果融入後來蘇詩注的成就中。《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中尚存其注六百餘則，亦可觀矣。

林敏修，字子來，敏功弟。終身不舉進士，與兄比鄰而居，以文學共隱，世號“二林”，劉克莊所謂“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①] 者。有《無思集》。《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無思集》四卷，已佚。《全宋詩》輯詩九首。

林敏功詩歌，從今存八首來看，有述懷、題畫、述行、贈人等主題，題材豐富，意蘊深厚，不僅僅是抒寫隱居懷抱。作爲隱者，他雖然未必躬耕於田，但頗能體會下層民衆的苦楚，形之吟咏。如《贈趙正之》詩：

君為稻田官，君非力田科。我令耕田夫，為君奏田歌。南畝茨粱稼，東郊烟雨蓑。田家不作苦，奈此歲暮何。憫憫望有年，一失成蹉跎。立苗非不疏，稊稗常苦多。小人剥良善，蓬蒿賤嘉禾。去惡藉老農，芟夷戒駢羅。夫君邦之彦，妙年加切磋。治國與治身，此道終靡他。人心不相遠，如以斧伐柯。願君日顯榮，吾言期不磨。（《全宋詩》第 12228 頁）

這首詩有兩條綫索。第一條綫索：“我令耕田夫，爲君奏田歌”，講述田家之苦及田家力苗、去惡之事；第二條綫索：“夫君

① 見《江西詩派·二林》，《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邦之彦，妙年加切磋”，規箴對方修身如治苗。這兩條綫索在“治國與治身，此道終靡他”句中交織在一起，點明詩歌的主旨：作爲“稻田官”的對方，所謂修身，不僅僅是單純的個人修養，而是要與治國結合起來，體會“耕田夫”的苦楚，以期“人心不相遠，如以斧伐柯”。古來“爲君奏田歌”的詩歌亦不少，但如林敏功這樣，將爲人父母官的個人修養和親民愛民的政治道德感聯繫起來，并以田家稼穡巧妙作喻的，還是第一次。又《子瞻畫扇》：

> 夫子江湖客，毫端托渺茫。攢峰埋暮雨，古樹困天霜。偪側餘僧舍，溟蒙失雁行。生死隨化盡，此意獨難忘。（同前，第 12227 頁）

此題子瞻之扇畫。詩歌開端在“毫端”之小中，點出“江湖客”、“托渺茫”之大，從小小的扇面進入蘇軾的繪畫境界；頷聯承之，“攢峰埋暮雨，古樹困天霜”，實寫畫境，虛寫詩人對畫家生存景遇的體會，用字深刻、狀物奇峭；到了頸聯，畫境進一步虛化，“餘”、“失”二字，提引畫境轉向現實的空間；尾聯遂點明——原來，此雖題畫詩，但對畫家的思念，方爲貫穿此詩的情感。此外，林敏功還有《書吴熙老醉杜甫像》《題薛彦海墨竹》《與劉義仲檢討别後有懷》等詩，皆有爲而作。這些詩歌内容充實，意脉貫穿，非僅僅以文詞取勝。

同爲隱逸詩人，林敏修詩往往流露兀傲、不平的氣息，與乃兄有所不同。如其《竹溪》詩，刻畫了一個隱於竹溪，“客來，

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剌船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駡相踵弗顧也”的隱士形象，詩云：“源流别涇渭，臭味同草木。肯當百事勝，容此一物俗。獨餘嵇阮輩，蕩槳戒臣僕。濁醪澆古胸，日没還秉燭。”（同前，第12229頁）如是隱居生涯，寄寓着耿介之意、抑鬱之懷，無乃是詩人自身心境的寫照。又如《次韻寄檢討》：

> 濟北淮南夢到稀，牢愁猶賴酒來微。欲知飯顆詩人瘦，政憶長鬚主簿肥。應世君方持手板，畏人我已着山衣。春來消息甚疏闊，徙倚高原惜寸暉。（同前，第12231頁）

這首詩寄給時爲鉅野主簿的劉義仲[①]。在詩中，友人的“肥”與自己的“瘦”，友人“應世”、“持手板”與自己“畏人”、“着山衣”形象的對比，是詩歌的核心意象。在這兩組對比中，詩人與朋友之間，因出處不同，變得“夢到稀”和“消息甚疏闊”，心理距離漸漸拉開；而詩人自身的生命意識却因這對比高漲，但也不過從“牢愁猶賴酒來微”到“徙倚高原惜寸暉”，徒然高漲而已——又能怎樣呢？詩人牢落窮愁、羨慕怨艾的情態呼之欲出。林敏功有一首《與劉義仲檢討别後有懷》，適堪與上詩參讀：

① 這首詩輯自［宋］劉渙等撰、劉元高編《三劉家集》。按，作此詩時，劉義仲尚未爲國史檢討，所謂“寄檢討”者，當爲編者擬題。下引林敏功詩亦如是。

> 縈燈耿夜窗，夜雨欲達晨。寒鷄催曉色，結束征車輪。車行馬上霜，送子西入秦。二年絶廩禄，此去當通津。人生萍托水，相遇即相親。况我與夫子，恩意踰天倫。屈指十日别，今君千里人。關山行役勞，欲雪風怒嗔。投身聲利區，納足冠蓋塵。銅墨不須飲，君心知愛民。歲晚勿滯留，歸及江南春。（同前，第 12228 頁）

對朋友的出仕，林敏功并未掀起心中波瀾。他關心劉義仲路途的辛苦，念及他仕途的風波及仁政愛民的官聲，并以誠摯的筆調叙述二人友誼，表達期待他歸來的願望，仁厚之情溢於言表。與乃兄的平和心態相比，隱居生涯對林敏修而言更像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畢竟，隱居非人生的常態。林敏修對自己躁動不安的心境并不掩飾。於是，從修辭寓其誠的角度，他的詩歌自有不同於大林的獨特美感，衹要讀者不自作解人，贊其高逸就好。

第九章
開封詩人及其他

開封詩人，指居住開封的詩人王直方、李錞、夏倪、晁冲之、江端本[①]。他們生長帝都，門第高顯，生存空間相對寬裕。詩風或紆徐婉約，或豪放不羈，不像江西、淮南詩人那麼清苦瘦硬。正直、狷介，不俗、有格的詩品與人品，是聯繫他們與宗派諸友的紐帶。此外，江西宗派尚有楊符、高荷兩人，生平不詳，存詩不多，不另起章節，一并於此論述。

第一節　王直方

王直方是江西宗派中的聯絡型人物。他是新黨子弟，却旗幟鮮明地站在元祐黨人一邊；他在汴京的宅第是江西宗派的重要聚

① 夏倪、江端本長期宦遊在外，但他們生長於開封，無論從家庭背景、社交圈還是生活習慣，汴京都對他們都有最大影響，故列入開封詩人。

集地；其情感之摯烈、立身之磊落，即使在宗派諸友中也罕見其儔。饒節對王直方有“王郎古遺直”的評價，庶幾近之。

一、生平簡述

王直方（1069～1109），字立之，號歸叟，河南府密縣（今河南新密）人。關於他的家世，劉文剛先生《王直方生平探微》[①] 有詳細考證。略言之，其高祖王顯授樞密使，改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曾祖王希夷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改殿中丞，直史館，預修《册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贈司空。祖父王仁，當時國史有傳。父親王棫，仕供備庫副使，贈金吾大將軍。王直方本人娶安定郡王趙宗絳的女兒遂昌縣君，以宗女夫入仕，補假承奉郎，續娶宋祁孫女，門第十分顯赫。

王棫在元豐末的黨争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他受邢恕的指使，上書誣宣仁太后於哲宗有異心，欲立其子歧王，是爲“宣仁之誣”。這引起哲宗對祖母的猜忌，激化了新舊兩黨的矛盾，使紹聖之後屢屢掀起黨禍的波瀾，邢、王二人，遂爲賢士大夫所不齒。然而，這樣的一對朋友，却分别有一個品行正直的兒子。邢恕之子居實，少有詩才，被蘇、黄、陳視爲忘年之交，可惜早卒，臨死前，以得黄庭堅作行狀爲遺願。王直方是邢居實的好友，陳師道所謂“永懷忘年友，死矣餘令聞。念子頗似之，老我何所恨”（《寄答王直方》，《後山詩注補箋》第139～140頁）

① 載《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

者。與邢居實一樣，他才華橫溢，崇拜蘇、黄，接受元祐文化的熏陶，而不滿父親的作爲，每爲士大夫言，父親晚年得了心病。除他們外，趙挺之子明誠酷愛蘇、黄詩歌，失歡於父而不辭，蔡京子儵也因作詩話多引蘇、黄語受到過勒停處分。蘇、黄等人的詩歌魅力和人格魅力不僅吸引着舊黨子弟，也吸引了新黨子弟，令他們作出不同於父輩的文化選擇，這在當時是一種具典型意義的文化現象。對這種父子立場不同的現象，黄庭堅、陳師道、晁説之等名之曰“歆、向也”① ——劉向、劉歆爲漢代大儒，父子倆每於學術上有分歧。在數對“歆、向”中，立場最堅定、態度最鮮明、成就最卓著的“劉歆”，就是王直方。

王家世居浚儀，在汴京城南有一座種滿奇花的别墅，頗好客。元祐中，蘇軾及門下士以盛名居北門東觀，往往受王家邀請，相會於城南别墅，進行著名的坡門酬唱。從黄庭堅與王直方的以下這則小簡，猶可見當時蘇門集會的餘韻：

> 筆十五、墨一，皆自用佳物，以公留意翰墨，故以相奉。研偶留局中，不携來，他日送上。來日恐子瞻來，可備少紙，於清凉處設几案陳之，如張武筆，其所好也。來日午後亦一到館下。某頓首上。(《與王立之承奉直方》，《黄庭堅全集》第 1909～1910 頁)

① 如陳師道《與魯直書》：“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黄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録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邢（指邢居實）矣。乃知歆、向，無足怪者。”《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蜀刻大字本，1984 年。

世傳蘇軾好着短檐高桶帽，黄庭堅好着幅巾，二公乃風神蕭散之人，而城南别墅之名花滿園、清陰拂地、曲徑通幽、纖纖捧盞，爲他們的揮毫灑墨、戲噱談笑提供了相宜的場地。王園有軒曰“大裘”，齋曰“求定”，乃蘇、黄所命。作爲主人，王直方忝陪末座，得聞緒言餘論，在以後《歸叟詩話》《詩文發源》的寫作中，成爲箋釋蘇、黄詩歌本事，闡釋元祐詩學的一個權威人物。

在與蘇軾及其門下士的交往中，王直方主要選擇黄庭堅作爲自己請益的對象。他曾以詩歌與楚辭體作品呈山谷請教，黄庭堅答以著名的錦機喻，還教他貫穿經史，讀《文心雕龍》《史通》以通曉文病。王直方應試前的詩賦、策題準備，也由黄庭堅指導。元祐六年（1091），王直方落第，心情抑鬱，黄庭堅作書開導曰：“士大夫平居事父兄之餘力，固以讀書學文，不免爲親應舉，得失便有數科，寧有利不利邪？思義理則欲精，知古今則欲博，學文則觀古人之規摹。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與王立之承奉帖》，同前，第1786頁）爲他指出向上一路。從元祐二年左右至元祐六年，王直方都與黄庭堅保持密切過從，成爲江西宗派中與黄庭堅相處時間最久、獲益最多的一位詩人。

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京師唱酬之盛，隨元祐時期之結束，轉眼風流雲散。紹聖元年是時勢急轉的一年，元祐諸公紛紛被貶。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今屬廣東）安置，黄庭堅謫涪州别駕、黔州安置，王直方却在這個時候得到監懷州（治今河南沁陽）酒税的官職。得官是件喜事，王直方與諸友却悶悶不樂。洪芻以詩送王直方赴官云：“眼中人物東西盡，肺病京華

故倦遊。”李錞詩曰：“散盡平生眼中客，暖風晴日閉門居。”[①] 情緒極爲低落。數月之後，王直方易冀州（治今河北冀縣）羅官，又過了不久，他就放弃紹述之政帶給他的作官機會，選擇了與諸友相同的蟄伏姿態，投劾而歸，再不復出，名堂曰“賦歸”——賦歸去來，亭曰“頓有”——一時頓有兩玉人，自號“歸叟”，其志可見。一時文人多爲作詩，而以謝薖“似聞一罇酒，醉眼分青白”（《寄題王立之賦歸堂》，《全宋詩》第15786頁）的神情描寫最得其深衷。

王直方還在園中作“介庵”——介者之庵，謝逸爲作《介庵記》曰：“抑不知天將誘其衷而使合於吾君吾相邪？抑將撼頓其志氣而使其言合於後世邪？合與不合，其命懸於天矣。立之勉乎哉！”[②] 北宋末的時局顯然衹給予王直方後一種可能性。他從此閉門讀書、專心著述，“凡十五餘年，處城隅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③]。王直方不顧政治的壓力，遣人往蘇、黄處問訊，傳寫他們的詩歌，所謂“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④]。他還有好事之名：“每有賓客至，則必命酒劇飲，抵談終日，無不傾盡，若其大有力而饒於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於遠邇，客有遊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爲恨已。”[⑤] 於是，王直方在汴京的宅第就成爲蘇、黄後學的聚會之地，接待過陳師道、謝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82～83頁。
② 謝逸《介庵記》，《溪堂集》卷七。《四庫全書》第1122册，第523頁。
③ 晁説之《王立之墓志銘》，《嵩山文集》卷十九。
④ 晁説之《王立之墓志銘》，《嵩山文集》卷十九。
⑤ 同上。

逸、謝薖、洪朋、洪芻、饒節、楊符、李錞、夏倪等江西宗派詩人。他們同賦詩歌、共論文藝，一起傳觀蘇、黄字畫，亦傳觀王直方出示的邢、王密信，歷史的真相在他們的心中清似明鏡。艱難時局中，王直方園提供了寶貴的場地，將元祐後學緊緊聯繫到了一起。

王直方對朋友極爲真誠。邢居實早逝，王直方編其遺稿爲《呻吟集》。饒節困遊汴京，備嘗人情冷暖，在王直方這裏感受到温暖情誼。陳師道生活貧窮，王直方經常派人周濟，在他去世後，又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在炎凉的世態、澆薄的人心中，還有什麼比得上這純潔熾烈的真誠情誼、雪中送炭的無私關懷？像這樣的事還很多。大觀元年（1107）左右，王直方中風偏癱，“舌本初傳强，仍聞右臂枯。經春一旬卧，見客二兒扶”（謝《寄王立之二首》其二，同前，第 15802 頁），身體情況每况愈下，然猶以左手作字，不廢著述。晁説之云：“立之卧病久，説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慷慨忠憤，不少懯也。”[①] 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感嘆“生兒不象賢”，取平生珍藏的書籍字畫古玩散之朋友。吕本中與王直方素未謀面，也收到他饋贈的書畫數種。王直方在江西宗派中的認同度頗高，他對朋友真誠付出，朋友們也以真情回報。大觀三年（1109）三月，王直方去世，享年四十一歲。晁説之爲作墓志銘，謝逸、吕本中、晁冲之等人，在詩歌中表達了對他的懷念。

---

① 同上。

王直方“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録，凡大編數十”①，著述頗多。他的詩文集，生前嘗屬意晁補之作序，内容當很豐富，但早佚。《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歸叟集》一卷，已佚。據《郡齋讀書志》卷一三，王直方還著有《歸叟詩話》六卷，亦不傳世。郭紹虞先生輯録《王直方詩話》三百餘則，見《宋詩話輯佚》本。另外，王直方還着有詩話性質的《詩文發源》，散見於宋詩話、詩注，《宋詩話輯佚》亦同録入《王直方詩話》。

二、詩話：述而不作的正確定位

王直方詩歌存留不多，在他的著作中，以《歸叟詩話》（亦稱《王直方詩話》）對後世有更大影響。此書原本雖佚，但由於被《苕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等多次引用，經郭紹虞先生輯佚，尚能得三百餘條，“庶幾復六卷本之舊”②。

對《歸叟詩話》，郭紹虞先生的評價是：“（立之）畢生精力悉在此書，其用力不可謂不勤，固非率耳操觚者比。然書中述事處多，論詩語少，即論詩之語，亦以轉述他人者多，而自得者少。”③ 此論甚確。詩話的重心在講述詩歌本事、詩壇軼事、他人論詩之語，王直方本人的詩學觀點表露不多，但也可以考見。

從《歸叟詩話》來看，王直方關注詩歌的屬對、用事、言語，認爲詩歌不厭多改，但在藝術表達外，更將詩歌精神的貫注

① 晁説之《王立之墓志銘》。
② 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31 頁。
③ 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1979 年，第 131 頁。

放到首要地位。他認爲詩歌要具詩性與詩味，批評邵雍《咏牡丹》的“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聯爲“可謂言工，殊無高致”①，楊蟠《蒓菜詩》爲“可以言咏物，未可以語詩耳”②。在他看來，煉韻不如煉句——“余以爲若衹覓好韻，則失於首尾不貫穿”③；詩歌要言近旨遠，不能“太粘着皮骨”④。他贊同化用前人詩句，但是須“有摩詰之才則可；不然，是剽竊之雄耳”⑤；又提倡獨創，以遞相踵襲“最爲詩之大患”⑥。在詩歌面貌上，以“然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并驅矣”⑦爲鵠的。在詩歌評論上，他批評論杜詩“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太細長乎”爲“論詩正不當爾”⑧，注杜詩“甫昔少年日”引賈誼少年、“幽徑恐多蹊”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真可發觀者一笑”⑨。總的説來，王直方在元祐詩風的熏陶下，注重詩歌的立意布局、用事煉字、繼承新變，持論中正，極有詩識，但其所論在蘇、黄詩學觀的籠罩之下，亦未見新的建樹。鑒於此，《歸叟詩話》選擇述而不作，利用作者與元祐諸公、宗派諸友的親密關係這種别人不具備的優勢，留下元祐文學與江西詩派的餘言緒論，不失爲一個正確的定位。因此，它不僅流行一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31頁。
② 同上，第66頁。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76頁。
⑥ 同上，第27頁。
⑦ 同上，第16頁。
⑧ 同上，第86～87頁。
⑨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鐵》上册，第87頁。

時，還被南宋詩話廣泛引用，更成爲我們今天宋代文學，尤其是元祐文學與江西宗派文學研究中屢次利用的寶貴資料。

三、詩歌："雖不熟，亦有格"

王直方詩歌曾得黄庭堅"皆有爲爲之"（《與王立之》，《黄庭堅全集》第1369頁）的評價，被謝逸贊爲"五言若長城"（《和王立之見贈四首》其一，《全宋詩》第14813頁），但到了南宋末，就因亡佚太多，衹剩下"詩絶少，無可采"[①] 的評語了。我們今天能見的王直方詩更少，衹有五首，但它們是不是"無可采"呢？這五首詩幸諸體皆備，下面就通過對它們的評析，略窺王直方詩大概。

《題清芬閣》爲五言古詩：

> 人以詩自業，在唐如蜂房。香英衆采擷，論功歸其王。恭維少陵老，實提六義綱。人能分一體，猶足生輝光。元英蕭散人，亦以詩道昌。餘雋獨不吮，嘉殽常自將。滄江下千尋，便足知流長。元英不可見，看取尚書郎。（第22册，同前，第14940頁）

五古之作，自黄庭堅、陳師道以來，開拓出一條置一字如六軍之令，以議論提携記事抒情，如司馬遷古文筆法般簡潔、有力、曲折有法度的寫作路徑。王直方此詩遵循的就是這條路徑。

---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他先提起議論以提綱挈領，再循理貫注而下，一意曲折，頓挫分明。衹是規行矩步痕迹明顯，句法欠變化，亦欠琢磨，才力較黄、陳爲遜。

《淮安園》爲五言律詩：

> 賢王經別墅，深窈近嚴城。花竹四時好，賓朋一座傾。闔奩争弈罷，擊鉢記詩成。明日朝天去，門肩鳥雀驚。（同前，第14940頁）

此詩造境幽雅，置字有力，乃有爲而作。詩中描寫的淮安園生活，和詩人自身城南别墅的生涯相似。不過，園中主人能“明日朝天去”，而詩人呢？在邦無道之時，衹能自絶仕進之路，連此“鳥雀驚”的機會并無，哪能不抑鬱傷情？一個“驚”字，所牽引出的，無乃是詩人在蹉跎歲月中對自身年華流逝的驚心。《歸叟詩話》之一則，可與上詩參讀：

> 余自夏歷秋，毎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凉之時，今日復凄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兹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然也[①]。

“顧念兹歲，屈指可盡”——這種年華空逝、老大無成的惕然，

① 《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68頁。

是王直方幽居生涯中時常涌動的情感，遂成爲上引詩歌的底色。

另外，七律《上巳遊金明池》："遊絲墮絮惹行人，酒肆歌樓駐畫輪。鳳管遏回雲冉冉，龍舟衝破浪粼粼。日斜黄傘歸馳道，風約青簾認别津。朝野歡娱真有象，壺中要看四時春。"（同前，第14940頁）有昆體風味，紀昀贊爲"句外自有遠神"[①]。七絶《玉蕊花》："閬苑瑶林春晚芳，仙妃舞困卸霓裳。蠙珠委地驟雲佩，尚帶天邊風露香。"（同前，第14940頁）不乏風華，惜未精粹。總的説來，王直方詩歌言之有物，能把握圓熟與老硬間的分寸，但鍛煉不精，表達尚不充分，在江西宗派中未爲上乘，但亦以免粗豪之病足居中游的位置。方回説"細讀其詩，雖不熟，亦有格"[②]，是也。

第二節　李　錞

李錞，字希聲，豫章人。他的祖父李茂直嘗官江西監司[③]、湖北轉運使、右朝請大夫、兵部郎中[④]，崇寧三年入元祐黨籍[⑤]。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223頁。

②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1417頁。

③ 據李廌《師友談記》，中華書局，2002年，第30頁。

④ 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九十四、四百十一、四百六十五。

⑤ 《皇宋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二《禁元祐黨人下》，臺灣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7册，第3695頁。

李錞本人官秘書丞①，爲仁宗朝宰相劉沆家女婿②。生平事迹之略可知者，李錞與米芾、李秉彝、李廌等爲友，好議論詩歌、收藏字畫，元祐時期已活躍在京師，在江西諸派中年輩較長。他在紹聖元年有送王直方赴官河内詩，宣和年間與韓駒有上元詩唱和③。從謝逸《懷李希聲》"此心何所思，思我逍遥子。挂冠卧秋齋，閲世齊愠喜。念昔造其室，微言契名理"（《全宋詩》第14815頁）詩來看，他一度弃官家居，好談論名理，受到朋友們的敬重。

李錞詩歌，《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李希聲集》一卷，已佚。《全宋詩》録其佚詩十首。另外，《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著録《李錞詩話》一卷，亦亡佚，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輯佚》輯其詩話十七則。

李錞論詩重格調、氣度，嘗云："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④ 又曰："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肺肝，不過僅然嘲風弄月而已。"⑤ "孟郊詩正如晁錯，爲人不爲不佳，所傷者峻直耳。"⑥ 與如上理解相應，李錞

---

① 據《直齋書目解題》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9頁。

② 《王直方詩話》："李希聲云：'舒王罷政事時，居州東劉相宅……'希聲，劉氏婿。"（《宋詩話輯佚》，第64頁）[宋]米芾《書史》："李錞收唐人歐行書《病箴》，劉冲之丞相家物。"（《四庫全書》第813册，第39頁）劉冲之即劉沆，皇祐三年參知政事，他應當就是《王直方詩話》所説的"劉相"。

③ 據《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中華書局，1983年，第316頁。

④ 李錞《李希聲詩話》，《宋詩話輯佚》下册，第478頁。

⑤ 同上，第478頁。

⑥ 同上，第479頁。

詩歌格調高古，氣度紆徐。他的“緑净隨時看上魚”① 句明净可愛，“散盡平生眼中客，暖風晴日閉門居”② 聯蕭散安詳，都有構圖簡明、意味深永的特色。又如《早梅》詩：

雪徑清寒蝶未知，暗香誰遣好風吹。野橋漏泄春光處，正為横斜一兩枝。

雄蜂雌蝶兩紛紛，梅子花香着莫人。風急落芙無藉在，已應先減幾多春。（同前，第 15830 頁）

此詩如簡筆畫，寥寥幾筆，抒寫了梅花的風采與詩人的情懷。從現存詩作來看，李錞詩歌流易工秀，清新可愛，没有江西末學辭澀言苦的毛病。吕本中在《宗派圖》中給他江西諸派第十二人的排名，在韓駒之上，可見對李錞其人其詩的看重。

第三節　夏　倪

夏倪，原名侔③，字均父，蕲州人。祖父夏竦，仁宗朝宰相，封英國公、鄭國公，謚“文莊”。夏竦以文學起家，又主持邊事，其子安期亦歷任邊帥，夏家遂有文與武兩個傳統。惠洪説

① 見《王直方詩話》，《宋詩話輯佚》上册，第 31 頁。
② 同上，第 83 頁。
③ 據吕本中《師友雜志》。

夏倪“知國知兵”①，潘大臨説他“武似三明”②，看來夏倪稟承了家學，留心邊事、多讀兵書，是江西諸派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兼備之才。

夏倪少能文樂善，以宗女夫入仕。其妻賢，鼓勵他多從賢士大夫遊。夏倪與王直方、饒節、林敏功、潘大臨等交往，嘗館饒節於家，又以襄陽别業請惠洪居住。他有很强的政治責任感，或許在元符三年詔求天下直言時，曾向徽宗進《萬言書》，極言時事。此書不傳，從晁説之“或云此書未備乙夜之覽，説之不信也。吾民因斯言而厚矣。衛叔玉、停山公主事鮮有爲上及之者，偉哉”③ 的跋語，及惠洪“誅奸志未捨，謀國疏空傳”、“清忠光竹帛，英氣斂山川”④ 的評議，其大體内容可以想見。

崇寧年間，饒節寄書夏倪曰“我已山林新祝髮，君猶州縣故隨人”（《寄夏均父二首》其二，《全宋詩》第14573頁），看來夏倪時仕州縣。大觀年間，他應該是仕於汴京⑤。宣和元年（1119）八月，以事自府曹謫祁陽（今屬湖南）監酒。過浯溪，登峿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遊，作《減字木蘭花》歌之曰：“江涵曉日，蕩漾波光摇槳入。笑指浯溪，聱叟雄文鎖翠微。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立風

---

① 見惠洪《遠遊堂記》，《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

② 見《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3頁。

③ 晁説之《跋夏均父萬言書後》，《嵩山文集》卷十八。

④ 惠洪《次韻曾伯容哭夏均父》，《石門文字禪》卷九。

⑤ 《師友雜志》：“大觀初，趙丈仲長、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夏均父、汪信民同在京師，每出入多聯騎同往。”又據陳自力《釋惠洪研究》，惠洪大觀四年遊汴京時與夏倪相識。可知大觀年間，夏倪居汴京。

烟，湘水浯臺總接天。"[1] 昂藏之氣，不稍因貶謫削減。次年三月，夏倪自三峴抵達祁陽，館於靈泉寺，構堂寺西，名"遠遊堂"。故友惠洪從長沙（今屬湖南）趕來相聚，作《予頃還自海外夏均父以襄陽别業見要使居之後六年均父謫祁陽酒官余自長沙往謝之夜語感而作》詩云："天下張荆州，四海陳合浦。當時寂寞濱，皆獲陪杖履。今又從公遊，楚山更佳處。詩成倚峿臺，天風吹笑語。"[2] 將夏倪與張商英、陳瓘相提并論。惠洪還爲夏倪作《遠遊堂記》，成爲我們今天瞭解夏倪生平面貌的一手資料：

宣和元年秋八月，朝奉郎夏公自天府謫官祁陽。明年三月至自三峴，館於靈泉寺。寺臨大江，江流湍急，斷岸千尺，萬峰環之，如趨如揖如翔如集。公構堂其西，盡收其形勝，靖深以宜茂林修竹，虚明以隔囂聲塵氛，而名之遠遊。重九後二日，余從公登焉。對立凝睇，晴嵐夕暉浮動乎緑疏青瑣之上；促榻對語，笑響散落乎千岩萬壑之間。於是隱几，枵然忘言。蓋其倚功名於憂患之外，玩雲川以自娱，心飽新得，百想俱滅。然知國知兵，百未一施，而沉冥小邑，如對彭澤之狄梁公，通泉之郭代公，乃名所居之堂為遠遊，何哉？嗟乎世之識真者寡，所從來舊矣。袁天綱識武后於襁褓，驚曰："貴武氏者此兒也。"使天綱果識真，當曰"亡武氏"可也。賀知章果識真，當曰"遊仙"可也。夫一塵翳

① 據《能改齋漫録》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下册，第 489 頁。
② 《石門文字禪》卷五。

目，天地四方易位。袁、賀方眩夢幻，以其禍為貴，以遊為謫，要不足怪也。公今去國之遠，而能酬酢風月，安樂泉石，酒後耳熱，侍兒扶掖而歌，則忘其身之為逆旅，謂之謫，可乎？公嘗首肯余論，祝余為之記。公諱倪，字均甫，其先江南人，嘉祐為名臣之後，凜凜有祖風者也[①]。

夏倪晚年與惠洪、曾紘等交遊唱酬，亦與饒節密切往來，所謂："璧老投冠去學禪，堂堂一鼓陣無前。平生老伴唯均父，馬病途窮不着鞭。"（吕本中《閑居感舊偶成十絶乘興有作不復詮次》其三，同前，第 18173 頁）他一度知江州[②]，不知繫於何年。靖康二年（1127），夏倪卒[③]。曾紘、惠洪等有詩悼念。

夏倪詩歌，其子裒之爲《遠遊堂集》，紹興三年請吕本中作序。《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遠遊堂集》二卷，已佚。惟《兩宋名賢小集》卷六八存其《五桃軒集》一卷，詩五首。《全宋詩》因之并輯佚，共録詩十九首。

夏倪詩歌，吕本中評價："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别饒德操，不愧前人作也。"[④] 劉克莊云："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亹亹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咏。"[⑤] 可惜得

---

① 《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二。

② 據《紫微詩話》，張擴有《送均父作江守》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歷代詩話》上册，第 369 頁）

③ 據《能改齋漫録》卷十"蘄州人夏均父……既没六年，當紹興癸丑（1133）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第 280 頁）推算。

④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 361 頁。

⑤ 劉克莊《江西詩派·夏均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到吕本中、劉克莊稱賞的上述詩歌都已失傳，今存十九首詩皆七古與絶句。七古以《次韻題歸去來圖》爲例：

> 階亭午景負槐陰，空齋初罷戲五禽。汚州太守致音問，啓讀乃有歸來吟。先生抱道肯乞憐，凜凜有面方如田。何能為此五斗粟，折腰鄉里小兒前。顧視銅章等涕吐，賦歸唾詞如涌泉。龍眠居士嘆豪逸，想象明窗戲拈筆。翕忽英姿來筆下，如恐超起將羽化。籲嗟能事詎可疇，一見公詩如見畫。惜哉道遠莫可致，强欲賡酬抽鄙思。韻絶難追神易倦，使我空然汗顔面。他日從公會借觀，錦囊捧出春笋寒。（《全宋詩》第 14967 頁）

這是一首唱和題畫詩。詩中交織着今人與古人、詩人與畫家、作者與和者的關係，這看似複雜難纏的種種關係正給“文詞富贍”的詩人以縱横揮灑的空間。此詩從詩人的現實時空切入，“階亭”、“午景”、“槐陰”、“空齋”、“五禽戲”的意象，已爲對《歸去來圖》的解讀作了接受者境遇的鋪墊；隨之，由信件的啓讀納入詩歌原唱者的身影，又因讀《歸來吟》詩，公與我皆隱去，進入陶潛《歸去來辭》的境界，描摹而感慨繫之，無乃因我心有戚戚焉；由此心而推及畫家，想象其作畫時情態，又倏忽回筆，論及題畫詩之如畫；經此層層曲折之後，詩歌進入結尾階段，詩人的身影從隱藏處凸顯出來，作唱和不易之謙辭；最後以與原唱者共觀圖畫之意作結，重新點出圖畫，合和了與對方唱酬之主旨、意趣。陶淵明的生活圖景、李公麟之《歸去來圖》、汚

州太守之《題歸去來圖》、自己的《次韻題歸去來圖》，都在深層的文化認同和生存感受上統一起來，轉接無痕、交糅無間。夏倪的其他七言古體詩歌，如《題宗室永年畫犬圖》《次韻漢陽蔡守題陽關圖》《壽蒲憲》，也都有爲而發、意脉貫穿，深於行文布局。而其絶句如：

紛然蟲臂蟻爭環，付與高人一解顔。不待南柯婚宦畢，始知身寄大槐間。（《跋聚蟻圖》，同前，第 14966 頁）

道師形氣合於無，八極超摇得自如。知我御風風御我，長袪獵獵自乘虚。（《和王子飛題李伯時畫列子御風圖》，同前，第 14966 頁）

江發岷山如瓮口，漢從嶓冢又東流。滔滔江漢為南紀，我憶禹功時倚樓。（《南紀樓》，同前，第 14969 頁）

這些詩歌信手寫來，并不精工，但粗獷之處，正見以意遣詞的詩人之我——老子風味時復不淺的形象呼之欲出。夏倪以五古與律詩著稱，上引七古、絶句還不盡其所長，朋友們對他的贊賞，看來不是没有理由。

吕本中在《遠遊堂序》中盛贊夏倪詩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果多從先生長者遊，聞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①] 劉克莊後來修正吕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吕紫微》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本中的觀點，認爲上述境界乃吕氏夫子自道，至於夏倪，“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①]。其實吕本中所説的“無意於文之文”，與“用功於詩”并不衝突。《詩説雋永》云：“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常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低。’”[②] 這就是夏倪“用功於詩”的明證。“用功於詩”應該是江西宗派的整體特徵。祇是吕本中所標舉的“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的境界，確實没有幾人可以達到。在這個意義上，劉克莊説夏倪詩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或許就是一個比較得體的評價。

第四節　晁冲之

晁冲之秉性正直。作爲昭德晁氏的詩人，他在紹聖年間一度隱居，後代表民間清議，對政、宣間朝政有嚴厲批評，後以身殉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其友人喻汝礪對他有“豈直以詩人命之”的評價。在詩學淵源上，他得句法於後山，又專學老杜，在江西諸派中，詩風最爲清壯。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夏均父》，《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② ［宋］佚名《詩説雋永》，《宋詩話輯佚》下册，第436頁。

一、生平簡述

晁冲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開封人①。晁家淵源深遠，從唐朝起就是海内著名的圖書收藏之家。“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②。晁冲之的高祖晁迥，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歷仕真宗、仁宗朝，官至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謚“文元”。曾祖晁宗慤，以父蔭爲秘書省校書郎，賜進士及第，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慶曆中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謚“文莊”。祖父晁仲衎，以父蔭入仕，賜同進士出身。父親晁端方，未仕。晁家世居汴京昭德坊，家藏圖書達到二萬卷左右，“故其子孫焠掌勵志，錯綜而藻繢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③，文學家輩出，爲北宋文學甲族。僅晁冲之兄弟輩，就有補之、説之、咏之、載之等詩人。晁冲之在從兄弟中排行二十六，在羣星璀璨的“昭德諸晁”中，仍舊能够脱穎而出，被從兄説之許爲宗族中最才華。下面的一則軼事或許可以爲晁説之推獎的注脚：據《風月堂詩話》卷上記載，重和元年（1118）三月雪，昭德諸晁皆賦詩，而冲之賦最工。晁冲之的文學成就或許不可與補之比肩，但毋庸質疑，在羣從兄弟中，他是一個突出耀眼的人物。

晁冲之生長昭德坊，自幼受父兄熏陶，得到儒學與文學的良

---

① 一作“鉅野人”，張劍《晁説之年譜》（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已辯其誤，今從張説。

② 喻汝礪《晁具茨先生詩集序》，《晁具茨先生詩集》卷首，《海山仙館叢書》本。

③ 同上。

好教養。他與諸兄弟同尊敬端方嚴肅的從兄說之，詩歌創作則頗受哥哥載之影響。晁載之，字伯宇，元祐時期以詩歌爲蘇、黄、陳所知。冲之是時年紀尚輕，亦跟隨兄長參學後山，得到後者“叔子擬度驊騮前”（《寄晁載之兄弟》，《後山詩注補箋》第136頁）的評價。據《風月堂詩話》記載：

> 詩人體物之詩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為題而作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而賦咏興焉，皆仿詩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誇也。……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己嘗舉老杜咏子規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栖。客懷那見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其所熔裁，殆别有造化也。又惡用故實為哉。”①

看來，在陳師道那裏，晁冲之所得非區區句法章法，而是關於詩體詩格的根本之論。後來晁冲之到徐州，拜後山墓，詩云：“鎖門脱落封將盡，題壁污漫字不分。我亦嘗參諸弟子，往來徒步拜公墳。”（《過陳無己墓》，《全宋詩》第13894頁）“以我懷公意，知公待我情。五年三過客，九歲一門生。近訪遺文録，重經故里行。寄書無鄭尹，誰爲葬彭城。”（《過陳無己墓》，同前，第13902頁）并與陳師道二子交往②，正見他以後山門人自任。

“憶在長安最少年，酒酣到處一欣然。獵回漢苑秋高夜，飲

①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卷上，中華書局，1988年，第99～100頁。

② 晁冲之《再至徐州示諸弟》：“還家作詩示羣從，早晚一遊携二陳。”《全宋詩》第21册，第13903頁。這裏所説的“二陳”，當指陳師道二子：豐、登。

罷秦臺雪作天”（《次二十一兄季此韻》，同前，第 13888 頁）、“少年使酒走京華，縱步曾遊小小家。看舞霓賞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其一，同前，第 13895 頁），詩酒清狂，放浪不羈，這是晁冲之青少年時期生活的寫照。元祐之治的結束，給他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生活劃上了句號。紹聖初，政治風向轉變，舊黨人士紛紛放逐，晁補之在遣中，羣從兄弟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冲之遂飄然遺形，避禍遠走，隱居具茨山下。具茨山亦名大隗山，在今河南新鄭縣。從《具茨集》詩歌來看，在隱居的歲月，晁冲之未必能如喻汝礪所言：“叔用既以油然栖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疏亮，未嘗爲凄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①] “青燈挂長檠，文字夜涉獵。問米米已無，問酒酒已竭”（《次四兄雪夜韻》，同前，第 13873 頁），在政治氣氛和時令一樣嚴寒的冬日，他“陟山既見虎，還舍乃對鵩。一沐三握髮，十飯九不肉”（《紀愁》，同前，第 13871 頁），心中未嘗不孤獨苦悶。能當喻汝礪所稱者，是在這樣的逆境中，他沉下心來，究心經史之學，并因窮而益詩，對詩歌的領悟又上了一個臺階。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參用新舊黨人，晁冲之回到汴京。明年陳師道仕京師爲正字，晁冲之又得與恩師相見。他呈上自己的近作，陳師道覽之而驚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晁冲之答曰：“别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陳師道聞言嘆息：“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

① 喻汝礪《晁具茨先生詩集序》，《晁具茨先生詩集》卷首。

論此矣。"[①] 如果說，元祐後期晁冲之作爲年輕後學開始嶄露頭角的話，經具茨山下的隱居生涯，到了建中靖國元年，他的詩歌已因實證實悟而自鑄偉詞，得到後山的充分肯定。

崇寧初，晁冲之與喻汝礪爲"同門生"[②]，估計同入太學。據喻汝礪回憶，在這段時期，"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③]。然而，晁冲之於徽宗朝衹作過一個"服銅墨於岩邑"[④] 的縣令，未知係於何年。他曾於政和末離開京師，到新鄭東里隱居[⑤]，但大部分的時間，還是閑居在昭德舊第，以熱心冷眼臧否時事，代表着民間清議的强大力量。陸宰爲晁氏外甥，政和、宣和年間從晁冲之遊，其子陸游以其所聞於先君，寫入《老學庵筆記》《家世舊聞》，成爲我們瞭解晁冲之政、宣間表現的一手資料：

> 政和以後，斜封墨勑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⑥]。
>
>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其必死矣，獨晁叔用（冲之）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天下至此，若使晏然死

① 《風月堂詩話》卷上，中華書局，1988年，第103頁。
② 喻汝礪《晁具茨先生詩集序》，《晁具茨先生詩集》卷首。
③ 同上。
④ 晁公溯《憫孤賦》，《嵩山集》卷四十八，《四庫全書》第1139册，第8頁。
⑤ 參張劍《晁冲之年譜》（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李朝軍《宋代晁氏家族文學研究》（四川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李文并指出，新鄭東里緊鄰具茨山，從晁冲之《別昭德第愴然傷懷》《謝沈次律水枕》等詩來看，他四十幾以後纔真正離開昭德坊。因此，晁冲之隱居具茨在此次而不在紹聖初。可備一說。
⑥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中華書局，1979年，第106頁。

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①]。

宣和末，有故契丹臣蘷離不者，號四軍大王，或謂之燕王，收餘衆犯景、薊。朝廷命郭藥師出兵敗之，遂函蘷離不首來獻，以大旗引首函，曰：“僞燕王蘷離不首級。”京師少年争往陳橋門觀之。大臣建言御殿受賀。然蘷離不實未嘗死，雖部送諸卒，亦自竊笑。識者皆憤黠胡敢欺朝廷，而嘆大臣之阿諛也、附會也。先君偶以書問晁叔用都城近事，叔用報曰：“亦别無他，但聞捉得燕王頭耳。”京師舊諺謂張大矜伐者曰“恰似捉得燕王頭”，初莫知何謂也[②]。

先君言：昭德晁氏多賢，自蔡京專國以來，皆安於外官，無通顯者。有疏族，居濟州，以京薦為大晟府協律郎，舉族耻之。宣和中，有御史，晁氏婿也，舊有喘疾。一日，與叔用言：“自入臺後，喘乃已。”叔用之妻顔夫人正色答曰：“某郎莫是不敢否？”蓋其家習為正論，雖婦人亦漸漬如此[③]。

看來，對蔡京把持下的朝政，不僅是晁冲之，就連他的夫人持論都很嚴正。但自南宋以來，有晁冲之向蔡氏父子獻《漢宫春·梅》詞從而出任大晟府丞的傳説。此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

① 陸游《家世舊聞》卷下，中華書局，1993年，第202頁。
② 同上，第205頁。
③ 《家世舊聞》卷下，同上，第212頁。

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宫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携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1]。

如前引陸游記載，晁家“習爲正論”，而冲之尤甚。晁冲之對蔡京父子的弄權亂國、粉飾太平持强烈的批評態度，怎麽可能自已去巴結蔡氏，入仕大晟？所謂晁冲之獻梅詞、爲大晟府丞，不見别處記載，不過是胡仔的一家之言，斷不可信。有明文可徵的晁氏仕大晟府者惟一人，就是上文所説的濟州“疏族”，名端禮，字次膺。他是熙寧六年（1072）進士，歷仕單州成武簿、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元豐末，以事除仕籍，從此廢居。政和三年召至京師，除大晟府按協聲律，未到任間，卒於昭德坊外第[2]。大晟府成立於崇寧四年（1105），是徽宗、蔡京君臣粉飾升平的産物。對晁端禮入仕大晟這件事，晁説之在《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中評價道：“師臣（按指蔡京）末爲此媚上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知其不可起而仕者必爲我出也。公乃被迅召，入大晟府，奉旨作爲一時瑞物之辭。乃還公承事郎、大晟府按聲協律。咸曰：‘徹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之初，失師臣之微矣。是行

---

①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410頁。

② 據［宋］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銘》，《樂静集》卷二十八；晁説之《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嵩山文集》卷十九。

也，不知公者謂公喜矣，知公者爲公耻之。"[①] 連墓表的撰寫也無恕詞，可見"舉族耻之"的反應有多强烈。對"疏族"晁端禮尚且如此，晁冲之若不顧家聲，入仕大晟樂府，更不知會掀起怎樣的軒然大波。恰恰相反，無論是從朋友評價還是後人記載，晁冲之都以品行狷介、持論嚴正著稱，故必無此事。在晁氏家族中，晁冲之是比晁端禮更有名的詞人。胡仔將李邴詞[②]、晁端禮事攪和在一起，又指派晁冲之做故事的主角。此説爲《獨醒雜志》《蓼園詞評》等引用，《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亦明此論，當代學者遂予以沿用[③]。這對今人來説似乎衹是小小的失誤，對古人而言，却是無法忍受的嚴重污蔑，亟須洗雪。

晁冲之與王直方、江端本是很好的朋友。政和年間，吕本中仕京師，始與晁冲之相識，"叔用日來相招，如不能往，既再遣人間訊"[④]，關係十分密切。吕本中所謂"平生親愛獨諸晁，叔也相親共寂寥"（《閑居感舊偶成十絶乘興有作不復詮次》其七，《全宋詩》第18173頁）者。除宗派諸友外，晁冲之交遊還甚廣，

① 《嵩山文集》卷十九。

② 關於《漢宫春·梅》詞，曾慥《樂府雅詞》録在李邴（漢老）名下。《玉照新志》卷四又道其原委云："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宫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十數人，皆絶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切自欣，除目可無慮矣，飲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四庫全書》第1038册，第649～650頁）直到南宋後期，劉克莊猶有"當時但知李公（邴）《漢宫春·梅》詞而已，實未見其四六也"（《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一百一二《雜記》）的感慨，可見李邴以此詞聞名。《漢宫春·梅》，應當就是李邴所作。

③ 如程千帆、吴新雷《兩宋文學史》，諸葛憶兵《徽宗詞壇研究》，皆舉晁冲之爲大晟詞人。

④ 吕本中《師友雜志》。

據他的兒子晁宗溯回憶：

> 予憶曩居大粱時，承平故事，士非繇吏部選不用，故四方無遊諸侯者，士於此畢集焉。予家五世而儒，不見弃於(大夫)士大夫，士集予門特多焉。由是見先君所與友日狎至，先君待之不敢怠，或留舍於家。家故貧，猶貰貸修具，終其去，人人皆盡歡。其間所遇豁達無隱、謔浪笑傲，或雜出辭章、含譏諷，靡所忌宜，暱甚。雖有沉厚而深者，亦篤誠可持久，謂不相負。然近者朞月，遠者三四年，或後以貴故，因復决舍；或既去迹寖，踈不相聞；或始出無聊，及得勢，則背而馳，不復來；或有所謁，陽示狎密，謁已，或遂或不遂，皆捨去，再遇則若不相識。予心疑之，豈先君待士薄耶？間以問先君，先君笑曰："無庸此之問，後乃自知。"①

兒子眼中的父親，和朋友眼中的詩人略有不同。在宗溯筆下，一個正直、善良、率性、豪爽，又有些不經世故的文士形象，躍然紙上。

晁冲之以生命踐履了他的人生理想。宣和七年（1125）冬，金兵大犯，所向披靡，不少守官弃城而逃。而晁冲之惟國之憂，留佐東道。靖康元年（1126）閏十一月，師敗於寧陵（今屬河

① 晁公溯《送王子載序》，《嵩山集》卷四十七，《四庫全書》第1139册，第261頁。

南）。晁冲之"獨立而彌厲兮，遂結纓于此野"[①]，壯烈殉國[②]。臨終之時，他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說："是不足以成吾名！"[③]

晁冲之詩歌，經靖康散亡，紹興初，其子公武尚裒輯二百餘篇，名《晁氏具茨集》，由涪陵太守孫仁宅刻於忠州酆都觀，共三卷，有喻汝礪序。《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具茨集》十卷，乃"一卷"之誤。三卷本久失傳，一卷本有明翻宋刊本傳世，以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永樂二年（1404）范凉靡鈔本爲古。另外，有明人始注、清人補注之箋注本《晁具茨先生詩集》十五卷，收詩一百六十七首，爲江西諸派詩歌中除後山詩集外的惟一注本[④]。此外，晁冲之還是一位著名的詞人。《直齋書録解題》卷二十一著録《晁叔用詞》一卷，已佚。唐圭璋《全宋詞》有輯録。

二、詩歌："意度沉闊，氣力寬餘"

晁冲之自言作詩從看韓愈雜文悟入，這是在意脉、章法上體會到的詩文相通。除此之外，他對詩歌還有更本質意義上的領悟，試看其《送一上人還滁洲琅琊山》：

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我聞大士入詞海，

① 晁公溯《憫孤賦》，《四庫全書》第1139册，第8頁。
② 參張劍《晁冲之年譜》。
③ 喻汝礪《晁具茨先生詩集序》。
④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三《具茨晁先生詩集》。

不起宴坐澄心源。禪波洞徹百淵底，法水蕩滌諸塵根。迅流速度超鬼國，到岸舍筏登昆侖。無邊草木悉妙藥，一切禽鳥皆能言。化身八萬四千臂，神通轉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說，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間何事無妙理，悟處不獨非風幡。羣鵝轉頸感王子，佳人舞劍驚公孫。風飄素練有飛勢，雨注破屋空留痕。惜哉數子枉玄解，但令筆畫空騰騫。君看琅琊釀泉上，醉翁妙語今猶存。向來溪壑不改色，青嶂尚屬僧家園。君行到此知此意，辨才第二文中尊。西江一口盡可吸，雲夢八九何勞吞。他年一瓣爐中香，此老與有法乳恩。(《全宋詩》第 13871 頁)

以禪論詩，而從自己超逸奔放的詩學興趣出發，以禪悟之自由心靈磅礴萬物，獲得充分無礙的表達，這種感悟注定叔用詩與清苦簡約派異趣。體悟到心靈與表達的雙重自由後，晁冲之詩呈現出意態有餘之後的從容自如：或立意新警，或筆有餘閑。以《次四兄（以道）韻答許下諸公》爲例：

羣雄將風騷，敵若攻守墨。公將百萬兵，如一劇孟足。間楚或揮軍，伐虞還取玉。使我備偏裨，授書防敗辱。安敢凱旋歌，直可向師哭。短兵不須接，長城已完築。畏强我但守，用奇公自出。入壘畏膝行，免冠謝頭禿。論功轂可丹，錫命綬當緑。顧我老更痴，猛虎空手觸。（同前，第 13869 頁）

此詩用戰事比喻詩歌交鋒，主敵有體，奇正互出，攻防兼備。又通篇用典切而不滯，氣力飽滿，妙趣横生。結尾在“猛虎空手觸”處戛然而止，作一個定格造型穩穩收住——至於觸虎後結局如何，正留與“羣雄將風騷，敵若攻守墨”的許下諸公繼續填寫。又如《同魯山韓丞相女靈廟前險石》，刻畫險石形貌，槎椏枯硬，百怪叢生，以“躑躅三遶回高岡，却立下視雲蒼蒼。古今誰爲好事者，後有韓子前奇章。君不見玉川先生洛陽宅，修竹蕭蕭獨爲客。它年如與鶴乘軒，可來相見銅駝陌”（同前，第13868頁）作結，豪邁清壯。《贈僧法一墨》《法一以余所贈墨不佳》《復以承晏墨贈之》等詩，亦皆闔辟馳驟，《紫微詩話》所謂“脱去世俗畦軫”[1] 者。

晁冲之詩歌，氣勢沉雄，表達從容。如《紫微詩話》所説：“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2] 能在氣度和手法上直接以老杜爲師，擺脱屋下架屋的狹窄。兹以《感梅憶王立之》爲例：

> 王子已仙去，梅花空自新。江山餘此物，海岱失斯人。賓客他鄉老，園林幾度春。城南載酒地，生死一沾巾。（同前，第13901頁）

此詩圍繞“感梅”——“憶王立之”的主題展開，在王直方

① 《歷代詩話》上册，第367頁。
② 《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1頁。

園梅花盛開的時節，抒寫對往事與故友的複雜感受，置字精警，起承轉合有力，極鍛煉而無痕。方回曰：“此詩纔學後山，便有老杜遺風。”紀昀曰：“似平易而極深穩，斯爲老筆。”① 皆給予很高評價。

總的説來，在江西宗派中，晁冲之詩最清壯。劉克莊説：“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沉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蔿過樓前。’亂離後追叙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蔿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② 是爲近之③。

第五節　江端本

江端本，字子之，開封陳留人。與晁冲之一樣，他出身在一個文學世家。祖父江休復，字鄰幾，官至刑部郎中，曾參與慶曆新政，詩歌與梅堯臣、蘇舜卿、尹洙齊名。父親江懋相，官朝散郎。江端本的兩位兄長端禮、端友，皆以詩鳴。江、晁二家有通家之好，江端本與晁冲之從小莫逆，是一起長大的好友。

---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中册，第 761 頁。

② 《江西詩派·晁叔用》，《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③ 本節對晁冲之詩歌的論述較膚淺。讀者可參陶文鵬先生《論晁冲之詩歌》，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4 年第 1 期。

江端本生長於陳留圉城，從小受父兄教誨。元祐年間，江端禮爲元祐諸公所重，江端本時尚年少，亦跟隨兄長遊於諸公之門，獲得“詞林三二公，子實門下客”（吕本中《奉送子之還京師》，《全宋詩》第 18055 頁）的教益，或許曾親受蘇、黄指點。潘大臨與江端禮交情深厚，來汴京應試就住在江家，想亦在這個時候與江端本相識。父兄的交遊曾給江端本帶來了開闊的視野。元祐八年（1093），江楙相卒。紹聖四年（1097），江端禮去世。他們的名字是與元祐文化聯繫在一起的。父兄的去世，將江端本及仲兄端友推上前臺。他們活躍在兩宋之際，成爲江家詩人新的代表。

元符年間，江端友、端本不赴科舉。據晁説之《壽昌縣君劉氏墓志銘》記載：

> 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者二十年。常為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乎？第汝安之，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優遊於圉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①。

元符年間，章惇當政，對元祐黨人嚴酷迫害。江氏兄弟在這個年代不應科舉，其原因除其母劉夫人明言的“有司待士之禮薄

① 晁説之《壽昌縣君劉氏墓志銘》，《嵩山文集》卷十九。

而法益苛”、不欲爲禮法所屈之外，還有母子三人心領神會，却没有説出來的對時局的不滿。江端友堅持隱逸頗爲徹底，他將門蔭讓給弟弟端本，隱居封丘門外，稱七里先生，直到靖康元年纔出仕。而江端本出仕較早。元符三年（1100），江端本遊歷到益州三泉縣（今陜西寧强），依姐夫、三泉縣丞龔言序。當時恰逢徽宗即位。按照慣例，逢皇帝登極，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等，可各遣親屬等進奉賀登極表及方物入京祝賀，朝廷對這些進奉人推恩補官。三泉縣雖衹是一縣，却因在宋初奉表賀太祖登極，得到不隸州郡、遇賀慶許發表章直達榻前的特殊待遇。赦書至三泉縣時，縣令、主簿正好遊山在外，龔言序攝縣事。他宣詔稱賀，遣内弟江端本捧賀表進京。依例，初品官不得奏異姓無服親。宰相曾布早慕江端本名，親自帶他上朝取旨。江端本遂得特補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陽）助教，從此步入仕途①。

江端本於徽宗即位初入仕，一直受到重用，節節高升，官與職俱至正郎。對他的仕宦生涯，宗派諸友以直道期之。晁冲之贈詩云：“一丘須早計，五斗莫堅辭。獻賦修竿牘，知君定不爲。”（《贈江子我子之》，同前，第13899頁）“燒丹岣嶁令，釀酒步兵厨。二者將安擇，功名莫浪圖。”（《寄江子之》，同前，第13878～13879頁）吕本中贈詩云：“士生多艱虞，道遠自古昔。相期逍遥遊，不計天地窄。名聲了三黜，談笑供百謫。别君爲此言，可當繞朝策。”（《奉送子之還京師》，同前，第18056頁）不過，江端本的表現未必副友人的期望。他頗得徽宗信任。宣和二年

① 據王明清《揮麈録前録》卷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1120)，江端本通判温州（治今浙江温州），以幾察失去徽宗寵信、於去年十一月斥還故里的道士林靈素。端本查林靈素居處過制，詔徙置楚州。命至，林靈素已亡故[①]。這件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附注引蔡絛語曰："久之，上復思靈素，使道流保明，欲再召入，釋氏大懼，而靈素不知何故，忽死矣。端本乃以靈素遺表上之曰：'靈素下血死矣。'"[②] 林靈素死因不明，畢沅另據别本，以上注"釋氏大懼"爲"伯氏大懼"，云："按伯氏，謂蔡攸也。詳絛此語，疑攸使端本殺之。"[③] 可備一説。温州任滿後，江端本可能回朝供職，靖康元年九月得到一處地方知州的任命[④]。建炎年間，他避地於湖州。後曾除知光州（今河南潢川），不赴，言者劾其避。紹興元年（1131）正月，江端本坐此事停官，主管臨安洞霄宫[⑤]。這是關於他生平的最後一則記録。

江端本詩歌，《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陳留集》一卷，已佚。《全宋詩》輯詩九首。僅從這九首詩歌來看，江端本詩歌精苦婉約，清麗疏雋，不負《宗派圖》的遴選。兹以《次韻子我兄和沈侍御吴興酬唱詩三首》爲例：

---

① 《宋史》卷四六二《方技下·林靈素》，中華書局，1978年，第13530頁。

② 《皇宋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二七，臺灣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7册，第3850頁。

③ 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十三宣和元年壬申條《考異》，中華書局，1957年，第5册，第2415頁。

④ 見［宋］佚名《靖康要録》卷八，《四庫全書》第329册，此572頁。

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一，中華書局，1988年，第1册，第757～758頁。

苕霅憶初泛，星霜今幾周。芳蓮霞比色，晚水月同遊。未盡烟波賞，先驚歲月遒。風塵今滿眼，遥想芰荷秋。

宇宙烟塵日，誰何風馬牛。掀天怒翼飛，卷地駭奔流。黷武非天意，窮凶與鬼謀。風波方浩渺，何處可維舟。

四野傳烽急，中原殺氣浮。游魚驚過艇，風葉亂鳴鶩。宿霧藏文豹，寒浮露遠州。無心謀出處，知命復何憂。（同前，第 16887 頁）

這組詩歌結體精工、骨架開張，帶有一點柔弱的風致，堪稱佳作。

第六節　楊　符

楊符，字信祖。關於他的生平，現存資料甚少，我們衹能從汪藻《贈左大中大夫致仕陳君墓志銘》中得知，他是該墓志銘事主陳彦恭的女婿，仕爲北海（今山東濰坊）簿①。又據《王直方詩話》《師友雜志》，楊符與宗派諸人來往甚密：他參加過崇寧二年三月三日的王直方園聚會；又曾與饒節、方元修同遊王直方園，各以姓賦詩；大觀年間，王直方卧病，送吕本中書畫數種，就是托楊符轉交。看來他是一個因參與王直方園聚會而與宗派諸

① 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七，《四部叢刊初編》本。

友交往的人物。

楊符詩歌，《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楊信祖集》一卷，已佚。《全宋詩》僅録其"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斷句一則，周裕鍇先生以所輯失題二首及《行村》一首惠示。如今，我們就祇能以此三詩窺楊符詩之仿佛。試看其五古《無題》詩：

> 置居城西陰，斷翠行短垣。藝木老風雨，委懷謝卑喧。情隨雲岫遠，色與松菊温。所托雖云幽，亦足當華軒。門外車馬塵，蹴踏白日昏。誰能赤吾族，且以朱其門。尚捐千金軀，肯顧五畝園。所以向荆柴，殷勤理墻藩。我初念此老，君已行其言。俗士苦難了，相與聊心存[①]。

這首詩，贈與的對象是一位隱士。詩歌并不描寫主人隱居生涯的閑適，而是在睥睨凡俗姿態的刻畫中，以慷慨激昂的語調，點出朋友"藝木老風雨，委懷謝卑喧"生涯與"誰能赤吾族，且以朱其門"世事的因果關係，表達自己對朋友的欣賞與認同。詩歌在"我"、"君"與"俗士"三方關係中展開對比與聯繫，立場鮮明，情感强烈，鋪陳充分，轉接有力，極富個性與神采。又如他的七古《無題》：

① ［明］解縉《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楊信祖集》，中華書局，1986年，第1册，第334頁。

春風距曉催林莽，裂石如雷土如雨。長年飛舸白浪中，慣見羊猥當虎怒。吾衰去國今幾時，絶險未省風濤危。獨倚柂樓聊一嘯，借問如許將何之[①]？

此爲旅途中作。在江山險境的刻畫中，“距”、“催”、“裂”、“飛”、“當”、“倚”、“嘯”等動詞的使用，交織着壓迫、傾瀉與抗拒的體驗。它們正對應着詩人憂憤、擔心與堅持的主體意識，呈現出道義與强權、個人與社會、精神與境遇搏弈的張力。楊符還有一首詩是七絶《行村》：

青秧斬斬水沄沄，午雨纔收夕照曛。坐看一川翻翠浪，預知千畝割黄雲[②]。

詩人在農田景色中看到豐收的希望，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看來，楊符是一個愛憎分明的詩人。他嫉惡如仇，却對農事及下層民衆滿心繫念。著名的斷句“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③]，正體現了其詩歌的主題。楊符雖然衹留下三首詩歌，但首首精良。可見江西宗派的詩歌亡佚，有許多偶然性的因素，并不一定是讀者的淘汰。“誰看青簡一編書，不遣花蟲粉空蠹？”有許多精心結撰的佳句，曾願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却經兵火蟲蠹、不經意的忽略、總事者的淡漠，淪喪於空空之大無，真可嘆也。

① 同上。
②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八十一《宋楊信祖詩集》，第3册，第2100頁。
③ 劉克莊《江西詩派·楊信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第七節　高　荷

高荷，字子勉，號還還先生，後唐南平王高季興裔孫，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元祐間入太學[①]。他名列《宗派圖》，或者説，名字存留於文學歷史的機緣，是因爲受到過黄庭堅的激賞。建中靖國元年（1101），黄庭堅得赦東歸，留江陵待命。高荷以《上黄太史》詩求見。詩云：

萬里南溪郡，黄香得賜環。盛名喧海内，摧翮返雲間。太史資誠峻，郎官選亦慳。朝廷才特起，堂奥援誰扳。一夢追前事，羣公厄後艱。中傷皆死禍，放逐罕生還。别駕之戎僰，僑居傍草菅。想知諳鳥道，聞説異人寰。（楊）［揚］子家元窘，王維室久鰥。鵩來心破碎，猨叫泪潺湲。達觀終難得，羈愁必易删。衆情相惻憫，靈物自恬憪。迥閣澄秋晚，幽窗聳夜跧。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墜屨魂空斷，遺弓涕忽潸。石門凄殿楯，銅雀慘宫鬟。帝統聯仁聖，皇恩感艷頑。網羅疏黨禁，諸蔓掃朋奸。點檢金閨彦，凋零玉笋班。尚令宗廟器，遥隔鬼門關。拊髀咨詢及，含香誥命頒。笑談趨赤縣，吟咏落烏蠻。奏記懷東觀，移文領北山。應將九遷

① 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四庫全書》第933册，第284頁。

待，未補七年閑。士愧千鈞弩，身謀五兩綸。退藏欣望氣，延仰竊窺斑。昌谷詞源窄，浯溪筆力孱。斲輪深類扁，投斧欲隨般。鵠卵真能伏，龍鱗敢冀攀。不嗔無紹介，試遣略承顔。（《全宋詩》第 14242 頁）

此爲五言排律，煌煌三十韻，以正起敘當前事，又逆筆插入大段倒敘，最後回到當前情景的順序，綜合敘事、抒情、議論等手法，交代了黄庭堅從貶謫到召還的全過程，刻畫了他超然物外、達觀處變的形象。章法舒展，用事妥帖，對偶精確。其中，如“點檢金閨彦，凋零玉筍班”以“金閨彦”對“玉筍班”，各有出典，正爲切對；“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寓敘事、抒情於寫景之中，自然工整，皆成爲名句。這展示了高荷得之心而應之手的詩學功底。經貶謫後認識到“要須唐律中做活計，乃可言詩”① 的黄庭堅對此詩十分欣賞，稱贊它“用事穩帖，置字有力”（《跋歐陽元老詩》，《黄庭堅全集》第 669 頁）。他還對高荷詩歌作出這樣的整體評價：“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温恭，天下士也。”（《跋高子勉詩》，同前，第 699 頁）并作《贈高子勉四首》予以勉勵：

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刳心潤身。沅江求九肋鱉，荆州見

① ［宋］蔡絛《西清詩話》卷中，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08 頁。

一角麟。

張侯海内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杰同科。

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鈎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弦。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同前，第 201 頁）

在這組詩中，黄庭堅贊賞高荷的文章學行，將他與張耒、晁補之相提并論，還提出要以斯文相付，這樣的激賞實不可多得。高荷作《答山谷先生》詩遜謝：

四篇詩得褭蹄金，妙旨初臨法語尋。要我盡除兒子氣，知公全用老婆心。平章許事真難可，付囑斯文豈易任。感激面東垂涕泗，高山從此少知音。（《全宋詩》第 14243 頁）

黄庭堅在江陵呆了九個月。這段時期内，高荷從遊，親睹他作《水仙花》詩的情事，并同作奉和。山谷離開江陵後，崇寧二年，作《題李亮功家周昉畫美人琴阮圖》，高荷有和作。政和三年，高荷在京師，與表弟王銍論及黄庭堅爲賦《水仙花》詩的鄰家女子，猶作《國香》詩感懷。應該説，對山谷的知遇之恩，高荷終身感念，但他以後的行爲却不副乃師的期望。高荷曾入陝西

轉運使張永錫幕府[1]，晚年爲童貫客，燕山平，獻凱歌，除直龍閣[2]。曾爲山谷欣賞的詩才，用以頌贊童貫，仕途的升遷同時意味着文學的墮落。高荷後知涿州（今屬河北縣）以終[3]（一説，終蘭州通判任上[4]），“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5]。

高荷平生作詩據説有數千篇，《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衹著録《江西詩派》本《還還集》二卷，已佚。《全宋詩》輯詩七首。這七首詩歌，大都經論者稱賞而存世，水平頗高。以《蠟梅》詩爲例：

> 少熔蠟泪裝應似，多爇龍涎臭不如。衹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同前，第14243頁）

短短二十八字，通篇比喻。前半以蠟泪、龍涎明喻蠟梅的色香，後半以“開破幾丸書”暗喻梅花之開放。而“春風有機事”則因此暗喻生發，錢鍾書先生所謂“雪山似象，可長尾牙；滿月似面，平添眉目”之“曲喻”也[6]，牽引全詩由刻意用喻到自然高妙。劉克莊評高荷詩云：“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之。”[7] 從詩歌藝術的角度，高荷確實在宗派詩人前列；但綜合人品來考慮，正該給他殿於諸人之後的位置。

---

① 見［宋］范公偁《過庭録》，中華書局，2002年，第326頁。
② 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四庫全書》第933册，第284頁。
③ 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十二同此説。
④ 據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歷代詩話》上册，第419頁。
⑤ 《石林詩話》卷中，《歷代詩話》上册，第419頁。
⑥ 錢鍾書《談藝録》，中華書局，1984年，第51頁。
⑦ 劉克莊《江西詩派·高子勉》，《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第十章
韓　駒

據説韓駒不滿被圖入江西宗派。他受學於蘇轍，但也得到過黄庭堅的品題，與《宗派圖》其他詩人關係密切。吕本中將他列入江西宗派，并無大謬。作爲兩宋之際的著名詩人，韓駒好論詩而多勝解，詩歌以行針布綫爲長，却又以某種“官様”的品質徘徊在江西詩格的邊緣。這使韓駒成爲宗派諸友中比較特别的一個人物。

第一節　生平：“三點本因元祐學”[①]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今四川仁壽）人。其曾祖仕爲屯田

① 曾幾《挽韓子蒼待制》詩語，《茶山集》卷五，《四庫全書》第 1136 册，第 521 頁。

郎[①]，父親元豐年間進士及第，作過峽州夷陵（今湖北宜昌）令[②]。韓駒出生於元豐三年（1080），少年時期勤奮好學："憶吾童稚時，書亦甚所愛。傳抄春復秋，諷誦晝連晦。飲食忘辛咸，污垢失盥頮。爾來歡喜處，乃在文字外。"（韓駒《李氏娛書齋》，《全宋詩》第16602頁）内侍賈祥曾坐罪流放峽州，與韓駒父交。韓駒當時尚年少，父事賈祥甚謹，給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

大約在紹聖年間，韓駒因不能尊奉父親的侍妾，被逐出家門，從此遊歷在外。元符元年（1098），韓駒與弟無斁卜居綿州（今四川綿陽）城東[④]。元符末寓居海陵（今江蘇泰州），與詩人葛稚川交往。建中靖國元年（1101），徐俯追隨陳瓘至泰州，韓駒與徐俯交往，遂受知於山谷。山谷有《與韓純翁宣義》云："蜀中諸舍侄多相識，亦嘗得書。棄中比來乃疏書問，亦以道遠且不便邪！如子蒼之詩，今不易得，要是讀書數千卷，以忠義孝友爲根本，更取六經之義味灌溉之耳。"（《黄庭堅全集》第1378頁）又有《與韓子蒼帖》（已佚）。周必大後來評價此帖："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絶，然須經前輩品題，乃自信不疑。正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⑤] 韓駒自己也説："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⑥]

---

① 韓駒《曾大父有詩云三春拂榻花黏袖午夜淘丹月在池舍弟子飛歸蜀與語及此因取爲韻》其十三："吾祖屯田公。"《全宋詩》第25册，第16609頁。

②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四庫全書》第1038册，第660頁。

③ 同上。

④ 韓駒《元符戊寅與無斁弟卜居綿城東述情詩》，[清] 張英、王士禛等《御定淵鑒類函》卷三百四，《四庫全書》第989册，第782頁。

⑤ 周必大《題山谷與韓子蒼帖》，《文忠集》卷十九，《四庫全書》第1147册，第194頁。

⑥ 《能改齋漫録》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上册，第282頁。

山谷的印可增加了韓駒的自信，也預示着，他有不可限量的文學前途。在這段時期，陳瓘以論蔡京聞名。韓駒與徐俯、陳瓘交往，作爲傾慕陳瓘節氣的後學之一員，呈《上陳瑩中右司生日詩》《上泰州使君陳瑩中》《便衣訪徐師川坐定陳瑩中太守亦至，余避入室。已而同語良久戲呈師川》《次韻師川見和》等詩，對陳瓘的風義、徐俯的節氣予以贊揚，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可見，早期的韓駒，是以與宗派諸友略同的形象活躍在青年詩人之間的。

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一記載，韓駒"後徙汝州"[①]，這應當是崇寧年間的事。元符三年（1100），蘇轍從循州（今廣東龍川）貶地内徙，歸居潁昌（今河南許昌），與汝州（今屬河南）相鄰。崇寧五年（1106），韓駒以詩見蘇轍。蘇轍見而奇之，題其詩卷後云：

>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②]。

此行韓駒得到蘇轍教誨。蘇軾有《李伯時山莊記》，蘇轍爲作詩二十首，韓駒一一和之[③]。蘇轍語其作文之法云："熟讀《楞嚴》《圓覺》等經，則自然詞詣而理達。東坡家兄謫居黄州，

①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一，中華書局，1988 年，第 2 册，第 1520 頁。
② 蘇轍《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絶》，《欒城集·後集》卷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卷二《廬州碑記》，《四庫全書》第 682 册，第 539 頁。

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或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故爲其載於墓志。”[①] 這段從學的經歷使韓駒受益匪淺，也爲他日後“鄉黨曲學”的罪名埋下了伏筆。

韓駒嘗遊太學，不第。政和元年（1111），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②]。這次出仕，據説得到了已回到徽宗身邊的内侍賈祥的幫助[③]，劉克莊所謂“有歧路可進身”、“自鬻其技，至貴顯”[④] 者。從他當時朋友的反應來看，還是能體諒他的這種行爲，未作過激評價。然官場的矛盾是複雜的，韓駒青雲直上的發展勢頭很快受到遏制。他爲正字不久，就坐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今屬陝西）市易務。在蒲城的日子，韓駒“鄙夫在蒲城，簿書劇絲棼。青山不到眼，終日無一欣”（《題分秀堂》，《全宋詩》第16589頁），倍感苦悶。終於，在“五占天鷄星”（《出宰分寧别舊同舍五首》其三，同前，第16590頁）後，政和六年左右，他回朝爲著作郎。曾受王黼之命，咏其家藏李公麟《太乙真人圖》。政和八年，蔡京排擠張綱，

---

① ［宋］釋曉瑩《雲卧紀談》卷上，《卍續藏經》第148册，第0010頁。

② 《宋史》卷四四五《文苑傳·韓駒傳》，中華書局，1978年，第37册，第13140頁。

③ 《玉照新志》卷五言其事云：“偶裕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四庫全書》第1038册，第660頁）此言不確。所謂“太乙真人之句”，乃韓駒《題王内翰家李伯時畫太一姑射圖二首》之一，作於王黼爲翰林學士的政和後期，非政和初所作。但如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二所言，韓駒“以詩文見知貴近，聞於天子”（《歷代詩話》上册，第463頁），他的由中人以進，諒非空穴來風。故《宋史》卷四四五《文苑傳·韓駒傳》評價他：“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第37册，第13141頁）

④ 劉克莊《江西詩派·二謝》，《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韓駒作爲張綱的朋友受到牽連[①]（一説：因爲得罪了門下侍郎薛昂[②]），貶知洪州分寧縣。他帶着失意之情上道，作《出宰分寧別舊同舍五首》（其二）云："念我行老矣，才拙世所捐。青綾未頻直，黃紬且安眠。飽聞縣西寺，修椽壓山巔。中（谷）［容］五百衆，上堂鼓闐闐。王程倘餘暇，玆焉著幽禪。自擷雙井茶，與僧酌雲泉。"（同前，第16590頁）此去分寧，韓駒果然與宗杲、惠洪、善清等大德交遊，接近禪學。他在分寧作堂曰"歸來"，故友李彭爲賦詩，并嘗來分寧與之相會。

宣和三年（1120），韓駒還朝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得到施展自己才能的舞臺。經他提議，徽宗詔三館學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大多數曲辭皆韓駒所作。這對國家禮樂之事有所補益，也展示了韓駒宏富的文學才能。宣和五年，韓駒除秘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據《宋史》本傳，韓駒入謝，徽宗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韓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徽宗曰："給事實掌封駁。"韓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徽宗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③] 君臣所談論，一爲制誥非止行文書、不作溢美溢惡的虛文，一爲中

① ［宋］張綱《華陽集》卷四十附録［宋］洪葳《張公行狀》："（政和）七年，磨勘，轉宣教郎。明年竟爲蔡氏所擠。韓駒、張忞輩，凡與公厚善者二十一人，俱在遣中。"《四部叢刊三編》本。

② 事見［宋］洪邁《夷堅丙志》卷一九《薛秀才》，《續修四庫全書》第1265册，第249頁。

③ 《宋史》卷四四五《文苑傳·韓駒傳》，第37册，第13140頁。

書舍人應能繳還詞頭、表達反對意見。這使中書舍人更能積極參與政務，對制誥文的品格也是一種提高。不久後，韓駒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在宣和大臣中，韓駒獨以能詩稱。但他這段時期的詩歌多爲官僚間的應酬之作，其中不乏對權貴的諛詞。如《臣㮚以御畫鵲示臣某謹再拜稽首賦詩》，以"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佔萬年枝"（同前，第 16618 頁）句著名。周紫芝贊此句"不動斤斧，有太平無事之象。以此知粉飾治具者，固不可以無其人也"[①]。韓駒果然是北宋末年的"粉飾治具"之人，然當時邊釁已啓，强敵欲發，君臣還沉浸在"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爲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紛然"[②] 的幻象中，實非盛事。宣和六年，韓駒遷中書舍人不久，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寓居揚州（今屬江蘇），與錢伯言交往唱酬。

宣和七年，韓駒除守歷陽（今安徽和縣）。未到任間，於靖康元年（1126）召還西掖[③]，除知應天府[④]。夏，移知黄州。他在黄州嘗戎服按軍，又與何頡交遊，訪東坡故迹。爲官僅百餘

① 周紫芝《書陵陽集後》，《太倉稊米集》卷六十七，《四庫全書》第 1141 册，第 481 頁。

② 同上。

③ 據韓駒《去冬除守歷陽未上召還西掖今夏自應天尹移知齊安道由歷陽珪老相訪奉柬一首》，《全宋詩》第 25 册，第 16597 頁。

④ 據韓駒《余往歲與遜叔侍郎同寓廣陵靖康元年遜叔守符離余被召過焉未幾余守南都遜叔移真定過留數日紹興二年復同寓臨川感念疇昔奉送一首》，《全宋詩》第 25 册，第 16630 頁。

日，復罷[①]。

高宗即位，除韓駒知江州、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因賊起旁郡，皆不赴。建炎元年初，他尚在黃州，有《某已被旨移蔡賊起旁郡未果進發今日上城部分民兵閱視戰艦口號五首》，後沿江而下。建炎二年（1128），韓駒寓居金陵[②]。後避難至江西，寄居洪州武寧（今屬江西）明心寺。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人自黃州濟江，進犯江西。十一月，洪州、撫州、袁州（治今江西宜春）皆降。十二月，金人屠洪州。韓駒自明心寺連夜出逃，“天寒更踢沮洳徑，月黑錯墮楊梅林。歷險登危四三里，少復前行過溪水”（《昔與道顏智俱二僧居武寧明心寺未幾與俱避賊山中顏幾不免紹興三年復會於廣壽寺偶作一首》，同前，第16603頁），躲進武寧城南的嚴陽山中，避賊十日下山。建炎四年，他住洪州豐城，與宗杲相見[③]。

紹興初，韓駒寓居臨川廣壽寺，曾紆、錢伯言、吕本中等也相繼來到臨川，“唱酬妍麗，一時傾慕”[④]。韓駒在廣壽寺的寓所成爲來往僧人挂單之處。宗杲、士珪禪師於紹興三年（1133）九月來此，館於韓駒西齋半年。除他們外，韓駒接待過的僧人，還

① 是時元祐黨禁已解，韓駒這次免官，應該不是爲“鄉黨曲學”。紹興五年，詔韓駒轉一官致仕，胡寅作制詞云：“具官早以詞藝，躋於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汝瑕疵。”（《斐然集》卷十三《韓駒轉一官致仕》，《四庫全書》第1137册，第439頁）高宗本人和胡寅都贊成元祐之學，這裏所説的“附麗匪人”，恐指王黼。這大約是韓駒本次罷官的原因，也是他在高宗朝没有被起用的原因。

② 據《大慧普覺禪師年譜》，本年十月以後，宗杲曾訪韓駒於金陵。見《嘉興藏》第1册，第797頁。

③ 據《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嘉興藏》第1册，第798頁。

④ 周必大《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唱和詩》，《文忠集》卷四十八，《四庫全書》第1147册，第512頁。

有善清、道顔、智俱、圓首座、元上人、賢上人、彰上人等，所謂“中歲厭凡子，結交惟道人。況此喪亂中，益信空門真”（《送深老住芭蕉寺》，同前，第16599頁）。他精進學禪，功名之念却未因此消減。供奉朝班的回憶，是這段時期韓駒詩歌中反復回蕩的旋律。他没有像故友徐俯、吕本中那樣被朝廷起用，但詩名極盛，足以和徐俯、吕本中鼎足而三。汪藻《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啓》：“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詩文一代之統盟。”[①] 曾幾《撫州呈韓子蒼待制》：“後學不虚稱吏部，此生曾是識荆州。”[②] 皆表示了對他的推戴。紹興五年（1135）七月，韓駒進一官致仕，卒[③]，年五十六，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

韓駒著作，《郡齋讀書志》著録《韓子蒼集》三卷。《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著録詩文全集《陵陽集》五十卷（《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著録《陵陽集》十五卷，疑爲五十卷之倒），卷二〇著録《江西詩派》本《陵陽集》四卷、《别集》二卷。五十卷本明末清初猶傳世。今惟存詩派本《陵陽先生詩集》四卷，皆明清鈔本。《四庫全書》以鮑士恭家藏本爲底本。清宣統二年（1910），沈曾植刊《西江詩派韓饒二集》，其中有韓駒《陵陽詩集》四卷，爲韓集現存惟一刊本[④]。另外，他還有筆記《南窗雜抄》[⑤]，詩話《陵陽正法眼》[⑥]，并有陶潛詩注本，已佚。

---

① 汪藻《浮溪集》卷二十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曾幾《撫州呈韓子蒼待制》，《茶山集》卷五，《四庫全書》第1136册，第514頁。
③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一，中華書局，1988年，第2册，第1520頁。
④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敘録》卷十五《陵陽先生詩集》。
⑤ 《南窗雜抄》爲歷史類筆記，《續資治通鑒長編》多處引用。
⑥ 據《氏族大全》卷五，《四庫全書》第1136册，第514頁。

第二節　詩論：江西宗派詩論的重要建樹

韓駒是著名詩人，也是詩歌理論家，他的詩論著作《陵陽正法眼》已佚，但從其弟子范季隨所録《陵陽先生室中語》（以下簡稱《室中語》）中，尚可見他對詩歌的基本觀點。就《説郛》本及《詩人玉屑》所引《室中語》及其他零星詩論來看，韓駒對詩歌的認識有如下幾方面内容。

其一，關於詩之體。韓駒説："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謂'思無邪'也。先具此質，却論工拙。"[①] 詩歌之質地須正而非邪，猶云詩歌之格調須高而非低，可以説，這是宋人的共識，亦是江西派詩論的標志。站在這樣的立場，韓駒批評晚唐詩"格致卑淺"。但他同時又説：

>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②]。

晚唐詩雖然格低，但它畢竟具備詩的品質，比今人作詩不像

①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三引《室中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9頁。
② 《詩人玉屑》卷十六引《室中語》，第359頁。

詩强。看來，在韓駒心目中，詩歌自有其獨立的領域。我們可以依如下次序來把握韓駒對詩歌性質的理解：體式（詩與非詩）——質地（正與邪）——表達（工與拙），在詩歌的內容、形式之上，特別把詩歌的本質放在首要位置，是理解韓駒詩論的一把鑰匙。宋詩自蘇、黄之後，不患格不高、意不正、語不新、法不奇，而患失去詩體、詩性與詩意。因此，韓駒欣賞王安石詩的“律詩甚是律詩，篇篇作曲子唱得”①，反對徐俯“作詩要當無首無尾”之説②，又因“絶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批評黄庭堅詩歌“若山谷蟹詩用‘與虎争’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詩中。如‘虎争’詩語亦怒張，乏風流蘊藉之氣”③。與黄庭堅、徐俯相比，韓駒對詩歌的看法較正統，也偏於保守。但對江西宗派而言，這也不失爲對過硬過偏詩風的自覺反撥。

其二，關於詩之法。韓駒於詩歌最大的心得在“行針布綫”，故他論詩，首先關心詩歌的命意布局，嘗言：

> 凡作詩須命終篇之意，切勿以先得一句一聯，因而成章，如此則意不多屬④。
>
> 作詩必先命意，意正則思生，然後擇韻而用，如驅奴隸；此乃以韻承意，故首尾有序⑤。

① 《詩人玉屑》卷十二引《室中語》，第 265 頁。
② 見［宋］吴可《藏海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338 頁。
③ 見《藏海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337 頁。
④ 《詩人玉屑》卷六引《室中語》，第 127 頁。
⑤ 同上。

在韓駒看來，詩歌要以意爲主腦。以意領起之後，則須究心於謀篇布局，講求意脉、語序的貫穿：

> 大概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脉聯屬，如有理詞狀。古詩云："喚婢打鴉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可為標準①。
>
> 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方為至妙。如老杜"莽莽天涯雨，江村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是也②。

而用典、對偶、下字，亦需圍繞詩人意緒、詩歌意脉進行：

> 使事要事自我使，不可反為事使③。
>
> 嘗與公論對偶，如"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以鏡名對酒名，雖為親切，至如杜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直以菊花對竹葉，便蕭散不為繩墨所窘。公曰："枸杞因吾有，鷄栖奈汝何?"蓋借枸杞以對鷄栖，"冬温蚊蚋在，人遠鳧鴨亂。"人遠如鳧鴨然，又直以字對而不對意；此皆例子，不可不知。子瞻岐亭詩云："洗盞酌鵝黄，磨刀切熊白。"是用例者也④。

---

①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第 121 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156 頁。
④ 同上，第 166 頁。

僕嘗請益曰：下字之法當如何？公曰：正如弈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着，顧臨時如何耳。僕復請曰：有二字同意，而用此字則穩，用彼字則不穩，豈牽於平仄聲律乎？公曰：固有二字一意，而聲且同，可用此而不可用彼者。選詩云："庭皋木葉下"，"雲中辨烟樹"。還可作"庭皋樹葉下"，"雲中辨烟木"。至此，惟可默曉，未易言傳耳①。

所謂"事自我使"、對偶不必拘繩墨、"正如弈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着，顧臨時如何耳"，無非都主於詩人之意。在韓駒看來，詩歌以意爲主，一切藝術表達都受意的調遣、安排，如行軍之有主帥。如上觀點，是對宋詩學尤其是江西宗派重意詩論的比較全面的總結。

在詩歌生與熟、新與變關係問題上，韓駒斟酌其中，贊成辨證性的把握：

韓子蒼言作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閑花"，此一字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為可信②。

（子蒼）又云：目前景物，自古及今，不知凡經幾人道。

① 《詩人玉屑》卷六引《室中語》，第139頁。
② 同上《復齋漫録》，第135～136頁。

今人一下筆，要不蹈襲，故有終篇無一句可解者。蓋欲新而反不可曉耳①。

所謂“不可太熟，亦須令生”，又要避免“欲新而反不可曉”，就是要求在參學前人詩作的基礎上，變而化之，追求陌生化效果，却不流於怪異。其間斟酌、把握的尺度，依然存乎意，對於詩人而言，是得失寸心知的事情。

其三，關於詩之病。北宋是詩歌的盛世，尤以元祐時期爲極盛。在這盛極之處，亦是詩歌凝固爲法度，被摹擬和仿效，開始僵化之時。北宋末、南宋初，對蘇、黄詩歌，尤其是黄詩的摹仿開始出現流弊，韓駒識此弊於初萌，敏鋭地提出批評。他反對爲追求高格而犧牲詩味，又針砭時人的亦步亦趨，說：“學詩須是有始有卒，自能名家，方不枉下工夫。如羅隱、杜荀鶴輩，至卑弱，至今不能泯没者，以其自成一家耳。”② 他還反對詩歌的次韻，論曰：

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③。

古人不和，况次韻乎④！

今人非次韻詩，則遷意就韻，因韻求事；至於搜求小說佛書殆盡，使讀之者惘然不知其所以，良有自也⑤。

---

① 《陵陽先生室中語》，《說郛》卷四十三，《說郛三種》第2册，第704頁。
②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第122頁。
③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八《評詩》，《四部叢刊三編》本。
④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第121頁。
⑤ 《詩人玉屑》卷六引《室中語》，第127頁。

次韻詩是在蘇、黄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一種因難鬥巧的交往唱酬方式，但無此才者，徒學次韻之體式，容易走入韓駒所説的“遷意就韻，因韻求事”的牽强境地，其弊端就是非詩之詩的出現。與韓駒同時的葉夢得、後來的嚴羽，對詩歌的次韻之風都有所批判，而最早提出批評的，還是韓駒。

“子蒼論詩説飽參”①，針對時人詩病，韓駒開出的藥方是全面學習前代詩歌。他勸人熟讀杜甫、韋應物、柳宗元詩，對晚唐詩也取其可取，嘗語人云：“大率作文須學古人；學古人尚恐不至古人，況學今人哉，其不至古人也必也。”②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南宋以後，江西宗派中與韓駒齊名的兩位領袖人物——徐俯、吕本中，持論亦與此同。前者説“余平生正坐子美見誣”，勸人上讀《文選》；後者超越前期以蘇、黄爲法的觀點，建議學者“《楚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爲吾用，則姿態横出，不窘一律矣”③。可見，識取詩病，廣參前作，這也是當時有識詩人的共識。

除以上内容外，韓駒詩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以禪論詩。其《贈趙伯魚》詩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全宋詩》第 16588 頁）這就是前文所説的“飽參”。對前代詩歌的廣泛學習，都作用於創作時的自爲自出，這種體驗以禪宗“參”與“悟”的關係作比

---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296 頁。
②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第 115 頁。
③ 吕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332 頁。

喻，分外貼切。同時或稍後，吳可作著名的《論詩詩》，所謂“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閑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冲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① 者，應當就是受上引韓駒《贈趙伯魚》詩的影響。韓駒還說：“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語此。”② 這一論調，我們可以在《滄浪詩話》“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③ 這段文字中找到嗣音。韓駒以禪喻詩的思想要追溯到蘇軾。蘇詩中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④ 的句子，蘇轍又親自向韓駒傳授了其兄“讀釋氏文，深悟實相”後獲得表達自由的詩文之法。不過，蘇軾所理解的詩、禪關係，主要是一種創作與閱讀的心法；進一步援之入文學批評的領域，以禪論詩，應該説是韓駒的創造。此外，韓駒還留下不少論詩的名言，如“賦詩十首，不如改詩一首”⑤、“人生作詩不必多，祇要傳遠”⑥、“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自不疑”⑦ 等，皆爲他創作中的甘苦之言。

總之，韓駒在詩歌本體論的基礎上，以詩人之意爲主腦，講究詩歌的體、格、形、貌。其詩論吸取了蘇、黄二家之長，又補

---

① 《詩人玉屑》卷一引《室中語》，第 8 頁。
②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第 122 頁。
③ 《滄浪詩話·詩辨》，《歷代詩話》上册，第 686 頁。
④ 蘇軾《夜直玉堂，携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蘇軾詩集》卷三十，中華書局，1982 年，第 5 册，第 1616 頁。
⑤ 《詩人玉屑》卷七引《室中語》，第 166 頁。
⑥ 《詩人玉屑》卷五引《室中語》，第 121 頁。
⑦ 同上，第 122 頁。

其短，發詩病於初萌，切中時弊，爲山谷之後江西宗派詩學理論的重要建樹。

第三節　詩歌：行針布綫的高手

韓駒有得黄庭堅印可和參法蘇轍的經歷，兼得蘇、黄兩個法統，但又能“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擺脱桎梏，自成一家。據説有人問蘇轍，爲何將韓駒比作儲光羲。蘇轍回答：“見其行針布綫似之。”① 行針布綫確實是韓駒的强項。布局的有序、意脉的貫穿體現在韓駒各體詩的創作，是其詩歌最顯著鮮明的特色。

先看古詩，以《贈蔡伯世》爲例：

君家夫人林下風，長齋綉佛鳴金鍾。侍兒百指亦清净，凌晨梵唄聲摩空。潭潭大第依喬木，日午捲簾按絲竹。古調猶歌于蔿于，麗詞不唱新翻曲。有美一子天麒麟，孟嘉外孫見淵明。掃地焚香坐弦誦，不聞梵唄連歌聲。俗子何由共杯酒，容我叩門呼小友。欲求百萬錢買鄰，倒囊祇有詩千首。安得一把茆蓋頭，榆林從君父子遊。敢期絲竹娱下客，但喜白業同精修。禿襟短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和詩論道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321 頁。

有餘閑，為語故家遺俗事。(《全宋詩》第16587～16588頁)

詩歌從友人的夫人説起，次及其侍兒、兒子，反復鋪陳，直到最後纔點及蔡伯世本人，述長相依從之願。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贈人詩，看似紛雜繁複，實乃以“不俗”的主題貫穿頭緒，從蔡家人入手，層層鋪墊，重重演繹，終於在“禿襟短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句中，點明蔡伯世的格調和自己的感受。詩歌以意貫穿，却又出人意計，叙事極有倫序。又如《題蕃騎圖》:

塞上漠漠黄雲秋，黄鬚胡兒騎紫騮。一馬攙前弄風走，胡兒掣轡空驤首。回鞭慎莫向南馳，漢家將軍方打圍。奪弓射汝猶可脱，奪汝善馬何由歸。(同前，第16601頁)

此爲題畫詩，前四句對“黄鬚胡兒騎紫騮”的畫中景物作生動描寫，後半部分却下一轉語，告誡畫中胡兒：“回鞭慎莫向南馳”——(因爲)“漢家將軍方打圍”——(如果不聽勸告，那麼)“奪弓射汝”——“猶可脱”——(可是)“奪汝善馬”——“何由歸”？這後四句話，交織着因果、承遞、并列和轉折關係，以有爲而發提挈了前半部分對畫圖的描寫，使終篇有所歸。在章法上，此詩如他標舉的“唤婢打鴉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莽莽天涯雨，江村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二詩，能“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篇，方爲至妙”。這就是韓駒詩歌的布

局之妙。

在諸體詩歌中，韓駒尤以七律聞名。除却如“倦鵲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和李上舍冬日書事》，同前，第16613頁）的善摹物象、精於對偶，“不見星橋開鐵鎖，似聞雷鼓落銅丸”（《次韻李希聲館中上元直宿》，同前，第16617頁）、“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登赤壁磯》，同前，第16622頁）等的善用典故外，他七律的最大成就，仍舊是意脉貫穿。《夜泊寧陵》詩，吕本中舉以爲法，亦是韓駒流傳後世的名作：

> 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便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泊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窣窣，寒花垂露落毵毵。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同前，第16615～16616頁）

詩歌的前半寫行舟，行文亦如舟行水上，輕利豐盈。首句“汴水日馳三百里”，許印芳評曰：“起法尤峭健，非斬盡枝葉者不能如此落筆。”[①] 第二句承首句氣勢貫注而下，“祗一句中有進步，猶云‘同是行人更分手首’也”[②]。三、四再承首聯，在“旦辭”、“夜泊”與“風微北”、“月正南”的排比中表現爲一聯内的進步，與“扁舟東下便開帆”的句中進步形成節奏上的錯落交替。頸聯承“夜泊寧陵”句轉，寫夜泊景象，對象是兩岸的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560頁。
② 同上，方回評。

花、樹。在詩人行舟始泊的心境中，兩岸的静物并不安静，而是在霜與露的浸潤中舞動起來。於是，在這初定未定的時刻，詩人回觀水色天光，沉浸在“茫然不悟身何處”的怡然中，任一氣回旋。此詩如紀昀所評“純以氣勝”①。詩人意氣貫穿，詩歌如行雲流水而下。難怪《詩人玉屑》卷六“意脉貫通”條引《小園解後録》，舉此詩爲法，以爲熟讀“打起黄鶯兒”及此詩，“思過半矣”②。

不僅古、律詩，即使是在韓駒以爲“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的絶句，也講究詩歌的布局。如《謝人寄茶筅子》：“立玉干雲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真龍種，猶解横身戰雪濤。”（同前，第16613頁）僅四句話，就總括了從竹之初生到作茶筅子，再到點茶數事，叙事極有倫序。又如《十絶爲亞卿作》，乃代妓贈友之作，是韓駒絶句中的名篇。後人往往艷稱它們“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③，對其中“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樓前更不流”一聯的化用唐人詩句、有唐人風味贊不絶口。其實，這十首絶句的好處，絶不止於化用、反用唐人詩句，或者具有唐人風味。試觀其全文：

離歌三疊最關情，不省從來此地聞。早是春殘心事惡，落花陰裏更辭君。

---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560頁。紀昀評。

② 《詩人玉屑》卷六，第133頁。

③ ［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五，《清詩話續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82頁。

君去東山踏亂雲，後車何不載紅裙。羅衣浥盡傷春泪，衹有無言持送君。

更欲罇前抵死留，為君徐唱木蘭舟。臨行翻恨君恩雜，十二金釵泪總流。

世上無情似有情，俱將苦泪點離罇。人心真處君須會，認取儂家暗斷魂。

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樓前更不流。

憶泛郎舟共採蓮，今來揮泪送郎船。回書倘寄新翻曲，湖上何人為扣舷。

一夢巫陽樂已窮，三年猶復怨匆匆。倏雲驟雨成何事，未必三年抵夢中。

妾願為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恐君回首高城隔，直倚江樓過夕陽。

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强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泪，莫道心痴不解愁。

强整雙鬟説後期，相盟不在已相知。來時休落春風後，却漫嘲儂子滿枝。（同前，第 16607 頁）

在訴説相思的主題和蘊藉婉約的風格上，此十絶確有唐人風致。但此十詩之佳，乃是在唐人閨怨詩的基礎上更進一籌，以宋人叙事之筆叙情，以深入的心理刻畫與轉折、層遞的章句，説盡女主人公依戀、埋怨、猜忌、期盼等種種複雜的心事。與此相應，詩中女主人公的形象，亦在唐人同題作的痴情之外，多了一

份宋人歷練世事後的清醒、乾脆、明白。如“離歌三叠最關情，不省從來此地聞”、“世上無情似有情，俱將苦泪點離罇”、“倏雲驟雨成何事，未必三年抵夢中”的幾近理語，“臨行翻恨君恩雜，十二金釵泪總流”、“强整雙鬟説後期，相盟不在已相知”、“來時休落春風後，却漫嘲儂子滿枝”的言切理直，“妾願爲雲逐晝檣，君言十日看歸航”、“縱言眼軟偏饒泪，莫道心痴不解愁”的句中轉折，所體現出的心理刻畫深度和層次感，都未經唐人所道。這十首詩交織着熱語與冷語，不僅以情、更以意勝，在詩歌章法的轉折、回旋、進步、反復上研擘入裏，極可玩味。徐俯《跋韓子蒼代葛亞卿詩》云：“十詩盡説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同前，第 15835 頁）從“盡説人間事”的深度與廣度，此十詩正體現了宋詩的成就，也體現了韓駒本人行針布綫的本事。敖陶孫論陵陽詩“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①]，良非虚言。

第四節　餘論：“官樣文章”的考察

據説韓駒得知吕本中圖寫自己入江西宗派，不懌道：“我自學古人。”[②] 四庫館臣評論云：

① 敖陶孫《臞翁詩評》，《詩人玉屑》卷二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9 頁。

② 見《雲麓漫鈔》卷十四，中華書局，1996 年，第 244 頁。

> 駒學原出蘇氏。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圖》，列駒其中，駒頗不樂。然駒詩磨淬翦裁，亦頗涉豫章之格，其不願寄(王)［黄］氏門下，亦猶陳師道之瓣香南豐，不忘所自耳，非必其宗旨之迥别也。陸游跋其詩草，謂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詩成，既以與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憾乃止，亦可謂苦吟者也①。

這是從詩學風格上對韓駒歸屬江西宗派的認證。從本文思路來講，韓駒的入江西詩派與否，還需要有一種詩學精神上的認證。這是因爲，韓駒詩文，在“江西宗派體”外，似乎有某種别樣的風格。

方回論饒節《次韻答吕居仁》詩，在贊揚了饒節詩的“决不肯拈花貼葉，如界畫畫，如甃砌墻也”後，説：“惟韓子蒼不喜用此格，故心不甘於入派，而其詩或謂之太官樣。要之天下有公論，予亦無庸贅也。”② 所謂官樣，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録·韓駒》云：“王平甫稱爲官樣文章。”按，王安國，字平甫，安石之弟，卒於元豐初年，其時韓駒尚未出生，不可能得到王安國“官樣文章”的評價。當依宋人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十五：

> 曾端伯謂昔人嘗論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

---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中華書局，1965年，下册，第1354頁。
②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1754頁。

> 槁，著書立言是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演綸視草之所尚也。王安國亦云：文章格調，須得官樣。若子蒼者，乃臺閣之文，所謂官樣者歟？其詩亦然。内外制多用西漢語，故温潤有體。

曾端伯即曾慥，上引曾端伯語，當出自他在《百家詩選》中爲韓駒作的小序。曾慥所引前輩關於"文章有兩等"的説法，見於吴處厚《青箱雜記》：

> 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温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①]？

看來，"官樣文章"出自王安國"文章格調，須是官樣"的議論，指富麗典雅的制誥體文章。吴處厚更以"文章有兩等"説將"朝廷臺閣之文"與"山林草野之文"對立起來，對"官樣文章"作出系統闡釋。曾慥在《百家詩選·韓駒小序》中援引吴處

① ［宋］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五，中華書局，1985年，第46頁。

厚觀點，論韓駒文章“官樣”，“其詩亦然”，將文章“官樣”的評價移評詩歌，這就是方回“而其詩或謂之太官樣”説所本。有意思的是，“官樣文章”在吴處厚、王安國處具褒義，在曾慥筆下無所謂褒貶，可到了方回這裏，就“要之天下有公論”，帶有强烈的貶義色彩，這應該是基於方回本人的價值取捨。“朝廷臺閣”與“山林草野”是兩條不同的創作路綫，其作品的風格迥異。如果説，韓駒詩文有官樣傾向的話，作爲“有志之狷士”的江西宗派其他詩人則更多的創作了“山林草野之文”。方回贊成江西詩風，故將韓駒的官樣文章放在江西詩格的反面予以諷刺。

在韓駒的創作生涯中，任職館閣的時間，衹有政和、宣和間的數年。如果以“有館閣氣”爲主要特徵的話，所謂的“官樣文章”，確切地説，是指這數年中的創作。這一時期詩歌有如下幾種可以稱爲官樣：其一，粉飾太平之作，如“萬年枝”等作品；其二，對上司的諛詞，如《咸平生日》，及韓駒集中爲數不少的上人生日之作；其三，官僚間的相互唱酬，如《次韻程致道館中桃花》《次韻王給事觀殿試唱名》等。這些詩歌多出於應酬的目的，爲文造情，語滑、情淺、格卑、力弱。《四庫全書總目》説：“晁公武《讀書志》謂王黼嘗命駒題其家藏《太乙真人圖》，盛傳一時。今其詩具在集中，有‘玉堂學士今劉向’之句，推許甚至。劉克莊謂子蒼諸人自鬻其技至貴顯，蓋指此類。其亦陸游《南園記》之比乎？”[①] 韓駒在政、宣大臣中獨以能詩稱，但即使是《和李上舍冬日書事》《次韻李希聲館中上元直宿》等名篇，

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中華書局，1965年，下册，第1354頁。

也難免貧弱之病。這些詩歌雖然可以潤色鴻業、粉飾太平，却與以“不俗”爲特徵的江西詩格正相反。宣和時期是韓駒人生中最爲得意的時期，但如果他一直保持人生中這種得意，韓駒詩歌就將不是江西宗派詩人，而是江西詩人的反調。

所幸的是，韓駒一生失意時多，得意時少。他曾從蘇轍受學，在打擊元祐學術的徽宗朝，屢次因爲“鄉黨曲學”貶黜，在昌明元祐學術的高宗朝，又獨獨未被起用。因此，在韓駒一生的大多數時候，所作并非“朝廷臺閣之文”，而是“山林草野之文”，并以蘇、黄詩學的傳承及對元祐文化的繼承，與宗派諸友同調。在他未仕之前，這一傾向尤其明顯。如他集中的《上泰州使君陳瑩中》詩，盛贊陳瓘的“今日在前皆鼎鑊，後來知我獨春秋”（《全宋詩》第16605頁）；又《贈蔡伯世》，在“禿襟短帽紛紛是”的時代，獨許不俗的“褒衣士”；《食煮菜簡吕居仁》，寄寓着與朋友“殷勤故煮菜，知我林下風”（同前，第16588頁）的同調之感。正因爲如此，吕本中圖寫韓駒入江西宗派。不過終韓駒的一生，功名心與解脱願交織，師友淵源與官場周旋并履，在宗派詩人中，氣味最不純粹。他晚年作送吕本中赴召詩云：

> 一樽相屬兩華顛，落日臨分更泫然。蹀躞鳴珂君得路，伶俜散策我歸田。近聞南國生涯盡，厭見西江殺氣纏。欲買扁舟吴越去，看山看水樂餘年。（《即席送吕居仁》，同前，第16629頁）

故人被召，韓駒的心中如打翻五味瓶，羡慕、怨艾、自憐、感

傷，一覽無餘。這種心向魏闕的詩歌，可以看作是“官樣文章”的變體。吕本中大約是嫌此詩氣格低下，衹稱“厭見西江殺氣纏”一句爲詩語①。在詩歌精神上，韓駒是一個徘徊在江西詩格邊緣的人物，而其中“官樣文章”的部分顯然溢出江西體外，流於平庸與軟弱。

① 見《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285頁。

第十一章
呂本中

呂本中是元祐宰相呂公著的曾長孫，兩宋之際整合元祐學術、傳承斯文的重要人物。就文學地位而言，他是江西宗派的命名者、領袖，其詩學理論和詩歌創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他雖然没有自列名入《宗派圖》，却在宗派詩人中不可或缺，故筆者將對他的考述，作爲江西宗派研究之殿後。

第一節　生平：中原文獻的淵藪[①]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學者稱東萊先生。呂氏祖籍東萊（今山東萊州），自本中七世祖夢奇遷於河南，夢奇之子龜祥徙居壽州（治今安徽鳳臺），自呂夷簡起徙居開封，遂爲開封人。呂氏爲宋代望族。本中的五世伯祖蒙正相太宗、真宗，謚“文

① 本節主要參考《宋史》卷三七六《呂本中傳》、王兆鵬先生《呂本中年譜》。

穆”；高祖夷簡三相仁宗，謚“文靖”；曾祖公著，相哲宗，謚“正獻”。公著長子曰希哲，以父蔭入官，哲宗朝召爲崇政殿説書，官至光禄少卿，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號“滎陽公”。希哲長子曰好問，以蔭補官，官至尚書右丞，封東萊郡侯。本中乃好問長子。他繼承了吕家良好的政治才能、理學修養，還作爲一位著名的詩人，爲吕氏家學增添了新的品質。

吕本中出生於元豐七年（1085）。次年三月哲宗即位，高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改明年曰“元祐”。吕公著以七十歲左右的高齡起爲宰相，被高太后所倚重。吕本中幼而敏悟，受到曾祖的奇愛。元祐四年二月，吕公著卒。宣仁太后與哲宗臨奠。吕本中時六歲，與諸童皆立庭下。宣仁后獨招本中上前，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出身如是家庭，生長如是時代，又受到如是囑托，這爲吕本中對自我的要求定下了很高基調。

吕公著去世後，吕本中以曾祖遺表恩授承務郎，在祖父希哲的教導下成長。元祐年間，吕希哲在汴京爲侍講，程頤亦在汴京，他們間的交遊，本中聞見習熟。紹聖元年，新黨當政。吕公著被追奪贈謚，仆所立碑，吕本中也坐黨事奪官。吕希哲先後貶知懷州（今河南沁陽），權知太平州，分司南京、和州（今安徽和縣）居住，吕好問父子皆隨侍。元符年間，吕希哲居和州，閉户却掃，不交人物。吕本中每夜與祖父母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學問極進。又嘗作詩嘔血，留下了終身的羸疾。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吕本中以赦復承務郎，吕希哲起知單州（今山東單縣）。吕希哲對政局并不樂觀，他以《周易》卜筮，得“復”之上六，“知吾道之不振也”，在赴單州任途經山陽（今

江蘇淮安）時，過橋墮水而不傷，經歷了一次悟道的體驗，思想更趨内省[1]。吕本中始終跟隨祖父，在治心養氣工夫上多受其濡染。

建中靖國元年（1101）秋，吕希哲召爲秘書少監，旋左遷光禄少卿。在汴京，陳師道與吕家往來；吕本中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期甚遠。吕希哲力請外，本年冬，以直秘閣知曹州。崇寧元年六月四日，奪職知相州（治今河南安陽），旋改邢州（治今河北邢臺）。八月，管勾冲佑觀。九月，吕公著、希哲入元祐黨籍碑。吕本中時年十九歲，隨父祖寓居宿州。作爲黨人子弟，仕進之門此時對他關閉，但廣闊的師友淵源領域，正在向他打開。

崇寧初，吕本中作爲年輕的詩人開始嶄露頭角。徐俯見其詩，大相贊賞，以爲盡出江西諸人之上。汪革、黎確、饒節等在宿州，相繼投入吕希哲門下，遂與吕本中交往。於是，在“窮居日荒凉，杜門與世絶。親故日夜疏，詩書固宜缺”的日子中，“符離雖陋邦，賢士稍羅列”（《符離諸賢詩》，《全宋詩》第18033頁），令其廢居生涯焕發神采。後謝逸托汪革致書滎陽公，與居仁相識，謝邁也因此與之相聞，臨川四友遂成爲吕本中平生最投契的朋友，在吕氏的師友淵源録中佔據了最爲重要的位

① 見吕本中《師友雜志》。

② 在吕本中《師友雜志》及《紫微詩話》中，臨川四友佔據了重要的位置。此外，吕氏還有《青溪類稿》(此書已佚，周彦約《青溪汪先生（革）傳》繫之青溪先生汪革名下，誤)，專門講述汪、謝、饒等人的事迹。參朱熹《跋吕舍人青溪類稿》：“紹興紫微吕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固非後學可得而贊也。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以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饒節者，一旦毁削膚髮，殄絶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臾嗟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晦庵集》卷八十三，《四庫全書》第1145册，第729頁）

置②。後饒節出家，汪革調官楚州，與吕本中仍保持着密切的書信來往。

大觀二年（1108），吕好問任真州舂料船場官，迎侍吕希哲至真州（今江蘇儀征）居住，吕本中隨往。一行人沿運河南下，行至楚州（治今江蘇淮安），時任楚州教授的汪革來會，并與接祖母赴官潁州的洪炎相遇，在山陽、寶應（今屬江蘇）道中會飲甚樂。吕本中在真州一直居住到大觀四年，其中曾數次回符離暫住。大觀三年冬，謝薖下第歸臨川，吕本中與他相逢於符離。他還在這段時期和王直方開始通信、與江端本結識、提出"活法"理論，作爲符離——臨川詩人羣體的領袖，受到謝逸等推崇。同一時期，以徐俯爲領袖的江西——淮南詩人聯繫緊密，於南昌興起豫章詩社；吕本中亦發起"東"字韻詩唱和，并作《江西宗派圖》，總結山谷後學"同作并和"的成就，在文學批評史上有深遠影響。

政和一、二（1111、1112）年，吕本中客遊京師，與昭德諸晁交遊，尤與晁冲之友善。政和三年，時吕好問司揚州儀曹事，吕本中離京回揚州。四月過寶應，與外弟趙承國相遇，應趙承國請，"因録予之聞於先生長者本末告之"，作論學之語十七則，推蘇、黄永以爲法①。後周必大跋此帖曰："紫微舍人吕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黄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

① 吕本中《贈趙承國論學帖》，《耆舊續聞》卷二，中華書局，2002年，第303～306頁。

操，誰能及之！”[①] 揚州據南北要衝，賢士大夫舟車上下，必過呂好問而拜滎陽公於堂。呂本中就在這段時期與楊時、陳瓘相識，又曾隨父親沿檄至静海（今江蘇南通），從元祐名臣馬涓、任伯雨遊。馬涓“論事有體，紆徐委曲，不與物競”，任伯雨“志剛氣直，都不少屈”，陳瓘告之以華嚴境界，對呂本中深有影響[②]。

政和五年，呂本中調濟陰（今山東菏澤）主簿，攜妻兒同往[③]。有《初抵曹南四首》（其四）云：“往時汪博士，勸我便歸休。”（同前，第 18092 頁）是時政治環境較以前寬鬆，逝者已矣，生者開始走上爲食而仕之途。從呂本中在濟陰的詩作，如“長官抵幾入門去，小吏垂頭就行立”（《和趙承之》，同前，第 18093 頁）、“簿書糾纏人，欲出不自許。老吏環我前，更作附耳語'（《十一月一日步河堤上》，同前，第 18104 頁）等來看，他頗不堪吏事。政和七年，劉安世召集呂本中、向子諲諸人，“皆相約爲一州之隱，以便往還講習之益”[④]。呂本中辭官歸。將行，得江端本、晁冲之書，有《將去曹南連得江晁書因嘆存殁諸友遂成長韻》云：“故人數通書，尚有江與晁。窮塗感節義，俗耳受風騷。向來相知人，昔盛今寂寥。落日送汪謝，荒山留老

① 周必大《跋呂居仁帖》，《文忠集》卷十八，《四庫全書》第 1147 册，第 182 頁。關於呂本中政和三年與趙承國帖，朱剛《呂本中政和三年帖與宋代文學整體觀》文有精闢論述，載王水照等編《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年。

② 見《師友雜志》。

③ 《宋史·呂本中傳》繫此於元符中，誤，從王兆鵬《呂本中年譜》改。

④ 呂本中《將去曹南連得江晁書因嘆存殁諸友遂成長韻》自注，《全宋詩》第 28 册，第 18103 頁。

饒。”（同前，第 18103 頁）至此，江西宗派已有幾位重要人物凋零，餘下的詩人聯繫鬆散，不再有“同作并和”的盛況。

重和元年（1118），吕本中任泰州獄掾。四月别江、晁諸友，自汴京出發，秋日到達海陵，忍受着“每隨妓吏去迎官”、“坐守寒燈聽聒囚”（《往來送迎城南道中二絶》，第 18109 頁）的獄掾生涯。宣和元年（1119），吕本中調官京師。宣和二年十月，方臘亂起，吕本中往泰州接家人避亂，次年至韓城（今屬陜西）。是年方臘亂平，吕本中母親去世。宣和四年，吕本中携妻子往陽翟（今河南禹州）依父親好問。宣和五年免喪，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居京師。靖康元年（1126），遷職方員外郎。閏十一月，吕好問除兵部尚書，本中引嫌奉祠。本年金兵入侵，正月起圍汴京，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靖康二年正月，欽宗被脅迫至金兵營中。三月七日，立張邦昌爲大楚皇帝。四月一日，金人擄徽宗、欽宗二帝北退。短短兩年間，北宋人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吕本中繼承了杜甫詩史的精神，以忠義的詩心、忠誠的史筆，用詩歌來記事，留下了《京城圍閉之初天氣晴和軍士乘城不以爲難也因成四韻》《守城士》《聞軍士求戰甚力作詩勉之》等詩作，可與歷史記載相參，更留下詩人在國破之際的情感體驗，是爲實録。靖康二年四月，金兵北退，圍閉半年的汴京城門始開，吕本中離京南下。五月高宗即位於應天府，改元建炎。七月，吕好問除知宣州，本中遂至宣州寓居。時金兵甫退，盜賊蜂起，連高宗的乘輿都因金兵追擊而數度奔竄，普通的士人及百姓，亦免不了逃難的歷程。

建炎二年（1128）秋，吕本中隨父親離宣城赴江西，途經涇

縣、旌德縣、休寧縣、黟縣、祁門縣、浮渠、進賢、洪州，建炎三年春至筠州（治今江西高安）。是年秋，又“如今避地走，不復爲山留”（《離筠州》，同前，第18142頁），離開筠州，走湖湘一綫，過建城、醴陵、衡州，於建炎四年正月初一到達宜章（今屬湖南）。然因“湖南馳賊騎，江外踐胡塵”（《宜章元日》，同前，第18230頁），又倉皇奔往連州（今廣西連縣）。端午日自連州北返，至郴州（今屬湖南）。是秋盜賊又起，吕氏父子遂又度嶺奔赴全州（今屬廣西），其冬徙賀州（今屬廣西）。紹興元年（1131）正月，復徙康州（今廣東德慶），夏間至桂州（今廣西桂林）。七月，吕好問卒於桂州。至此，吕本中連年的轉徙纔告一段落。三年間他輾轉行役，一路皆有詩紀行，表現了其詩歌的實録精神。

吕本中在桂州居住了一年半。其時曾幾寓居柳州，素聞居仁之名，至此前來受教。紹興二年年底，吕本中離開桂州北返。紹興三年二月一日，夏倪之子見吕本中於嶺南，出夏倪詩集。吕本中爲作《夏均父集序》，系統地闡釋了自己的活法理論。是秋，吕本中北還至臨川寓居。臨川是他的故友二謝、汪革等生活的地方。他往訪其家，收聚故人子弟共學，得謝薖文集於其子訥所，作《謝幼槃文集跋》云：

> 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寧、大觀間，不為世俗毫髮污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

二子立言之本志①。

紹興三年是吕本中屢遷始定，亦是南宋政權初得安定的一年。宋高宗愛好元祐學術，喜愛山谷詩歌、書法。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山谷詩風大行於世。然與時風不同的是，吕本中帶着中原文獻之傳承，爲後學開示的，并非某種文字風格，而是此文字後"修身厲行"的内在精神，這纔是江西宗派詩學的命脉。

寓居臨川期間，吕本中與韓駒、曾紆、錢伯言唱酬，與宗杲、士珪禪師交遊，收了曾季貍等門生，促進了臨川文藝的繁榮。紹興四年三月，吕本中除祠部員外郎。四月，以疾辭，依舊直秘閣，主管臺州崇道觀。本年秋天，吕本中來到福州。故人范寥、張元幹、士珪、宗杲時在閩中，與吕本中交遊，福州士子林之奇、李柟、李樗亦拜入門下。這一時期，他有《閑居感舊偶成十絶乘興有作不復詮次》，追憶汪革、謝逸、饒節、夏倪、晁冲之等人，表達了對宗派故友的懷念。

紹興六年四月，以范冲薦，吕本中召赴行在臨安。七月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十一月二十三日，兼權中書舍人。紹興七年四月，引疾奉祠。閏十月，以趙鼎薦，除太常少卿。紹興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讀。六月，兼權直學士院。八月，兼史館修撰。十月，落職奉祠。在朝廷供職的兩年中，吕本中抑制内侍的權勢，諫除易濫用的黥刑，建議接待金使以儉約，薦舉道德之士爲政，展示了務實的政治才能。最值得一提的，是

① 吕本中《謝幼槃文集跋》，謝薖《謝幼槃文集》卷尾，《叢書集成初編》本。

在對金關係中，他所持的不同於戰、和兩派的中立態度。據《宋史》本傳，紹興七年正月，吕本中奏言：

> 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絶，奸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

輕言恢復者無視實際形勢，力主和議者踐踏民族情感，吕本中兩不取之，而是站在恢復的立場，以務實的態度，於百廢待興之時尋求固本之道。較之清議派的浮躁與投降派的悖謬，這無疑是一種中道的擇取。吕本中爲中書舍人後，秦檜、趙鼎爲左右相，議論多不協。吕本中曾與秦檜同爲郎官，相得甚歡，但他的政治態度乃與趙鼎相近。秦檜有專擅之意，欲排不附己者，吕本中爲陳“同人於野，亨”義，勸他以大同至公圖濟艱難。秦檜引用私黨，吕本中封還除目，秦檜勉之而卒不書行。《哲宗實録》成，趙鼎遷僕射，吕本中草制詞曰：“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秦檜見之大怒，遂指爲附首相、破和議。紹興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趙鼎罷相。秦檜指使御史蕭振彈劾本中。二十八日，吕本中落職奉祠。秦檜將此事寫入他的《日曆》，本圖詆毁，效果却適得其反。吕本中表現

出的不畏權臣、敢於直言、是是而非非的勇氣，爲天下人稱許佩服。

罷官後，吕本中先去嚴州（今浙江建德），後至衢州（今屬浙江）寓居。紹興十年一度復職，旋罷。紹興十一年，吕本中居信州（今江西上饒），寓居茶山廣教寺。餘年與曾幾、劉勉之等交遊，“上饒學子稍宗其學問，雖山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①。紹興十五年六月，吕本中跏坐而逝，年六十二。謚“文清”。

吕本中著作，有《春秋集解》《官箴》《童蒙訓》《紫微雜説》《師友雜志》《東萊先生詩集》《紫微詞》《紫微詩話》《軒渠録》《吕居仁集》《吕居仁奏議》《痛定録》《江西宗派圖》《吕文靖公事狀》②《青溪類稿》等十餘種。就詩歌而言，乾道二年(1166)，吕本中故人之子沈公雅裒《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而刻之，請曾幾作序。此本今存日本内閣文庫，《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收録。慶元五年（1199），黄汝嘉重刊《江西宗派詩集》，收《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三卷，此本尚存《外集》及正集殘卷，藏國家圖書館③。

①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五《兩賢堂記》，《四庫全書》第1165册，第226頁。

② 以上著作，王兆鵬先生《吕本中年譜》有詳細考述。

③ 據祝尚書師《宋人别集叙録》卷十六《東萊先生詩集》。

第二節　理學家修養與詩人活法

呂本中是《江西宗派圖》作者，也是宗派詩人中具代表性的理論家。其詩學主張散見於《童蒙詩訓》《紫微詩話》《江西宗派圖序》《與表弟趙承國帖》《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第二帖》《夏均父集序》等著作、書信、序跋中。這些詩論值得在如下兩個方面引起我們關注：其一，作爲兩宋之際著名理學家，呂本中的詩學主張是宋代理學家詩論的組成部分；其二，作爲江西宗派集大成的詩人，他的詩論又是江西宗派詩學體系中重要的一環。理學家與詩人身份的統一，給江西詩派詩論、宋詩學帶來了怎樣的品質，這就是本節考察的着眼點。

一、理學修養的滲透

與黄庭堅一樣，呂本中論詩講究根本。如前引《謝幼槃文集跋》，指出謝逸兄弟“修身厲行”的“立言之本志”；又《夏均父文集序》，論“今之爲詩者，讀之可使人興起爲善之心乎？果可使人興觀羣怨乎？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①，重申儒家詩教；在《童蒙詩訓》中，亦指出“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呂紫微》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1]，將對"氣質"之性的追求放在形式美之上。以立身爲立言之根本，爲美建築善的根基，此乃理學家與江西派詩人的共識。而在吕本中這裏，理學思想不僅爲詩歌樹立道德根基，還滲透入詩人主體的心性修行。他提出著名的"活法"理論，就見理學修養的影子。

吕本中的"活法"理論，約於大觀三年，在《外弟趙才仲數以書來論詩因作此答之》中提出：

前時少年累，如燭今見跋。胸中塵埃去，漸喜詩語活。孰知一杯水，已見千里豁。初如彈丸轉，忽若秋兔脱。(《全宋詩》第 18056 頁)

又《别後寄舍弟三十韻》：

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筆頭傳活法，胸次即圓成。……力探加潤澤，極取更經營。徑就波瀾闊，勿求盆盎清。(同前，第 18086 頁)

"活法"是詩法，但它首先是一種心法，是脱去塵埃後的透脱境界，所謂"直須識根柢，始是極波瀾"(《寄唐充之二十韻》，第 18087 頁）者。這種境界與吕本中的理學修養有關。吕氏家學以踐履爲主，融以釋氏心法，主於廣大、樂易、貫通。吕希哲

① 《宋詩話輯佚》下册，第 594 頁。

《吕氏雜記》云："修身至於樂。修之至也，則樂生矣。和氣熏蒸，煞氣自消。煩慮定心乃强爲，學者須先得其要。閑邪，然後能存其誠。"[1] 講究心境的和易。吕本中承之，内心篤定堅實，觸物却和氣生春。他嘗語後學"讀書須是玩"、"道袛在日用處"[2]。持此心性修行，吕本中遂在詩歌創作中提煉出"活法"理論——"直須識根柢"是基礎，"胸次即圓成"是涵養，"極取更經營"爲作用；至於"初如彈丸轉，忽若秋兔脱"，則爲"活法"完成後的境界。理學治心養氣的工夫滲透入詩歌創作，心境之圓活通透，遂成爲"筆頭傳活法"的關鍵。而"彈丸"之喻，如劉克莊所説"非主於易"[3]。後來吕本中語曾幾作詩之法云："詩卷熟讀，治擇工夫以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4] 在"治擇工夫"、"涵養吾氣"、"規模宏放"中轉圜，如此作詩，正是"活法"作用的表現。

大觀末、政和初，吕本中"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謝邁《讀吕居仁詩》，同前，第 15764 頁），其詩歌也達到"吾詩如清風，去留不可期。灑然或一來，不繫凡子知"（《送山伯良佐東歸以務道其息途爲韻》其三，同前，第 18069 頁）的活潑潑境界。活法理論的確立標志着吕本中詩學觀和詩歌創作的成熟，也貫穿了他一生對詩歌的理解。紹興三年，吕本中在《夏均父集

① ［宋］吕希哲《吕氏雜記》卷上，《四庫全書》第 210 册，第 211 頁。
②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四庫全書》第 1140 册，第 372 頁。
③ 《江西詩派·吕紫微》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④ 曾幾《東萊先生詩集後序》，《茶山集·拾遺》，《叢書集成初編》本。

序》中，對“活法”理論作出進一步規定：

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俱，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必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①。

在這裏，“活法”除如前期標舉的流轉圜美、心地圓成外，還賦予了入規矩内而出規矩外，法之圓活者的含義。當代研究者據此盛贊活法理論對江西詩派成法的反撥。其實“規矩備俱，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并非吕本中的首創，其淵源可追溯到《文心雕龍·通變》的“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江西詩派詩論家從黄庭堅開始，亦無不贊成取法前人而反對模擬成法。“有定法而無定法”早已成爲廣爲接受的文學規律。而在“盡知左規右矩”後如何“變化不測”，既“法”之如何“活”，所謂“好詩流轉圜美如彈丸”者，方是貫穿吕本中前後期的主要思想，是吕氏理論獨創性所在。圜美之詩，既須如劉克莊所解“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之巧妙，窮極巧妙，然後能流轉圜美”②，參古制法；又須涵養圓活之心境來創作詩

① 劉克莊《江西詩派·吕紫微》引，《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
② 同上。

歌，望今出奇。以個人修養滲入詩歌創作，爲“左規右矩”的藝術形式帶來新的品格與新的表現手法，這是江西宗派體詩風的獨特成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吕本中認識到黄庭堅詩歌“首變前作之弊”的開創之功，及“後學者知所趣向”的派别淵源。所謂“居仁説活法，大意欲人悟”[①]，“活法”理論在融入内省化心性修養、開拓詩歌本體要妙方面，是對山谷詩學思想的繼承。不過，與山谷心法趨於壁立千仞不同，居仁“活法”，是他在自己樂易圓活理學修養中開拓出的具獨創性的詩學法要。如方回所云：“居仁在‘江西派’中，最爲流動而不滯者，故其詩多活。”[②]“活法”理論反映了理學對詩學的激發，是吕本中從自身心地修養出發的詩學境界開拓。對山谷後學時已出現的固守成法傾向，它也是一種適時的反撥。

二、文學本體的立場

以上論述了吕本中理學修養對他詩學思想的激發。但與同時理學家，如言“黄魯直如此作詩，不知要何用”的尹焞或後代理學家，如朱熹相比，吕本中是一個比較純粹的詩人，所謂“朱子以詩爲餘事，而本中以詩爲專門”[③]。吕本中雖爲理學家詩人，其詩歌却“傳衣江西”而不入理學家詩派。他站在詩人而非理學家的立場上作詩、論詩，自覺追求文學的表現，不僅在詩格，而

---

① 曾幾《讀吕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贈之》，《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九十《茶山集》，《四庫全書》第1363册，第545頁。

②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702頁。

③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中華書局，1965年，下册，第1360頁。

且在詩藝上有與黄庭堅近似的追求。

在學詩途徑上，居仁與山谷一樣，講究熟參前作。從《童蒙詩訓》來看，他對蘇軾和黄庭堅兩位前輩的典範性，顯然有過深入思考：

>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①。

從對蘇、黄詩歌的體悟入手，他將前代詩歌劃分爲兩種取法系統。其一是涵養氣格的系統，如《選》詩之有"高古氣味"②，《古詩十九首》及曹植詩的"言有盡而意無窮"③，李白詩的"氣蓋一世"④，孟浩然詩的"自然高遠"⑤，張耒詩的"自然奇逸"⑥，等等。這些詩歌"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⑦，可以助人詩思，啓人詩興，予人神思、氣宇上的啓迪。其二是深明法度的系統，如"《載馳》詩反復説盡情意，學者宜考。《兼葭》詩説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⑧、"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

① 吕本中《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92頁。
② 同上，第605頁。
③ 同上，第585頁。
④ 同上，第585頁。
⑤ 同上，第588頁。
⑥ 同上，第593頁。
⑦ 吕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九，第333頁。
⑧ 《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95頁。

爲能深識之"[①]、"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黄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②]，等等。從這些詩歌，可以體會表達的方法和途徑。劉勰曾說："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又說："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③] 詩歌的情感乃詩人所以興，詩歌的表達乃詩人所以立，二者不可偏廢。在吕本中看來，以上兩個體系，其實都是"悟入"的途徑。他說："或勵精潜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强作，出於牽强，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④] 熟參前作而以自家體悟爲歸墟，這一認識正可和他的活法理論參讀。

在"悟入"的思路下，吕本中對前代詩人的學習，講究取法乎上，又提倡遍考精取：

大概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

① 《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88頁。
② 同上，第597頁。
③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下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93～494頁。
④ 吕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九，第333頁。

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1]。

學詩須熟看老杜、蘇、黄，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2]。

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3]。

《楚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横出，不窘一律矣[4]。

他還體會前人成就到他們各自的“句法”：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摇，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5]。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為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6]。

所謂“句法”，是指對應詩人獨特主旨、意趣的獨特藝術表達。句法這個概念超越内容與形式、神思與辭藻的二分，是對詩

① 《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 593 頁。
② 同上，第 603 頁。
③ 同上，第 597 頁。
④ 吕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苕溪漁隱叢話》卷四十九，第 332 頁。
⑤ 《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 586 頁。
⑥ 同上，第 588 頁。

歌本質、詩人風格認識的深入。從句法論詩不始於吕本中，但作爲江西詩派詩論的一個法寶，在吕本中這裏得到光大。

除取法途徑的指示外，吕本中對具體詩法也有論述。如由“活法”衍生的“響字”理論——“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①。又如他提倡文章要有警策，詩歌用代詞之妙，作詩不可循習陳言，詩不能鑿空强作出於牽强，等等。此皆吕本中作詩的甘苦之言。這些觀點大體不出山谷詩論藩籬，故不再詳論。

三、詩統説的提出

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圖》，四庫館臣評價：“宋詩之分門别户，實自是始。”② 江西宗派的命名在詩學史上有首立詩歌流派的意義。然吕本中作此圖的目的本非爲詩歌分門别户，而是要爲它確立一個傳承的統系。試看《宗派圖序》：

> 古文衰於漢末，先秦古書存者為學士大夫剽竊之資；五言之妙，與《三百篇》《離騷》争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後莫能及。韓、柳、孟郊、張籍諸人，自出機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無足論者，衰至唐末極矣。然樂府長短句，有一唱三嘆之音。國朝文物大備，穆伯長、尹師魯始為古文，成於歐陽氏，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同作并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蘊矣③。

---

① 《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下册，第587頁。
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中華書局，1965年，第1783頁。
③ 《雲麓漫鈔》卷十四，中華書局，1996年，第244頁。

我們可以在兩個系統中考察這段論述。首先，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發展走向中，此論以黄庭堅在詩歌革新與歐陽修在古文運動中的地位相提并論；其次，在唐宋古文運動的理論體系中，上述論述與古文家好提的“文統”説如出一轍。鑒於詩文革新運動即宋古文運動向詩歌領域的擴展，如上兩個系統貫穿的是同一精神，正可合觀。

“文統”之説，是爲文學的發展勾勒一個正宗的傳統，始自韓愈《進學解》：“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①] 韓愈倡言“文統”，他也被視爲文學統系中的重要一環，如其三傳弟子孫樵所言：“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②] 到了宋代，“文統”説在古文運動中繼續風行。試看兩則典型的“文統”説論述：

>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詞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③]?

---

① ［唐］韓愈《韓愈全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1頁。

② ［唐］孫樵《答王霖秀才書》，《孫可之集》卷二，《四庫全書》第1083册，第70頁。

③ ［宋］穆修《唐柳先生文集後序》，《皇朝文鑒》卷八十五，《四部叢刊初編》本。

> 自孔子没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①]。

與上引二文進行對比，可以看到，《宗派圖序》從“古文衰於漢末，先秦古書存者爲學士大夫剽竊之資”到“至國朝文物大備，穆伯長、尹師魯始爲古文，成於歐陽氏”這一段文字，正是典型的古文家“文統説”的描述；而從“元和之末，無足論者，衰至唐末極矣”到“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同作并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藴矣”的論述，則與“文統”的描述相并列，衹是將詩歌的統系專門細分出來。這正是一種“詩統”的建構。

自韓愈提出“文統”説以來，不僅在文學上勾勒了傳承的統系，亦在朝廷文官制度之外，確立了一種文學傳承的師友淵源系統。這一師友淵源系統，如蘇軾所言，“正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②]。於是，韓愈文學集團、歐陽修文學集團、蘇軾文學集團，無不基於“文統”理論，在名世之士的主盟下集聚。就詩文革新運動而言，古文品格在歐陽修手中得到提高，而詩品的提高，要到黄庭堅這裏纔最終實現。黄庭堅得蘇軾付囑斯文，爲江西諸派等後學奉從，正是中唐以來文學傳承的重要一環。於

① [宋] 蘇洵《上歐陽内翰第二書》，《嘉祐集》卷十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② 見李廌《師友談記》，中華書局，2002年，第44頁。

是，在《宗派圖序》中，吕本中將“詩統”從“文統”中分離出來，以黄庭堅上續元和以來失落的詩統，定江西宗派爲詩歌發展的正脉。後來方回説：“予平生持所見：以老杜爲祖，老杜同時諸人皆可伯仲。宋以後山谷一也，後山二也，簡齋爲三，吕居仁爲四，曾茶山爲五。其他與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詩之正派也，餘皆旁支別流，得斯文之一體者也。”[①] 這正是承《宗派圖序》思路，對江西詩派“詩統説”的進一步完善。

古文運動以倡復古道爲口號，故文之正統，在“傳道”、“宗經”、“徵聖”的原則下與儒家道德有了糾葛。在提出“文統”説的同時，韓愈另有《原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②] 勾勒出“道”的體系，良非偶然。自中唐到北宋，“文統”、“道統”分而復合、合而復分，最終在古文運動主將歐陽修手中完成了“‘文’、‘道’并重，但他的‘道’既非‘道統論’者所鼓吹的‘道’，更與道學家的‘道’相去甚遠”[③] 的文道觀。“文統”從此與“道統”分立，文學的獨立領域得到保持，但“文”與“道”、“文統”説與時代思想走向的關係，實千絲萬縷。同樣，江西宗派“詩統”説的提出，亦有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北宋末期，與儒學的道學化相對應，心性之學對詩歌的滲透乃詩歌發展的必然方向。《宗派圖序》以黄庭堅爲振興詩歌精神的不二人選，這種認識符合宋詩學的基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591頁。
② 《韓愈全集·文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2頁。
③ 祝尚書《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巴蜀書社，1995年，第164～165頁。

本走向，在南宋屢獲認同。兹舉數論：

史贊曰：自李、杜没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幺麼骫骳，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鬥果為工，號稱崑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絶倡，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黄并出，以碩學宏才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宋興以來，一人而已①。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在也。……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晋、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黄庭堅魯直，其後學黄而不至者（逅）［後］山陳

① ［宋］佚名《豫章先生傳》後附《史贊》，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黄庭堅全集》附録一據《文獻通考·經籍》六三《黄魯直豫章集》條編録（《黄庭堅全集》第4册，第2362～2363頁）。編者注云：《豫章先生傳》作於徽宗時，爲黄庭堅《家傳》，而所附《史贊》爲宋朝國史《黄庭堅傳》之史臣贊。本文采用這一觀點，故以上引《史贊》爲南宋時期作品，與《豫章先生傳》非出一手。

師道無已。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為者也[①]。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尋）［撏］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煉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②]。

這些詩論以道德、句法、格調作爲詩歌評價標準，推黄庭堅爲宋詩第一人，與《宗派圖序》觀點相近。可見，北宋末江西宗派的出現及南宋以來江西詩風的泛濫，與宋詩學本身的發展方向有關。南宋以來，蘇文、黄詩凝固爲新的文學經典。從這個意義上，呂本中“詩統説”，可視爲對宋詩學精神的一種表述。

“詩統説”雖體現出宋詩學精神，却有其天然的缺陷。正如“文統”、“道統”終不能一統天下，詩歌比古文、道學更豐富多彩，更不可統之一律。呂本中以“江西”爲“宗”的觀點顯然没有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後人稱江西宗派爲“江西詩派”，一字之差，意義頓别。所謂“詩派”，乃詩中之一派，是一個詩歌流派的概念。這與呂本中詩統説的原意相去甚遠，却更具歷史合理

① ［宋］許尹《黄陳詩注序》，［宋］任淵《山谷内集詩注》卷首，《四庫全書》第1114册，第3～4頁。

②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山谷》，《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478頁。

性，遂取代“江西宗派”成爲更爲通行的名詞。欲定詩之一統，而終爲詩之一派，這正揭示出吕本中及多數江西派詩人認識上的缺陷：山谷詩學雖然以道德爲根基，有高古瘦硬的優點，但它僅僅是詩之一體，若以偏概全，惟我獨尊，則容易犯偏執的毛病，所謂偏枯、偏硬、偏粗、偏瘦、偏僻等等。紀昀指出江西詩派的毛病：“‘江西派’病處爲着此二字（按：指老硬）於胸中，生出流弊。”① 遂爲明眼矣。

第三節　詩歌的分期評述

宋人王楙云：“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② 吕本中詩歌《東萊詩集》二十卷、《外集》三卷至今尚存。對這位寫作跨度大的多産作家，正需要從“變”的角度，按其詩歌創作風格的明顯轉變作分期描述。

一、崇寧末、大觀初詩歌

《東萊詩集》卷一前半部分，收吕本中崇寧時期及大觀初詩歌。這一時期存詩不多，却是吕本中詩歌發展歷程的起點，不可或失。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921頁。
② ［宋］王楙《野老紀聞》，《四庫全書》第852册，第804頁。

吕本中早期詩歌，喜愛使用樹蔭、苔蘚、林塘、草樹等具有陰涼、清净意味的意象，好寫細雨、薄暮及雪殘之景。如下引詩歌：

客事久輸鸚鵡杯，春愁如接鳳凰臺。樹陰不礙帆影過，雨氣却隨潮信來。山似故人堪對飲，花如遺恨不重開。雪籬風榭年年事，辜負風光取次回。（《暮步至江上》，《全宋詩》第18032～18033頁）

凉風森爽遽如許，天氣蕭條殊未佳。密徑留陰鎖苔竹，敗畦藏雨鬥蛙蟆。碧雲莫合人千里，丹鳳愁看天一涯。惟有雙叢庭下菊，殷勤還作去年花。（《陰》，同前，第18033頁）

雪盡寒仍在，園荒春欲歸。晴空落雁小，古木聚鴉稀。肺病猶堪酒，囊空合典衣。碧雲愁不見，千里故山薇。（《雪盡》，同前，第18036頁）

敏鋭的感覺，芊綿的景物，分明可以看到，在詩人内心，有一處柔軟、易感、多情的領域，這注定了他的詩人氣質。據《紫微詩話》記載，居仁父好問學義山詩，尤喜"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句，以爲有不盡之意①。這一愛好顯然也影響到吕本中。崇寧、大觀年間，他隨父祖寓居宿州，幽居生涯、瘦弱多病的體質與多愁善感的心緒交織爲愁緒淡淡的詩情，這種詩情，無疑與上引義山"一春夢雨"聯意味接近。這一時期，他精於七律景聯的鍛煉：

① 見《紫微詩話》，《歷代詩話》上册，第367頁。

春盡茅檐深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宿州初暑》，同前，第 18034 頁)

風聲入樹翻歸鳥，月影浮江倒客帆。(《晚步至江上》，同前，第 18036 頁)

古壇背日藏芳草，小樹留春放晚花。(《謁雍道士》，同前，第 18038 頁)

風摇柳帶千絲亂，雨勒花心十日期。(《春日即事二首》其一，同前，第 18038 頁)

以上景物，或映帶、或錯落、或横斜的構圖，交織隔與通、勒與放間的疏雋之美，訴説着莫名的少年春愁。他的名句“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欄干欲暮時”(《春日即事二首》其二，同前，第 18038 頁)畫出一幅池館初春圖，人之情意，物之容態，正可爲居仁早期詩歌寫照。

二、大觀後期至宣和末詩歌

曾季貍論吕本中“活法”曰：“大約非悟入不可。”[①] 在近而立之年，吕本中經歷了一次詩歌創作的“悟入”體驗，所謂“前時少年累，如燭今見跋。胸中塵埃去，漸喜詩語活”者。他提出“活法”理論，將詩歌植根於道德之基，以胸次之圓成來發明詩境，并經歷了創作風格的轉變。“但聞微雨響梧桐，不悟高樓盡日風”(《讀舊詩有感》，《全宋詩》第 18085 頁)、“放筆有新功，

①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296 頁。

無人與傾倒。不知新恨多，但覺舊愁少”(《夜作呈諸公》，同前，第 18041 頁)，從他對少作的檢討，可見其詩學思想轉變的軌迹。錢鍾書先生論唐音、宋調對應着人生年齡段的分野，這一評價正可施之居仁詩歌。

從悟“活法”開始，居仁詩歌從委屈纏綿之少年愁緒轉向對憂患人生的積極承擔，題材漸趨繁複，意象漸趨老秀，境界也變得坦蕩、自在、平易、闊大。惟幽渺之意緒，仍縈繫不去。兹以《雨後月夜懷沈宗師承務》詩爲例：

> 雨雲攬江色，偃蹇破昏睡。千花閉紅紫，妙見一室内。披衣行夜永，明月在船背。微風過蕭瑟，古柳立蒼翠。翛然一蒲團，堅坐覓詩對。我生無南北，所到意輒遂。孰知十年遊，保此清净退。頗念城北人，結友老杉檜。漫隨長鋏歸，甘作短檠弃。出門萬里涂，已駕安得税。何當持被來，把酒相就醉。(同前，第 18053～18054 頁)

詩歌清凉、幽静的景象，對應着詩人清醒、幽微的情味，在孤獨的品味中領略人生軌迹，尋求友情的慰藉，體驗詩情的伴隨。經過活法體悟後的居仁詩歌，具有意味、理趣，却不廢情致。他説：“平生最愛花梢月。”(《步月有懷》，同前，第 18065 頁)在詩歌境句的製作上，吕本中繼續前期重映帶、曲折，有層次感的構圖法并有所發展，有“疾雷衝雨斷，亂草接江深”(《夜坐呈吴迪吉》，同前，第 18084 頁)、“晚照雲千叠，新凉月半彎”(《寄江端本子之晁冲之叔用》，同前，第 18097 頁)、“客燈吹屢滅，

細雨落還休”（《京師新鄭與諸晁兄弟往還前後數詩》，同前，第18106頁）、“草木山嵐暗，人家水影重”（《海陵雜興八首》其四，同前，第18108頁）、“月挾清霜下，風隨細浪行”（《江上二首》其一，同前，第18121頁）、“濁河遠貫長淮水，峽岸遥瞻寶塔臨”（《寄知止》，同前，第18095頁）、“樹移午影重簾静，門閉春風十日閑”（《試院中作》，同前，第18099頁）、“江村過雨蓬麻亂，野水連天鸛鵠飛”（《雨後至城外》，同前，第18113頁）、“長廊廣殿風來遠，古柳高槐日上遲”（《府學治事奉懷張彦實兼寄惠子澤范信中向君受》，同前，第18239頁）這樣清新優美的詩句，但這一時期詩歌的主要成就，還在於意句的琢磨，這在他的“東”字韻唱和詩中有比較集中的體現。兹以《寄璧公道友》爲例：

符離城裏相逢處，酒肉如山放手空。已見神通過鶖子，未應鮮健勝龐公。且尋扇子舊頭角，一任杏花能白紅。破箬笠前江萬里，無人曾識此家風。（同前，第18040頁）

方回評此詩云：“江西詩，晚唐家甚惡之。然粗則有之，無一點俗也。晚唐家吟不著，卑而又俗，淺而又陋，無‘江西’之骨之律。且如此詩五、六，晚唐决不夢見。‘扇子’、‘杏花’，物對物也。‘頭角’、‘白紅’，各自爲對。惟陳簡齋妙得此法。”[①]這首詩作爲“東”字韻唱和詩的第一首，以高健的格調，意味、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1753頁。

意脉的領起、貫穿，表現方式的自爲主出挑起宗派諸友同作并和，成爲江西派詩歌的典型。這次唱和中，居仁共作詩九首。它們皆以意爲主，縱横恣肆，顯示出吕本中“直須識根柢，始是極波瀾”的宏富詩才。僅以諸詩之頸聯爲例，如方回所評：“‘酒如震澤三江緑，詩似芙蕖五月紅。’‘雙鬢共期他日白，千花猶是去年紅。’‘銀杯久持浮大白，桃花且着舒小紅。’皆脱灑圓活。”① 自大觀三年始至宣和末，吕本中以“東”字韻唱和詩爲起點并實踐了他本人的“活法”理論，形成成熟的詩風，并作《江西宗派圖》，與宗派諸友同作并和。師友交往帶給他心靈的碰撞與思想的激蕩，使他這一時期的詩歌氣盛言宜，意足語豐。

三、圍城及亂離中詩歌

靖康元年是汴京城破之年，它是國家的巨變，也帶來了吕本中創作風格的轉變。《瀛奎律髓彙評》無名氏（甲）評吕本中《還韓城》詩云：“‘江西派’原以工部爲名，而適遭（建）[靖]康、建炎之世，與天寶、至德相似，則忠義激發，形諸篇什者，非工部而誰師?”② 從靖康元年到建炎三年，吕本中親歷圍城及亂離，詩歌也經此歷練，以杜甫爲師，更上一層。

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圍汴京，閏十一月城破。明年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僞楚皇帝，四月擄徽宗、欽宗二帝北退。吕本中時在汴京，親歷國破家亡的全過程，以詩記事。金兵圍城之初，有

① 同上，第 1755～1756 頁。
②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第 1352 頁。

《京城圍閉之初天氣晴和軍士乘城不以爲難也因成四韻》："賊馬侵城急，官軍報捷頻。民心皆欲鬥，天意已如春。"（《全宋詩》第18134頁）在圍城之中，有《守城士》："殺賊須長槍，防城要强弩。炮來大如席，城頭且撑柱。"（同前，第18134頁）《聞軍士求戰甚力作詩勉之》："今春賊來時，軍士怖而走。今冬賊來時，决（拾）［射］揎兩肘。憤然思出鬥，不但要死守。"（同前，第18134頁）城破後，有《兵亂寓小巷中作》："城北殺人聲徹天，城南放火夜燒船。江湖夢斷不得往，問君此住何因緣。竄身窮巷米如玉，翁尋濕薪媪爨粥。明日開門雪到檐，隔墻更聽鄰家哭。"（同前，第18135頁）《城中紀事》："昨者城破日，賊燒東郭門。中夜半天赤，所憂驚至尊。是時雪政作，疾風飄大雲。十室九經盗，巨家多見焚。至今弛道中，但行胡馬群。翠華久不返，魏闕連妖氛。"（同前，第18135頁）皆爲實録，可與《宋史》互證或補史之闕。除此史實的記録外，吕本中圍城詩歌，更以精警的史論，繼杜甫詩史之風。如僞楚之立，吕本中作《無題》詩：

> 胡虜安知鼎重輕，禍胎元是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同前，第18136頁）

此詩對賣國求榮及出仕僞楚的朝臣作出辛辣批評，二十八字抵一段史論。靖康二年三月，吕本中作《兵亂後自嬉雜詩》二十九首，更是結合史實與史論，抒寫國破家亡感受，發出了圍城詩歌的最强音。兹選録其中數首：

晚逢戎馬際，處處聚兵時。後死翻為累，偷生未有期。積憂全少睡，經劫抱長饑。欲逐范仔輩，同盟起義師。（自注：近聞河北布衣范仔起義。）（其一）

胡騎猖狂甚，連年窺西京。貪饕期竭澤，剪戮遂盈城。國論多遺策，人情罷請纓。有誰似南八，血指衆心驚。（其三）

（黄）［萬］事多反復，蕭蘭不辨真。汝為誤國賊，我作破家人。求飽羹無糝，澆愁爵有塵。往來梁上燕，相顧却情親。（其九）

國命方屯厄，吾曹何所依。白駒將老至，黄鳥恨春歸。柳巷清陰合，花蹊紅蕊稀。主憂聞未解，涕泗望天畿。（其十二）

四郊多屬壘，何地可逃生。水水但争渡，城城各點兵。牛亡罷春種，馬奪盡徒行。囊槖經鈔掠，寇來渾不驚。（其十三）

一紀幽栖地，宛然高樹林。比鄰風雨散，垣屋草萊深。池面華光歇，井床苔色侵。衰年筋力弱，閣道罷登臨。（其十五）

君父圍城内，忽逾三月期。六龍時臲卼，百雉日孤危。報國寧無策，全軀各有詞。旄頭漸低小，早晚定班師。（其二十四）

重到江頭齋，荒殘足嘆嗟。新鳥忽栖樹，舊犬已辭家。月淡初回夢，風輕不落花。相親為部曲，弓劍作生涯。（其二十六）

歲間值狂寇，曾此駐戈鋋。臺沼餘春草，圖書散野烟。懶尋愛酒伴，愁起落花邊。不忍登江閣，心隨北斗懸。（其二十九）（同前，第18246~18249頁）

上引第一首詩領起全篇，并記范仔起義事；第二首詩激烈陳言；第三首出沉痛語；第四首寫春天到來的圍城；第五首，寫亂亡景象；第六首，寫幽栖之荒涼；第七首，繪小人情狀；第八首，寫破國人生涯；最後一首，在時代和個人境遇中總結全篇。詩歌在抑揚頓挫、直言曲語中回環而下，在史實記録、史筆議論中，夾雜着詩人春日圍城中對國破家亡局面的沉痛感受，以流淌於筋骨血脉、非發爲怒張叫囂的筆力，觸摸到杜甫詩歌的表現領域，也觸摸到杜詩的力量。紀昀評這組詩“全摹老杜，形模亦略似之，而神采終不及也”[①]。其實，這組詩不是摹杜，而是合杜。它們作於家國危難之時，套用黄庭堅“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的要求，江西詩派平時學杜的工夫，無論於形模於神采，於詩品於人品，正要到此地來檢驗。這組詩歌立論剛正，寓意清壯，情感充沛，不暇煉意而意新，不暇煉句而句好，用事下字自然新警，得杜詩神貌。故曾季貍説：“吕東萊圍城詩皆似老杜。”[②]

靖康二年四月，金人虜二帝北歸。吕本中離開汴京，開始了輾轉流徙。離開京師，他作詩云：“親見去年城破時，至今鐵馬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第1353頁。
② 《艇齋詩話》，《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300頁。

黄河上。小臣位下才則拙，有謀未獻空惆悵。漢家宗廟有神靈，但語胡兒莫狂蕩。”（《懷京師》，同前，第 18136 頁）過貞女峽，又感慨：“時經喪亂後，世不聞堅貞。烈士久喪節，丈夫多敗盟。”（《貞女峽》，同前，第 18143 頁）忠義之情，發於詩歌，也是對杜甫精神的繼承。至於因行記役，發物態人情，更是這一時期詩歌的主題。如《題涇縣水西》：

> 江東住已厭，又却過江西。急雨投涇縣，窮秋渡賞溪。稻田猶少水，山路已多泥。珍重高僧意，求詩索自題。（同前，第 18138 頁）

草草題詩，却簡約有味。我們看見，經過人生憂患的磨練、江山物色的增益，吕本中詩歌内容更加豐富，表達更加恣肆，境界也更加闊大，是爲其詩之又一變也。

四、晚年詩歌

從紹興元年起，吕本中先後寓居桂林、臨川、福州等地，於紹興六年召赴行在，擢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紹興八年落職，一度居嚴州、衛州，後寓居信州以卒。這是吕本中創作生涯的晚期。這一時期的詩歌，又以落職奉祠爲界，分前後兩個階段。

從紹興元年到紹興八年，隨着南宋政權的逐漸穩固，吕本中的流徙生涯較前期安定，參與了豐富的社會生活。他在桂林與曾幾、折彦質，在臨川與韓駒、錢伯言，在福州與范寥、張元幹交往，收了曾季狸、林之奇等門徒，聚故人子弟與自己子侄共學，

唱和詩尤多。他還在《夏均父詩集序》中重新闡述了“活法”理論，并示曾幾作詩法云：“欲波瀾之闊去，須於規模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① 吕本中本人這一時期的詩歌，正是表現爲“涵養吾氣”基礎上的規模宏放。以《將發福唐》爲例：

> 盡此一囊粟，我行當有期。凉風吹天涯，增我别後思。結束向行在，問子還何時。初無濟時策，處事多參差。環視中所有，無一施可宜。形骸久已病，敢徼當世知。不蒙朋友責，定遭兒輩嗤。矧此世外人，勸歸常恐遲。相尋有如日，請盟吾此詩。(《全宋詩》第 18171 頁)

這是吕本中蒙召赴行在，將離福州時所作。與“蹀躞鳴珂君得路，伶俜散策我歸田”的同期韓駒詩相比，本詩立意正大，風神駿逸，因挺立剛健而富贍宏博。他作如《贈童堯詢蔡楠謝敏行》《陸庭元紹意齋》《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與李似宗别後奉寄》《閑居感舊偶成十絶乘興有作不復詮次》等也準此。紹興初期是吕本中詩歌的豐收期，他的詩名也在這一時期達到頂點。曾幾與吕本中年齡相當，也向他學詩，臨川、福州青年士子更紛紛拜入門下。吕本中已儼然成爲當時的詩學領袖。連高宗都贊嘆：“本中詩極佳，不減徐俯少時所作，俯晚年學李白，稍放肆矣。”②

---

① 吕本中《與曾吉甫論詩第二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第 333 頁。

② [宋] 趙鼎《建炎筆録》卷下，《叢書集成初編》本。

罷職之後，吕本中退出社會政治中心，奉祠閑居，後寄身僧寺。在這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在詩歌藝術上又有進境。與人唱酬詩，如《病中聞諸范日赴飲會》："諸公相隨日酣飲，我病昏昏困衾枕。人生苦樂故不同，世味再尋如拾瀋。良醫更在肱九折，曾子從來日三省。不離方丈走諸方，萬事衹如驢覷井。"（同前，第18187頁）風味更趨老健。在詩藝方面，他發展了前期重映帶的構圖法，而把它化爲對偶的方法，表現更加靈活。如"憑欄一望長空遠，鑿石新開小徑微"（《次秀亭韻二首》其一，同前，第18180頁）這樣的對句，以"憑欄"之我對"鑿石"之人，以"一望"之實寫對"新開"之虛寫，以"長空"之遠對"小徑"之微，將前期如"長廊廣殿風來遠，古柳高槐日上遲"的句中景物（"長廊廣殿"——"風"、"古柳高槐"——"日"）的映襯關係延伸到一聯的對句（"憑欄"——"鑿石"、"一望"——"新開"、"長空"——"小徑"）中，以虛實不稱、方向不同、人我對立的關係，打破前期匀稱的對偶，回環斜架，曲折往復，構築出意之疏雋。"物色寒初甚，溪山畫不如"（《舟行至桐廬》，同前，第18181頁）、"江城氣候猶含雪，草市人家已挂燈"（《追憶昔年正月十日宣城出城至廣教》，同前，第18188頁）之以氣候對風景，"僧老渾無念，田荒近不收"（《將往城南觀音寺阻雨未果》，同前，第18183頁）之以人物對景物，亦有同樣的功效。方回説："紫微詩圓活，然必曲折有意。"① 曲折有意的圖景在吕本中後期的詩歌中，不僅表現爲風景的構圖，亦爲其心靈的構

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1004頁。

圖、文本的構圖，有根有節，而又錯落映帶。敖陶孫《詩評》云："吕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異。"[①] 頗能形容之。

吕本中暮年因身份和年齡的關係，處於社會邊緣化的位置。其詩歌主題亦漸漸從人事、世事的領域撤回，與自已的孤獨、衰病晤對，與回憶作伴，氣味漸趨衰颯。他自稱"學詩漸老轉銷聲"(《無題》，同前，第 18205 頁)、"我詩老益退，久爲人所嗤"(《送范子儀將漕湖北五首》其五，同前，第 18226 頁)，正體現了他的詩歌從主題、題材到影響力從主流領域的撤退。撤離主流領域的結果，是舊主題的淡化與新題材的發掘。以《衢州路中》爲例：

今日衢州路，師奴不共行。阿童渾似汝，衹是太粗生。(同前，第 18184 頁)

吕本中晚年養了一猫一狗，猫叫師奴，狗叫雪童，師奴在詩人去衢州前病死，於是，衢州路中，衹有雪童忠實地追隨主人車馬的埃塵。短短二十字，勾勒出詩人晚年與猫狗相伴的精神窘况。後來雪童暴斃，吕本中作《蓄犬雪童黠甚勝人壬戌夏暴死作詩傷之》："它生與我有微因，來見防家最後身。共住世間均是夢，未應心境不如人。浮雲屢變本無迹，叉路多歧莫問津。此後窮愁走南北，更誰隨馬踏埃塵。"(同前，第 18216 頁）從佛教平

① 敖陶孫《臞翁詩評》，《詩人玉屑》卷二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19 頁。

等觀出發對待畜類，可見暮年詩人更趨仁慈的心境。於是，吕本中晚年詩歌，出現如《師奴病化》《病中》《夜坐》《蓄犬》《疥》《潦倒》《野寺》《戒殺八首》這樣的題目。這些題目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實則是富創造力的詩人對自己暮年處境的真實吟咏。“未愈俱生疾，空懷宿昔憂。時因發孤笑，尚足慰窮愁”（《久病二首》其二，同前，第 18199 頁）、“老慵已慣跏趺坐，昏夢尤便松竹鳴”（《雪夜》，同前，第 18203 頁），暮年生活的邊緣化處境乃人生之一態，吕本中暮年詩對詩歌主題、題材、情感領域的開拓，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和體會。

據説吕本中“平生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如不勝衣，有孟浩然跨驢之相。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裕如也”[①]。在理學家、政治家的身份之外，他還是一個有審美生存意識的的詩人。曾幾説：“東萊吕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己下。”[②] 這個評價過譽。在江西諸派中，吕本中成就不及陳師道，但也祗在陳師道下。他一生創作不輟，屢經進步，以“活法”理論與實踐自成一家，在兩宋之際傳江西詩法，承前啓後，衣被無窮。

---

①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六，《四庫全書》第 933 册，第 561 頁。
② 曾幾《東萊先生詩集後序》，《茶山集·拾遺》，《叢書集成初編》本。

結　語

紹興十五年（1145），吕本中去世，最後一個宗派詩人退出歷史舞臺，意味着江西宗派文學時代結束。此時江西宗派的影響正如火如荼：江西詩風籠罩詩壇；對它的贊成或反對成爲文學批評的焦點；受其影響的青少年將成爲下一輪詩歌的主角。但這已是廣義"江西詩派"，或云"後江西宗派"的研究領域，筆者將另作專題論述。本論文的寫作進入尾聲，兹以如下絮語，作爲此書的收束。

江西宗派詩歌并非一個地域流派，而是時代文學的概念，我們已經從新舊黨争與元祐黨禁的文化背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走向予以説明。事實上，這個問題還可以納入中唐至北宋大的歷史圖景中，從安史之亂、貞元革新、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新舊黨争、元祐黨禁的歷史脉絡，唐古文運動、宋詩文革新運動、元祐文學、江西宗派文學的文學史脉絡，結合唐、宋儒學復古運動的走向，在政治、思想、文化與文學的相互糾葛中，以師友淵源爲主綫，把握其形成綫索。這是自封建社會衰落的表徵出現之後，文學精神從昂揚向上尋求出路的努力，到退回心性自足領域

的歷程。杜詩、韓文、蘇文、黄詩在這個歷程中凝固爲新的文學經典。當宋型文化，乃至整個封建文化的痼疾顯露，黄庭堅在對時局的清醒認識中退回到個體精神的持守、文學審美的探究，作爲上述文學歷程的最後一環，爲江西諸派等後學所奉從。《宗派圖序》的欲定詩統，和這樣一個大的文學走向有關。

江西宗派的文學淵源可上溯到杜甫。黄庭堅以杜爲師，又學杜而不爲，以“輕於外物而自重”的文化人格和格高、律嚴、以意爲主的詩學範式，爲後學者指出方向。師黄和學杜是江西宗派詩學的兩大主題。就黄庭堅而言，他的詩歌被後人總結出一些成法，而其最高境界則如普聞所説“境句易琢，意句難制。境句人皆得之，獨意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具有高度個性化的特徵，一空依傍，不可規模。在這個層面上，山谷詩法也是一種心法。於是，黄庭堅所言“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争先則後矣”，陳師道所言“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便成爲江西宗派詩學法要。後來韓駒提出“飽參”，吕本中提出“活法”，徐俯提出“中的”，就是在自身體悟基礎上對“高師一着”理論的貫徹。一般而言，江西諸派接受過元祐文化的熏陶，又在元祐黨禁的高壓環境中自覺傳承詩學，不僅對黄詩的文學形式，對其藝術精神也有深刻領會，故能如陳岩肖所云：“吕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爲初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迹。今觀東萊詩，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

善學柳下惠者也。”[①] 雖未脱盡摹擬之氣，尚能成自家面目，在格高、律嚴的總體特徵外各具特色，而尤以陳師道、徐俯、韓駒、吕本中四人足以名家。

不過，江西宗派自具形之初，就有其先天的不足。山谷詩歌，從情趣之雅正、態度之嚴肅、境界之崇高來説，體現了宋詩文革新運動以來詩格提高的最終成就。但此詩格的提高，從通經明用的努力退歸到淡泊自守，主題、題材向深、狹發展，而失去闊、大之境界。如果説，這種詩歌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宋詩學本身所結的一枚果子的話，也是苦澀堅硬的橄欖，或者説，如蘇軾所説的“蝤蛑、江瑶柱”——“格韻高絶，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對黄庭堅本人而言，這種詩風基於他自身的氣質血性，不失爲巨刃摹天的創造。而江西諸派則不同。他們以山谷爲師，以“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②] 的詩之一體爲詩歌的最高典範，就有屋下架屋的危險。於是，在江西宗派體詩歌中，偏僻、偏瘦、偏生、偏硬之弊，已然發生。本文所論洪芻詩歌的亦步亦趨、謝薖詩歌的情致偏枯、潘大臨詩歌意與力的失衡，就是其中比較突出的表現。南宋以來江西宗派的後學，更漸漸失落山谷詩學的創新精神，入其彀中，規模其形容，“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③]，江西詩病，更顯露無疑。許印芳説：“凡天地間事物，

① ［宋］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下，《歷代詩話續編》上册，第 182 頁。
② ［元］劉壎《隱居通議》卷十引《劉玉淵評論》，《四庫全書》第 866 册，第 103 頁。
③ 《庚溪詩話》卷下，《歷代詩話續編》上册，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82 頁。

有一美在前，即有一病隨之於後。惟詩亦然：雄有粗病，奇有怪病，高有膚廓病，老有草率病。惟根柢深厚者，始能善學古人，得其美而病不生。根柢淺薄者，每學古人，未得其美，病已著身；非古人原有是病，乃不善學而自成其病耳。"① 就成爲不易之言。總的説來，江西宗派體詩歌有如下兩個弊病：

其一，山谷詩學以狷介自守的氣格爲尚，講究不俗，是士大夫雅文學的極致。但這個雅不是大雅，而是變風、變雅，用黄庭堅的話來説，是"候蟲之聲"、"末世詩人之言"，喪失水深林茂氣象及觸物生春的活力，所立極爲狹窄。後學摹之，更成爲死聲活氣語，枯索無味。在這種情况下，詩歌有向世俗精神轉向的需要。

其二，山谷詩學以意爲主，詩人的情感在所謂"呻吟調笑之聲"中，受到政治環境、心性修養的規範，表達上"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晦澀、生新、瘦硬，乃詩學之偏鋒。後學衍之，更流爲偏執。這偏離了審美生存的詩學精神，需要重新濟之以情韻。

創造是詩歌的生命。如果説，瘦硬、生澀的山谷體詩風在黄庭堅和他的上首弟子陳師道那裏是西子捧心的話，在江西末學那裏就是東施效顰。形模略似，效果正反。江西詩派一度法席盛行，其弊端也顯露無餘。乾道、淳熙年間，陸游、楊萬里對江西體詩歌入室操戈，分別濟之以生活的歷練及晚唐巽味，重新帶給

① ［清］許印芳語，《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中册，第992頁。

詩歌豐富新鮮的氣息，文學也因此進入如尤袤所説“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① 的新時代。江湖體和晚唐體詩歌又相繼興起，江西宗派體詩歌從此從主流地位撤離，退歸成爲文藝百花園中的一朵。或許，恰恰是這種非主流的位置，正是與其文學本體、個人本位、内省化修養詩風相符的正確定位。從此，江西宗派不再作爲文學流派卷土重來，却因此保持了它“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的風調，以“冲寂自妍，不求識賞”的姿態，獻給“無限多的少數人”，代有知音，爲草木臭味同者惺惺相惜。

①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自序》引尤袤語，《四部叢刊初編》本。

參考文獻

B

《白石道人詩集》，［宋］姜夔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白石詩説》，［宋］姜夔撰，《歷代詩話》本。

《北湖集》，［宋］吴則禮撰，《四庫全書》本。

《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祝尚書著，巴蜀書社 1995 年。

《北宋文化史述論》，陳植鍔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年。

《北宋文人與黨争》，沈松勤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年。

《北宋新舊黨争與文學》，蕭慶偉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年。

《北宋經撫年表·南宋制撫年表》，［清］吴廷燮撰，中華書局 1984 年。

《碧鷄漫志》，［宋］王灼撰，《四庫全書》本。

《避暑録話》，［宋］葉夢得撰，《四庫全書》本。

《泊宅編》，［宋］方勺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步里客談》，［宋］陳長方撰，《四庫全書》本。

C

《參寥子詩集》，［宋］釋道潛撰，《四部叢刊三編》本。

《滄浪詩話》，［宋］嚴羽撰，《歷代詩話》本。

《藏海詩話》，［宋］吴可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藏一話腴》，［宋］陳郁撰，《四庫全書》本。

《茶山集》，［宋］曾幾撰，《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兩宋名賢小集》本。

《禪林僧寶傳》，［宋］釋惠洪撰，《明版嘉興大藏經》本。

《晁具茨先生詩集》，［宋］晁冲之撰，《海山仙館叢書》本。

《晁氏客語》，［宋］晁説之撰，《四庫全書》本。

《陳後山年譜》，陳兆鼎編，《宋人年譜叢刊》本。

《陳了翁年譜》，［元］陳宣子編，《永樂大典》本，《宋人年譜叢刊》本。

《誠齋集》，［宋］楊萬里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誠齋詩話》，［宋］楊萬里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春秋集解》，［宋］吕本中撰，《四庫全書》本。

D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宋］釋祖泳撰，《明版嘉興大藏經》本。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宋］釋道謙編，《卍續藏經》

本。

《帶經堂詩話》，［清］王士禛撰，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

《道山清話》，［宋］舊題王暐撰，《四庫全書》本。

《鄧廣銘治史叢稿》，鄧廣銘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東窗集》，［宋］張擴撰，《四庫全書》本。

《東湖居士集》，［宋］徐俯撰，《兩宋名賢小集》本。

《東萊集》，［宋］吕祖謙撰，《四庫全書》本。

《東萊吕紫微師友雜志》，［宋］吕本中撰，《十萬卷樓叢書》本。

《東萊先生詩集》，［宋］吕本中撰，《四部叢刊續編》本。

《東坡烏臺詩案》，［宋］朋九萬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東坡志林》，［宋］蘇軾撰，中華書局 1981 年。

《獨醒雜志》，［宋］曾敏行撰，《四庫全書》本。

《杜工部草堂詩話》，［宋］蔡夢弼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杜詩鏡詮》，［唐］杜甫撰、［清］楊倫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年。

E

《二程集》，［宋］程顥、程頤撰，中華書局 1981 年。

《二老堂詩話》，［宋］周必大撰，《歷代詩話》本。

《二老堂雜志》，［宋］周必大撰，《筆記小説大觀》本。

F

《樊榭山房文集》，[清] 厲鶚撰，《四部叢刊》本。

《方輿勝覽》，[宋] 祝穆撰、[宋] 祝洙增訂，中華書局 2003 年。

《斐然集》，[宋] 胡寅撰，《四庫全書》本。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唐] 杜甫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風月堂詩話》，[宋] 朱弁撰，中華書局 1988 年。

《佛法金湯編》，[明] 釋心泰編，《卍續藏經》本。

《浮溪集》，[宋] 汪藻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G

《庚溪詩話》，[宋] 陳岩肖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古典文學資料彙編·黄庭堅和江西詩派卷》，傅璇琮編，中華書局 1978 年。

《觀林詩話》，[宋] 吴聿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官箴》，[宋] 吕本中撰，《四庫全書》本。

《管錐編》，錢鍾書著，中華書局 1986 年。

《龜山先生語録》，[宋] 楊時撰，《四部叢刊續編》本。

《歸田録》，[宋] 歐陽修撰，中華書局 1981 年。

《過庭録》，[宋] 范公偁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H

《韓愈全集》，[唐] 韓愈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和靖録》，[宋] 尹焞撰，《四庫全書》本。

《河南穆公集》，[宋] 穆修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鶴林玉露》，[宋] 羅大經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宋] 魏了翁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橫浦集》，[宋] 張九成撰，《四庫全書》本。

《洪龜父集》，[宋] 洪朋撰，《四庫全書》本。

《洪駒父詩話》，[宋] 洪芻撰，《宋詩話緝佚》本。

《鴻慶居士集》，[宋] 孫覿撰，《常州先哲遺書》本。

《侯鯖録》，[宋] 趙德麟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後村詩話》，[宋] 劉克莊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後村先生大全集》，[宋] 劉克莊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後山居士文集》，[宋] 陳師道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後山集鈔》，[宋] 陳師道撰、[清] 紀昀編，《鏡烟堂十種》本。

《後山詩話》，[宋] 陳師道撰，《歷代詩話》本。

《後山詩注補箋》，[宋] 陳師道撰、[宋] 任淵注、冒廣生補箋，中華書局 1995 年。

《後山談叢》，[宋] 陳師道撰，《四庫全書》本。

《滹南詩話》，[金] 王若虛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滹南遺老集》，[金] 王若虛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華陽集》，[宋] 張綱撰，《四部叢刊三編》本。

《淮海集》，[宋] 秦觀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環溪詩話》，［宋］吴沆撰，中華書局 1988 年。

《黄山谷的交遊及作品》，張秉權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8 年。

《皇朝文鑒》，［宋］吕祖謙編，《四部叢刊初編》本。

《黄庭堅全集》，［宋］黄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黄庭堅詩歌研究》，白政民著，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黄庭堅詩集注》，［宋］黄庭堅撰，［宋］任淵、史容、史季温注，劉尚榮校點，中華書局 2003 年。

《黄庭堅詩學體系研究》，錢志熙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黄庭堅年譜新編》，鄭永曉著，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黄庭堅評傳》，黄寶華著，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宋］楊仲良編，臺灣文海出版社 1968 年。

《揮麈録》，［宋］王明清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徽宗詞壇研究》，諸葛憶兵著，北京出版社 2001 年。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宋］朱熹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J

《鷄肋編》，［宋］莊綽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鷄肋集》，［宋］晁補之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宋］蘇軾撰、［宋］舊題王十朋集

注,《四部叢刊初編》本。

《嘉泰普燈録》,[宋] 釋正受編,《卍續藏經》本。

《家世舊聞》,[宋] 陸游撰,中華書局 1993 年。

《嘉祐集》,[宋] 蘇洵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嘉祐雜志》,[宋] 江休復撰,《四庫全書》本。

《箋注陶淵明集》,[晋] 陶淵明撰、[宋] 李公焕箋注,《四部叢刊初編》本。

《簡齋詩外集》,[宋] 陳與義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澗泉日記》,[宋] 韓淲撰,《四庫全書》本。

《建炎筆録》,[宋] 趙鼎著,《叢書集成初編》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宋] 李心傳編,《四庫全書》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宋] 李心傳編,中華書局 1956 年。

《江湖詩派研究》,張宏生著,中華書局 1995 年。

《江西詩派小序》,[宋] 劉克莊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江西詩派研究》,莫礪鋒著,齊魯出版社 1986 年。

《江西詩社宗派研究》,龔鵬程著,臺灣文史哲出版社 1983 年。

《江西詩社宗派圖録》,[清] 張泰來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江西通志》,[清] 謝旻等撰,《四庫全書》本。

《江西通志》,[清] 劉坤一等修,劉鐸、趙之謙等撰,清光緒七年刻本。

《鮚埼亭集》,[清] 全祖望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京口耆舊傳》，［宋］佚名撰，《四庫全書》本。
《荆溪林下偶談》，［宋］吴子良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靖康要録》，［宋］佚名撰，《四庫全書》本。
《酒邊詞》，［宋］向子諲撰，《四庫全書》本。
《居士分燈録》，［明］朱時恩編，《卍續藏經》本。
《居易録》，［清］王士禛撰，《四庫全書》本。
《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撰，《四部叢刊三編》本。
《郡齋讀書志附志》，［宋］趙希弁撰，《四部叢刊三編》本。

K

《孔氏談苑》，［宋］孔平仲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撰，《四部叢刊三編》本。

L

《老圃集》，［宋］洪芻撰，《四庫全書》本。
《老學庵筆記》，［宋］陸游撰，中華書局 1979 年。
《樂静集》，［宋］李昭玘撰，《四庫全書》本。
《類説》，［宋］曾慥編，《四庫全書》本。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本。
《李希聲詩話》，［宋］李錞撰，《宋詩話輯佚》本。
《梁溪漫志》，［宋］費衮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兩宋詞人年譜》，王兆鵬著，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4 年。
《兩宋道學命運的歷史考察》，關長龍著，學林出版社 2001

年。

《兩宋史研究彙編》，劉子健著，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8 年。

《兩宋文學史》，程千帆、吴新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臨川先生文集》，［宋］王安石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林間録》，［宋］釋惠洪編，《卍續藏經》本。

《陵陽集》，［宋］韓駒撰，《四庫全書》本。

《陵陽先生室中語》，［宋］范季隨撰，《説郛三種》本。

《了齋詩集》，［宋］陳瓘撰，《兩宋名賢小集》本。

《臨漢隱居詩話》，［宋］魏泰撰，《歷代詩話》本。

《龍川别志》，［宋］蘇轍撰，《四庫全書》本。

《蘆川歸來集》，［宋］張元幹撰，《四庫全書》本。

《欒城集》，［宋］蘇轍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羅湖野録》，［宋］釋曉瑩撰，《卍續藏經》本。

《吕氏雜記》，［宋］吕希哲撰，《四庫全書》本。

M

《漫叟詩話》，［宋］佚名撰，《宋詩話輯佚》本。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梅溪王先生文集》，［宋］王十朋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捫虱新話》，［宋］陳善撰，《筆記小説大觀》本。

《名臣碑傳琬琰集》，［宋］杜大珪，《四庫全書》本。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宋］章定撰，《四庫全書》本。

《明一統志》，［明］李賢等編，《四庫全書》本。

《默記》，［宋］王銍撰，中華書局 1981 年。

《墨客揮犀》，［宋］彭□輯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墨莊漫録》，［宋］張邦基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N

《南澗甲乙稿》，［宋］韓元吉撰，《四庫全書》本。

《能該齋漫録》，［宋］吴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廿二史劄記校證》，［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中華書局 1984 年。

O

《甌北詩話》，［清］趙翼撰，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歐陽文忠公文集》，［宋］歐陽修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P

《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元］佚名編，《四庫全書》本。

《潘邠老小集》，［宋］潘大臨撰，《兩宋名賢小集》本。

《潘子真詩話》，［宋］潘淳撰，《宋詩話輯佚》本。

《萍州可談》，［宋］朱彧撰，《四庫全書》本。

《坡門酬唱集》，［宋］邵浩編，《四庫全書》本。

Q

《耆舊續聞》，[宋] 陳鵠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潛溪詩眼》，[宋] 范溫撰，《宋詩話輯佚》本。

《清波雜志校注》，[宋] 周煇撰、劉永翔校注，中華書局 1994 年。

《清非集》，[宋] 洪朋撰，《四庫全書》本。

《青箱雜記》，[宋] 吴處厚撰，中華書局 1985 年。

《慶湖遺老詩集》，[宋] 賀鑄撰，《四庫全書》本。

《曲洧舊聞》，[宋] 朱弁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全宋詞》，唐圭璋編，中華書局 1965 年。

《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年。

《全宋文》，曾棗莊、劉琳主編，巴蜀書社 1988～1995 年。

《却掃編》，[宋] 徐度撰，《四庫全書》本。

R

《日涉園集》，[宋] 李彭撰，《四庫全書》本。

《容齋隨筆》，[宋] 洪邁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S

《三劉家集》，[宋] 劉渙等撰、[宋] 劉元高編，《四庫全書》本。

《僧寶正續傳》，[宋] 釋祖琇編，《卍續藏經》本。

《山谷别集詩注》，[宋] 黄庭堅撰、[宋] 史季温注，《四庫全書》本。

《山谷詞》，[宋] 黄庭堅撰，《四庫全書》本。

《山谷老人刀筆》，[宋] 黄庭堅撰，《紛欣閣叢書》本。

《山谷内集詩注》，[宋] 黄庭堅撰、[宋] 任淵注，《四庫全書》本。

《山谷年譜》，[宋] 黄㽦撰，《四庫全書》本。

《山谷題跋》，[宋] 黄庭堅撰，《四庫全書》本。

《山谷外集詩注》，[宋] 黄庭堅撰、[宋] 史容注，《四庫全書》本。

《珊瑚鉤詩話》，[宋] 張表臣撰，《歷代詩話》本。

《上蔡語録》，[宋] 謝良佐撰，《四庫全書》本。

《邵氏聞見録》，[宋] 邵伯温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邵氏聞見後録》，[宋] 邵博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聲畫集》，[宋] 孫紹遠輯，《四庫全書》本。

《世説新語箋疏》，[南朝宋] 劉義慶撰、[南朝梁] 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詩話總龜》，[宋] 阮閲編，《四部叢刊初編》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 年校點本。

《詩人玉屑》，[宋] 魏慶之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石林詩話》，[宋] 葉夢得撰，《歷代詩話》本。

《石林燕語》，[宋] 葉夢得撰，中華書局 1984 年。

《石門文字禪》，[宋] 釋惠洪撰，《四部叢刊》本。

《石州詩話》，[清] 翁方綱撰，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詩論》，[宋] 釋普聞撰，《説郛三種》本。

《詩品集注》，[梁] 鍾嶸撰、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詩人玉屑》，[宋] 魏慶之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一版。

《詩説雋永》，[宋] 佚名撰，《宋詩話輯佚》本。

《詩讞》，[宋] 周紫芝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師友談記》，[宋] 李廌撰，中華書局2002年。

《首届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王水照等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書史》，[宋] 米芾撰，《四庫全書》本。

《書史會要》，[明] 陶宗儀撰，《四庫全書》本。

《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美] 包弼德著、劉寧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四庫全書總目》，[清] 紀昀等撰，中華書局1965年。

《四庫提要辨證》，余嘉錫著，中華書局1980年。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清] 阮元撰，商務印書館1955年。

《嵩山集》，[宋] 晁公溯撰，《四庫全書》本。

《嵩山文集》，[宋] 晁説之撰，《四部叢刊續編》本。

《宋稗類鈔》，[清] 潘永因輯，《四庫全書》本。

《宋朝事實類苑》，[宋] 江少虞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宋代東京研究》，周寶珠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宋代詩學通論》，周裕鍇著，巴蜀書社1997年。

《宋代文化研究》（第二集），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宋會要輯稿》，［清］徐松等編，中華書局 1957 年縮印本。

《宋兩湖大郡守臣易替考》，李之亮著，巴蜀書社 2001 年。

《宋兩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李之亮著，巴蜀書社 2001 年。

《宋兩江郡守易替考》，李之亮著，巴蜀書社 2001 年。

《宋論》，［清］王夫之撰，中華書局 1964 年。

《宋南渡詞人羣體研究》，王兆鵬著，臺灣文津出版社 1993 年。

《宋名臣言行録》，［宋］朱熹輯，《四庫全書》本。

《宋名臣言行録續集》，［宋］李幼武輯，《四庫全書》本。

《宋人軼事彙編》，［清］丁傳靖輯，商務印書館 1958 年。

《宋詩鈔》，［清］吴之振等輯，中華書局 1986 年。

《宋詩話考》，郭紹虞著，中華書局 1979 年。

《宋詩紀事》，［清］厲鶚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宋詩選注》，錢鍾書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9 年第 2 版。

《宋史》，［元］脱脱等撰，中華書局 1978 年。

《宋史紀事本末》，［明］陳邦瞻編，中華書局 1977 年。

《宋史翼》，［清］陸心源輯撰，中華書局 1991 年。

《宋人别集敘録》，祝尚書著，中華書局 1999 年。

《宋文節公全集》，［宋］黄庭堅撰，清光緒義寧州署刻本。

《宋藝圃集》，［明］李蓘撰，《四庫全書》本。

《宋元學案》，［清］黄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中華書局 1986 年。

《蘇軾年譜》，孔凡禮著，中華書局 1998 年。

《蘇軾詩集》，［宋］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 1982 年。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 1986 年。

《涑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四庫全書》本。

《遂初堂書目》，［宋］尤袤撰，《四庫全書》本。

《歲寒堂詩話》，［宋］張戒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孫公談圃》，［宋］孫升語、［宋］劉延世編，《四庫全書》本。

《孫可之集》，［唐］孫樵撰，《四庫全書》本。

T

《太倉稊米集》，［宋］周紫芝撰，《四庫全書》本。

《談藝録》，錢鍾書著，中華書局 1984 年。

《唐宋詩學論集》，謝思煒著，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唐宋文學研究》，曾棗莊著，巴蜀書社 1999 年。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撰，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年。

《鐵圍山叢談》，［宋］蔡絛撰，中華書局 1983 年。

《桯史》，［宋］岳珂撰，《四部叢刊續編》本。

《艇齋詩話》，［宋］曾季貍撰，《歷代詩話續編》本。

《通志》，［宋］鄭樵撰，中華書局 1995 年。

《桐江集》，［元］方回撰，《宛委別藏》本。

《桐江續集》，［元］方回撰，《四庫全書》本。

《童蒙詩訓》，［宋］吕本中撰，《宋詩話輯佚》本。

W

《宛陵先生集》，［宋］梅聖俞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直方詩話》，［宋］王直方撰，《宋詩話輯佚》本。

《渭南文集》，［宋］陸游撰，《四部叢刊》本。

《聞見近録》，［宋］王鞏撰，《四庫全書》本。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5 年。

《文心雕龍注》，［梁］劉勰撰、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年。

《文忠集》，［宋］周必大撰，《四庫全書》本。

《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周裕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文憲集》，［明］宋濂撰，《四庫全書》本。

《五燈會元》，［宋］釋普濟撰，中華書局 1984 年。

《五桃軒集》，［宋］夏倪撰，《兩宋名賢小集》本。

《五總志》，［宋］吴坰撰，《四庫全書》本。

X

《西渡集》，［宋］洪炎撰，《四庫全書》本。

《西清詩話》，［宋］蔡絛撰，《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本。

《溪堂詞》，［宋］謝逸撰，《四庫全書》本。

《溪堂集》，［宋］謝逸撰，《四庫全書》本。

《西溪叢語》，［宋］姚寬撰，中華書局 1993 年。

《習學記言》，［宋］葉適撰，《四庫全書》本。

《香譜》，［宋］洪芻撰，《四庫全書》本。

《湘山野録》《續録》，［宋］釋文瑩撰，中華書局 1984 年。

《象山先生全集》，［宋］陸九淵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中華書局 1974 年。

《小學紺珠》，［宋］王應麟撰，《四庫全書》本。

《謝幼槃文集》，［宋］謝薖撰，《叢書集成初編》本。

《新安文獻志》，［明］程敏政編，《四庫全書》本。

《須溪集》，［宋］劉辰翁撰，《四庫全書》本。

《續墨客揮犀》，［宋］彭□輯撰，中華書局 2002 年。

《續資治通鑒》，［清］畢沅編，中華書局 1957 年。

《續資治通鑒長編》（附拾補），［宋］李燾編、［清］黄以周等輯補，中華書局 1986 年。

《宣和畫譜》，［宋］佚名撰，《四庫全書》本。

《雪溪集》，［宋］王銍撰，《四庫全書》本。

Y

《揅經室集》，［清］阮元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彦周詩話》，［宋］許顗撰，《歷代詩話》本。

《養一齋詩話》，［清］潘德輿撰，《清詩話續編》本。

《野老紀聞》，［宋］王楙撰，《四庫全書》本。

《伊川擊壤集》，［宋］邵雍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伊洛淵源録》，［宋］朱熹撰，《四庫全書》本。

《夷堅丙志》，［宋］洪邁撰，《續修四庫全書》本。

《遺山先生遺集》，［元］元好問，《四部叢刊初編》本。

《倚松詩集》，［宋］饒節撰，《四庫全書》本。

《彝齋文編》，［宋］趙孟堅撰，《四庫全書》本。

《藝概》，［清］劉熙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隱居通議》，［元］劉壎撰，《四庫全書》本。

《瀛奎律髓彙評》，［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永樂大典》，［明］解縉編，中華書局1986年。

《輿地碑記目》，［宋］王象之撰，《四庫全書》本。

《于湖居士文集》，［宋］張孝祥撰，《四部叢刊》本。

《玉壺野史》，［宋］釋文瑩撰，《四庫全書》本。

《豫章黄先生文集》，［宋］黄庭堅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豫章詩話》，［明］郭子章撰，《豫章叢書》本。

《豫章文集》，［宋］羅從彦撰，《四庫全書》本。

《玉照新志》，［宋］王明清撰，《四庫全書》本。

《御定淵鑒類函》，［清］張英、王士禎等編，《四庫全書》本。

《元祐黨籍碑考》，［明］海瑞撰，《學海類編》本。

《元祐黨人傳》，［清］陸心源，《潛園總集》本。

《樂府雅詞》，［宋］曾慥編，《四部叢刊初編》本。

《雲麓漫鈔》，［宋］趙彦衛撰，中華書局1996年。

《雲卧紀談》，［宋］釋曉瑩撰，《卍續藏經》本。

《雲莊四六彙話》，［宋］楊囦道撰，《讀畫齋叢書》本。

《韻語陽秋》，［宋］葛立方撰，《歷代詩話》本。

Z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宋］陳與義撰、［宋］胡穉注，《四部叢刊初編》本。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唐］柳宗元撰、［宋］潘緯注，《四部叢刊初編》本。

《張文潛先生年譜》，邵祖壽編，《宋人年譜叢刊》本。

《張右史文集》，［宋］張耒撰，《四部叢刊初編》本。

《張氏可書》，［宋］張知甫撰，《四庫全書》本。

《中國歷代文論選》，郭紹虞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册），譚其驤主編，地圖出版社 1982 年。

《中國通史》，范文瀾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5 版。

《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著，中華書局 1961 年。

《竹友集》，［宋］謝邁撰，《四庫全書》本。

《莊簡集》，［宋］李光撰，《四庫全書》本。

《昭昧詹言》，［清］方東樹撰，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1 年。

《直齋書録解題》，［宋］陳振孫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朱子語類》，［宋］朱熹撰、［宋］黎德靖編，中華書局 1986 年。

《竹坡詩話》，［宋］周紫芝撰，《歷代詩話》本。
《竹隱畸士集》，［宋］趙鼎臣撰，《四庫全書》本。
《莊子集釋》，郭慶藩輯，中華書局 1982 年。
《拙齋文集》，［宋］林之奇撰，《四庫全書》本。
《紫微詩話》，［宋］吕本中撰，《歷代詩話》本。
《紫微雜説》，［宋］吕本中撰，《四庫全書》本。

後　記

本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

兩年多前，我接觸到江西宗派詩人的資料，進入其生動豐富的生活圖景，詫異於在那個貧乏的時代，他們所擁有的執著、豐滿、熱烈。這是相關文學史及研究著作所没有言及的。我嘗試着爲宗派詩人製作簡表，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傷逝”的主題令我動容。這種感動，後體現在本文“情感的複奏——‘滿城風雨近重陽’詩的多次補作”專題及汪革去世所引起震悼之描述中。謝邁《潘邠老哀詞》：“維君之文兮，予謂不朽。於今之世兮，只以覆瓿。不顯於今兮，固傳於後。嗚呼！君身槁壞兮，君名星斗。”道出了宗派詩人擇善固執的默默堅持。吕本中作《江西宗派圖》，就是要“録其名字，以遺來者”。但這種深意顯然被後代研究者忽略。南宋初期，江西詩學成爲顯學，但宗派詩人師友承傳、寂寞自任，上承元祐文學之盛，下啓南渡詩學之中興的歷史功績，却慢慢被人淡忘。他們的名字變得模糊，詩歌開始亡佚，生平事蹟也漸次湮没。後世對江西宗派有一些想當然的評價，如“凡掛一名其中，有榮耀焉”、“滄海横流”、“形式主義”等，這

是因隔膜產生的誤解。謝逸《祭汪伯更教授文》之"嗚呼哀哉！廉恥道喪，忠義氣塞。乘時射利、變節從俗者滔滔皆是，乞食墦間、舐痔得車者面有德色……"的長歌當哭，在我心中縈繞不去。道義和强權拔河，個體生命消亡，而文學的內在品格却不會失落。我感慨着和激動着，有發潛德之幽光、爲古人樹碑立傳的願望。這使本次研究成爲我尚友古人的一次經歷，從而有益於我自己的人生。

一直想續寫"滿城風雨近重陽"，苦無詩思。現文稿即將付梓，重陽風雨適至，作《九月七日改書稿既風挾雨至用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句廣爲三絶句》，與古人酬酢：

滿城風雨近重陽，赤壁煙林接混茫。擬把黄花方覓句，催租人至意彷徨。

滿城風雨近重陽，玉樹凋殘舊雪堂。覆瓿銷聲身後事，平添呂謝淚千行。

滿城風雨近重陽，校畢遺編酹一觴。後日登高雲散否？重傾樽酒賦秋凉。

祝尚書先生指導了本論文的寫作。項楚先生、張志烈先生提出綱領性建議。周裕鍇先生以所輯數十首佚詩惠示。傳璇琮先生、蔣寅先生、張伯偉先生、王兆鵬先生、沈松勤先生、熊良智先生、常思春先生、馬德富先生、劉文剛先生、謝謙先生給予修改意見。師友淵源，今古不隔。

作爲宋代影響最大的文學流派，江西宗派涉及許多複雜、重

要的文學問題和現象。這些問題和現象，非本書所能囊括，非淺陋如我者所能把握。錯誤和疏漏在所難免。目前，我計劃編制《江西宗派年譜》，并就“後期江西詩派”等題目展開後續性研究。對本書已出現的問題，及我下一步當注意的事項，祈願得到方家的賜教。

伍曉蔓
甲申秋於川大緑陽村